

目 次

代编辑室报告：「科学科技研究（STS）与传播研究之美丽邂逅」
.....江淑琳/i

专题论文

社交媒体之双重性：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郑宇君/ 1
探索数位即时新闻生产之物质性的可能研究取径.....江淑琳/ 27
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方念萱/55

张金策与 1990 年代的台湾左翼媒体：

《群众》杂志及《群众之声》电台.....林恕晖/85

「大谎言」：川普如何活用经典的威权主义宣传技巧？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着·谢侑恩译/125

在传媒的末日前创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郑国威/133

研究志要

我国公视节目规划策略之探讨.....徐福德、胡元辉/143

书评书介

关于「看见」的持续思考与对话.....郭力昕/199

评《文化资本-创意英国的兴起与衰退》.....蔡蕙如/209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四期
2016 年 12 月

两岸交流

《众志》以两岸民众为主体 推动文艺跨境交流.....李哲宇/217

稿约

稿约详情请见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代编辑室报告：
科学科技研究（STS）与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 Studies）之美丽邂逅

江淑琳*

本文引用格式

江淑琳（2016）。〈科学科技研究（STS）与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之美丽邂逅〉。《传播、文化与政治》，4:i-v。

* 作者江淑琳为本期专题主编，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壹、整合 STS 与传播研究之可能

此专题之诞生，源自于三位写作者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及科学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或有做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之学术背景与学术历程，以及本刊主编慧眼催生此主题。传播技术一日千里，科技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此两极端早已无法回应当前传播现象，于是，我们试着想从 STS 领域借来可以与传播研究对话、或者激发传播研究想象的取径与理论。同时也补充 STS 研究在传播相关技术发展上的文献欠缺。从两个领域的共同基础与互利角度上寻求整合。

一方面，传播研究长久以来忽略研究「科技物」本身，或者将科技物当成文本进行媒介社会学式研究，并未将科技物置于关键位置。即便传播研究论及传播科技物，也容易陷入科技决定论与否的争议泥沼。近年来德国媒介思想家 Friedrich Kittler 对媒介技术的研究或可填补传播研究对科技物隐约的略而不谈，不过，Kittler 重视科技物、不谈人的论述方式，时而引致科技决定论之批判上身，类似的批判也发生媒介生态学重要学者 Marshall McLuhan 对科技的看法上。STS 或可补此不足，同时谈及科技物，也注意人类社会与科技物的关系、过程。

另一方面，STS 领域中对传播科技或传播媒介的研究虽不能说付之阙如，但相较于其他科技物的研究，STS 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三十多年来，媒介或传播科技并不如生物技术或其他科技物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之一。资讯传播科技的研究或可补此不足，发展出以传播科技或传播技术为研究重点。

STS 学者与传播研究学者近几年已经注意到上述现象，开始思考两个研究领域的互动与整合（例如，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Wajcman & Jones, 2012）。STS 研究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传播研究重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STS 不仅只研究科技物本身，也研究科技物的发展过程，摒弃科技决定论，也反省社会决定论，同时思考科技与社会之相互形塑（mutual shaping，爱丁堡大学 STS 学者 Robin Williams 所用之词汇）、相互生产（coproduction，哈佛大

学 STS 学者 Sheila Jasanoff 所用之词汇)。传播学者则是借用 STS 领域的概念来分析传播科技与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在论及两个领域整合时，目前两个领域学者们最常谈及的是物质性概念 (Materialisation)、媒介化取径 (Mediatisation)、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此三者均试图将媒介技术、人、结构等各种相关要素或行动者纳入传播研究中。从组织理论发展而来的物质性概念，不仅讨论具体与无形的物质，也将结构或环境因素纳入讨论。媒介化理论讨论的两大重点在于媒介与其他建置 (institution) 的关系、媒介与各种建置互动的过程，强调共时或历时的互动，强调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被用来分析媒介的新闻室里的新闻生产 (例如：Emma Hemmingway, 2008)。本专题即是在这样的关怀下孕育产生，试着从两个研究领域切入，找出彼此可以整合的概念与途径。并提供可能的实证观察。但我们要特别强调，此整合角度并非唯一，只是抛砖引玉，提出可能整合的想象。

贰、本专题三篇文章的阅读脉络

郑宇君以社交媒体的二元性质探讨传播研究与 STS 同时关怀的物质基础与社会连结，探讨如何将两种研究领域的关怀带入社交媒体的研究中。江淑琳的论文则以亲身经历并观察即时新闻产制现象而孕生问题意识，以物质性概念为核心，试图爬梳 STS 与传播研究两个领域的对话可能。在此两篇实证观察与文献探讨及理论整合之论文后，方念萱的文章则试图让两个领域的理论对话，她聚焦在近来欧洲传播研究关注的「媒介化」概念，以及 STS 领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之「全景」概念，同样试图整合 STS 与传播研究，但更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提供未来实证研究的概念化理路。以下分别突出三篇文章对于 STS 与传播研究整合之观点与可能的贡献。

郑宇君的论文〈社交媒体之双重性：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以物质性的概念为主，从社交媒体的技术与人之双重连结，提醒读者与研究者，社交媒体的内容交换与消费建筑在其物质性的基础上，社交媒体的物质性基础在本文中谈的是社交媒体的计算功能，计算方式影响到内容提供者与使用者所

能连结的对象，因而社交媒体同时具有科技物与人的双重面向。郑宇君在本文中已经勾勒出 STS 与传播研究整合之可能取径。

江淑琳的论文〈探索位数即时新闻生产之物质性的可能研究取径〉观察即时新闻产制现象，试图结合 STS 与传播研究中可使用的取径或理论角度，希望有助于实证分析。延续本专题第一篇文章所点出的物质性概念，本文也从物质性的理论关怀出发，整理 STS 与传播研究两个领域对于媒介技术或媒体现象的研究文献，并讨论两个理论领域在传播相关议题上的研究进展与可整合之处，像是科技物的「诠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行动者网络则是目前两个领域学者进行初步整合的理论之一，江淑琳在文中亦提及行动者理论的可能应用，以及会遇到的问题。不过，行动者网络理论仍不失为 STS 与传播研究可以整合的方式之一，这有待更多实证资料分析。

方念萱的论文〈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一文，可以看出作者从理论上整合 STS 与传播研究两个领域的企图心，也可进一步视为本专题前两篇论文的理论视角。方念萱从近来欧陆媒介研究提出的「媒介化」取径着手，整理并论辩此取径作为理论的各种讨论焦点，包括媒介化理论是否为中程理论？媒介化研究中的媒介位置？媒介化研究中，媒介与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等等。方念萱接着比较 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全景」(panorama) 概念与「媒介化」概念。关于媒介化理论的问题，除了科技物与社会的关系之外，传播学者对于此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证分析也有所批判。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也有分析上的困难，但在 STS 领域已累积不少相关研究之后，应用于实证上的可行性或许略胜于媒介化理论一筹，传播领域学者或可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参、邂逅之后？

我们不断思考，STS 与传播研究可以如何整合、借用，以更周全地描述并分析当前传播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建议：一方面从概念着手，传播研

究可以借用 STS 领域的相关概念进行现象的分析；一方面从分析的对象着手，STS 可以将传播科技视为分析对象。

在对象上，无需限于传播科技。例如，传播领域在进行科学传播分析时，也可以借用 STS 对「专家」(expert)、「专家知识」(expertise)、「常民」(laypers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 等概念分析传播科技以外的科学传播现象；STS 领域在分析公众参与 (public engagement) 时，也可以借用「媒介化」等相关传播概念来进行诸如医药新闻媒介化的现象。

又例如，STS 学者在早期著作中受到马克思传统对于劳动过程争议的影响，对军事科技以及产品设计的社会形塑深感兴趣（例如 Mackenzie & Wajcman, 1985）：

又或者 STS 对于后印刷时期的媒介中介讯息之接收与消费深感兴趣。这些同时都是传播研究关怀的现象，如果能够整合两个领域，或可以点出同一现象的不同研究角度。

然而，我们并非乐观以为整合之后，两个领域各自的理论、方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整合之后或许无法完全解决实证研究上会遇到的问题，但我们希望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分析现象，让现象的分析更为多元，也希望透过跨域分析，打破既有的领域界线 (boundary)，能够进一步补充不同领域内既有概念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这也正是跨领域研究被希冀之处。

参考书目

- Boczkowski, P., & Lievrouw, L. (2009). Bridging ST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larship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J. Hackett, O. Amsterdamska, M. Luch & J. Wajcman (Eds.),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 (pp. 949-977). Cambridge, MA: MIP Press.
- Hemmingway, E. (2008). *Into the newsroom: Exploring the digital production of television new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ajcman, J., & Jones, P. K. (2012). Border communication: Media sociology and S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6), 673-690.
- MacKenzie, D., & Wajcman, J. (Eds.). (1985).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四期
2016 年 12 月 頁 i-v

社交媒体之双重性： 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

郑宇君**

本文引用格式

郑宇君（2016）。〈社交媒体之双重性：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传播、文化与政治》，4:1-25。

投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 本文为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探索社交媒体之民意形成过程》（计画编号：MOST103-2410-H-364-004-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特别感谢国立政治大学水火计画研究团队成员共同参与文献阅读与讨论之贡献。

**作者郑宇君为玄奘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副教授，e-mail: colisa@gmail.com。

《摘要》

本文从社交媒体之双重性出发，主要探讨社交媒体带来了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二者背后的物质基础。社交媒体平台创造了一个连结的生态系，一方面鼓励使用者互为好友，形成巨型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则是透过技术的连结，将各种不同的平台构成一个连结的生态系，促成讯息的快速流动与群众的集体协作。

本文认为，当前社交媒体之浮现样貌乃是人的能动性资讯的内在结构二者共同演化的结果，因而探讨社交媒体的双重性亦可分为两类研究取径：第一类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从理论观点或批判立场指出演算法背后的意识型态与社群平台隐含的结构限制，及巨量资料（big data）研究取径可能带来的隐私问题或研究局限；第二类则是人文社会学者结合资讯技术，收集与分析社交媒体平台的大量数据，透过实证资料的分析与诠释来探讨用户数位足迹所代表的意义。

关键词：分享、平台、社交媒体、连结性、巨量资料、演算法

壹、前言

自古以来，凡是有人群存在，就一定会有人际互动与交往，今日社交媒体的普及即奠基于此一古老的社交行为，不同的是当前的人际交往与关系维系，并非完全透过传统的面对面沟通互动，很大部分是以社交媒体做为中介平台来维持人际网络的互动，但社交媒体的人际互动，不只仰赖人与人的互动，更包括平台演算法的推荐好友、主动 tag 等机制，因此本文目的主要是探讨社交媒体背后的物质性，像是演算法如何决定讯息的可见性、将朋友化约为可计量的节点，这些设计影响了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互动与讯息流动。

何谓 social media? 一般意指 Web 2.0 后的网路服务发展, 包含 Facebook、YouTube、Blog、Wiki 等促进双向互动, 强调使用者创作内容、集体协作与分享的网路服务。Social media 并未有统一的中文译名, 有人译为社会媒体、社交媒体或社群媒体, 译为社会媒体着重平台上互动社群所有的社会性 (翟本瑞, 2011), 译为社交媒体则在强调它透过人际网络的连结构成庞大的讯息流动系统 (郑宇君、陈百龄, 2012), 商业及行销场域则称为社群媒体, 强调它能聚集成千上万群众的能力。由于本文旨在强调 social media 透过连结形成的强大影响性, 因而以下统一称为社交媒体。

与 Web1.0 网路服务相较, Web 2.0 的社交媒体之最大特点在于平台业者本身绝大多数不产制内容, 完全依靠使用者自制内容 (UGCs) 来吸引用户互动, 包括一般用户与机构用户 (新闻媒体、电视台、电影公司等), 因此平台业者经营重点在于如何依据不同社群需求来设计平台, 吸引用户在平台上互动并产生内容。Gitelman (2006, p.7) 给媒体的定义最能体现社交媒体的特性。她指出: 「媒体做为沟通之社会化体现的结构, 这个结构一方面包含了技术型式与其相关协定 (protocols), 另一方面这个结构是一种文化实践, 不同的人具有同样的心智地图、他们分享并投身于再现的通俗本体论, 形成一种仪式化搭配」。因而, 媒体是一种独特且复杂的历史主体, 且这个历史必然是社会与文化, 而不只是技术如何导出另一个技术的故事而已。

van Dijck (2013) 指出, 社交媒体体现了双重连结, 一是连结性 (connectedness), 它是驱使许多用户登入网站的动力, 亦即人与他人产生连结, 因而这些网路平台更加强调社交性, 另一方面平台的可连结性 (connectivity) 快速成为有价值的资源, 社交媒体平台所属的大型公司, 如:

Google、Facebook，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用户资料，这些资料是促成连结的副产品，所以这些公司想办法让用户持续上线，工程师找出方法将用户互动资讯编码到演算法，得以帮助品牌获得线上社交性更佳的市场。它促成的结果是平台之间的相互连结，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YouTube 彼此之间经常相互连结，因而一个新的内在结构浮现：一个连结性媒体的生态体系（ecosystem），由少量却规模大、大量却规模少的社交媒体业者互相连结而成。这个转变发生在千禧年以来的短短十年间，从网络化传播到「平台式」社交性，也是从参与式文化到连结性文化过程，社交平台的组成和人们的社交实践是相互影响的，用户会使用不同策略发出适当的讯息，这是用户衡量所属组织或机构而自行协调的结果。

Cloudry 与 van Dijck（2015）进一步探讨在「媒体」与「社交」之间的辩证性，当我们宣称媒体被社会化的同时，它迫使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个媒体与资讯内部结构相互延展、覆盖，并成为更深刻地镶嵌在日常生活的肌理。Cloudry 与 van Dijck 探询的正是社交媒体的 social 有何重要，他们指出 social 的再现是所有权力交织后的结果，权力的所有形式交织在社交的某种再现中，因而社交媒体就是这个战役的核心，在此所指的权力意谓了个人资料与经济价值。例如：在社交软体的内在结构中，「社交」变成一种新的主宰性技术—经济物质性之效果，资料流激发成为一个经济系统，包含点击数量、朋友数量等，但这种操作化及商品化并非是资料化的结构，这三者都是交织在使用及平台预先设定的经济体里。

社交媒体当中的「社交」性，更接近布西亚所言是社会（the social）的终结，在媒介社会里，符号交换成为社会互动的核心，布西亚更声称在后现代当中，符号、认同、机构与所有坚硬的意义界线都产生内爆，将导致社会的终结（Baudrillard,1983）。社交媒体世界里的社会互动不仅使用符号、更有技术介入的特质，对于成长在智慧型手机与社交媒体普遍的数位原住民，他们所体会到的社交性早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面对面互动。

van Dijck（2013）将社交媒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社交网络平台（social network sites，简称 SNSs）：以社交网络为基础的社群网站，这也是最大宗，包括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皆属于此类；（二）使用者产制内容平台

(user-generated content, 简称 UGCs): 这类为使用者创作内容的分享平台, 如: YouTube、Flickr、Wiki 等; (三) 交易与行销平台 (trading and marketing sites, 简称 TMSs): 以交易或行销为主要目的之社交平台, 如: eBay、Amazon 等; (四) 游戏平台 (play and game sites, 简称 PGS): 以线上游戏为基础的社交互动平台。其中, 第一大类的社交网络平台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平台, 其次为第二类的使用者创作内容分享平台, 这二类皆有超大型且具影响力的平台; 第三、第四类社交媒体平台则较为封闭, 仅限于特定公司的消费者, 他们的规模较小、数量众多, 用户基于特定兴趣参与这类游戏或交易平台, 用户资料也多半属于公司内部资料。因而, 多数的社交媒体研究皆针对前二类平台所进行, 这类平台通常有开放的应用程式界面 (API) 供研究者或第三方撷取部分用户资料, 本文后续讨论亦以 SNS 平台为主要对象。

本文将从社交媒体之双重性出发, 主要探讨社交媒体带来了人的连结与技术的连结, 二者背后的物质基础。在社交媒体上每一次的点击互动都代表着社交媒体的双重连结,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正面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而用户没有看见的背面是平台技术的连结。有了连结就会促进了分享与交换, 在社交媒体中, 人们分享的是: 文字、照片、影音内容、资讯、商品、对话、情感、意义、协力工作、社群感、认同; 在此同时, 平台之间则交换了资料与后设资料 (metadata), 像文本、图像、影音、超连结、用户记录等。正是藉由社交媒体的双重连结, 人们得以在平台上进行永不停歇的交换、扩张、延伸、再交换, 得以形成今日庞大、涵括全球用户的巨型社交网络服务。

从社交媒体生态系的角度来看当前网路社群的流动变化: 社交媒体平台因应商业需求不断修改演算法与使用者界面的配置, 它改变了用户体验与社群行销方式, 同时促成社群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中跳进跳出, 每个人使用多种社交媒体已是常态, 如: 对年轻世代而言, Facebook 成为人际互动的公开入口, Facebook 好友包括父母长辈及学校同学, 藉此进行公开社交或报告讨论, 但较亲昵的朋友则以 Instagram 互动, 以保有隐私。因而, 一方面社群必须在社交媒体的内在结构限制下互动, 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交或资讯接受方式, 会弹性调整个人使用方式。因而从双重连结的角度来探讨社交

媒体，必须同时从人的能动性与资讯内在结构的限制来看，我们才能理解二者的共同演化造就了今日社交媒体之浮现样貌。

探讨社交媒体的双重性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取径也分成二大取径：第一类取径主要是批判的技术哲学，研究者主要从理论观点或批判立场指出演算法背后的意识型态与社群平台隐含的结构限制，以及巨量资料（big data）研究取径可能带来的隐私问题或研究局限，以软体研究、平台研究为代表；第二类取径则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结合资讯技术，收集与分析社交媒体平台的大量数据，透过实证资料的分析与诠释探讨用户社群之数位足迹所代表的意义。以下分别从这二种取径来介绍他们如何看待社交媒体的双重连结。

贰、社交媒体之批判的技术哲学观点

一、技术的连结：人际互动之媒介化与数位化

van Dijck（2013）将社交媒体的特性定义为在「连结性文化里的工程化社交性」（Engineering Sociality in a Culture of Connectivity），意指社交媒体里的社交性是由各种工程技术组建而成，有别于人类社会自然存在的社交性。以 Facebook 例，当社会活动被转换为系统化 / 演算法的概念，人类的连结和自动化的连接，就会以相似的合并产生，但这种作法并无法全然复制人类的社交互动。举例而言，在线下世界和我们高度连结的人，连结程度是以他们的地位和品质来衡量，而非接触次数，但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则是由系统将自己以外的其他用户区分为朋友和陌生人这二类，因而「社交」事实上是经过电脑化输出和人类投入而形成的结果。因而，要形成一个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是不能把两者分开来的。

从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或科技文化（techno-cultural）结构来看社交平台的结构，主要的技术在于如何将用户的社交行为予以编码(coding)，当中包含五个组成元素：（一）资料 / 后设资料（Data/Metadata）：后设资料是关于资料的资料，是资料的结构信息，如：资料生成的地理、时间资讯或

暫存档 (cookies)，它有助保護智慧財產，但自動生成的後設資料有時會侵犯個人隱私，再次成為用戶與平台所有者的抗爭戰場；(二) 演算法 (Algorithm)：意指平台利用某種公式與參數來計算社交互動，演算法決定了社交平台的競爭力，因此通常是商業機密；(三) 協定 (Protocol)：用以統一不同系統之間的資料格式，以隱蔽方式引導用戶行為朝向管理者偏好方向進行，有人視協議為「管理者霸權」；(四) 介面 (Interface)：分為用戶可視介面與用戶不可視介面，可視介面意指客戶終端介面，通常是圖像化、易操作的，而不可視介面則是用來連結軟體與硬體，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則是介於二者之間，對於應用程式開發者而言，API 是部份可視的介面。(五) 預設值 (Default)：軟體中的預設值，具有引導用戶的功能 (van Dijck, 2013)。

然而，一般用戶很難體察社交媒體平台技術之組成結構對於用戶行為產生的影響，舉例而言，當 Facebook 將用戶貼文預設為公開，多數用戶在開設帳號時並不會逐一檢視或修改個人隱私設定，用戶以為自己是跟親友分享照片，結果是將個人隱私曝露在不知名人士的目光下，就可能造成很大影響。

1

Beer (2009) 認為一般用戶在社交媒體從事日常活動是一種「技術無意識」(technology unconsciousness) 的狀態，一方面人們意識不到自己的受眾是誰、這些行為會對誰起作用，另一方面未能意識到我們傳播行為的機制，因此他強調不該將使用者視為獨立於技術以外的行動者，而是需要被提醒、無法分清人與技術界線的分析對象。

Lash (2007, September) 指出資訊在人們當前生活與環境中扮演重要的形構角色，社交媒體當中的軟體演算法 (software algorithms) 的決策力量挑戰了人類能动性，Lash 認為曾是媒介 (medium) 的東西，今日已經變成了一種物，一種產品 (a thing, a product)，資訊成為我們如何生活、存有、行

¹ Facebook 自 2014 年 5 月改進隱私設定，將新用戶貼文預設不公開，新用戶預設分享對象會由之前的「公開」調整為「朋友」，對既有用戶，Facebook 也推出新的隱私檢查工具，讓用戶可以循序檢視他們的貼文分享給了誰、用了哪些 app，以及重要個人資料的隱私設定。參見 <http://www.ithome.com.tw/news/87984>

事、接触事物，与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不只靠资讯理解世界，资讯更在其中扮演积极的建构角色。这些资讯秩序造成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崩解与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论的」或认识（knowing）模式越来越与我们的存有方式（modes of being）相关。

Hayles（2006）强调软体在社交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却经常潜伏在其背景内，它对建构与分类人、地、物之影响往往难以看见，在高度发展与网络化的社会中，人类意识包含了巨大资料流量金字塔所给出的资讯提示（tip），而这些提示大多发生在机器之间，透过关连性资料库与在地硬体之传播互动产制了资讯，也用作决策。Hayles 形容这是一个「认知领域」（cognisphere），意即它是一个人与机器多重地共同演变与高度连结之复杂系统。这种具有认知潜能的主动和互动技术，不需人类参与也能运作，它是一种自动的传播（automated communications）；它成为了生活一部分，却不一定被意识到，大部分的传播将在智慧装置之间自动地发生，人类只能介入这传播过程的一小部分，这过程的绝大部分是人类所没有察觉或真正知道的。

Lash（2007）以后霸权来形容今日的资讯社会，在过往时代，霸权作为权力，透过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它以社会结构中的物质改变来说明与重构权力；但在后霸权时代中，霸权已经走进了日常生活，而权力也更是从「里面」（而不是从上而下）运作。他指出：「若霸权秩序（hegemonic order）是透过再生产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reproduction）进行，那后霸权权力则是以创造发明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invention）施展。」对 Lash 来说，电影、唱片、印刷品属于再生产的领域，网路上的评论、部落格、标签、交友（friending）等内容创建则属于创造发明，它们一方面为用户主动地生产，另一方面被动产出了一些生产轨迹。Lash 所言的创造发明可连结到 Web 2.0 时代最重要的使用者产制内容之特色，它不仅指向 YouTube 中众多素人上传的影片，也指向更多人日常的拍照、打卡、留言等行为，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行动，累积成一股庞大的影响力量，例如：YouTube 每日最多人浏览之影片即是一人上传、数百人留言、千万人点阅所共同创造而来。因此，在后霸权时代，权力取代论述与认知判断，渗透到我们每个人之中，权力成为我们存有之一部分，与我们同时生活，回应我们，这是一种从内运作的权

力方式，它会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举例而言，透过使用者产制、分类线上内容的标签，已让资料「找到我们」。

就社交平台的公司而言，Facebook 创办人马克佐伯格强调人们连结的关系是社交的基础，科技仅方便社交活动的进行，然而这种作法是让人与人的连结成为资源，社交成为一种可贩卖的商品，用户的朋友关系成为脸书最珍贵的资产，它透过用户与朋友的互动痕迹来计算、推荐其他内容。批评者认为，阅听人在其中更加成为商品化，使用者用个人隐私交换更多样化的线上社交活动（van Dijck, 2013）。

当代社交媒体的全面渗透，使人们更难以脱离社交媒体生活，像 Facebook、Twitter、YouTube 成为建构当前媒体事件发生与人际关系连结的重要力量，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就像一个微生态体系，这些平台彼此连结并组合成一个连结性媒体的生态，它涵盖了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并会自我组织与蓬勃发展。

二、人的连结：分享作为一种意识型态

社交媒体上多数人的分享对于社交媒体的讯息传递很重要，然而社交媒体内容的分享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经由技术的介入形塑出一种「分享」（sharing）的意识型态。van Dijk（2013）指出，Facebook 在技术层面创造了易于线上社群互动活动的平台，它鼓励使用者「加为好友」（friending）及「按赞」（liking），这些都是具有「分享」意识形态的行为，让「分享」形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主流价值；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所分享的内容，使用者都可以看到，Facebook 平台透过编辑过的内容排序、管理政策、商业模式，介入了使用者容易观看到什么内容，当然也包括使用者不容易看到那些内容。

van Dijk（2013）认为，「分享」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交媒体的标准生态模式，当中所发生的实践影响了社会及文化常规，例如：隐私的意涵及数据控制的常规被模糊化。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分享带来了一种参与的文化，让更多人可用简单方式参与，并关注公共事务。Jenkins、Ford 与

Green (2012) 就对社交媒体的分享文化抱持正面态度，当人们从他人处接收了分享内容，也产生新的意义，对于分享内容，人们不再是思考生产者要传达甚么讯息，而是思考分享的人到底想要传达甚么意义，社交媒体的分享文化支撑了人和他人持续对话的意愿。

Gerlitz 与 Helmond (2013) 则提出按「赞」经济学的概念，指出 Facebook 透过社交媒体按钮与资料分析平台，将影响力延伸至整个网路的野心。社交按钮是一种计算用户参与的计数器，这些计数器可以用来衡量用户连结到不同网路的行为，「赞」这一个按钮让用户产生的不同数据彼此流动，促进了网路的重组与聚合，计数器同时可跟踪用户行为，并将行为转换为参与的数据，网路上的按钮与插件 (plugin) 将不同网站彼此连结，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网路结构，因而透过推出社交插件，Facebook 用户的互动，如：喜欢、评论和分享不再局限于 Facebook，而是分布在整个网路，用户能够更广泛的将网路行为连接到他们的个人资料。例如：用户的脸书帐号保持登入状态时，当用户在新闻网站上按赞时，脸书也追踪了用户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网站不能被认为是离散的，而是一种基于相互作用的平台。这些社交插件让网站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并增加了用户的朋友在网站中的参与行动。

除了社交按钮之外，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上所建立的朋友关系，亦包含了技术介入的空间。Twitter 用追随者 (follower) 这个词汇来描述用户及其他人的关系，用户与追随者可以是双向订阅，也可以是单向追踪，后者往往比前者来得重要，一名用户的追踪者人数意谓有绝对数量的人会看到所追踪的讯息流，因而连结成为可数量化的价值，像是名气定律，你有愈多追随者意谓者你愈有价值，且别人会认为你很热门，而与你产生连结 (van Dijck, 2013)。

许多学者探讨 Twitter 用户及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认为 Twitter 用户是面对一群想象的观众说话，这群观众不仅是他的追随者而已，更包括许多因用户资料公开而可以浏览内容的用户，用户与追随者经常是不对等的关系，特别是名人拥有诸多追随者，但名人却鲜少反向订阅他的追随者。然而，用户与追随者之间仍会维持一定的互动，以满足情感及同属于一个社群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会对其追随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Marwick & boyd, 2010; Gruzd, Wellman & Takhteyev, 2011)。

由于 Twitter 预设的追踪功能开放让任何人订阅任一用户讯息,而不需经过他本人同意,除非用户将预设为开放的讯息内容全都改为隐私。Murthy (2012) 指出这使得 Twitter 上的人际互动与实体的人际关系不同, Twitter 用户会寻找有兴趣的用户进行联结,包括名人等陌生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必认识,因而, Twitter 是一种多对多媒体,推文透过不同用户之间的转推 (retweet, 简称 RT) 方式,连结到另一群使用者, Twitter 这种形式的网络媒体将人际互动带到公共领域,也因此经常成为公众意见流动的场域。

相较于 Twitter 的追踪功能, Facebook 一开始以实名制为主要诉求,希望将线下人际关系带到线上平台互动,因此最初的用户互动必须在双方互为好友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到彼此的讯息。后来 Facebook 亦开放单向追踪功能,方便用户追踪名人的讯息,更进一步出现粉丝专页 (page),鼓励企业或组织设立专页与消费者互动,将 Facebook 从个人互动的社交平台扩大为个人与机构并存的巨型社会网络。

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鼓励人们产生连结,无论是 Facebook 或 Twitter 用户,他们在线上社交媒体拥有的朋友数或追随者数量,往往远大于他们在线下世界所能维持的人际关系,因此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构成了巨型的社交网络,讯息可以透过网络中任一节点开始,最终达到快速传散目的。

在此同时,「分享」做为社交媒体兴起的重要意识形态,一方面鼓励人们在社交媒体积极分享有价值的讯息与意见,另一方面透过电脑运算技术的介入,它根据社群运算结果决定将某则讯息推荐给使用者,以获得最多的点阅或分享,或是藉由方便易用的使用者界面设计,让用户只要按一个键就可把内容分享给其他朋友,这些大量分享讯息的传布对于民意形成或群众动员的过程亦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很多研究者透过巨量资料研究取径收集社交媒体上的大量数据,藉由实证资料的分析来探讨社交媒体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影响。

参、社交媒体巨量资料研究取径

一、傳播研究与资料科学的跨领域合作

社交媒体的双重性同时为研究者带来了契机与挑战，加上巨量资料（big data）分析技术与工具的普及，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可利用资讯技术来收集与分析众多用户线上行为与使用者创造内容，产生了新的方法学领域（郑宇君，2014）。社交媒体巨量资料分析取正是透过研究用户的数位足迹，包括 data 与 metadata，并结合 non-human data（设备、地点等相关资料），了解社交媒体上的群众分享行为。随着大规模群众随时在社交媒体产制大量内容、进行频繁互动，留下大量的数位足迹资料，传统的传播研究取径无论是质化研究或量化调查，都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便有了资料领域介入的合作空间，透过跨领域合作收集大量的社交媒体实证资料进行分析。

社交媒体巨量资料分析的方法应用主要集中于下列三个面向，第一，分析用户生成的大量内容（UGC），像是社交媒体的舆情侦测与口碑分析；第二，追踪用户的数位足迹（digital trace data），分析用户的线上活动证据，如：超连结引用和 retweet 的情况，或是脸书用户的浏览与分享行为（郑宇君、施旭峰，2016；Bakshy, Messing & Adamic, 2015）；第三，分析社交媒体上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找出具影响力的用户，解释人们为何要追踪他人并分享讯息的情况（Freelon, 2014；boyd, Golder & Lotan, 2010）。

针对社交媒体用户产生的大量贴文内容，目前研究者可以透过 Twitter、Facebook API 大量收集贴文资料后，除了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之外，亦可结合资讯科技的自动化分析技术，透过大量贴文分析找出公众情绪（public sentiment）或动态框架变化。例如：Thelwall、Buckley 与 Paltoglou（2011）分析 Twitter 上的热门事件，透过测量 tweets 使用词汇增加程度，找出热门事件与正负面情绪词汇增加的关联性；Lewis、Zamith 与 Hermida（2013）则以 Twitter 上的新闻来源，混合电脑计算与手工方法在巨量资料时代进行内容分析，达到系统性的严谨，既兼顾情境的敏感性，又可使电脑运算达到演算上的正确性。

此外，透过资讯技术的协助，研究者可了解社交媒体用户的超连结引用行为，由于 Twitter 使用者透过「转推」(retweet) 资讯方式进行公共参与，它是一种「分享」的形式，可快速将讯息扩散出去。这与 Twitter 平台的资讯流通方式密切相关，讯息内容很短，因此很高比例 tweets 有延伸资讯(网址连结)。例如：郑宇君、施旭峰(2016)比较 2012 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台湾、日本、简体中文社群最常引用的新闻来源。

另一方面，强调实名制的 Facebook 则希望连结线上与线下的人际网络，这使它在人际互动与线上动员群众更具有影响力。Bond 等人(2012)研究团队与 Facebook 合作，以 Facebook 六千万的使用者进行政治讯息传播与动员之实验，研究发现线上政治动员是有效的，包括使用者的政治自我表露、资讯搜寻、是否参与投票等，因为线上网络的动员可以让使用者看到熟悉朋友的面孔，可以戏剧性地加强其效果。Bode(2012)则是针对大学生的 Facebook 日常使用与政治参与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Facebook 的使用与政治参与行为有正相关，但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

二、社交媒体公共传播之研究主题

关于社交媒体究竟属于公共领域或私人空间的论辩，许多学者采取折衷式说法：社交媒体做为公私混杂的线上空间，由于它具有社交性—人为了社交，必须拥有公共的一面，造成的结果是政治的，因此这个社交场域可做为公共与私人领域两极化的调和方式，公民觉得在此私人领域可以更安全地保有个体自主性与他们公共身份的融合，并能控制他们的公共命运，因此人们退回这样的私人领域，谈论公共事务，进行公民参与(Papacharissi, 2010)。

由于社交媒体具有非私密性与半公共性的特点，人们可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多对多的沟通，不需透过新闻媒体做为意见表达的中介，因此分析社交媒体上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研究者不需要新闻媒体的报导视为多数公众意见的「代理人」，可以直接从公众意见出发，探讨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共意见如何形成。

就公共事件的传播主题而言，针对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三类主题：第一类是与选举或政治相关的公共议题，分析特定社交媒体空间中的意见类型及内容框架的变化，如：Facebook pages（粉丝专页）、#hashtags、贴文与回应之间的关系；第二类是与重大灾难事件相关，探讨人们如何透过社交媒体分享资讯、召唤行动、表达讨论；第三类则是随着社交媒体普及，在各地唤醒的社交媒体革命或运动，包括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关注的是社交媒体如何串连人们、动员群众、形成对话的潜能。

（一）政治选举事件

关于政治选举事件的社交媒体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人们用来讨论政治事务与评论主流媒体报导的主要场域。Ampofo、Anstead 与 O'Loughlin（2011）针对 2010 年英国普选的电视辩论赛进行研究，透过同步播放的辩论，现场媒体、一般公众或线上收看的人都可提问，Twitter 使用者的讨论反映出对民调结果不信任，包括质疑民调方法纰漏、有精英阴谋论，认为政客与主流媒体企图操作选民的意识。Ampofo、Anstead 与 O'Loughlin 认为，社交媒体上的阅听人不再是被动接受资讯，而是主动讨论、寻找更多资讯，这改变了新闻消费方式，网络上有一群因政治事件窜出的 *viewertariats*，²他们作为传统媒体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中介者，在社交媒体上负责提供资讯与解读民调的业余专家角色，某种程度可以取代传统媒体的专家角色。

Burgess 与 Bruns（2012）观察 2010 年澳洲总理选举时 Twitter 社群的动态变化，探讨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内容之间的关系，他们收集内含 #ausvotes 的 tweets 共 41.5 万则，其中有 23% 的发文集中在大选当天的 24 小时内，透过分析发文讨论主题与延伸连结，结果发现虽然 Twitter 讨论大致上反映两大党与主流媒体的竞选活动内容，像是前 10 个最常出现的连结都是主流媒体

² *Viewertariats* 意指由於社交媒體提供即時互動的功能，個人可將他們的意見立即公開在網路平台上與別人互動，相對於以往，公共意見是被精英主導的，現在有愈來愈多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或是提供資訊解釋（Anstead & O'Loughlin, 2010）。

报导，但是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对于不同议题的重要性认知和讨论热度大相径庭。Burgess 与 Bruns 认为，造成 Twitter 讨论与主流媒体内容相互依赖的原因有二：（一）浮现型媒体中的对话会关注媒体本身；（二）讨论主流媒体报导容易引起社群共鸣；总结来看，Twitter 并不是独立于主流媒体之外的讨论平台空间，它可以用来过滤、评论主流报导的内容，甚至催化讨论。

许多 Twitter 研究都指出，用户用来传递或告知资讯的比例，远比真正的评论或对话来得高，也就是说发送带有超连结的贴文或直接转推（retweet）其他帐号的贴文，远比用 @user 来相互对话的比例来得高（boyd, Golder & Lotan, 2010; Small, 2011）。boyd、Golder 与 Lotan（2010）认为人们在 Twitter 上透过 RT 转发讯息即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对话，但 Small（2011）认为政治性的 hashtags 中只有部分是对话，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告知的 RT，这些 RT 只能算是资讯分享，不能算是对话、对于促成数位民主没有太多帮助，但可视为政治资讯的集散地，透过 hashtag 用来搜集跟自己兴趣相关的资讯十分有用，它主要目的就是告知，不论是提供或接收资讯。

在的选举民意与情绪分析方面，Groshek 与 Al-Rawi（2013）分析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社交媒体内容之公众情绪（public sentiment）与批判框架（critical framing），研究者选择二位主要候选人（民主党奥巴马 vs. 共和党罗姆尼）的 Facebook 专页，收集 2012 年 1 月 1 日到选举后一天 11 月 17 日的动态贴文与回应，及 Twitter 上标示 #election2012 在投票当天 24 小时的 tweets，利用 Facebook 与 Twitter API 共计收集了 142 万则社交媒体内容进行分析，透过资料探勘与断词分析方法找出不同候选人 Facebook 专页的浮现框架（emergent frames），利用概念地图将粉丝页出现频率前 200 名的字词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粉丝专页概念地图相近，在自己的粉丝页上，对手和批评性字眼的相关性较高，相较之下，在选举当天的 Twitter 上少有批判性字词，多是报导性质（如：获胜、RT 转发新闻报导结果）。

进一步比较不同社交媒体的内容特性，Groshek 与 Al-Rawi（2013）发现，相较部落格与 YouTube 的内容较为原创、具党派色彩和批判性，出现在 Facebook 多是非原创或二手资料，这可能与 Facebook 的非匿名性、易于

辨認身份特性有關，但討論內容的相互關連性較高；相較之下，Twitter 的討論範圍及熱門關鍵字則是較多元廣泛，特別是選舉當天的 24 小時，Twitter 仿佛電視新聞的即時轉播一樣在做選情報導。

（二）災難事件

在重大災難事件當中，由於災難的不確定性與災情瞬息萬變，災難事件當中社交媒體的公眾意見更具時間敏感性，且在社會機構失能之際，社交媒體往往扮演備援頻道（backchannel）的角色，第一時間將目擊影像或即時訊息發布在社交媒體。公眾利用線上論壇、部落格、維基百科、臉書、網路相簿以及微網志等資訊平台從事訊息交換、討論溝通和表達支持，進而形成社會聚合與群體協作的活動（Sutton et al., 2008; Hughes et al., 2008）。

特別在災難發生第一時間，確認親友安危與相互聯繫往往成為公眾透過社交媒體想要掌握的情況。新聞網站了解最新情況或聯繫親人朋友。例如：2005 年 Katrina 颱風期間，公眾使用手機或即時通訊軟體聯繫親朋好友以確認平安（Shklovski et al., 2008; Palen et al., 2007）；2007 年維州校園槍擊案中，學生在官方正式公布傷亡名單前的第一時間內，透過 Facebook 串聯，快速確認死亡者身分和人數（Vieweg et al., 2008）。因而，Google 在重大天災時會設立 people finder 功能，提供多對多尋人服務，以減輕救災機構的負擔，Facebook 則在 2015 年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發生時，啟動用戶確認平安功能，當地用戶可快速按下確認鍵，即會透過 Facebook 發布平安訊息，得以迅速安撫親友焦慮的心情。

學者研究發現人們在災難中使用社交媒體的主要目的可分為四種：實況更新、意見表達、情感支持和行動號召（Qu, Huang, Zhang, & Zhang, 2011）。陳百齡、鄭宇君（2014）分析 2009 年台灣莫拉克風災的災情網站內容時，將社群討論內容分為資訊、行動、討論三大類，資訊類：請求協尋人員、提供情境資訊、轉貼媒體公告；行動類：請求救援、志工物質；表達類：討論反應、要求自律；這三類訊息的數量會隨著時間變化而有所不同，其中最多仍是資訊的請求或轉發擴散，透過多對多方式滿足人們對災情即時資訊的需

求与供给；其次是号召集体行动，动员志工或捐助灾民，最后才是对灾难行动的讨论与意见表达。

（三）社会运动

社交媒体在近年的社会运动中更是扮演讯息传递与动员的不可或缺角色。Manuel Castells 率先提出网络化运动（networked movement）的概念，他看到网际网路崛起之后，产生的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现象，透过点对点传播及网际网路的连结，每个人播送的讯息都有潜能触及更广大的群众，它同时也是多样性的，可能是任何内容、以任何形式，增加它在网际网路的扩散，因而它会自我生产内容、自我决定扩散方向，并以多对多方式接收（Castells, 2007）。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网络化运动中参与的群众不再是被组织所动员而来，透过社交媒体的连结，群众的自我组织和生产，形成新型态的集体行动，群众利用科技力量超越地理和社会疆界，他们重新形塑了传播逻辑，改变了动员的方式（Bennett & Segerberg, 2012; Stohl, 2014）。Bennett 与 Segerberg（2012）提出网络化运动中的连结性行动逻辑（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强调数位传播促成抗争政治的个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数位促成的行动网络（digitally enabled action networks），利用互动性高的数位媒体将主题个人化，透过个人化网络的方式将公民讯息传播出去，号召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技术平台及应用取代了政治组织的角色，政治诉求与不满以非常个人化方式在网际网路上被快速分享，今日社运诉求的个人化主题和独立能动性超越传统社运强调的组织化效能。

在分析社交媒体大量庞杂内容时，许多研究者以动态框架分析的方式，分析公众意见的流动与转向，特别是发生在 2012 年春天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由于事件持续好几个月，参与者内部产生不同派的意见，透过社交媒体大量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研究者可掌握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讨论议题转向，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如何透过社交媒体进行意见协商，并与公众互动过程。

Meraz 与 Papacharissi (2013) 以埃及革命期间 Twitter 上的资讯传布为案例, 探讨网路上的框架与守门行动如何产生? 她们针对埃及革命期间一个月內#egypt 的 Twitter 文章进行随机抽样, 并以质化、量化并行的方法, 进行网络分析、内容分析、论述分析, 结果发现, Twitter 上的框架与守门是透过群众协力而形成, 当中显著 (prominent) 框架是经由菁英与非菁英反复地协商、修正而出现, Twitter 做为一种资讯扩散与群众沟通的网路平台提供了菁英与非菁英进行沟通的可能, 进而让框架与守门的过程结合。

然而, 在社会抗争事件中, 虽然 Twitter 可像新闻媒体一样 24 小时即时报导抗争现场状况, 但报导方式与传统媒体迥异, 情绪性浓厚, 难以分辨事实陈述与情绪呼告, 研究者认为在这类社会抗争事件的社交媒体报导浮现出一种新文类: 情感新闻 (affective news), 它常是主客观并陈、夹叙夹议, 在故事或事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虽然常常重复或模仿主流媒体讯息, 不过最重要或最受欢迎的 tweets 通常都是情绪性的, 造就了事件可能没有多少进展, 情感积累却很浓厚, 研究者认为情感新闻不是传统新闻的替代品, 而是另辟蹊径, 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兼具感知层面与情感渲染力 (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上述发现与 Hermida (2010) 的观点相符, 面对具有时效性的重大事件 (如: 选举、灾难、突发事件), Twitter 变成氛围新闻 (ambient journalism) 的模式, 它广泛、轻量, 总是在传播系统中不断互动、增生新闻, 这种新闻模式不仅渗入主流的大众媒体, 也会回头影响传统媒体之议题设定主题, 产生溢散和共鸣的效果。Nisbet (2010) 认为, 在社交媒体这种互动式的数位媒体上, 一般公众会成为更主动提供内容的贡献者、创用者、回应者, 少了传统新闻人守门的把关, 新闻框架的形成转变为互动、社会建构、由下而上的框架模式, 有别于传统新闻框架的传输模式, 许多议题的发酵都是先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之后才被传统新闻媒体报导。

整体而言, 社交媒体上的众多公众意见, 诉求的未必是意见沟通, 更多比例是为了资讯分享与扩散 (过去这点只能仰赖大众媒体来做)、动员公众自发性地参与行动 (过去这点必须仰赖政党或社团组织的动员)、只有部分内容是意见表达与沟通, 尽管意见表达所占比例较低, 但重要性却不亚于前

二者，因为这些意见表达与沟通之目的正是在于提醒公众在进行资讯扩散、群众动员时必须要有反身性思考。

肆、结语

前文简述了社交媒体的双重连结所带来的特性，它使得所有互动都夹杂了人与人的互动以及平台与平台的互动，这些互动成为平台演算法的参数，根据演算法背后的分享意识形态，引导出下一次的互动。在这个特性之下，社交媒体研究也可分为两大取径，一方面从批判的技术哲学切入，探讨平台结构及演算法所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巨量资料研究取径，人文社会学者与资料科学家的跨领域合作，取得巨量的实证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公共传播议题包括选举、灾难、社会运动，藉此了解宏观的社交媒体之社群行为。

面对资讯技术对于传播活动与研究带来冲击，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不足以因应，从目前检阅文献看来，它确实已经造成研究典范与研究方法之转移。本文前述的两种研究取径正是呼应了社会科学之批判、实证与诠释典范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投射在社交媒体研究上，它一方面反思社交媒体平台结构所隐含的限制，但也利用资讯技术的进展，强大传播研究的尺度与范围，透过巨量资料的研究取径，研究者有机会取得全球性的资料进行宏观轮廓的勾勒，并对这些结构予以诠释，像是找出网络化社会运动之连结性逻辑（Bennett & Segerberg, 2012），或是诠释全球跨语言社群对于单一选举事件的传播模式差异（郑宇君、陈百龄，2014）。

随着资讯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社交媒体生态系的蓬勃发展，目前正是典范移转的阶段，巨量资料的研究取径仍在快速发展持续变化当中。综观目前国外的发展趋势，社交媒体巨量资料分析的未来展望在于以下几个面向（Ampofo, Collister, O’ Loughlin & Chadwick, 2013; Bruns, & Highfield, 2014）：

- (一) 追踪大范围公开使用者的活动：举例来说，澳洲研究者 Bruns 团队掌握全澳洲 Twitter 用户帐号，可追踪全国用户对于特定议题或事件的发言态度 (Bruns, 2014)。
- (二) 结合质化、量化取径的资料分析：针对大量线上资料的分析结果，研究者必须结合线上参与观察及质化的文本分析，甚至是访谈，才能对资料结果进行深入的诠释。
- (三) 研究者不只分析线上资料，兼顾线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例如，政治传播学者将线上民调结果与选举的出口民调结合，分析比较线上线下载民意之差异与可能原因。
- (四) 探讨议题趋势、用户情绪、网络影响力：分析 Twitter 或 Facebook 的热门事件，测量情绪词汇的增加或减少程度，找出热门事件与正负面情绪词汇的关联性。
- (五) 出现更多新工具用来处理巨量资料与视觉化分析，可协助研究者针对大量资料进行探索性分析。
- (六) 藉由 Facebook、Twitter 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 API，或由研究者自行开发的资料撷取工具，研究者可进行大规模、即时资料的分析。

社交媒体巨量资料分析领域目前仍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研究议题待开发，等待更多研究者投入研究，产生更有价值的应用。当然，这个研究取径仍存在很多研究限制，包括抽样与收集资料的问题、道德与隐私的界线模糊、如何进行有效的测量与资料诠释、自动化分析与人工分析如何协力等问题 (boyd & Crawford, 2012; Mahrt & Scharkow, 2013)。

上述这些研究议题与方法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正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双重连结，将传统的人类互动与先进的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地绑在一起，它们交织缠绕形成庞大的全球社交网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既受到整个网络事件波动的影响，但因为在地脉络而产生不同的感应，如同 2015 年发生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因为有着技术的连结让我们第一时间感受到攻击伤亡的震撼，但又因所处在地脉络的差异，让我们有着不同于

西方或穆斯林社会的感受。对于事件既近又远的观看，既相似又差异的感受，正是今日我们生活的样貌。

参考书目

- 陈百龄、郑宇君（2014）。〈从流通到聚合：重大灾难期间浮现的资讯频道〉。《新闻学研究》，121:89-125。
- 翟本瑞（2011）。〈从社区、虚拟社区到社会网络网站：社会理论的变迁〉。《资讯社会研究》21:1-31。
- 郑宇君（2014）。〈向运算转：新媒体研究与资讯技术结合的契机与挑战〉，《传播研究与实践》，4(1):67-83。
- 郑宇君、施旭峰（2016）。〈探索 2012 台湾总统大选社交媒体之新闻来源引用〉，《中华传播学刊》，29: 107-133。
- 郑宇君、陈百龄（2012）。〈沟通不确定性：探索社交媒体在灾难事件中的角色〉，《中华传播学刊》，21:119-153。
- 郑宇君、陈百龄（2014）。〈探索 2012 台湾总统大选之社交媒体浮现社群：巨量资料分析取径〉。《新闻学研究》，120:121-165。
- Ampofo, L., Collister, S., O'Loughlin, B., & Chadwick, A. (2013). Text mining and social media: When quantitative meets qualitative, and software meets Humans, *New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Unit Working Paper*, October 2013
- Ampofo, L., O'Loughlin, B., & Anstead, N. (2011). Trust, confidence, credibility: Citizen responses on Twitter to opinion polls during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 (6), 850-871.
- Anstead, N., & O'Loughlin, B. (2010). The emerging viewertariat: Twitter responses to Nick Griffin's appearance on BBC Question Time, School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Y: Semiotext(e).
- Bakshy, E., Messing, S., & Adamic, L.(2015). 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 348, 1130-1132.
- Beer, D. (2009). 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New media society*, 11 (6), 985-1002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ode, L.(2012). Facebooking It to the Polls: A stud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polit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9, 352-369.
- Bond, R.M, Fariss, C. J., Jones, J. J., Kramer, A. D.I., Marlow, C., Settle, J. E., & Fowler,

- J. M. (2012). A 61-million-person experiment in social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Nature*, 489, 295-298.
- boyd, d., & Crawford, K.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662-679
- boyd, d., Golder, S. & Lotan, G. (2010.01). Tweet, tweet, retweet : Conversational aspects of retweeting on Twitter. *HICSS '10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4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1-10.
- Bruns, A., & Highfield, T. (2014). 'Big social data' in context: Connecting social media data and other sour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CSPRI conference, Sydney, 7-10 Dec. 2014. 上网日期 2014年8月14日, 取自
<http://www.slideshare.net/Snurb/big-social-data-in-context-connecting-social-media-data-and-other-sources>
- Bruns, A. (2014/8/3). First Survey Finds 2.8 Million Twitter Accounts in Australia. 上网日期 2014/08/14, 资料取自
<http://theconversation.com/first-survey-finds-2-8-million-twitter-accounts-in-australia-29829>
- Burgess, J., & Bruns, A. (2012). (Not) the Twitter election: The dynamics of the #ausvotes convers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Australian media ecology. *Journalism Practice*, 6(3), 384-402.
- Castells, M. (2007).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38-266.
- Cloudry, N., & van Dijck, J. (2015). Researching social media as if the social mattered. *Social Media + Society*, 1, 1-7.
- Freelon, D. (2014).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gital trace data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ompu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8(1), 59-75.
- Gerlitz, C., & Helmond, A. (2013). The 'like' economy: Social buttons and the data-intensive web. *New Media & Society*, 15(8), 1348-1365.
- Gitelman, L. (2006). *Always already new: Media, history, and the data cul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roshek, J., & Al-Rawi, A. (2013). Public sentiment and critical framing in social media content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5), 563-576.
- Gruzd, A., Wellman, B., & Takhteyev Y. (2011). Imagining Twitter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0), 1294-1318.
- Hayles, N.K. (2006).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the cognisphe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 159-66.
- Hermida, A. (2010). From TV to Twitter: How ambient news became ambient journalism. *M/C Journal*, 13(2).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13, from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index.php/mcjournal/article/view/220>
- Hughes, A. L., Palen, L., Sutton, J., Liu, S. B., & Vieweg, S. (2008). "Site-Seeing" in disaster: An examination of on-line social convergence. *Proceedings of ISCRAM 2008 -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324-333.

- Jenkins, H., Ford, S., & Green, J. B. (2012).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 (2007, September). *New new media ontology*. Presentation at Toward a Social Science of Web 2.0, National Science Learning Centre, York, UK.
- Lash, S. (2007)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4(3), 55-78.
- Lewis, S. C., Zamith, R. & Hermida, A. (2013). Content analysis in an era of Big Data: A hybri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and manual method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1), 34-52.
- Mahrt, M., & Scharrow, M. (2013). The value of big data in digital media research.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1), 20-33.
- Marwick, A. E., & boyd, D. (2010).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and Society*, 13, 96-113.
- Meraz, S., & Papacharissi, Z. (2013). Networked Gatekeeping and Networked Framing on #Egyp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2), p138-166.
- Murthy, D. (2012).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dia: Theorizing Twitter. *Sociology*, 46(6), 1059-1073.
- Nisbet, M. (2010). Knowledge into action: Framing the debates over climate change and poverty'. In P. D'Angelo & J. Kuypers (Eds.), *Doing framing analys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43-8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alen, L., Vieweg, S., Sutton, J., Liu, S. B., & Hughes, A. (2007). Crisis informatics: Studying crisis in a networked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Social Science*. 上网日期 2010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s://works.bepress.com/vieweg/12/>
- Papacharissi, Z. (2010).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Papacharissi, Z., & de Fatima Oliveira, M. (2012). Affective news and networked publics: The rhythms of news storytelling on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2), 266-282.
- Qu, Y., Huang, C., Zhang, P., & Zhang, J. (2011). Microblogging after a major disaster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2010 Yushu earthquake. *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11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25-34.
- Shklovski, I., Burke, M., Kiesler, S., & Kraut, R. (2008).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Hurricane Katrina aftermath*. Paper presented the HCI for Emergencies Workshop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CHI 2008), Florence, Italy.
- Small, T. A. (2011). What the hashta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6), 872-895.
- Stohl, C. (2014). Crowds, clouds, and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1), 1-19.
- Sutton, J., Palen, L., & Shklovski, I. (2008). Backchannels on the front lines: Emergent us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2007 Southern California Fires. *Proceedings of ISCRAM 2008 -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624-632..

- Thelwall, M., Buckley, K., & Paltoglou, G. (2011). Sentiment in Twitter ev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2(2), 406-418.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eweg, S., Palen, L., Liu, S. B., Hughes, A., & Sutton, J. (2008).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isaster: Exami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7 Virginia Tech shooting. *Proceedings of ISCRAM 2008 -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44-54.

**Dual connectedness of social media:
Connecting networks of users and connecting ecosystems of
techniques**

Yu-Chung C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d for the dual connectedness of social media. On one side, social media connect a lot of people to make a huge social network; on the other side, numerou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connected through technologies to become a connecting ecosystem.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today is the result of co-evolution of human agenc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u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dual connectedness of social media. One is theoretical, which provides critiques to the ideologies of algorithms and structure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another one is empirical, which acquires big data on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to analyze human digital footprints by combin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words: algorithm, big data, connectedness, sharing, platforms,
social media

* Yu-Chung Ch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Hsinchu City, Taiwan, e-mail:colisa@gmail.com

探索數位即時新聞生產之物質性的可能研究取徑

江淑琳*

本文引用格式

江淑琳（2016）。〈探索數位即時新聞生產之物質性的可能研究取徑〉。《傳播、文化與政治》，4:27-54。

投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通過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作者江淑琳為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

《摘要》

本文试着整合传播研究及科学与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两个领域，以物质性概念为切入角度，透过爬梳「科技」或说「新传播科技」在传播研究与 STS 中被置放的角色，强调在新闻研究中，科技的角色应该更被看见，而非只是作为新闻研究个案的背景。本文并援用 STS 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以及「相互形塑」（social shaping）与「相互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概念，提供初步访谈资料，试着思考当今不断流动与片断化的数位新闻生产之可能研究取径。

关键词：共同生产制作、行动者网络理论、相互形塑、科学与科技研究、传播研究

壹、前言

传播研究如何看待科技？传播研究在谈到科技时，一个重要的传统脉络之一，是将科技视为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 McLuhan, 1964），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科技持续被视为用来支持或扩展人类感官认知与传播行动（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的技术，例如，从 Ong（1982）讨论口语与书写传播提到人类使用符号、语言与书写以表达并形成想法与经验，到英国传播学者 Raymond Williams 讨论电视的科技形式，乃至德国传播媒介思想家 Fredirch Kittler（2010）讨论留声机、摄影与打字机的发展。又如加拿大学者 Innis（1972）将媒介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认为帝国的盛衰会受到时间或空间偏向的媒介影响。

另一个在传播研究中谈论科技的传统，则是从行为导向的取径出发，根据媒介与人类感知的相关性，区分出媒介形式（例如文本或图像）与人类使用媒介的方式（例如单向或双向）。上述这些研究取径可以说多半从科技形式（technical feature）出发，偏重于媒介带来的效果（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不同于部分传播研究的传统将重点置放在科技形式，科学与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则重视某一个科技系统的意义与实践，以及这个科技系统与更大环境的关系（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STS 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于从科技的物质层面出发，探索科技的物质层面如何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脉络互动，当然科技的研究也得置放在这样的脉络下进行。

然而，传播学者与 STS 学者的研究取径并非两条平行线，已经渐渐有融合的趋势。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两位学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传统的传播研究，将媒介科技视为「文本」，而非仅是一种「形式」，媒介演化的路径受到各个参与者及相关利益或兴趣所决定，因而科技发展的最终结果难以预期。这种重视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发展的意义与实践，与 STS 对科技的关怀若合符节。

除此之外，传播研究对于早期源自于美国传统的行政研究与效果研究，自 1980 及 1990 年代之后，也借用了 STS 对于科技研究的看法，扬弃科技决

定论，并借用了诸如「诠释的弹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等概念，进行科技与社会的分析 (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STS 领域的学者对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不少相关研究。网际网路在 1990 年代渐渐成为流行的资讯传播科技，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的学者同时注意到网际网路与社会的关系 (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这篇文章简单描述了笔者过去的媒体工作经验，包括从纸本新闻(日报、晚报)转换到网路新闻的过程，结合笔者所受过的新闻传播以及科技与科学研究两个领域的训练，以物质性概念为梗，以数位新闻生产为个案，透过初步访谈不同媒体特性的线上记者与编辑，概略呈现在什么样的脉络下，速度成为新闻实践的优先要求，新闻的正确性与深度甚至存而不论。藉此试着在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与物质性的概念，思考并建议对于数位即时新闻生产的可能研究取径。

笔者以为，加入科技物的物质性思考，可以进一步反思，虽然科技与社会互动之后，最终某一种结果将被特别突显出来，但科技物的物质基础其实可以带出各种结果，也就是说，各种行动者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弹性、非决定性的。将这样的关怀运用在新闻研究上，本文也希望从数位即时新闻的再现，一方面思考科技物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从过程的发展去思考某一种结果被突出的可能原因以及反转的方式。同时本文也想知道，目前对于科技与新闻的研究角度有哪些，有什么样的偏重，加入其他角度对新闻产制的研究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以数位即时新闻生产为例，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当数位媒体让即时新闻的发展达到极致的现在，开始有人呼吁「慢新闻」(slow journalism)，深度的新闻内容又重新被重视，这或许也是 Harold Innis 所认为的，某一种传播偏向达到极致之后，就会往另一个偏向转？

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结合笔者个人在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的新闻经验，并同时访谈目前仍在线上处理新闻的记者、编辑与国际新闻编译，勾勒出数位即时新闻产制的过程与症结。因此，本文将同时结合对理论思考，以及笔者与受访者的新闻实务经验，以即时新闻生产切入，思考新闻的本质，以及物质基础在数位即时新闻生产中的角色。

貳、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科技的角度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希望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两个取径。传播学者 Mosco (2009) 指出, STS 与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从实在论的认识论 (realist epistemology) 出发, 两者有相似之处, 例如 STS 研究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形塑。两者对民主也同样感兴趣, 例如 STS 关心行动者 (actant); 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补 STS 可能忽略的权力问题 (Mosco, 2009, pp. 234-235)。

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外, 媒介生态学的取径也可能用以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例如加拿大学派传播学者 McLuhan (1964) 认为科技是人的延伸, 科技是人的义肢之论点; 或者如德国媒介思想家 Kittler (2009) 从科技的角度研究媒介发展, 其研究特别关注科技本身, 认为科技是一种操控时间轴的媒介。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关怀, 也具有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的潜力。

因而, 不论从政治经济学、媒介生态学等传播取径, 均初步点出或呈现出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可以整合、互补, 不过这些取径尚缺乏较为完整的论述。

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也试图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取径, 这两位学者以资讯传播科技为分析对象, 从因果关系 (causality)、过程 (process)、结果 (consequence) 等三个角度, 讨论两个取径的差异以及整合的可能性。两位学者的文章是目前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最完整的代表作, 因此本文将两位学者的架构为主, 并补充相关文献。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并不表示传播研究与 STS 仅能以此种方式整合。

一、因果：科技影响社会 vs.科技是社会形塑的产物

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认为, 研究资讯传播科技的学者提出了重要问题: 科技与社会的因果关系 (causality)。在行为与文化学理论化的

研究背景驱使下，传播研究倾向于将科技视为造成、或有助于造成社会变迁的因素，而非将科技本身视为研究对象（object）。不同于传播研究，STS 研究则将科技视为研究对象，他们关心的不是科技物对社会的影响，而是科技的发展过程，想要知道是哪些原因使得科技发展成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但又要尽量避免从科技决定论落入社会决定论的极端。

为了避免落入科技或社会决定的极端，STS 学者以科技物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科技的发展过程，并关心科技发展的社会脉络。STS 学者 Trevor Pinch 回顾过去文献并整理出曾经使用「物质的技术物」（material artifacts）这个词汇的文章之后，他发现「物质的技术物」会受到社会学的实践所影响而产生根本上的变化，并反过来也改变了社学会的实践面向。虽然 Pinch 所回顾的这些文章中所提到的技术物，多半是有具体形体的技术物，例如 Bijker（1995）的脚踏车研究，或是 Kline 与 Pinch（1996）的汽车研究；不过，Pinch 所回顾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数位软体或是电脑软硬体的分析，所以 STS 学者所研究的科技物，已经不局限于具有具体形体之物。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则进一步以印刷科技为例，说明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的研究视角在看待印刷科技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有所分歧。两位学者以爱因斯坦所著的《印刷报纸是社会变迁的代理人》（*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Eisenstein, 1979）与约翰斯所著的《书的本质：印刷与生产中的知识》（*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Johns, 1998）为例，作为对照。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认为《印刷报纸是社会变迁的代理人》对研究传播科技的学者影响深远，传播学者认为印刷报业的出现带来了印刷文化，相较于之前经由抄写员手抄生产的文本而言，印刷报纸成为一种独特的科技系统，宣示西方文明的到来，并带来一连串革命性的改变。就爱因斯坦而言，印刷的重要特质在于固定了排字印刷术，印刷的文本内容与形式被保存在印刷物中，生产与使用的关系被独立起来。除此之外，整个现代知识工业也因此而发展。《书的本质：印刷与生产中的知识》则持不同视角，约翰斯反驳爱因斯坦将印刷自外于历史的看法，他想要知道的是印刷史如何与

社会互动之后相互形塑而成，他想要知道的是印刷科技发展的过程，而非印刷术对社会的影响。

不过，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也认为，虽然传播学者与 STS 学者看似分道扬镳，但其实两者也在找寻合作之道，他们所找到的整合之道是，将科技视为一种「社会物质形构」(socio-material configuration)，在这个形构中，各个要素在不同的时期，于开展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各自展现不同程度的决定性 (determination) 与偶发性 (contingency)。

二、过程：生产 vs. 消费

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认为传播学者与 STS 学者都注重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不过两个领域还是有所差异。STS 学者早期为了反对并有别于科技决定论，特别将科技的研究聚焦在新科技物的生产面向，而较少放在消费面向。传播学者则是强调生产或消费两个面向各有之，生产面向通常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不过 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认为，以他们所分析的现象来看，少有研究能够同时结合生产与消费两个面向。

然而，传播领域与 STS 领域的学者一直尝试在各自的领域中开始尝试整合科技生产与消费面向的研究。举例来说，「创新传布」(diffusion of innovation) 研究试着从科技物发展伊始就开始进行分析，不像早期的研究把焦点放在消费者身上，待早期消费者出现后才开始进行研究 (Rogers, 1995)。

STS 学者在 1990 年代早期致力于揭开科技产制的「黑盒子」(black box) 的同时，也关心科技的消费面。例如 Woolgar (1991) 对电脑软体生产过程的研究发现，研究人员在研发电脑软体时，会想象消费者的可能期待，而将其融入于软体发展中；Akrieh (1992, 1995) 提出「铭刻」(inscription) 的概念，认为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技术选择、科技物如何被象征性地框架，以及科技物所处的规范环境，都会影响消费行为。所以，消费市场的影响也或多或少进入到科技生产过程中。

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也采取了与 STS 学者试图打开「黑盒子」颇为类似的研究视角。研究资讯传播科技的学者试图揭开使用者如何消费实践资讯传

播科技, 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认为传播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概分为三方面: (一) 新科技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 例如 Silverstone 与 Hirsch (1992) 发现新科技的驯化是受到家庭使用者控制, 使用者拥有并挪用新科技到家庭之中, 进入其每日的生活规律之中, 于此同时, 新科技持续发展、变化。(二) 使用者做为科技变迁的行为者 (agent), 例如 Douglas (1987) 研究发现, 早期收音机广播从点对点传播系统转为大众传播媒介, 即是受到观众使用者的影响。(三) 对新科技的抵抗 (resistance), 例如 Kline (2000) 研究 20 世纪初期电话引进乡村生活时, 受到居民抵抗, 生产者为了让居民愿意使用, 改变了这项新科技的生产方式以适合当地居民每日生活的社交模式, 因此, 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调整了新科技的发展方向。

三、结果: 断裂 vs. 延续

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对于资讯传播科技与媒介的发展, 大抵上存在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是采取断裂、非延续的看法, 认为科技是「完全创新的」(revolutionary) 发展, 挑战既有的传播科技, 与过去的发展无关, 带来新的实践与体制的重组; 另一种看法则拒绝上述认为科技的发展是断裂、完全创新的说法, 反过来指出科技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渐进、累进的, 因为不管是科技的发展或社会的变化, 都是在已经建立的科技、实践以及体制等脉络中发展, 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STS 学者多半采取第二种看法, 反对科技决定论, 传播研究中持这种延续性观点, 则可以从 1970 到 1980 年代受到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影响的学者论述中看到 (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断裂、非延续的看法其实并未完全消失, 当网络化的电脑科技在 1990 年代初期出现时, 依旧赢得不少认为这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传播进步者的掌声, 以拥抱科技决定论的态度, 将这些新的数位传播科技视为新科技发展的里程碑, 但随即便有持相反观点的学者指出, 这些被人们感知到具有新奇特质的新数位科技, 也是从既存的资讯传播科技、以及既有的社会脉络中发展出来。Boczkowski 与 Lievrouw (2009) 提醒我们, 资讯传播科技越来越世

俗化、越来越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的学者，只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同时采用断裂与延续的角度，继续审视传播科技的发展（Boczkowski & Lievrouw, 2009）。

四、小结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两位学者最后在考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科技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等三个关怀点，提出未来研究可以如何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两位学者特别强调，未来研究者应该将资讯传播科技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科技形构」（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区分开来，将研究重点放在科技的物质性与象征性之间的关系，意即某一项科技物与科技系统之物理物质性、持久性、以及设计，如何形塑传播内容与传播意义。

（一）关于因果：可采取历史或比较的观点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认为，有鉴于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相互形塑」（mutual shaping）及「相互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取径，未来的研究可以朝向指出可能影响「社会科技形构」的条件有哪些，包括哪些要素可能使科技与社会的研究偏向以决定论或是以偶发事件的角度观看，而失去平衡的观点。未来的研究也可以指出什么样的条件强化了「社会科技形构」，抑或是在哪些条件下，「社会科技形构」更具弹性。此时，采取历史或比较的观点或许有效，例如将目前研究视为仍在浮现的研究领域之起点，采用环境观，同时分析科技体系、社会结构与关系，以及行为者的行动。

（二）关于过程：选取对比的例子来检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指出，未来研究可以试着寻找科技生产与消费之间界线模糊或消失的案例，以及科技生产与消费之间泾渭分明到两者之间的影响微乎其微的案例，将这两类相互对立的案例类型进行比较。

例如如果比较公民新闻，可以将韩国「OhMyNews」成功让数以千计由公民转而成为记者的公民记者如何成功地进入点阅率高、政治影响力大的线上新闻网站之案例，与《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企图利用 WIKI TOOLS 让其社论成为使用者导向，但没设立几天都因为编辑认为有些发文过于激进而作罢的例子，将这两个案例进行比较。韩国的例子证明人们参与资讯传播科技不能被简单化约为使用者或消费者，美国的案例则显示生产—消费之间的分界，在许多媒介与资讯脉络下还是相当重要。

（三）关于结果：调和科技发展的断裂性与连续性观点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提醒我们，有鉴于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资讯传播科技的原创性（ordinariness）或庸俗性（banality）（这两个特性对应于科技的断裂性与连续性），未来研究可以同时试着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宏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变迁着手，试着调和这两种相对的观点，不管连续性或不连续性其实都可以从不同分析层级观察得见，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从物质性角度研究科技与新闻的关系

Boczkowski 与 Lievrouw（2009）从物质性的角度着手，试图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对科技与社会的研究取径。目前文献对物质性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概念，不过大致上可以简单区分为几种：第一种是指称有形、具体的物体（material / matter / object），例如桌椅这种具体之物；第二种虽然指的也是物的本身，但这种物体并不像桌椅拥有具体的形体，例如电脑软体；第三种不特别指称有形或无形的物体，而是强调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性是物体透过与人的互动而产生其特性，光是物体本身，若没有经过使用者去使用它，就没有物质性可言。Boczkowski（2009）等学者也提供实证分析来进行整合两者的研究，以下简述之。

一、实证上：研究科技与新闻组织及新闻工作者的关系

（一）科技与新闻组织的关系

Boczkowski (2009) 从新闻领域的物质性 (materiality) 与模仿 (mimicry) 分析科技发展与新闻竞争的关系，意即科技的物质性对于新闻实践上的模仿以及新闻判断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所谓「模仿」，指的是当别家新闻媒体出现某则新闻时，自家的新闻媒体也要有相同的新闻，不能漏新闻，所以，内勤的主管或编辑会透过监看其他各家新闻媒体，确保自家新闻不会漏失任何一条已经在别家媒体出现的新闻，这已经成为新闻实践时，编辑习以为常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在科技越加发展之后，对新闻实践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Boczkowski (2009) 指出，这种「模仿」的行为，也是一种「厌恶风险」(risk aversion) 的做法，尤其在数位即时新闻出现之后，更加强化记者或编辑的新闻模仿倾向，也连带增加了「手到擒来的新闻」(sedentary journalism, p. 59) 数量，编辑或记者越来越依赖科技中介以取得讯息，过去经由面对面与记者同业互动的机会也因此降低。更甚者，由于网路新闻网站提供的新闻量大幅提高，更新内容的频率也高，于是就更强化透过科技中介来监看 (mediated monitoring) 各家新闻，并加速新闻更新的速度。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各家媒体一边监看新闻，一边不落人后地更新新闻，而记者则在即时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疲于奔命。

Boczkowski (2009) 在 2004 年年底访谈新闻工作者时，受访者告诉他，因为新传播科技提供加速监看与更新线上即时新闻的速度，媒体主管明白表示，他们需要的不再只是在网路上接收新闻内容的人，还要能够有能力在网路上找寻新闻，要成为网路上的「新闻猎人」(news hunter, p. 60)。

Boczkowski (2009) 提醒我们，从他分析的个案可以看出来，科技不是改变新闻实践的唯一、决定因素，科技通常与一组复杂的科技物、规章、标准等相互作用之后而产生作用，这一组「中介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of mediation) 让由记者与同业之间面对面监看新闻，转为透过科技中介的监看，这样的基础建设，与科技的物质性、使用者的技巧以及新闻产制中的各个行动者之独特的挪用密切相关。

（二）科技对记者的 agency 与工作内容的影晌

第二种看待科技与新闻的角度，将科技视为加速并强化新闻实作的改变，审视个别记者的如何将科技挪用于新闻产制的过程中，意即记者如何在既有的新闻实作中运用新科技。在这个意义下的科技，并不是改变新闻实作过程的唯一必要条件，而是加速已有的发展趋势（Deuze, 2009）。

Mitchelstein 与 Boczkowski（2009）整理出科技的变迁与记者实践变化的四个现象。首先，网路新闻增加了记者的工作压力。记者的工作量增加，记者被要求多工、多技能，这包括记者要有能力结合新闻收集与说故事的技巧，并可以撰写各种新闻型式，记者在被要求更快的发稿速度与多工、多技能之下，很难充分发挥传统所要求的新闻专业，而且，记者在薪资未变的情况下，被期待要拥有更多的能力。

其次，记者上网搜寻新闻材料的能力也影响到消息来源的选取与近用。在两位学者所引述的研究发现里，1999年已经有九成以上的美国记者透过网路找新闻灵感，但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太一样。例如受访的英国记者在2000年时都还嘲笑在网路上找新闻的记者，不相信网路消息的记者还占多数，记者最常使用网路来搜寻新闻的背景资料或新闻灵感，但还不会直接将网路内容做成新闻。这与现在的新闻实践情况已经大相径庭。

第三，网路新闻越来越强调即时性。两位学者引述文献指出，过去一天两次更新新闻的习惯被网路新闻打破，追求速度已经是当前新闻媒体最强调的特质，为了抢即时，便出现许多二手新闻，因为记者没有足够时间找资料、多重查证，也没有时间跑出原创的新闻。

最后，新科技促使不同型态的媒体开始聚合、汇流。平面、广播、网路新闻在新科技推波助澜下，渐渐朝向聚合、汇流之路前进，透过电脑与网路发布多媒体适用的新闻内容。新闻汇流虽然有助于增加新闻组织的外部竞争，但各种媒体之间是否能够协调，且新闻汇流加上记者多工的要求，很可能造成无法胜任的记者自愿或被动离开新闻场域，这些都会影响到记者对自我的认知与工作权的保障。

因而，上述学者的研究虽然提及物质性，但多半强调媒介科技的物质性特质，同时提及其他像是规章、标准等物质性基础，但尚未有系统或是明确地从理论上讨论物质性的其他可能面向，然而，影响即时新闻产制的现实因素不仅是科技，亦即，有必要从前述第三种物质性定义着手，讨论人与物的关系，扩及组织与社会脉络，例如组织的定位与型态、组织对资本与经济财务上的考量、市场竞争、劳动条件等，均有必要纳入即时数位新闻生产的物质性讨论。

二、理论概念上：从物质性的角度分析新闻产制

过去的新闻研究较多地放在记者、新闻室或媒介组织，传播科技被当成新闻产制的背景或媒介，甚至将新闻（journalism）定义成是记者（journalist）在做的事，记者做的事就是新闻，忽略到科技在新闻产制过程中的物质性角色，因此，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 ANT 的角度将传播科技或技术视为与记者等其他要素同等重要的行动者（actor, actant）。

目前整合 STS 与新闻传播研究的角度，拒绝科技决定论，强调科技的主动性是透过人类行动者的合作而完成（e.g. Boczkowski, 2004, 2015; Plesner, 2009; Hemmingway, 2008）。关于新闻室文化的研究文献迄今依旧偏重于以平面媒体为对象，即便研究数位时代的新闻文化也脱离不了平面媒体的视角，不过，已经陆续有学者从 STS 及 ANT 的角度去研究「新闻—科技」之间的关系（Rodgers, 2015）。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通常被用来讨论新科技的创新如何达成。学者在使用 ANT 来进行新闻产制的研究时，强调的是新传播科技创新的动态（dynamics of innovation），强调非人（non-human）的科技物与人（human）同样都是科技创新的行动者，人与非人这两类行动者是关系性的，人与非人这两类行动者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拥有同样的权力。因而可以这样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透过社会行动者与科技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创新动态（Callon, 1987; Latour, 2005）。

虽然有越来越多研究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媒介研究，但仅有少数研究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如何被应用于分析新闻室里的创新过程，解释数位时代新闻工作的动态之研究也不多。即便研究的质与量还有丰富的空间，不过像是 Bechmann (2011) 的研究就颇值得参考。Bechmann 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近的科技特质并没有让丹麦的跨媒体新闻室内的编辑之间权力更加均衡，形塑这些互动以及制造某些利益的既存社会网络是影响权力失衡的原因之一，这在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时必须一并考量。

从 STS 的角度去思考透过组织结构、工作实践与再现，各种挪用 (appropriate) 科技的方式，并拒绝科技决定论，以理解新闻传播领域不能只关注科技的效果，相当重要。不过，从上述 Bechmann (2011) 的研究发现来看，我们也无法否认，以行动者网络研究新闻时，还是有些局限。

首先，还是没有解决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时常受到的质疑，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关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不先预设哪些行动者参与，而是从实际的个案中去找出有关系的行动者，但在分析时就会因为网络不断扩张延伸，而发生「边界」(boundary) 如何设定的问题。

除此之外，科技物的能动性或主体性最终得透过人的使用才能呈现，如何证明科技物的能动性，换句话说，将科技当成 actor 或 actant，具体上要如何研究？目前的使用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文献只是提出这两种取径的结合，实证上该如何进行？又或者，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被批评为过于强调个别行动者与科技所拥有的权力，而忽略了更为广大的社会脉络与既有的权力及利益结构 (Williams & Edge, 1996)，这个质疑目前可以透过「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共同生产制作」(co-production) 以及「能供性」(affordance，或译为「机缘」) 来解释，除了同时考量人与非人的行动者之外，社会脉络也视为行动者之一，并且，有在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同时作用时，社会与科技变迁才得以进行。

肆、即时新闻经验可以如何结合传播研究与 STS 两者分析 取径

科技的发展与新闻对速度的追求，并不是新传播科技出现才有的现象，本文强调每一个时期促成即时新闻发展的传播科技是延续性的，并非断裂或完全是新的发展，循此方向思考，即时新闻也不会是新传播科技发展之后的独特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并先简要地呈现台湾数位即时新闻发展的科技与社会因素，并从传播研究与 STS 的相关理论中，试着找出可能的分析取径。

一、即时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

本文认为，科技与人的互动会带出的「科技能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能供性」(或有学者译为「机缘」)的本体论基础是关系性的 (relational ontology)，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等重，「科技能供性」会在物与人的互动关系之间产生，这个概念也通常被用来分析科技物被社会挪用 (appropriation) 过程 (Faraj & Azad, 2012)。这一节的重点放在数位新闻生产的物质性，意即即时、不停更新的即时新闻之生产。

在这一节中，也希望根据初步的访谈资料，思考前几节所提到的分析取径可以如何运用于实际的分析中。由于这只是初探性质的尝试，并未提供详细的分析文字，但期望可以做为未来整合传播研究与 STS 研究的初步研究架构。

(一) 2000 年左右的即时新闻实作情况

笔者尝试使用个人的工作经验，呈现科技与新闻生产的关系，这包含笔者于 1998 年在平面媒体《自由时报》、1999 年在《联合晚报》，以在 2000 至 2001 年在当时新成立的网路新闻媒体《东森新闻报》(Ettoday) 担任财经记者的经验，这段时间也是台湾的新闻媒体渐趋网路化之重要转折点。

笔者在上述时间于主流媒体主跑财经新闻，相较于其他新闻路线或类型，财经新闻对于速度的要求更高，因为即时的财经数据对金融市场影响甚深，尤其上午发布的财经政策、经济数据、金融数据等，均会影响金融市场

股汇市变化。因此，从笔者任职不同性质媒体、笔者报导的路线，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网路新闻尚在发展时，某些路线的新闻已经朝向发稿快速又即时新闻型态迈进，但并非所有路线都如此，大概还只着重在财经新闻或突发的重大新闻。

财经媒体之中，又以像是《巨亨网》、《中央社》、《彭博》这种提供即时财经新闻的网路新闻媒体最重视速度。这些媒体的记者，被要求要比其他媒体在更快的时间内，将资讯传给公司，最快的定义，就是要比其他家来的快，在所有媒体之中抢得头筹。所以，记者通常在知道几点可以拿到新闻稿之前，就已经拨好手机，跟公司连线，只要时间一到、新闻稿一发，便可以将最新财经数据（例如物价、失业率、经济成长率等）告诉公司，由公司同事或主管代为录稿（由记者在新闻现场以电话方式将新闻内容口述给报社内勤同事），即时出现在自家网路新闻页面上。此时，手机是记者发送即时新闻时所使用的传播科技。

2000 年左右，笔者在网路新闻媒体《东森新闻报》担任财经记者时，主流媒体对即时新闻已经有更多的要求，且渐渐从财经新闻与突发新闻延伸到各路线的新闻。笔者当然虽然尚未被要求随身携带数位相机拍照传回报社（当时手机尚没有高画素的摄影功能，也还没有 3G、4G 上网功能），但因为新闻汇流、大编辑台的整合，被要求要协助与电视台记者分工传送新闻——画面由东森电视台记者负责，文字部分则逐渐交由网路记者。与此当时，其他媒体同业文字记者已经开始陆续被公司要求除了文字之外，也要试着无偿提供现场照片，节省报社另外派摄影记者到记者会或新闻现场的成本，非财经新闻路线的记者也被要求发即时新闻。此时，记者多工、多技能，以及晚报等平面记者被要求发即时新闻已经渐为趋势。不过，当时记者还多是以有线网路拨接上网将新闻传回编辑室。

2000 年以前、笔者的经验已经明显看出传播科技有助于产制即时新闻，然而除了科技之外，不同的组织定位（例如财经专业媒体需要最快速的资讯提供给投资人）、媒体市场竞争（例如以即时快速新闻来赢得财金市场投资人信任并点阅）、要求记者多工多技能的劳动条件（例如文字记者也要拍照

或录音传回公司)等, 据此可以看出影响即时新闻生产的成因不仅仅是科技物与新闻工作者。

(二) 目前的即时新闻实作实况

近年来, 社交媒体与网路新闻蓬勃发展, 记者与编辑取得新闻的管道更为多元(或说其实更为狭隘?), 网路新闻占据主流媒体新闻的比重大为增加, 为了解并更新当前新闻实践现况, 笔者同时访谈目前分别任职于电视台、网路新闻平台, 以及网路新闻编译中心之线上新闻工作者, 这三位受访者的经验分别涵盖了平面报纸的网路部门、原生网路媒体及电视工作环境, 并分别提供我们编辑、编译与电视台驻地方记者这三种不同数位即时新闻的产制过程。以下节录访谈内容作为本文认识并理解记者、编辑、编译的工作内容与科技使用的现况。

以电视新闻来说, 电视媒体的即时新闻最容易体现在车祸与空难等突发新闻上, 记者在处理这些新闻时, 新闻室对于速度与收视率的控制是发新闻稿主要考量, 而收视率则是最终考量。一位年约 28 岁、年资两年半、在电视台担任驻地记者的 A 受访者之访谈内容指出:

突发新闻的处理通常都是最紧急的, 这时候电视台的方式就是主播会先念干稿(只有文字, 没有画面, 通常是文字记者先写好 150-200 字的稿子, 交代意外事件的状况), 代表我们家已经抢到这条新闻了, 然后念完干稿之后, 电视右边的快闪条会开始跑, 代表我们抢到后, 还会有后续的新闻画面, 告诉观众, 你想知道这件事, 就可以看我们家, 不必转台。

公司主管的监看各台新闻, 也是迫使记者必须赶发即时新闻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新闻室控制对外勤记者的影响。电视台驻地记者 A 说:

这时候，长官就会站在大电视墙前面，开始监看我们一线记者传来的新闻消息，是不是比别人慢，譬如一则车祸，或是空难，X 台已经报导死了 10 个人，我们才死 6 个，这时候长官就会开始跳。

监看新闻是所有内勤主管的例行工作，且是最重要的工作，主管通常用这种方式来确定自家记者没有漏新闻，并确保新闻速度不至于落后其他竞争对手太多。即便来自外电的新闻编译稿，主管依旧以监控其他家国内媒体的新闻为判准。因而，国际即时新闻发稿的重要一环，除了传统英美外电如 BBC、CNN、Daily Mail 之外，手机结合 app 软体所开发出的新闻推播，也成为国际新闻编译的重要新闻来源。一位年约 25 岁、年资两年又五个月、在平面媒体担任国际编译的 B 受访指出：

即时新闻会很依赖传统外电及手机的新闻推播（国内外新闻媒体）。一般来说，通常 20-40 分钟就要生出一条稿，一定要有照片，有影片也一定要附上去；比较简单的社会、八卦新闻大概 15 分钟左右就可解决。……刚发生时一定是死守外点及 CNN 或 BBC，当下就要用最快速度发稿，就算只有一句话、没有配照也没关系，因为公司要抢第一推播。……事件发生后，开始要搜集各家外媒网站的内容或独家，这时候会有其他同事加入帮忙，会有人盯网站，有人会参考自己的推特、脸书、微博上的消息来源。

既然新闻发稿的速度对电视台、平面与即时新闻的国际编译都如此重要，对网路即时新闻编辑就更形重要了，不过这也会视媒体组织自身的要求而定，例如，编辑会被要求先查证之后才抢速度。一位年约 25 岁、年资累计两年又一个月、分别在 yahoo、新生报及中央社任职的网路编辑 C 说：

我上班上到一半就会逛一下脸书，因为大部分的社群媒体粉丝团我都有按赞，有什么即时新闻的话也不怕漏掉。我自己也会装苹果的 app。……我的主管都跟我们还有其他做 app 的同事说，不要抢快，要

先查证，不要推出的东西自己都没有查证，最后发现是假消息。可是当天一堆媒体都已经查证这则新闻了，如果你还不推出，那也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其他媒体都有了，而你却没有呢？

那么，除了一般主流媒体之外，内勤主管还有哪些可以监看的新闻来源，并要求记者发布即时稿？以电视台来说，电视台即时新闻发布的方式除了维持传统发稿方式外，社交媒体或网路社群上的消息，也成为记者与电视台主管监看新闻并制作新闻的重要参考指标，甚可说是相当重要的参考指标。受访的电视台驻地记者 A 说：

其实早期不会有「追网路新闻」这种事情发生，是一直到这半年，脸书出现后（尤其是爆料公社，或是什么粉丝专业），尤其是 XX、XX、与 XX 台这三间，有的就直接假连线，从网路上把影片甚至是照片抓下来，就开始做新闻，这种就是各台比快的，最后就变成看各台文字记者网路搜寻的功力，因为这种东西查证的时间根本不够（根本也不用深入报导，因为其实根本不值得，这些通常都是网路上行车纪录器、饮料里面有虫、谁没穿裤子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等等），也不用找出所谓的当事人，除非 po 上去的新闻够大条，素材足以吸引特派开一台 SOT。

除了在网路上与社交媒体上找新闻，即时通讯软体、手机与脸书等具备的即时性之科技物质条件也成为新闻产制的要角。电视台驻地记者 A 以即时通讯软体 Line 为例：

当抢快成了各台新闻一线记者的使命之后，抢快的工具就不可或缺，Line 就是电子媒体最好的使用工具。当新闻事件发生时（以突发事件为例），因为记者不可能预知事发现场，所以一定会有车程上的时间差，这时就可以依靠民间友人（可能是路人甲、第一时间到达的消防队员、警察等），请他们先拍大概 30 秒或一分钟的画面，传给自己，再回传给公司，这样主播在念干稿时，就可以先跑画面。

当公司的 SNG 车无法即时到达新闻现场时，记者也必须判断先用机器拍或直接用手机拍，电视台驻地记者 A 表示：

要是公司决定这条要开重大框（就是主播后面的背板），记者就必须用手机先拍，访问加画面约 3 分钟，有时公司会要求，自己用手机做 stand（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收音效果不佳，连摄影机都不用），传到公司台北编辑台的群组里面，这样的新闻产制流程是最快的。

除了 Line、手机，电视台驻地记者 A 指出，脸书也成为数位时代新闻产制的重要角色，不过，脸书除了前述提供新闻来源之外，记者有时候为了对抗新闻室控制，例如辛苦跑的新闻无法播出，便将新闻上传到脸书或爆料公社，让其他台先播报，如此一来，随时监看各台新闻的主管也不敢不播报这条新闻了。

除了 Line，脸书也是，尤其是爆料公社，各家的长官（除了民视，苹果日报还在官网首页替爆料公社成立一个专区）现在把爆料公社当作圣旨，只要社团里面 po 什么，他们一定要有，所以有记者就曾经把自己收集到的新闻画面，po 上爆料公社，因为他们知道长官一定会看，这条新闻就一定会上版面。

因而，电视台驻地记者 A 目前的采访经验让她觉得，新闻抢快的结果，用来制作新闻的科技也跟着升级，SNG 渐渐被更方便的硬体与软体设备所取代，甚至内勤主管监控外勤记者的技术也更新了：

X 视现在引进了超越各家电视台的科技，直接用摄影机传讯号回去台北中心，这意味着一台要价上千万的 SNG 车，可能逐渐式微，甚至淘汰。早期驻外记者使用 3G 包，现在升级到 4G 包，然后变成直接用摄影机传带子。简单来说，因为现在 4G 基地台的发展，摄影机可以直接接上手机讯号，变成小型行动 SNG 车，摄影机上面也有 GPS 定位。

电视台驻地记者 A 认为，这样的最新机器，主管可以监看自己的记者是不是认真跑线，也可以让记者用最快速度将讯息传回台北，因为电视台的所有新闻都必须传回台北，才有办法编播，不用再等 SNG 车把卫星定位好，碟盘升好，虽然这在目前尚未普及，但已可见是未来的电视即时新闻的趋势。A 的看法呼应了文献中指出科技与新闻组织对于数位即时新闻展制的影响。

上述初步访谈结果呈现了台湾目前平面媒体网路部门、原生网路媒体、电视台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媒体如何生产即时数位新闻。下一节我们继续从物质性的角度、结合传播研究与 STS，试着思考可能的理论分析角度。

二、从物质性的角度结合传播研究与 STS 以分析数位即时新闻产制

Mico、Masip 与 Domingo (2013) 研究曾经采用创新传布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研究两个取径，花了四年时间，分析新闻室的数位汇流 (convergence)，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或许可以借来作为我们将来分析社交媒体与新闻产制的分析框架，诚然，这个分析框架会因为分析个案的特殊性与科技物的独特性，而有不同的分析结果，分析框架也会随着分析个案而随之调整，但目前不失为可以借镜的对象。

创新传布理论关心新闻室里对新科技采用的态度，并预期新科技的发展过程，Garrison (2001) 研究美国报业的数位汇流发现，1990 年代末期，美国记者已经很习惯将网际网路运用于新闻搜寻，Lawson-Borders (2003) 的研究发现，2000 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新闻室都已经习惯于数位汇流，不过，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个看法或许过于乐观。而这正是创新传布理论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只探讨创新传播成功的案例，忽略了其他最后未成功的案例。另外一个实证上发现的不足是，过去以创新传播研究角度分析新科技在新闻室的应用多半放在组织层级 (Singer, 2004)，但较少关注在个别文字记者、摄影记者与编辑的个人与人际之间的层次。

行动者网络研究关心的则是科技发展与新闻室实践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对科技发展与科技使用并未预设或预期任何发展结果，这是与创新传布较大的不同之处。创新的定义由行动者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共同完成，虽然人类

行动者可以定义科技的内涵，但是物质行动者也可以以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物质上的限制，去限制定义的范畴（Mico, Masip & Domingo, 2013），创新传布其实也是一种行动者网络。

虽然创新传布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源自不同的认识论传统，不过，两者同是对新技术的采用与发展感兴趣，不同于过往新闻产制研究偏重于以人为主的行动者，因而，结合创新传布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研究两个取径，尽量不偏向以科技为中心（*techno-centric*）或是以社会为中心（*socio-centric*）的研究偏向，两者结合之后，将科技的行动者角色找回来，有助于打破人 / 非人（*human / nonhuman*）各行动者之间的界线，也可以避免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先定义好科技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形塑」（*mutual shaping*）及「相互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角度进行数位即时新闻的产制研究。

以上一节对电视台地方记者、网路新闻编辑、平面与网路国际新闻编译的初步访谈为例，目前可以看到的行动者大致包括：科技（各种数位媒介，如脸书、line、爆料公社、其他新闻竞争组织等）、传统定义下的新闻产制者（记者、编辑、主管等）、消费者（主管会考量新闻有没有人要看，显示消费者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主管判断新闻有没有人看的依据则是点阅率、收视率等）、传统新闻产制的规则（监看其他家媒体以免漏新闻、要求新闻速度）。

在访谈中也发现，消费者除了主管考量新闻点阅率的依据之外，消费者也同时是新闻产制者，例如访谈中就有受访者提及主管会从「爆料公社」这种民众提供讯息的网站上找新闻，并要求专业记者跟新闻，新闻消费者不单只是消费新闻或使用新闻，而是新闻的「生产消费合一者」（*prosumer*; Ritzer & Jurgenson, 2010）或「生产使用合一者」（*produser*; Jenkins, Ford, & Green, 2013, pp. 182-183; Chadwick, 2013, p. 55）。

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建议可以选择某个新闻产制的场域，进行纵时的观察与访谈等资料收集，一方面发掘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如何支持或提供数位即时新闻生产，一方面分析哪些人为的要素促使或加速数位即时新闻的生产。再者，从上述访谈中，我们看到受访者谈及记者进行现场报导时的因应作为，以及记者如何因应新闻室控制，这提醒了我们，即时新闻生产过

程中的人为因素也包括记者此一行动者如何定义科技内涵，因此，除了将科技这个行动者角色找回来之外，也不能忽略新闻工作者如何定义科技内涵。

最后，人与非人的行动者都必须被置放于更大的脉络中来检视。非人的行动者除了科技之外，影响媒体产制的组织定位与型态、资本、市场竞争、劳动条件等，都应在未来更详尽的个案分析中被考量。

伍、结语与讨论

本文呈现的是还在发展中的思考过程，奠基于现有的相关研究，并希望结合传播研究与 STS 两个领域，从 STS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角度切入，思考可以如何研究目前快速发展中的数位即时新闻产制。除此之外，本文也持续思考下列问题：首先，从理论取径上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若要应用在数位即时生产的研究上，可以如何修正并应用？人与非人的行动者要如何画出疆界，以及各行动者在数位即时新闻中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数位生产为什么会是片断化，不断更新？就科技物本身而言，过去文献中的分析单位是什么？是软体？还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科技物之物质性促成不断更新又片断化的数位即时新闻？

其次，透过人与科技物（新传播科技或社交媒体）的互动，新闻可以快也可以慢，慢新闻近来也不断被呼吁并强调。因此，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试着追问：同样一个新媒体，却可以有不同的作为，显示出媒体的物质性要放在整体脉络下来观察，才能彰显其意义，这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所在。所以，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即时新闻？即时新闻如何地改变了新闻定义与标准？又为什么出现回归慢新闻的呼声，原因何在（网路出现不一定只能即时，也可以是有深度的慢新闻）等。

第三，本研究所访谈的新闻工作者虽然并未明确提及即时数位新闻时代的阅听人之参与特质--他们常常也是新闻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意即「生产消费合一者」或「生产使用合一者」，但从不断增加的文献以及我们在本文第贰部分小结所提到的现象已指出，科技生产与消费之间正出现界线模糊的情

形。社交媒体兴起也促成了一群「网络化的公众」(networked publics; boyd, 2011, p. 40), 这些「网络化的公众」经由网络化的科技被重新建构, 他们同时指的是透过网络化的科技所建构出来的空间, 也是人、科技与实践等所有面向共同形成「想象的集体」(the imagined collective) (boyd, 2011, p. 40)。这些「生产消费合一者」、「生产使用合一者」或是「网络化的公众」, 在即时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行动者角色, 是我们企图使用行动网络以整合 STS 与传播研究时, 不可忽略的重要行动者之一。

第四, 本文所提供的初步访谈仅显示出即时数位新闻的产制概况, 未来进行更深入研究时, 应回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初衷, 重视新闻实际产制的脉络, 并细致地区分电视新闻、网路新闻等新闻通道, 或是传统媒体网站、网路原生媒体等在产制数位即时新闻时的行动者网络, 进行实际个案分析, 并区分不同型态媒体的行动者网络。

本文强调从物质性的角度讨论数位生产的即时性, 也希望提醒未来进行新闻研究时, 可以从历史的观点、传播研究与 STS 整合的观点, 进行动态的、关系性的新闻产制研究, 透过理论与实证的文献整理, 以及新闻实践的初步访谈, 我们可以看到, 数位科技虽然提供即时新闻物质性, 但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共同促成即时新闻、不断更新的特性, 不只网际网路或 SNG 车等设备, 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室的常规、读者或观众对该项讯息的期待、以及读者同时也是讯息生产者与消费者, 凡此都一起促成即时新闻与新闻不断更新与片断化的特性, 只有将产制新闻的新闻室视为科学实验室, 分析各个行动者, 以及更大的社会脉络, 才能更加如实地呈现并研究数位即时新闻产制的样貌。

参考书目

- Akrich, M. (1992). The de-scrip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n Bijker, W., & Law, J.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05-22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krich, M. (1995). User presentations: Practices, methods and sociology. In A. Rip, T.

- Misa & J. Schot (Eds.), *Managing technology in society* (pp. 167-184). London, UK: Pinter.
- Bechmann, A. (2011). Closer apart? The networks of cross-media news production. In D. Domingo & C. Paterson (Eds.), *Making online news-volumn 2.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internet journalism* (pp. 15-2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ijker, W.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czkowski, P. (2004). The mutu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videotex newspapers: Beyond the diffusion and 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 255-267.
- Boczkowski, P. (2009). Materiality and mimicry in the journalism field. In B. Zelizer (Ed.).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pp. 56-67). London, UK: Routledge.
- Boczkowski, P. (2015).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Some hopeful and cautionary remarks from an early explorer. *Journalism*, 16(1), 65-68.
- Boczkowski, P., & Lievrouw, L. (2009). Bridging ST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larship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J. Hackett, O. Amsterdamska, M. Lurch & J. Wajcman (Eds.),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pp. 949-977), *the 3r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P Press.
- boyd, d. (2010).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 Affordance,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In Z. Papacharissi, (Ed.).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pp. 39-5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allon, M. (1987).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W.E. Bijker, T.P. Huges & T. Pinv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pp. 83-10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adwick, A. (2013).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uze, M. (2009). Techn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journalist: Agency beyond imitation and change. In B. Zelizer (Ed.).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pp. 82-97). London, UK: Routledge.
- Douglas, S. (1987).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Eisenstein, 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raj, S., & Azad, B. (2012). The materiality of technology: An affordance perspective. In P. M. Leonardi, B. A. Nardi & J. Kallinikos (Eds.), *Materiality and organiz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pp. 237-25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rich, K. (2010). *Optical media: Berlin lectures 1999*. Polity Press.

Garrison, B. (2001). Diffus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newspaper newsrooms. *Journalism*, 2(2): 221-239.

Hemmingway, E. (2008). *Into the newsroom: Exploring the digital production of regional television news*. London, UK: Routledge.

Innis, H. A.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Jenkins, H., Ford, S., & Green, J. (2013).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ohns, A. (1998).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line, H. K. (2000). *Consumers in the country: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Americ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line, H. K., & Pinch, T. (1996). Users as agen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 the rural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763-95.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wson-Borders, G. (2003). Integration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Seven observations of convergence as a strategy for best practices in media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5(2), 91-9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Micó, J. L., Masip, P., & Domingo, D. (2013). To wish impossible things: Convergence as a proces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an actor-networ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1), 118-137.

Mitchelstein, E., & Boczkowski, P. (2009).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online news production.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10(5), 562-586.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Sage.

-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UK: Methuen.
- Plesner, U. (2009).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on changing work practic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actants in newswork. *Journalism*, 10(5), 604-626.
- Ritzer, G., & Jurgenson, G. (2010).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pre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0(1), 13-36.
- Rogers, E.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4th ed.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Rodgers, S. (2015). Foreign objects? Web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 journalistic cultures and the ontology of software. *Journalism*, 16(1), 10-26.
- Silverstone, R., & Hirsch, E.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y: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London, UK: Routledge.
- Singer, J. B. (2004). Strange bedfellows? The diffusion of convergence in four news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5(1), 3-18.
- Williams, R., & Edge, D. (1996).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Research Policy*, 25(6), 865-899.
- Woolgar, S. (1991). “Configuring the user: The case of usability trials. In Law, J.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Never-ending fluidity and fragment: Exploring a Potential Research Approach to Materiality of Instant News Production

Shu-Lin Ch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egrate two research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drawing upon the idea of materiality. With investigating the roles of “technology”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mbedded in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it reminds us of technology being visible, instead of being taken as background of news case-study.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ideas from ANT, social shaping as well as co-production in STS to analyze the preliminary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personal in-depth interviews. It provides a further thinking of a possible approach to materiality of instant news production.

Keywords: Co-production, Actor Network Theory, Mutual Sha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 Chiang, Shu-L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CShulin @googlemail.com

媒介化、行动化： 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

方念萱*

本文引用格式

方念萱（2016）。〈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
《传播、文化与政治》，4:55-83。

投稿日期：2016 年 10 月 1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12 月 1 日。

* 作者方念萱为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e-mail: telnhf@gmail.com

《摘要》

本文从 Hepp 论述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相关性切入，检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全景」这概念，藉以廓清宣称不再区分不同建制、而要研究整体（totality）的媒介化理论所谓的整体可能为何。之后藉由耙梳有关理论层次、实证分析可能性等的相关辩论，审视媒介化理论层次，从而找出媒介化理论所说的过程为何以及可以采行的研究路数。最后，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检视、分析媒介化此一方兴未艾的理论、研究取径，思考未来媒介化研究「行动化」（actor-ing）、「行动者网络化」（actor-networking）的可能性与挑战。

关键词： 中程理论、全景、行动者网络理论、媒介化

壹、前言

媒介如何影响文化与社会？这一个重要性历久弥新的提问在媒介化（mediatization）这概念出现之后，掀起另一波讨论分析的热潮（Asp, 1990; Block, 2013; Couldry, 2008; Couldry & Hepp, 2013; Deacon & Stanyer, 2014, 2015; Ekstrom, et al., 2016; Hjarvard, 2008, 2013; Hepp, 2013; Hepp et al. 2015; Jensen, 2013; Krotz, 2007, 2009; Lundby, 2009）。虽然探讨媒介对大众文化影响的书籍文章历来所在多有，但是就像Hepp在2013年著作开宗明义所说，在媒介化论述兴起之前，文献大多分为二路，一边是媒介对大众文化影响的著述，另一边持续增加的则是有关媒介文化的论述，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持续转换成为媒介文化的允当分析，依然不足」（Hepp, 2013, p.1）。Hepp认为过往研究看待媒介与文化泾渭分明，用过往的观点难以审视整体文化、社会、各种建制都逐渐媒介化的趋势与现况。过往传播研究尚未概念化Hepp所说的这种文化尽皆成为媒介文化的「转换」（transition）、未概念化这种日常生活中媒介印记无所不在的过程与结果。Hjarvard在他同为2013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开头，也直接指出媒介化这概念有效地呈现媒介如何扩散到社会上其他如政治、战争、宗教等建制上、如何与之纠结、产生影响；在媒介化的研究中，媒介与其他建制不再是各自独立的机构，媒介化研究关注的正是彼此交融。Hjarvard指陈过往的效果典范（effect paradigm）看重媒介如何对人产生影响，而另一典范看重阅听众如何使用媒介以满足己需，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或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审视，都看重主动阅听人，媒介则成了第二因。Hjarvard强调当前媒介渗透（permeate）社会、文化，媒介再不能被看做与社会、文化有别、三者各自独立。媒介化研究不同于前，研究看重的是媒介在社会、文化中，所形成的长期结构性变迁（the long-term structural change; Hjarvard, 2013, p. 2）。

此一由欧陆传播与社会学者开始提倡的媒介化概念，近年亦见诸台湾传播学界的研究作品。唐士哲（2014a）引述欧陆学者有关媒介与其他社会场域之间交错过程的文献，论述「中介」（mediation）、「媒介化」（mediatization）

这两个概念，藉以分析近年企图重新勾勒传媒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企图。唐士哲（2014b）另一篇论文探讨政论节目、政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之间互动，以了解政治媒介化的过程，唐士哲亦采用「媒介化」此一概念，以其「关切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因其深化影响力，而导致与媒介有互动的其他社会机构或组织的专业实践种种的质变」（唐士哲，2014b，页4）。曹琬凌（2015）亦指陈欧陆传播研究领域近10年来倡言「媒介化」（mediatization），以之描绘媒介内容与平台在日常生活、媒介组织、以及各种实践类型均在其中的变化与广泛效应。在两篇实证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媒介化此一过程的研究，唐士哲（2014b）探究政论节目出现后，台湾政治上相应而生的政治实践，实际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一政治传播实践，电视政论导引出哪些相应的制度化政治实践或作为」（页10），而在研究方法上，唐士哲在此初探质性研究里，采用深度访谈与报章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以探究政论节目此一常态化的政治传播实践如何致使政府行政、政党行事发展出应对作法。传播组织单位与政治场域的媒体策略之间的「交易」过程就是媒介化过程的一例。政党党务运作、行政部门行动呼应，在在与名嘴化的政论节目与其制作逻辑有深厚的关系，初探性研究细密勾勒了互动关系脉络。曹琬凌（2015）与唐士哲一样，也在论文中提出Schulz（2004）所言媒介化的四个关键角色，包括了延伸、取代、交融、迁就，将媒介化概念构连再媒介化（remediation）概念，研究市场媒介逻辑如何深入社会整体脉络、动员、改变。这两个台湾的有关媒介化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分析上，都深入互动脉络，但是就媒介化之为一个「过程」（process）的分析上，对于理论指称的过程、历史性转变等概念的定义与操作化方式，则未多着墨。

其实，有关媒介化概念理论有关「过程」的主张、在实际研究上对于该当如何研究，近年来有诸多辩论、分析（Deacon & Stanyer, 2014, 2015; Hepp et al. 2015; Deacon & Stanyer, 2015; Ekstrom, et al., 2016）。从2014年一路延续到2015年发表在《媒介、文化与社会》期刊的几篇论文，以Deacon与Stanyer论述起头，他们对媒介化理论是否过于笼统、所指称的影响过程究竟有无因果方向、以及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行性等议题提出己见。此一对媒介化理论提出的挑战引来Hepp等人于2015年在同一期刊上的回应，辩论聚焦在究竟媒介

化是无视其他脉络因素的媒介中心论抑或是缜密关注文化媒介化的不同进路。在此之后，Deacon与Stanyer直问理论的区辨力（discriminatory forces）何在，进而主张理论该当用以进行实证分析。辩论至此，媒介化理论在众人的辩论中，理论之为中程（middle-range, meso-level）或是巨型（grand）的道理、原因似仍未能愈辩愈明。最近一篇相关讨论是2016年Ekstrom等人合着的期刊论文，他们以「媒介化研究的三大任务」（The three tasks of mediatizatio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an open agenda）为题，接续Deacon、Stanyer与Hepp等人就媒介化过程的因果属性所开展的辩论，深究社会转变的长期过程究竟应该如何研究、要如何得见互动关系。

当Hepp等人在回应Deacon与Stanyer的诘问而以媒介化理论本来就不是零合主张、并不认为理论一定是持媒介主导政治或是政治主导媒介这种赢者全拿的立场，Deacon与Stanyer就以「媒介化『与』其他建制」（mediatization and）指称Hepp等人笔下的媒介化理论——Hepp等人强调媒介化理论指的是媒介化「与」社会其他建制的共变；Hepp等人否认这理论是决定论、只看重「其他建制『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这种过程。这种强调「与」、强调「连结」、「同时发生」的立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立论核心相近。也看重过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也一路面临与媒介化理论相似的检视、提问——理论之为中程（middle range）或实为巨型理论（grand theory）？理论对于实证研究的指引？事实上，媒介化理论的研究学者过往就曾指出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渊源。Nick Couldry与Andreas Hepp主编2013年*Communication Theory*期刊有关媒介化的专号，在该期专号导论中，两人指出2000年前后几股影响引发媒介化概念成型、成为势之所趋的关键因素与研究走向。Couldry与Hepp就认为受到傅科影响、由Bruno Latour与相关学者逐渐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其一。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权力运作的探看、思考，不再只局限在特定机构建制中，而在每日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制度的连带、机制、习惯中寻找。Hepp自己在他的2013年的专书《媒介化文化》（*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中，也直接指出

媒介化概念中的后设过程（metaprocess）¹其实与Bruno Latour在他的著作*Reassembling the Social*（2007）中发展的概念「全景」（panorama）大有关系。

本文从Hepp论述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相关性切入，检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全景」这概念，藉以廓清宣称不再区分不同建制、而要研究整体（totality）的媒介化理论所谓的整体可能为何。然后，藉由耙梳有关理论层次、实证分析可能性等的相关辩论，审视媒介化理论层次，从而找出媒介化理论所说的过程为何、可以采行的研究路数。最后，藉由行动者网络理论所经验的检视、分析，回头探看媒介化此一方兴未艾的理论、研究取径，思考未来媒介化研究「行动化」（actor-ing）、「行动者网络化」（actor-networking）的可能性与挑战。

贰、什么样的整体？媒介化与全景

要如何理解媒介化？媒介化是个指称「整体变化」的概念，Hepp就引用Latour的全景概念来强调媒介化这概念的某些重点。Hepp（2013a）在著作中再三强调要视媒介化为一概念建构（conceptual construct）、将其当成「一种有关变迁的持续后设过程的全景」（a panorama of a sustained metaprocess of change；Hepp, 2013, p.69）。首先，论及「变迁」，Hepp强调媒介化并不是一种封闭的媒体转化，而是开放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文化两者变化之间的往复关系。至于「持续的、后设过程的」，则是Hepp在介绍何为媒介化时，所引用的Krotz的概念。Krotz（2007）以「后设过程」（metaprocess）指称变化，然而，他虽然讲的是「过程」，但是Krotz强调他所讲的「过程」，并不是一般认为的那种从时序上某一点开始、行进至另一点结束的意思；他强调后设过程的开展是多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包括了社会变化与文化变化（引自Hepp, 2013a, p. 47）。Krotz认为这影响、变化既难以自特定时点计算、然而又是在日常每日、时时刻刻发生，一般人以及要研究这种传播变化的研究者都可以体察意会到这种变化的形式、因果。Hepp解释Krotz的「后

¹唐士哲翻譯為元過程，曹琬凌翻譯為後設過程。

设过程」概念时，引述各理论家关注的社会变化，包括个人从阶级、地位挣脱出来的个人化过程、全球益发紧密连结的全球化过程、各式消费文化开展的商业化过程（Hepp, 2013a, p. 47）。Hepp 强调了解后设过程，就能了解媒介化。Hepp 在书中就直接引述 Latour 理论中「全景」（panorama）来与后设过程这个强调包括一切的概念对话，他书中的标题即为「媒介化为后设过程，亦为全景」（Mediatization as a Metaprocess and as Panorama; Hepp, 2013a, p. 46）。他认为媒介化的长期变化是在多处发生，也因为如此，他认为媒介化概念所强调的与 Latour 所说的全景可以对话。

Hepp 提到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的「社会」不是生就如此；社会，是由不同的构连（in its different associations）方成，Hepp 认为 Latour 想探究的是这样藉由接合、连结而成的社会过程是什么样（how it articulates itself; Hepp, 2013a, p.49）。说明至此，Hepp 转而提到，Latour 也以「全景」（panorama）来指称「整体」（totality）。Latour 拒绝采取一种将社会当成「自成一体」（given unity）的巨观点；Latour 认为，采取一种对「整体」的强力宣称（staging the totality）是个严重问题，但是，这确实是由来已久的论调，Hepp 引述 Latour 的话认为虽然对整体的强力宣称大有问题，但是，在描述日常生活或是科学的时候，藉由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像是螺丝箱（clamps）、叙事（narratives）——就可以解决整体宣称所产生的问题（Hepp, 2013a, p. 49）。Hepp 认为 Latour 提出的全景概念就是解决整体论述之弊的一种叙事。Hepp 在书中引用 Latour 2007 年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书中的话说所谓「全景」这概念，是「设计出了一种天衣无缝的景象，给予身在其中的观看者一种强而有力的、浸淫在真实世界的印象」（Latour, 2007, p.188）。Latour 确实花了一番笔墨来论述有关整体的强力宣称之病，也提及全景与之对话，但是，Latour 的论述逻辑并不是直接以全景取代简单的整体论。Hepp 的引述、Latour 原典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探究媒介化概念理论时，反思、建构有关社会整体变化的逻辑、论述，但是，全景究竟为何？必须回到 Latour 原本的阐释。

Latour 确实提到全景的这种「整体」特别之处，在于「解决了呈现整体的难处、解决了要能使微观、中层、与巨观的景貌彼此交织的挑战」（of nesting

‘micro’, ‘meso’, and ‘macro’ into one another; Latour, 2007, p. 188)。然而，Latour 的论述路径是自傅科的全景敞视（panoptica）入手，先论窄景敞视（oligoptica），继而指出全景（panorama）与窄景敞视（oligoptica）宣称的整体有别；借着分析全景的虚与实，指出当代探讨整体的挑战。窄景敞视是 Latour 在同书第 181 页开始论述的概念工具。他说到窄景敞视有别于傅科所讲的全景敞视（panoptica）、不是提供一个一览无遗的视角。窄景敞视指的是在一个位置上，看的范围固然小但是看得仔细（they see it well; Latour, 2007, p. 181）。Latour 以战争中的战情室（war room）为例说明，他指出科学技术发展日盛，因此我们具体地追踪社会连结（physically trace social connections）益发容易，所以像是战情室，可以藉由科技来回传讯，决战千里，但是科技提供的连结稍有状况，连结中断，这也显示了连结的脆弱（Latour, 2007, pp.181-182）。Latour 与 Hermant（2006）就以窄景敞视指称那些提供有限区域的全部资讯的中心、机构，就好像是一个城市的行控中心、自来水供应中枢等，他们就单一目的备齐完整资讯，协力让大城市运作无碍；窄景敞视指的就是隐藏的连结。因此，窄景敞视和傅柯强调的全景敞视正好相左。Latour 在他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书中就曾这么说，「窄景敞视常显现他们连结上的脆弱，而对于彼此连结无法全权控制」（p. 188）。

那么全景与此有何不同？Latour 表示，全景就是「得见万事万物」（see everything），然而，在此同时，Latour 认为说是得见万事万物，事实上却是「什么也看不到」（see nothing），因为这全景只是投射在墙上，与外界却是隔绝的（Latour, 2007, p.187）。Latour 援用这全景概念，强调全景投射在房里三百六十度墙上的景象就是全部、起码让观看的人自以为看到了全貌，而这样环场的、绵密的影像确实也将微观、中层、与巨观的景貌尽皆呈现、彼此交织。这些环场的、不间断的、自有逻辑的影片景象，为在内里的观看者认为就是全部。全景观视（panoramas）给人一种印象是他们对于他们浏览审视的，全然知晓，即使其实他们是半盲的，而在一个封闭的观景场域中，除了有兴趣的和弄不清楚情况的观景者闯入，环场的景观就维持原样。Latour 为了说明窄景敞视与全景观视之别，他以位居美国佛罗里达的美国战情室对于千里之外的战情指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里上节目的退休将领对前线战情

的评论为对比，他说前者在随时接收前线资讯的情况下，了解掌握实情，只是，传讯的光纤卫星一断，战情室的人也莫可奈何。电视节目里对前方战事夸夸其词的来宾其实未能充分掌握即时发展，但是却没有断讯的危险(Latour, 2007, p. 188)。Latour 看重针对特定的、有限场域中系统的连结资讯的看待，而全景观视的自以为是，在他看来，问题大矣。全景设计了一幅景象，在其中，没有任何隙缝，给了观众一种好似完全沉浸在真实世界的有力印象（见 Latour, 2007, p. 188; Hepp, 2013a, p. 50）

Hepp 表示全景以一种整体（totality）的方式，再现了真实世界的部分。但是，问题就出在「整体」。Hepp 继续引述 Latour 的话表示，许多社会学理论所提供的论述（narratives）若被视为具体而微地表述了日常生活的全部、被当成整体，这种全景观点就误导了我们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了。Hepp 究竟如何将 Krotz 的后设过程与 Latour 的全景概念连结在一起，而有助于我们对于媒介化的理解呢？Hepp 认为要是将后设过程当成一段完整的过程，自成一体，就好像因为其与文化、社会互为表里、融合为一，所以就认定这是一种「纯粹的巨观的现象」（purely macro phenomena; Hepp, 2013a, p. 50），Hepp 认为从 Latour 的观点观之，这大有问题。寻找媒介化的非历史的、正式的定义，这是徒劳无功、也大有问题；Hepp 认为媒介化这概念所开启的，是一种特别的世界全景，不是想要尽皆含纳、站一处而小天下的那种历史观。然而，如果媒介化真的就该是不能定义、不能定于一尊，永远是一时一地的概念，是不是根本不能给媒介化一个定义？定义要永远开放？Hepp 认为也并非如此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需要「以一种特殊的全景」（a specific panorama; Hepp, 2013a, p. 51）来指称媒介化了；Hepp 认为，「媒介化」这概念企图掌握的是社会、文化、媒介传播之间变化的流转关系。

Hepp 在书中并未直接言明 Latour 对于全景更幽微的观察，但是这正与媒介化概念的开展有关，这也必须回到 Latour 对理论概念的阐释中。Latour 在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书中直接指出那些看似最一致、最完整的说法（全观点）可能是最盲目、最局限、最片段的观点，但是，全景说法深具研究价值。全景，并非一无是处；全景一如其他任一观点，是说法的一种，可以连结、构连其他，而形成多元。Latour 甚至从全景所具备的特质，赋予

全景不同于其他说法的重要性，正因为全景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机会，这种观点、论述该当被好好研究。Latour 强调，这种整体化的观点不该被鄙视、只当成专业偏执的表现，「他们该当与其他观点一样，被加总在一起，为我们所部署」(they should be added, like everything else, to the multiplicity of sites we want to deploy; Latour, 2007, p. 189)。Latour 认为，即使只被当成组合中的一部份，但是，全景常常跃居中心、成为人们理解世事的全部。何以如此？这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份的全景因为让观众、读者得以对完整 (wholeness) 求解、对中心 (centrality) 产生渴望，还是有可能渐次又被观众、读者放到中心的位置 (Latour, 2007, p. 189)。

Latour 说得仔细，他说「我们是在这些有力的故事中得着那些『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比喻、我们本当分享的热情、有关社会架构的大致轮廓、我们被规训的大论述」(that we get our metaphors for what 'binds us together', the passions we are supposed to share, the general outline of society's architecture, the master narratives with which we are disciplined; Latour, 2007, p.189)。他的这些话，正点出了何以全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由此观之，Latour 所强调的也就是对于叙述、表现整体与中心的欲望是可贵的趋力（只是如何叙述表现是重点）。援引 Latour 全景说法的 Hepp(2013a, 2013b)在著作中处理的，就是社会、文化之为一个整体，逐渐媒介化的过程与现象。媒介文化这整体，其实就是文化媒介化的缩写，而这当中，媒介沟通就是我们描述整体经验的核心。Hepp(2013a)引述 John Thompson 的作品表示在论现代化的论述中，媒介沟通 (media communication) 的重要性被轻看了——过往探究现代性带来的转变时总是追究「价值」的转变，但是 Hepp 认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价值转向符号形式，检视文化变化时答案会更明显。他引述 Thompson (1995) 的话时特别强调有一个清楚具体的机构组织基础，也就是媒介组织的发展，从 15 世界后半开始，一路延展扩张。Thompson 曾经谈「传统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tradition; Thompson, 1995, p.180)，指的就是将活生生的传统转化成媒介内容²，传统可以如是转移传递到原生地区以外的地区。所以，

²電視節目「舌尖上的中國」就是一例。

就此观之，媒介化并不起自数位媒体。然而，媒介化理论与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分析并不一样，发生的转变并不是媒介的物质结构的直接效果使然。Hepp 表示，所谓的媒介的形塑力量（moulding forces）只有在考量各种挪用的形式时，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日益具体（Hepp, 2013a, p.55）。Deacon 与 Stanyer（2015）回应 Hepp 等人对于媒介化理论指涉的现象范畴的论述时，虽然引用的是 Althusser 的概念、不是 Latour 的说法，Deacon 与 Stanyer 批评他们论述中的媒介化「再无此外」（has no outside; Deacon & Stanyer, 2015, p. 657）。这些交锋也都显示 Latour 笔下的全景虽然正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概念，但是「全景」与「窄景敞视」的对话确实是当前分析探究媒介化时，各方理论的精准比方；Latour 的概念是研究媒介化的理想切入点。

Latour 在提出全景概念时详尽描绘了这概念如何具体而微地传达了一般人看待景观的偏执，然而在此同时，Latour 又从这概念、概念所传达的人类的渴望中指出「得见万事万物的渴望」诚然可贵。延续 Latour 的分析、提问，从窄景敞视对连结的看重是否得以回应有关全景「如何得见」的提问？媒介化之为全景，可以与其他部分如何合作以呈现整体？媒介化的理论讲述的正是如何得见媒介与社会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攸关媒介化理论的讨论、分析应可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取譬、进一步思考理论可能有的缺漏、进行观察的方式。

参、媒介化概念化到媒介化的实证分析

媒介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都被看做是过程导向的理论，然而有关媒介化理论的论辩中，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媒介化是一过程」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理论强调媒介主导行动的因果、有人主张理论看重过程的互动（Deacon & Stanyer, 2014; Hepp et al. 2015; Hjarvard, 2014; Krotz, 2007）。研究者如何主张媒介化过程的研究法？不同的主张就引导着对于何谓适当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看法。从理论的角度思考，媒介化理论层次不同，对于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主张、指引就不一样。媒介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同样是看重

过程的理论，也都曾被研究者以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视之，在相关讨论中论及媒介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该如何进行（Hjarvard, 2013）。在文献中，研究者都曾探究这两个看重过程（或谓行动者的过程）的理论层次，好了解理论最终宣称是对文明、文化、社会的主张或者是深究一时一地、特定脉络下的现象。我将先从理论、概念的类型、应用上的挑战切入，审视与媒介化理论、研究相关的辩论中，有关媒介化理论区辨力、与因果论的关系、以及对互动、共变过程的主张等疑问，探究研究者如何主张媒介化的研究法，再转而探究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的过程」的观点、研究角度、以及近年从中程理论立场出发，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的检视检讨，藉由相关分析再转回思考媒介化理论应用、分析过程的可能挑战。

DiMaggio（1995）在回应 Sutton 与 Staw 的〈理论不是什么？〉（What Theory Is Not?）一文时，指出好理论并非只有一种；有关好理论该是什么样，他指出社会科学所论，至少有三种理论——法则统摄型的理论（theory as covering laws）、启蒙型的理论（theory as enlightenment）、以及叙事型的理论（theory as narrative）。法则统摄型的理论强调理论的推论性、解释力，理论解释、说明世间现象变异关系。启蒙型理论强调的则是复杂、去熟悉化、一言难以尽述的现象关系，这样的理论反而不是藉由明晰的概念建立，DiMaggio（1995）在文中引述 Gouldner（1970）的话语说这样的理论常是一部「出其不意的组构」（a surprise machine）——由一组像是重要零件一样的类别与假定组成，旨在扫除通俗的观念，好让发人深思的洞见现身（DiMaggio, 1995, p. 391）。第三种叙事型的理论强调的是叙事（narrativity），理论为的是说明社会过程，强调叙事以及相关说法适用范畴的可信度。这样的理论不是只是检验变项间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的真实行动是如何产生叙事中所言明的关系的。Geels（2007）就在他有关 STS 发展为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可能性的论文中，引述 DiMaggio 这篇论文，强调理论不只是概念与命题，「也关乎风格」（but also style; Geels, 2007, p. 631）。他引述 DiMaggio 的三种好理论路数时指出 STS 理论几乎与法则统摄型理论背道而驰，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则是第二种理论路径的典型范例——以扫除一般想法与假定为职

志、去熟悉化、解构大众接受的假设为宗旨的启蒙式理论。他引述 Law (1999) 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赞语, 说这理论具有「令人震惊的价值」(shock value)、「将神圣的分野 (divisions)、差异 (distinctions) 掷入永火」(p. 3; 引自 DiMaggio, 1995, p. 632)。至于第三种理论路径、重过程的叙事型理论, Geels 认为因为这路径的理论看重行动者(包括行动的个人与结构)在过程中变化, 因此即使仍然看重变异的由来、解释量, 但是同样看重这些行动者的行动产生联结 (associations) 的原因、说法, 因此, 不少 STS 作品也属于这风格。

理论、概念遇上快速变迁的世界、要用以揣摩、再现世事变化, 又有新的挑战。Sartori 在 1970 年曾经发表〈比较政治的概念误资讯〉一文, 该篇探究因着当时世局变化, 政治学研究领域发展新的概念理论以分析现象而遭遇挑战, 这篇论文至今仍深具影响力。当时他有鉴于政治学领域因着世界益发政治化——愈来愈多的动员、愈多参与——指出研究者面对的是「政治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politics)、无事不政治, 因此, 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概念、方法受到挑战, 研究者难以只使用承袭自前人的概念、方法研究现下世界(Sartori, 1970, p. 1033)。Sartori 表示, 「我们要调查探看的世界愈辽阔, 我们愈是需要足以纵横四方的概念工具」(the wider the world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more we need conceptual tools that are able to travel; Sartori, 1970, p.1034)。研究者遭遇的挑战是我们不得不从行之有年的概念出发, 同时发展可以因应最新变化的词汇、概念。此时, 研究者在概念化时, 多扩张其意义、扩张应用的范畴 (broaden the meaning--and thereby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of the conceptualizations at hand; Sartori, 1970, p.1034)。Sartori 称此为「概念撑张」(conceptual stretching)——概念化的时候, 愈撑大、愈抽象、也愈空洞; 理论、概念得以涵盖解释的范畴大了, 但相对地, 理论概念也因此丧失了指涉的精准程度。以 DiMaggio (1995) 与 Sartori (1970) 对于理论类型、概念撑张的分析来论媒介化理论, 近两年来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化此一新理论的辩论就环绕在媒介化理论的理论类型、理论解释力、以及在概念化的同时, 如何看待媒介与其他建制的互动关系、适当的研究方法。在探究有关媒介与其他建制、因素共生共变的过程时, 相关讨论正就是在辩论媒介化的研究应该如何跟随行动者 (follow the actor)、谁一起行动。虽然如 Hepp

(2009) 等部分研究者强调媒介化看重的过程是历史变迁、是后设过程 (meta-process), 根本不是实证意义上可以像是看待行人过街的过程一般的具体过程, 但是, 媒介化理论的辩论涉及如何跟随行动者、启动行动或者共同变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正可以与之对话。

近年有关媒介化的辩论可以以 2014 到 2015 年发表在《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 期刊上的系列论文为代表。Deacon 与 Stanyer 于 2014 年撰文提到媒介化这概念重要性日增, 然而却少人评断。他们以关键字搜寻 2002 到 2012 年这十年间 14 种主流媒体与传播期刊的所有论文, 找到 93 篇论及「媒介化」这概念的论文。但是这其中八成以上的论文, 论及这概念时仅仅带过, 并未定义、解释操作、没有说明所指陈的媒介化究竟是哪种。Deacon 与 Stanyer 开宗明义地提问「这概念, 够严谨吗?」(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3) 他们认为媒介化既然指称的是变迁的历史过程, 那么这过程始于何时? 如何指称、得见过程变化? 又该如何分析? Deacon 与 Stanyer 从三方面评析——概念指称的过程有着什么样的因果性、指涉的变迁的历史性如何呈现、以及概念究竟是如何设计。他们的提问开启他们与 Hepp、Hjarvard 与 Lundby (2015) 三位学者的辩论, 前后三篇论文就相关议题来回讨论。一开始, Deacon 与 Stanyer 就说明当前援用此概念的研究可分二端, 一为 Hepp (2013) 指称的制度化取径 (institutionalist) 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式取径 (social constructivist), 前者视媒介化为一过程, 在其中, 「非媒介的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s) 必须适应、遵循媒介的规则、目的、产制逻辑以及限制」(Mazzoleni & Schulz, 1999, p.249; 引自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3)。社会建构主义式取径同样视媒介化为一过程, 只是看重的是「这过程中变化的资讯传播科技驱动 (drive) 了不断变化的文化与社会的传播建构」(Hepp, 2013, p.616; 引自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3)。两种取径, 着眼两种过程, 前者看重的媒介是「大」(big) 的媒介组织及其向心 (centripetal) 的力量, 而后者看重的是「小」(small) 的媒介及其离心 (centrifugal) 的力量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3)。

Deacon 与 Stanyer (2014) 提到 Hepp 将传播媒介看成具有驱动力的前因。Hepp 在与另外两位学者在同一期刊上、回应 Deacon 与 Stanyer 的质诘之前,

Couldry 与他（2013）合写的《传播理论》期刊「媒介化」专号序言、以及他与 Hasebrink 在 2014 年发表于 Lundby 编辑的专书篇章已经就此深入说明。他们一如 Deacon 与 Stanyer 所言,指出媒介化研究可分成制度论(institutional)与社会建构主义式(socio-constructivist)两种取径,前者关心传统媒体、企图了解媒体逻辑(media logic),后者关心每日传播沟通实作,像是数位媒体的沟通、人际沟通的运作等等如何在媒介化过程中,影响文化、社会的变化。虽然这两种取径在怎么界定媒体的「特殊性」(specificity)有别——制度取径关心建制化的媒体逻辑、社会建构主义式取径则关心因脉络而生的某些传播时刻(moments),但是,Hepp 与 Hasebrink (2014)认为两个传统共通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互动。所谓社会互动,不是随意为之,是有着特定形式的互动;说是有逻辑,就意味着有规则、方式、规约。Hepp 与 Hasebrink 认为媒介化研究针对的正就是当媒体科技成为社会不可少的一部份,社会互动会如何发生、如何转变。因此,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媒介化研究的核心。这篇文章中,Hepp 与 Hasebrink 并没有视媒介的变化为因。Hepp 与 Hasebrink 从符号互动论讲起,认为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众多社会互动的其中一类,而传播就与其他种类的社会互动相连结。他们强调的是互动,而非因果,文中倒是提及因为媒介化研究者不断强调社会互动,Hjarvard (2013)就提醒如果只是一个劲地强调社会互动过程,可能忽略如何掌握媒介特殊性这概念化、研究分析上的重要课题、忽略了去探讨互动过程的内里发生了什么。

媒介以其特殊性而影响其他建制、影响日常生活,这与效果论有何不同? Hepp 与 Hasebrink 两位作者特别强调,这可不是媒介效果研究、讲究的不是媒介造就了什么效果;媒介化研究强调的是在互动中,其他社会建制借力使力而媒介被挪用、终而发生型塑(moulding)作用的过程。然而,Deacon 与 Stanyer 正就是质疑媒介化研究者动辄以像是「型塑力」(moulding force)这种讲法指称媒介化而他们以为,究其实,这还是因果论;以因果看待,研究方法上就该有对应策略。Deacon 与 Stanyer 就主张跨时比较(temporal comparison)的研究,认为即使 Hepp 认为媒介化的历程不是一可付诸实证分析的具体过程,跨时比较的研究结果才有助于建构对方所认定的大理论(grand theory)(见 Deacon & Stanyer, 2014, pp. 1034-1036 讨论)。假使像是

Hepp 等主张媒介化的学者一方面说媒介化是历史变迁历程、一方面又坚拒实证分析、只从当下的个案回推过往，Deacon 与 Stanyer 认为这样的理论宣称其实靠的是假设、推测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7)。Deacon 等认为，历史变迁过程固然不可能经由单一个案分析捕捉尽现，但是不致力设计发展可行的研究框架，究竟要如何与目前媒介化研究结果对话？目前实际检视媒介化结果，并没有线性的因果，Deacon 与 Stanyer 说曾经红极一时的 Second Life、My Space 风靡、影响，似乎也就是「一时」。「媒介化学者对于新媒介网路与科技的采纳感到兴趣，他们也应该对这些传播媒介的弃用付以同等关注。」(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8) 显然这样的对话聚焦的是所谓过程，究竟是大的历史历时变迁过程？还是当代一段时间之内，因为领头媒介科技的兴起而引发的各种建制互动、共变？如果可以付诸实证研究，应该如何研究、分析这变动的过程？如果不该只希冀实证分析来证成有关文化媒介化的大命题，有没有可行的观察、分析、得以建立推论的研究方法？毕竟，媒介化的重点正在于「化」、变化持续发生、社会逐渐媒介化 (there is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is becoming ever more 'ized ;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6)。Deacon 与 Stanyer 强调的是研究要得见此「化」。

Hepp 等强调看重社会互动，反驳 Deacon 与 Stanyer 所说，强调媒介化理论论的不是因果影响。Deacon 与 Stanyer 在论辩论文系列的首发论文中提出的另一批评指出媒介化的立论对于过程中参与变化的角色的选择道理不清，媒介化理论与研究并没能具体看待相伴相生、共同变化的角色；所谓的社会互动其实排出了脉络中重要因素。Deacon 与 Stanyer 举政党如何适应、内化媒介逻辑为例，要说媒介增长、自主，但是同时也还有如政党政治专业化程度这种中层因素 (meso-level factor;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5)。如果媒介化学者并没有如 Deacon 与 Stanyer 观察媒介化研究者立论而宣称「大众传媒或资讯传播科技总是对传播实践发挥强力纯效」(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5)，那么，从宏观、中层、到微观层次上的互动、变化、这共同变化的内里关系是？媒介化是否真的关注了同时的其他行动者呢？

Deacon 与 Stanyer 在辩论系列首篇论文最后质诘的是媒介化是否是个没有区辨力的概念，这正是 Sartori (1970) 经典之作中，他对于当时政治学研

究为因应日炽的政治化所从事的概念化提出的批评——「概念撑张」(conceptual stretching)。难道媒介化不能就扮演触发思考的概念的角色(sensitizing concept)? Hebert Blumer (1954) 将概念分为定义型(definitive)与触发思考型(sensitizing)两种,而在2013年《传播理论》期刊「媒介化」专号中, Klaus Jensen 就曾以定义型与触发思考型的分类分析媒介化概念化的状况。在 Blumer 的定义与 Jensen 的援用中,触发思考型定义多指引研究者如何观察分析实证个案。Deacon 与 Stanyer 在2014年的论辩中,则认为如果如是定位,与其说媒介化引导研究者观察,不如说媒介化这样的概念、理论其实反而蒙蔽了认知(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9)。以 DiMaggio (1995) 的三种理论分类看来, Deacon 与 Stanyer 在挑战媒介化的因果论时,他们二人认为支持媒介化理论的学者是以法则统摄型理论看待媒介化;若是像 Jensen 以触发思考的概念视之, Deacon 与 Stanyer 援引 DiMaggio (1995) 的启蒙型理论模式检视媒介化理论的属性——媒介化的观点,触发了什么? 媒介化理论要引导识者关注什么过往忽略的「化」的过程与结果而能一新研究者耳目? Deacon 与 Stanyer 问的是媒介化究竟是哪一种理论? 哪一种概念? 功用何在? 他们引 Sartori (1970) 的讲法指出概念可以是「资料储存器」(data container),但是,即使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universal)的概念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区辨力以避免让不一样的,看似一样」(have enough discriminatory power to avoid making the unlike alike; Deacon & Stanyer, 2014, p. 1040)。论文最后, Deacon 与 Stanyer 建议(pp. 1039-1041),即使媒介化是个放诸四海而通用的概念,依然可以在其下发展一系列抽象层次较低的概念,就像是 Schulz (2004) 指认的延伸、取代、交融、迁就等四个媒介化次概念(sub-concepts),这些新生的概念可以发挥中层概念(medium-level concept)的功能,指点变化转折的形貌。「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放诸四海而皆一致」(of no difference);他们引述 Sartori 的话表示,概念的所谓通行、放诸四海皆准,必须是「实证上放诸四海皆准」(empirical universals)、有其限度(bounded)、而总是指向某对象(something),然而非实证的通行概念基本上指向所有对象、「万事万物」(everything;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42)。Sartori 强调,建立概念、理论的时候,「不是什么」(is not)比「是什么」来

得更重要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43)。Deacon 与 Stanyer 认为目前媒介化理论「宣称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虚假的, 需要成为实证上放诸四海而皆准」(currently a pseudo-universal that needs to become an empirical universal; Deacon & Stanyer, 2014, p.1043, p.1041)。

Hepp、Hjarvard、与 Lundby 这三位媒介化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在回复 Deacon 与 Stanyer 对媒介化理论中心化媒介及其作用力的批评上, 他们表示媒介化理论确实强调媒介角色, 但是, 理论并非决定论, 理论要检视的是「媒介如何形塑 (mould、shape) 社会互动以及传播形定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Hepp, Hjarvard, & Lundby, p.316)。Hepp 与 Hasebrink (2014) 曾深究媒介化这种跨媒介 (transmedial) 概念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他们倡言需要一个中介概念 (intermediate concept) 以探究符号互动的变化, 「传播形定」就是这样的概念。「传播形定」衍生自 Norbert Elias 的「形定」(figuration) 的概念, 本是 Elias (1978) 用以了解社会文化交织的过程样态的概念工具, 指的是经由不断地往复互动所形成的人的网络, 可以是游戏、舞蹈。Hepp 与 Hasebrink 在说明传播形定时, 举家庭为例, 说家庭之为一种传播形定就在于家这社群的维持持续, 靠的就是人际对话、电话联络、一起看电视、明信片、电子信、数位相簿的分享传送、以及经由手机、社群媒体的联络等等; 传播形定指的就是藉由符号互动的传播而逐渐形成、稳定的样态、形貌。当 Hepp、Hjarvard、与 Lundy 反驳 Deacon 与 Stanyer 而举陈传播形定这中介概念时, 强调的就是社会互动, 而且不是一般的互动, 是传播形定这种各式发生中的媒介、传播历时、合力形成的样态。媒介化这大理论导引关注方向, 而中介概念弭平抽象理论与实证个案之间的鸿沟, 有待深究。

Hepp 等强调媒介化讲的「不是媒介『殖民化』其他社会文化领域」(the idea is not that the media 'colonize' other social or cultural domains; Hepp, Hjarvard, & Lundby, 2015, p.317)。Hepp 等人在回应有关媒介与因果论的质疑时, 区分「以媒介为中心」(media-centric) 与「以媒介为关键」(media-centered) 的两种视角 (Hepp, Hjarvard, & Lundby, 2015, p. 316), 阐述媒介化实为后者、不是前者、不是唯媒介是尚的决定论, 以此反驳 Deacon 与 Stanyer 认为他们「自动奉媒介为舞台中心的行动者」(Deacon & Stanyer, 2014, p.1033)。「媒

介中心论」指的是以一种偏颇的方式去理解媒介传播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而「媒介关键论」则是一方面对于同时间经纬交织的各种社会力的运作，采取一种全观的意会、了解，另一方面，「媒介关键论」容许研究者特别关注过程中媒介的角色。同时，Hepp 等人一再强调从理论上以及实作上，媒介化都相当成熟，传播以外的领域都采用媒介化理论概念进行实证研究了。这个在 Deacon、Stanyer 与 Hepp 等人来回交锋的议题与 Latour 理论中的全景概念恰可对应。Latour 在说明全景呈现时强调全景不是全部、仅是投射出来、以其绵密连贯而看似自成一体（自成整体）的映象，然而因为人的需求、欲望，在审视全景与其他部分连缀一起时，往往将全景中心化。这番解释放在「以媒介为中心」「以媒介为关键」的视角辩论中，显得格外重要——在讨论全景似的理论概念时，Latour 的窄景敞视、有关追索脆弱但发生效益的互动，其实提供了另一种探求取径。

在 2014 到 2015 的往返辩论中，Hepp、Hjarvard、与 Lundby 同意 Deacon 与 Stanyer 所言——媒介化研究应该考虑在巨观（macro-）、中层（meso-）、与微观（micro-）层次脉络里涉及的不同因素的互动；他们承认不同畛域，互动或有不同结果，媒介发展也未必只肇因于媒介内部的发展，经济、法律、政治、科技等都可能与媒介发展揉合之后影响媒介结构与动能。Deacon 与 Stanyer 则在辩论终篇以「『媒介化与』或是『（其他建制）的媒介化』？」为题，以「媒介化『与』其他建制」（mediatization and）表示他们从 Hepp 等人的回应中看到了 Hepp 等人声明的媒介化理论主张——媒介化理论指的是媒介化「与」社会其他建制的共变、Hepp 等人否认这理论是决定论、只看重「其他建制『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这种过程。Deacon 与 Stanyer 仍然强调他们分析已经出版、问世的媒介化研究，看到的仍多是针对各种建制、社会文化「的」媒介化的研究，因此，他们呼吁，媒介化要避免成为无边无际、放诸四海而无区辨力的概念，应该发展中层概念、研究互动，聚焦研究「媒介化与」的形貌、过程。Hepp 等人在 2014、2015 的辩论中虽然不像之前作品详述中层概念，在论辩系列的回应论文中，为回应辩论，只略略述及传播形定（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如果以「媒介化与」的角度探看媒介化理论大宣称（grand narrative）其下的传播形定这中层概念、中介概念

所指涉的过程、媒介化研究者所关心的超过程中的案例、次过程，是否有助理论从下而上地论述建立？

肆、媒介化向行动者网络转

虽然 Couldry 与 Hepp 在 2013 的作品中在分析过往重要的媒介化论述之后表示，媒介化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取径，同时，他们综整过往论述，说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媒介化逐渐加强的历史，但是，即使如此，在这篇推出媒介化专号的期刊专刊前言中、他们强调概念化媒介化过程的时候，诸多重要议题有待深入讨论，其中之一即是我们究竟可以在什么层次上安置媒介化理论？这究竟是一个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还是是个提出有关社会、文化转换的大问题的理论？

Hjarvard（2013）也曾以中程理论的角度探究媒介化。他强调媒介化的制度取径从没放弃建立概论、通则时的实证基础，这取径基本上对于媒介对文化、社会具普世影响这类宣称抱持怀疑，强调经验资料、实证、在一时一地的脉络下探讨实属必要。因此，中程理论就成了这取径用以说明自己理论位置的理想概念，Hjarvard 强调最好是在一个时间点、一种特定的脉络之下，发展有关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Hjarvard 在文中比较起 McLuhan 有关媒介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这类议题，指出媒介化理论与其路数不同。Hjarvard 倒是认为像 Meyrowitz（1986）聚焦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广电媒体对政治人物与选民的影响所发展出的理论、研究，就与媒介化理论有相近性（Hjarvard, 2013, p. 205）。只是，要说中程理论就是媒介化理论发展的理想模式，Hjarvard 也引述 Boudon（1991）的话，认为其实 Merton 的中程理论也没有标明依照中程理论而行，可以如何引导实证的探问，言下之意是即使将媒介化理论定位为中程理论，这也并不表示依此而行的实证研究、理论建构就自动有了靠山。研究媒介化著称的 Hjarvard 虽然表示媒介化就是现代性的一段特殊过程，这种说法将媒介化与现代性、全球化等构连在一起，又接近巨观的理论框架，但是，明确指称媒介化理论应为中程理论，依此而

行的研究重要的不是上达人类文明的讨论，而是在发展一般通则的同时，时时探问现实的、实证上的变化。

Hepp 与 Hasbrink(2013)的传播形定(communitive figurations)、Couldry (2012)的媒介多层像(media manifold)等概念都用来说明媒介研究者观看当代媒介群像、点出特殊性，同时呼吁传播学者研究时不能只关注单一媒介，必须整体观之，分析掌握不同的媒介组合之后，是如何涉入文化与社会的持续改变、建构。Hepp 与 Hasebrink 于 2013 年的论述中明白指出媒介化研究需要中程概念(middle-range concept)以为应当进行实证分析却短缺概念工具的媒介化理论打基础、使理论关注的现象是「可研究的」(make it researchable; Hepp & Hasebrink, 2013, p.18)。两位研究者提出传播形定此一具体指涉过程中行动者、脉络的中程概念，同时，论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的路数正是由媒介化中程概念引导的实证研究的方向。

Hepp 与 Hasebrink 指出，从后设过程(meta process)或是媒介化的全景(panorama)转到符号互动、再移转到传播形定，这正代表有关「媒介化研究为何」答案的重新定位。他们表示，如果媒介化研究在乎的正是媒介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在概念化「变化」的时候，一个「避免不假思索地将媒介安置在中心位置的分析性叙事(analytical narrative)」实属必要(Hepp & Hasebrink, 2013, p.18)。Hepp 与 Hasebrink 此言，似乎将媒介化理论定位在 DiMaggio (1995)理论分类的第三类、认为媒介化理论是叙事型理论(theory as narrative)——叙述人事物的真实行动如何产生叙事言明的关系。Geels (2007)认为不少 STS 理论属于此类，而 Hepp 与 Hasebrink 就在分析中明白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媒介化研究分析有所提醒、指出了分析之道。他们二人在论述如何利用传播形定这中程概念工具进行实证研究时，先说明传播形定概念的重要元素包括了传播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媒介总体(media ensemble)、行动者云集(constellation of actors)、以及主题式框架(thematic framing)。「传播形式」就是传播形定的特质，像是家庭的传播形定就和政治上公共领域的传播形定不同——各有各的样子。「媒介总体」指的是每一种传播形定都座落在特定的媒介环境，用这环境与传播形定的关系来说，环境就是形定的媒介总体、是一群发生作用的媒介的总和、以其整体

观之 (in their entirety; Hepp & Hasebrink, 2013, p.13) 至于「行动者云集」, Hepp 与 Hasebrink 认为传播形定就是由一群典型行动者交互纠结所形成的群体, 这些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Hepp 与 Hasebrink 认为每一种传播形定都有一个特殊的行动者云集, 他们的互动未必和谐, 冲突也是形貌之一。Hepp 与 Hasebrink 特别指出, 「主题式框架」与传播研究中的框架研究无关, 此处所谓框架有其互动的与认知的意涵——框架就像文类 (genre), 提供了互动者情境脚本, 知道如何依脚本互动、情境由是再生; 框架也指引新加入情境的行动者方向——行动者只要认出是哪种框架, 就知道该怎么互动。从 Hepp 与 Hasebrink 对于传播形定重要元素的定义看来, 他们也援用行动者的概念, 但是, 并没有特别指出人之外的物也是过程中要角、也是行动者 (actant)。倒是所谓的媒介总体正就是物的总和、物集结互动之后、发生作用的总和。这说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有相近之处, 但是讲到这些元素时, 还没有特别强调网络理论追随行动者 (follow the actor) 的意味。

Hepp 与 Hasebrink 直接提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在他们论述媒介化过程如何进行共时分析之处。二人将研究区分为跨时性媒介化研究 (diachronou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与同时性媒介化研究 (synchronou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前者就是在不同时点进行研究、之后比较结果, 二人举家庭传播形定为例, 像是研究 1950、1980、与 2010 年家庭的传播形定, 之后比较, 就是一例。但是 Hepp 与 Hasebrink 强调, 这样的跨时研究并非认为媒介化就是线性的, 事实上, 二人指出所谓的「媒介化波动」(mediatization waves), 就是指当特定的媒介发展可能导致媒介环境质变、彻底改写原来的传播形定 (Hepp & Hasebrink, 2013, p.17)。讲到同时性媒介化研究, Hepp 与 Hasebrink 特别指出这更需要方法、取径上的思考、设计, 他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正可以提供探看多角色同步、同时作用的媒介化, 而这样的取径与既往方向有别。他们引用 Latour (2007) 论及观看「社会的」(social)、观看变化发生时所一再强调的「保持社会的无层级、扁平」(keep the social flat; Latour, 2007, p.159)——意即对于互动的人与物一视同仁, 所以, 他们强调, 媒介之为一种物, 正就是研究者该紧密追随、研究分析的对象。他们举柯达相机兴起为例, 要研究相机问世以及新手摄影的大众市场之兴, 这两者同时出现, 就可

以采取 Latour 的取径，一步一步探看两者互动、发展。Hepp 与 Hasebrink 提出采行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方法的「同时性媒介化研究」(synchronous mediatization research)，聚焦传播形定的过程，强调这是媒介化研究应该发展的方向。(见 Hepp & Hasebrink, 2013, pp.12-18 相关讨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曾经面临是否为中程理论、是否为研究提供清楚坚实的切入角度与步骤的质疑。Latour (1996) 在回应外界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评时曾经说许多对于这理论的误解来自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追随行动者的纪录、发展不同既往的框架上，提出了坚实的理论论述，但是，对于怎么描述行动者互动历程上，却没有一般中程理论的内容以指引步骤，以致被批评成只不过是描述 (Latour, 1996, p.9)。Lindemann (2011) 论及 Latour 早年与 Woolgar 有关微生物实验室的研究 (1979) 时，确实以中程理论来形容 Latour 早期这类扎根式的、植基于几个个案之上、理论运用有其限度的研究、取径，然而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渐次开展，Lindemann 认为这理论就不再是中程理论了。研究物质文化的考古学者 John Robb (2015) 则在论述物质文化研究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时认为影响物质研究甚巨的理论——包括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都从哲学层次的问题出发，像是处理人的主体性与外在物质世界的关系等等；物质文化研究缺乏中型理论、缺乏真正贴身解释说明物质与其脉络的理论。从这些论述看来，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看重深刻描述，但是从理论的对话层次看来，并非被当成中程理论。Geels (2007) 的论文虽然也探究当前的 STS 理论是否为中程理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力主该是行动者网络理论、STS 理论以中程理论为定位目标的时候了——他从与政策相关性、概念用语、在复杂性 (complexity) 上的过度聚焦、以及理论风格四方面申论以中程理论为目标、重新定位的必要。Geels 指出事实上这些理论与其施做已经蕴含了中程理论的可能性。Geels 引述 Molina (1995) 对 STS 的批评说到像是 John Law 提出的异质工程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征召 (enrollment) 等概念「至今尚未建立一组不只是比方，而是在分析上可以操作自如的概念工具」(Molina, 1995, p. 387; 引自 Geels, 2007, p. 630)。被媒介化研究者视为可资援引、以为中程概

念操作化的指引、进一步发展实证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其实也面对中程化与否的挑战。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的是比方？是用以操作的工具？或其他？

在有关理论层次、实证研究方法等相关议题争执不下的此时，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媒介化研究重要学者 Hepp 等人视为指引媒介化研究进行的重要依据，从而发展出同时性媒介化研究。然而回过头来，愈来愈多的分析、论述采取中程理论的角度，检视行动者网络理论、STS 理论研究的概念、步骤、描述过程复杂度，认为亟需再修正。传播形定、行动者网络，都是研究者在与大理论对话之后发展而出的中程概念；环绕在中程（middle range）的必要性的讨论显示实证分析的企图愈炽、从上层理论、实际现象之间中介工具愈是重要。媒介化研究的讨论已经看出中介概念的重要，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重要性为传播学界看重、采用之际，有关概念、应用的对话重启，行动者网络化的研究路径方兴未艾。

伍、代结语：比喻？步骤？媒介化与行动化的对话

媒介化的概念、理论的深究探讨已经在传播学界掀起热潮。Lunt 与 Livingstone 在 2016 年新近发表的期刊论文中直接以「媒介化是我们领域的新典范吗？」（Is ‘mediatization’ the new paradigm for our field?）为题，回应之前发表在《媒介、文化与社会》期刊上一系列与媒介化理论相关的辩论。即令已成典范，因着媒介化理论概念相关辩论而益发鲜明的课题犹待回应，尤其是「向媒介化转」指的其实正是向着许多与 / 因着媒介而内里运作逻辑生变的领域——文化、娱乐、社会、教育、政治等等——转。如何看出媒介化所指陈的各领域的共变？各家论辩的焦点之一正是看的方法。Hepp、Hjarvard、与 Lundby 强调的「与」、「媒介关键论」是一种看待媒介化的角度、一种不同于媒介中心论的角度。然而，看待「与其共变」、认识这种「与之共变」的认识论立场是什么呢？

Hepp 引用 Latour 的全景与窄景敞视等概念与媒介化对话，援引「全景」以说明媒介化可以被当成有关变迁的全景，然而 Hepp 一方面点出如果就将

媒介化这后设过程当成自成一体、纯粹巨观的现象，这就反 Latour 了；另一方面，Hepp 以「特殊的全景」指称媒介化时，又说不必像 Latour 所言「我们从未现代过」那般极端（go as far as Bruno Latour's exaggerated thesis; Hepp, 2013, p. 52）；他建议研究者其实可以循着生理演化与社会文化变化之别的理路，深入探究跨时、越界、探索媒介化的社会面向。但是，诚如检视 Latour 这本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书的学者 Rowland 等人所言，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的，「从来不是一套现成的、满是为当代社会学理论提供解答的工具箱」（never be a readymade toolkit full of solutions for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Rowland, Passoth, & Kinney, 2011, p.97）。Rowland 等人强调，应该要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成一座可以在其上打造新工具的工作台（workbench; Rowland, Passoth, & Kinney, 2011, p.97）。根据这比方，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概念全数当成可以直接操作化的工具，似乎仍有必须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研究者若是直接立足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上、倚恃这「工作台」而发展可以追溯连结（trace connections）的工具时，Latour 提醒，必须遵循三个重要的原则——将全球地方化（localizing the global）、重新分配地方（redistributing the local）、以及连结不同现场（connecting the sites）（Rowland, Passoth, & Kinney, 2011, p. 97）。Latour（2005）所说的「将全球地方化」正就是他的「窄景敞视」概念，世界千里（global）不在地方的上方、高于地方，也不是地方的脉络，地方不是深藏其中。观察者不能骤然跃上世界（jump to the global）；世界千里其实是在一地一处经由与前线、不同现场的来回连结而生成的。将 Latour 的这概念放在为媒介化发展研究工具上，虽然 Hepp 等人以全景为喻，说明媒介化，但是，沿着行动者网络理论走，更需要的应该是如 Latour 等人有关窄景敞视的说法。

所谓「重新分配地方」这原则提醒的是依照行动者网络理论，地方从来不从全球、世界这种所谓的「脉络」里生成的；没有「脉络」这回事，Latour 甚至也说，没有「互动」这回事，观察者要注意的是连结（connectors）、不因脉络、不因互动而驻足的连结（Latour, 2005, p. 193）。重新配置的其实是观察者的注意力——从原本关心的脉络、互动，转而看到成为主题的连接，这才是所谓的「地方」。这原则应用在媒介化的观察上，提醒的则是观察、

对于连结的追索，必须经由各式各样的行动者。媒介化研究以传播形定为中程概念，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的可能是探看物的连结。Latour 的第三个提醒、第三个原则是连结不同现场，Latour 从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的角度，带入众多行动者网络理论概念，用以强调连结运作形貌。但是，一如 Rowland 等人批评，这对进一步研究最具潜力的论述，众多例子、概念却也有待廓清。

目前直接述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成为媒介化研究发展中程概念、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有限，而在有限的文献中，Hepp（2013）援引 Latour 的全景来比喻媒介化既虚又实的样貌，用以反驳对媒介化之为整体（totality）的想象。Hepp 与 Hasebrink（2013）则先确立媒介化向中程理论发展的必要，而在提出传播形定此一中程概念之后，借重 Latour 的「维持社会平面化」（keep the social flat）概念，呼吁同时性媒介化研究的重要。但是，强调互动、强调物（媒介）的带入、媒介关键化的媒介化研究如要采取行动者网络的取径、研究要「行动化」，更重要的还需要面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两个原则。如果对于所谓整体、全部（totality, global）——就像是媒介化所论的社会文化媒介化，此其一——的论述，放弃加总的叙事，而采取从媒介与不同建制连结的角度，追溯连结，以网络代替结构、整体，媒介化理论与研究所意味的新典范势必更基进。这确实是媒介化研究往行动者网络理论取径转之后，下一步需要探讨的课题。

参考书目

- 唐士哲（2014a）。〈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耙梳〉，《新闻学研究》，121: 1-39。
- 唐士哲（2014b）。〈从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电视政论节目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中华传播学刊》，25: 3-41。
- 曹琬凌（2015）。〈院线纪录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传播研究与实践》，5(2):121-153。
- Asp, K. (1990). Mediatization, media logic and mediarchy. *Nordicom Review*, 11(2),47-50.
- Block, E. (2013). A culturalist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age of "media hegemony."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259-278.
- Blumer, H. (1954).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 Review*,19,3-10.
- Boudon, R. (1991). Review: What middle-range theories ar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4):519-522.
-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 377-391.
- Couldry, N. (2012)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Oxford: Polity Press.
-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91-202.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4).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7),1032-1044.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5). 'Mediatization and' or 'Mediatization of' ? A response to Hepp et 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4),655-657.
- DiMaggio, P. (1995). Comments on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391-397.
- Ekstrom, M., Fornas, J., Jansson, A., & Jerslev, A. (2016). Three tasks for mediatizatio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an open agend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7),1090-1108
- Elias, N. (1978). *What is sociology?* London: Hutchinson.
- Gouldner, A.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eels, F. (2007). Feelings of discontent and the promise of middle range theory for ST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2(6), 627-651.
- Hepp, A. (2013a).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epp A. (2013b):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6), pp. 615-629.
- Hepp, A.,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5). Mediatization: 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2),314-324..
- Hepp, A. & Hasbrink, U. (2013).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pp.249-272). Boston, MA: De Gruyter.
- Hjarvard, S. (2008).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9, 105-134.
- 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jarvard, S.(2014). Mediatization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pp.199-226). Boston, MA: Walter de Gruyter.
- Jensen,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203-222.
-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19-3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Krotz, F.(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 256-260.

- Krotz, F. (2007). *Mediatization: Fallstudien zum Wandel von Kommunikation*. Wiesbaden: VS.
- Lundby, K. (2009). Media logic: Looking for social interaction.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101-11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Latour, B. (1996).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plus more than a few complications. *Soziale Welt*, 47,369-381.
- Latour, B.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ondon, UK: Sage.
- Latour, B. & Hermant, E. (2006). *Paris: Invisible city*. Virtual Books.
- Law, J. (1999). On recalling ANT.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ited by J. Law and J. Hassard, 15-25. Oxford, UK: Blackwell.
- Lindemann, G.(2011). On Latour's social theory and theory of societ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saving the world. *Human Studies*, 34(1), 93-110.
- Lundby, K. (Ed.). (2014).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De Gruyter.
- Lundby, K. (2014). Mediatized stories in mediatized worlds.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19-37).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azzoleni G. & Schulz, W. (1999).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3): 247-261.
- Robb, J. (2015). What do things want? Object design as a middle range theory of material culture.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6(1),166-180.
- Rowland, N. J., Passoth, J., & Kinney, A. B. (2011). Review: Brut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Spontaneous Generations* 5(1),95-99.
- Schulz, 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87-101.
-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1033-1053.
- Sutton, R. & Staw, B.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 371-384.
- Thompson, J.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tor-Network-Theory as a middle range methodology for mediatization research:

The dialogue between mediatization theory and ANT

Nien-Hsuan 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ndreas Hepp's defining mediatization as a metaprocess and as panorama. Panorama is introduced by adopting Latour's Actor-Network-Theory and as the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otality, panorama i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oligoptica and together they help to paint a different picture of wholeness. Mediatization theory is questioned in how its wholeness can be empirically analyzed. Besides this, the questionable discriminatory power and the dubious non-causal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mediatization are also debated. Actor-Network-Theory is then again proposed as to enlighten the possible synchronou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Middle-ranged or not, ANT does function as the workbench on which mediatization researchers can build the conceptual tools needed to conduct research that nesting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 into one another.

Keywords: actor-network-theory,medialization, middle-range theory,
panorama

* Nien-Hsuan 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telnhf@gmail.com

张金策与 1990 年代的台湾左翼媒体： 《群众》杂志及《群众之声》电台

林恕晖*

本文引用格式

林恕晖（2016）。〈张金策与 1990 年代的台湾左翼媒体：《群众》杂志及《群众之声》电台〉。《传播、文化与政治》，4:85-124。

投稿日期：2016 年 8 月 5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 作者林恕晖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室机要科员，曾任《群众》杂志编辑、自立早晚报记者、自立晚报工会干部、自由时报北市组记者、自由时报政治中心国会组副召集人。e-mail:ahui0928@gmail.com

《摘要》

《群众》杂志（1993 年 3 月-1994 年 4 月）与《群众之声》电台（1994 年 6 月~1998 年 12 月）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波的台湾异议与左翼媒体。本研究深度访谈该媒体的创办人张金策等成员，将该波传播与政治活动的缘起，向前推至 1970 年代的党外运动及其后续发展。张金策任职宜兰礁溪乡长任内遭到司法迫害，1977 年从台湾潜逃至美国后，与海外台湾留学生、侨胞社群的左翼思潮发生互动，渐次走向阶级意识更为浓厚的社会与政治运动，透过反核、环保与劳工等诉求的抗争，确立其台湾「工农小市民」运动的路线，《群众》与《群众之声》也就先后扮演准阶级政党媒体的角色。相对于 1994 年台湾省长、北高市长选举时，台湾出现的中国与台湾民族意识之激烈对抗，《群众之声》的阶级色彩另具强烈特征，为此集结的人群也达高峰。惟在台湾首次总统民选在 1996 年登场，象征地理与国家机器的认同强度与凸显程度，如同很多「正常国家」的发展轨迹，已经使得阶级认同大举褪色，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国家意识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张金策等人所希望凸显的左翼路线陷入低潮，尽管《群众》与《群众之声》销声匿迹，但已影响台湾左翼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党外杂志、地下电台、左翼、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

壹、前言

張金策在 1990 年代先後創辦的《群眾》雜誌與《群眾之聲》是當時台灣對普罗大眾發聲的左翼媒體，作者搜集史料、進行訪談，試圖為其軌迹與成績，留存紀錄，彌補當今台灣新聞傳播發展史與左翼相關研究之空缺。

作者曾於 1994 年《群眾》雜誌任職編輯、撰稿，並曾於《群眾之聲》電台工作、擔任張金策隨身秘書，長期直接參與《群眾》運作。出於前述經歷，本研究遂能透過長期直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納入二手資料的研讀，搜集、匯整與判別資料。

在深度訪談部分，本研究訪談包括：《群眾》雜誌、《群眾之聲》創辦人張金策等二十餘人（詳見附錄：訪談人員名單），以及《群眾》成員曾助選的陳婉真，張金策因病旅居美國加州，研究者特於 2016 年 2 月由台灣前往美國訪談張金策。

研究者並以《群眾》雜誌上、下兩集全套 13 期合訂本，及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的「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所保存的《海外政論》、《台灣天地》檔案為研究之文本，進行論述分析。並搜集《群眾》雜誌相關人員之官方記錄、私人記錄，並搜集《聯合知識庫》、《中央通訊社》自 1992 至 1998 年有關《群眾》雜誌及張金策之報導資料比對。研究者於《群眾》雜誌任職後，曾撰寫部分回憶文章，相關文本也作為研究之用。《群眾之聲》資料因年代已久，電台庫存資料已遭毀損，無法取得文本下，以深度訪談取代。

本研究也試圖透過對《群眾》研究，追尋張金策等人於近代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脈絡，並藉由整理《群眾》的歷史經驗，並以 Gramsci 的文化領導權、陣地戰理論，厘清台灣左翼運動面臨的問題。

貳、1990 年代之前的張金策¹：從台灣到美國

¹ 《群眾》雜誌、《群眾之聲》的開辦經費主要來自張金策籌募，張金策於流亡美國時期與留學生發展的左翼刊物、組織，並促成留美學生返台後與學運、社運幹部集結形成《群眾》，本研究因此自張金策黨外運動歷程出發、探究，研究者試圖

张金策在 1943 年出身于宜兰县礁溪乡的党外政治家族，1972 年击败国民党对手当选礁溪乡长，但任职一年半即遭国府以贪污为由起诉、停职，并判刑 10 年，直到 1997 年才获判无罪定讞（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张金策并受康宁祥、张俊宏邀请出任《台湾政论》副总编辑，直到 1975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五期的《台湾政论》被国府查禁停刊。受李万居《公论报》的从政、办报、组党模式影响，形成张金策党外运动的参政、办刊物、发展组织的政治架构。张金策参与台籍政治人物集结的《台湾政论》，即为张金策的党外运动政治实践路径出发点。

在国府以司法判决使张金策面临入狱危机下，张金策决定于 1977 年 5 月偷渡赴美，张金策受访时指出：

1977 年初，国际特赦组织人员告知我，美国国会将举办台湾人权听证会，我认为机不可失，因此决定冒险偷渡、到美国华盛顿参加听证会，我当时与前嘉义县议员吴铭辉自宜兰大溪渔港一起搭渔船出海，到日本冲绳县屿那国岛外海跳船，并游泳至与那国岛上岸，在国际特赦组织成员林迈尔（梅心怡）的协助下，取得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的邀请信函、难民护照等证件后，获得日本境管单位的谅解，自东京搭机赴美，并在美国的人权组织成员王能祥的安排下，于 1977 年 6 月 14 日出席美国国会的台湾人权听证会。（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简称台独联盟）请张金策担任宣传部长，张金策于 1977 年 7 月至 1979 年在北美为台独联盟巡回演讲，却经常遭《台湾时代》的左翼人士质疑挑战，开启张金策向左转的历程。张金策指出：

透過挖掘張金策「左轉」的過程，耙梳部分台灣左翼組織發展的歷史脈絡，呈現 1990 年代前後、部分的左翼媒體發展歷史，其中因研究者於 1994 年曾任張金策的隨身秘書，雖有利取得訪談資料，也難免因私交而受限，請讀者斟酌。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演讲时，认识《台湾时代》的左雄，左雄也介绍左翼人士苏英明、苏建明（郑节）、林宏钦、陈正宗、陈高明、王俊明等人，并因此认识钟维达、高成炎等人。我也开始参与苏英明、苏建明（郑节）、陈正宗等人在林宏钦家举办的读书会，1979年7月我认为左派才能改造台湾，因此决定宣布退出右派的台独联盟。（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年2月27日）

史明回忆录（2016）提及1970年代「保钓」前后情况时指出：

中共加入联合国（1971年）及「保钓」前后，台独联盟虽然盟员遍及美洲各地，但其运动因台湾独立思想武装不够，却遭「中共派」（林孝信）及「台湾时代派」（左雄）攻击而无法抵抗。（史明，2016，页545）

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后，1981年2月张金策结合《台湾时代》等部分左翼人士成立《海外政论》刊物，由张金策主导发行，《海外政论》每期印刷约两、三千份，都是透过台湾同乡组织名册免费寄送，由台湾同乡捐钱赞助相关花费（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年2月27日），《海外政论》透过社会主义观点看待台湾内外问题，成为张金策第一个左翼路线的组织、宣传实践工作，杂志的取名也呈现《台湾政论》的延续性，凸显其与台湾党外运动的连结。

《海外政论》于1984年1至7月曾停刊7个月，直到1984年8月第14期复刊，主因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度跟踪调查张金策与其妻子，张因此转赴德州，投靠钟维达、高成炎等人，钟维达是台大机械系毕业，1977年到美国德州留学，3年后取得机械硕士学位，却因参与海外台湾民主运动、被列为黑名单无法回台，直到解严后、1987年国府才同意钟维达返回台湾，1989年受邀进入劳工运动支援会（劳工阵线前身）担任组织部主任，也是日后《群众》杂志社的社长。（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年9月20日）

《海外政论》发行至1984年12月停刊，共发行16期，张金策指出：

停刊原因是因为，部分左派人士认为《海外政论》应该是为右派刊物，展现「革命的自由主义」立场，才能与右派台独联盟斗争，凸显独盟的落后性，因此《海外政论》不应该左倾。但另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海外政论》也应左倾，才能与右倾的台独联盟进行思想斗争，两派争论不下，我认为左倾的《海外政论》已完成过渡性任务，因此决定《海外政论》停刊（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年2月27日）。

1981年至1984年时，《海外政论》仍深受左雄等《台湾时代》左翼人士的影响，但1985年张金策将《海外政论》停刊，也呈现张金策决定摆脱《台湾时代》的影响，另起炉灶，对于《海外政论》停刊后情况，张金策说：

我当时决定自休士顿开车到旧金山沿途拜访台湾同乡，讨论台湾左派的发展策略，在沿途拜访友人，回到美国东岸后，我找许文龙、陈高明、陈荣庆等人组织读书会，讨论左派理论，1985年10月再办《台湾天地》刊物，主要是这个读书会成员、钟维达及部分台湾左翼人士的捐助支持。其中许文龙、陈高明出力甚多（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年2月27日）。

许文龙日后返台，也成为《群众》杂志、《群众之声》主要成员之一。许文龙为台北工专毕业，是来自桃园中坜的客家人，1977年赴美留学，为Wayne State University电机暨资讯工程博士，曾任纽约曼哈顿学院电机系助理教授，返台后因曾列黑名单，无法返回母校任教，转任中华大学资工系暨生物资讯系教授，《群众》、《群众之声》营运时，许文龙常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其中。

面对与《台湾时代》之间的纠葛关系，《台湾天地》第2期刊出〈台湾时代社何处去〉（李清峰，1985），一方面肯定《台湾时代》对台湾社会主义革命与理论的贡献，但对于左派组织的机关志《台湾时代》中止三年多，文内直指台湾时代社在「刊物宣传此一基本工作的欠缺实践表现」。此一说法

也隐含筹设《台湾天地》的目的——建立左派组织与其机关刊物——的企图心，不同于《台湾时代》成员停顿了左翼宣传与组织发展，呈现张金策等人亟欲透过《台湾天地》发展左翼运动的具体实践。

张金策等人在《台湾天地》仍贯彻在党外运动、海外台独运动发展左翼运动的策略，并且此向台湾同乡募款营运，对于左雄与张金策等人的路线差异，《群众》主要干部黄泰山认为：

左雄的《台湾时代》当时认为，台湾民族民主革命应该是二阶段，类似苏联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模式，依照列宁主张，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由台独运动推翻封建的国民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风起云涌的国会全面改选、台独运动都被他们设定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成炎、施信民都属于这一派，比较倾向台独。但张金策、钟维达等人认为，台湾应该直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推翻国民党的同时，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联合，由无产阶级取得主导权，「一次革命」成功，也就是所谓的一阶段论，比较像中国共产党当年主张与国民党联合、共同推翻中国封建制度的情况，类似毛泽东对新民主革命的看法（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

黄泰山的说法呈现张金策领导的《台湾天地》「一次革命论」路线，与《台湾时代》左雄等人的「二阶段革命论」路线的巨大差异，也显示张金策认为应由台湾工农联合取得台湾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化领导权，推翻国民党统治，左翼不应等待国民党被推翻后，再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不过黄泰山指出，1980至1990年代时，海外左翼对支持左雄「二阶段论」者较多，也就是认为先推翻国民党再说，对于张金策等认为应由无产阶级主导者台湾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阶段论」，人数较少，仅《台湾天地》的张金策等人（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左翼人士当时对一阶段论与二阶段论之间的纠葛，也呈现1980年代左翼运动者面临一切以「反抗国民党」为党外运动主要目标时，左翼运动企图掌握党外运动论述主导权、却难以冲出重围的处境。

《台湾天地》双月刊共持续发行一年多，1986 年底出版第 7 期后停刊，张金策说：

原本 1987 年仍计画要出版，但经费欠缺，无力支撑，只好停刊，停刊后仍定期举办读书会，与海外留学生持续接触（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8 日）。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进党成立，推测因海外台侨强烈关注、财务支援台湾岛内民进党，间接导致海外刊物《台湾天地》缺乏财务支撑、停刊。

国府于 1987 年 7 月宣布解除戒严，被列入黑名单、取消回台加签的钟维达于解严后立即尝试申请返台探亲，是《台湾天地》成员首先返台者（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钟维达自美国西部的洛杉矶返台定居之前，也曾特别到当时住在美国东部的纽泽西洲与张金策、许文龙等人见面、商议（许文龙访谈纪录，2015 年 10 月 4 日）。

1989 年中，钟维达接受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台湾劳工阵线前身）赖劲麟的邀请，担任劳支会组织部主任，参与工运、社运活动，并加入主张台独、支持党外运动的「新青年社」，参与党外运动、反国民党运动、工人运动组织。

海外留学返台的左翼人士返台时，民进党已占党外运动主导位置，也握有众多社会运动资源、工具，左翼组织者多凭借在海外留学资历、人际网路进入，熟悉台湾党外运动政治、社会脉络，进而发展左翼组织。同时期的工运人士郑村棋等人也进入民进党台北县长尤清主政台北县政府劳工局劳工教育中心，从事劳工运动工作（吴永毅，2014），这显示进入民进党相关人士的外部组织，进而争取运动主导权，是当时左翼运动者资源考量下的决定。

赖劲麟与劳支会总干事简锡阶当时隶属民进党新潮流系统，钟维达也曾受邀加入新潮流，钟未同意（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1989 年王志郎结束留美学业返台时，钟维达介绍王志郎进入环保联盟组织部任职。

1990 年 9 月钟维达参与台湾长老教会的基督教城乡宣教运动（URM）活动时，结识刚自台大哲学系毕业的黄泰山，黄泰山也是新青年社成员，就读台大哲学系期间读《资本论》而有左翼思想，也常参与环保联盟活动，两人于 1990 年 8 月一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的参加 URM 高级班三个多月课程训练，在钟维达引介下，黄泰山前往纽泽西州与张金策见面，与张金策建立合作关系。（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

1990 年 3 月中正庙学运，也带动多所大学的学生运动发展、接触左翼思潮，部分学运学生也投入左翼运动。黄泰山 9 月自美返台后，接办「新青年社」的机关刊物《台湾青年》编辑工作，除自行撰稿外，也邀请张金策以「王火狮」等笔名以社会主义、左翼观点撰写多篇政经分析文章，引发各校学运社团争相传阅，黄泰山也因此成为学运圈知名人物（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黄泰山、钟维达等人透过 1990 年 3 月学运后活跃的学生运动，除了以刊物散布社会主义理念，也吸纳各校大学生参与左翼读书会等相关聚会活动。钟维达说：

当时在黄泰山家的读书会，读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在美国参与读书会时，这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重点书籍，回台前我特别买了好几本带回台湾，再影印给参与读书会者，文化大学等多个学生社团读书会，也是读这本书（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

除了学生之外，钟维达、黄泰山也在环保联盟等社团，邀请多名社会运动、党外运动者参加左翼讨论会，包括环保联盟活动部专职人员、擅长演讲主持的康惟壤，擅长机电的北区政治受难者基金会总干事黄国良，以及经常接触社运人士的洪奇昌国会办公室助理简淑慧等人，其中康惟壤、简淑慧都曾为民进党新潮流系公职担任专职工作，但对于新潮流成员担任公职后逐渐疏离社会运动、台独运动感到失望，康惟壤指出：

1990 年我担任李逸洋服务处主任时，为了声援台独联盟成员回台，制作布条、筹办接机等声援活动时，被李逸洋服务处成员认为是「浪费资源」，开会时感受压力，我因此辞职，转到环保联盟活动部担任专职。新潮流成员常常说「公职是运动的工具」，但他们不少人公职当久了，需要公职推动的社会运动，却很少出面，财产也越来越多（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

上述过程除了显示新潮流系与台独联盟在岛内党外运动资源已处于竞争关系，这样的竞争反而引起部分基层党工的不满，质疑公职成为自身谋利的工具，部分基层党工转而被重视「群众」的左翼运动者吸引，1990 年代初期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风潮，也带动了左翼运动的在台湾推展，《群众》杂志干部群也在此时成形。

参、《群众》形成前的操练

在党外运动多年的「国会全面改选」声浪下，李登辉主政下的国府于 1992 年底进行首次国会全面改选——第 2 届立法委员选举，以台独为诉求的陈婉真 1991 年原本在台中地区活动，因街头抗争而声名大噪，由于钟维达曾与陈婉真在美国洛杉矶台湾同乡会担任正副会长，1992 年初钟维达评估，民进党在台北县仍有立委当选空间，钟维达力劝陈婉真到北县参选，透过参选介入政治运动（陈婉真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9 日；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陈婉真也同意参选，在钟维达引荐下，黄泰山、张素真与左翼读书会成员丘襄陵、周幸宜、康惟壤、黄国良、林志侯、包玉文、林恕晖等人都为陈婉真 1992 年底参选立委助选，陈婉真以「终结中华民国」作为参选诉求，对于为陈婉真助选的动机与过程，黄泰山指出：

我们动机很简单，是去练兵。选举是台湾最密集的动员形式，强调有别于社会运动，选择陈婉真，一来因为和她是旧识，二来，陈婉真很晚才宣布参选，又没班底，可参与和发挥的层面和空间，相对的

比较大。我主要参与组织工作。陈婉真在北县没人，找得到人就不错了。同时陈在选举过程没有什么保留，她强调文宣、造势、对组织则没有特别看法和要求。陈婉真这次选举是靠她的知名度来动员，她的票是空气票，而非组织票，她的选战模式就是靠一次一次的造势活动，拜访桩脚的行程不多（野百合通讯，1993年2月）。

此论述显示，《群众》成员参与陈婉真立委助选，是在党外运动资源、人际关系、助选位置、成员历练等考量下的结果，助选也有利于争取在反国民党、台独运动内的左翼论述位置，也可让《群众》成员熟悉党外运动、民进党基层助选运作方式，特别选举多年来一向是台湾最密集的政治动员、宣传活动，1992年国会首次全面改选，区域立委是采复数选区投票制度，而立委席次大增，台北县为一个选区，应选席次高达 17 席，陈婉真在冲撞国民党政权引发的高知名度，及台湾建国运动组织（简称台建）成员、《群众》成员助选下，1992年当选立委。

对陈婉真立委助选工作，是《群众》成员的重要操练，使黄泰山等学生成员与康惟壤、黄国良等基层社运工作者合作，累积政治经验，尤其陈婉真的总部设新北市三重区，也为日后《群众》在新北市的民进党地方人脉的动员形式，倚靠「造势活动」、催出「冲组」投票的助选方法，成为《群众》日后助选主要策略。同时也吸纳新成员并透过助选，参与政治运动、工运、环保运动等抗争，累积政运、社运经验。

肆、建立组织基地、延伸社运发展

除了助选之外，《群众》成员也发展新的社运组织，1992年9月，曾参与读书会、且为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成员的简淑慧、林正修、林志侯、蔡万吉、康惟壤、钟维达、丘襄陵、黄国良等多人，因不满环保联盟总会的学术菁英领导作风，决定落实草根经营、发展在地环境议题为目的，成立环保联盟「台

北分会」²，以类似新潮流参与社运方式，推选淡江大学教授张正修担任会长，《群众》成员简淑慧担任副会长，秘书处则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由林正修担任首任总干事，中兴法商学运社团出身的刘思龙任副总干事，其后历届接任环盟台北分会秘书处总干事的包玉文、林志侯、李贞莹、吕建苍、陈建志、赖伟杰等人都曾参与《群众》相关活动，林正修指出：

「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正是《群众》成员建立、不同于环保联盟的运动组织。等于我们弄细胞进去，人家也知道，以施信民为主的人都知道，这一挂与他们不同挂，他们一直怕我去抢环保联盟总会秘书长，其实位置对我们不重要，但有三个问题对我们很重要，一、有优秀的组织干部、年轻人。二、是运动的筹码。三是募款的来源。我们在台北分会是自己募款，张正修会长提供他自己的房子给我们用。这些都是组织工作，有点像是细胞在打进去，这我们在学谁？就学新潮流嘛！新潮流在民进党内是少数派，但是他在各个社运团体都占最重要的秘书长位置，我们群众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更清楚的，旗帜是左翼！而且某个程度是更冲的（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年6月22日）。

在《群众》读书会成员忙于成立台北分会、为陈婉真助选期间，1992年9月26日张金策闯关返台，与张金策有私谊的黄信介、陈菊、钟维达等都前往接机，张金策抵达桃园机场就被警方逮捕，移送台北地检署，经审讯后当晚获交保（程川康、钟沛东，1992），张金策在宜兰礁溪老家休息几日后，随即北上与钟维达、黄泰山等读书会成员见面。

林正修形容第一次见到张金策时指出：

² 環保聯盟台北分會 1992 至 2000 年在反核、淡水河議題深耕，逐漸脫離環保聯盟總會，2000 年環保聯盟台北分會脫離環保聯盟，成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持續推動反核運動，為 21 世紀至今台灣活躍的反核、廢核團體，在其串連反核團體之下，2014 年成功推動核四封存，2016 年促使立法院刪除和四封存預算，為台灣重要的反核、能源議題的環保團體。

我看到张金策第一个感觉，这才像列宁，张金策没有那种学究气，他不会啰啰唆唆，不会讲一些排场的话，说自己多伟大。见面第二天我问他，我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他说「很歹势」，我都还记得这些，这个人的土气。我觉得要搞事情就是跟这种人搞，我不是菜鸟，我在学运搞过，也看过头面的人物，看到那些人我都没感觉，对，就是他！只有看到张金策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他有那种草根的开放性，又有一些最关键的理论认识，不是说要读辩证法那些，我记得他用闽南语说，什么叫做辩证法？就是一个事情「要活跳跳来看」（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年6月22日）。

面对有深厚党外运动资历与左翼运动经验的张金策返台，林正修的说法，也呈现了当时左翼学运、社运干部的雀跃心情，在钟维达、黄泰山、林正修等人带动下，当时 50 岁的张金策也迅速成为《群众》成员的领导人。

伍、发行《群众》杂志

张金策返台是《群众》杂志创刊的关键，也因为张金策能筹募营运资金，才能使《群众》杂志社于 1993 年初在台北市嘉兴街的一处公寓开办（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年9月20日；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

在《群众》财务部分，张金策的外甥蓝伟新是《群众》杂志最主要的财务支持者，《群众》杂志社先后在台北市嘉兴街、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的房租，都因张金策而使蓝伟新愿意赞助（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张金策妻子陈金钗找亲友借款 60 万元作为杂志开办费外，其余经费大多由蓝伟新支付（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年2月27日）。蓝伟新当时每月赞助《群众》15 万元（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年4月15日）。

在《群众》人员部分，由钟维达以左翼运动为号召邀请台大学生黄泰山、张素真、丘襄陵担任编辑，康惟壤担任发行经理（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年2月17日），原为立委洪奇昌国会助理的简淑慧也决定转任《群众》杂志行政经理，专职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包括社长钟维达在内，月薪一律 2 万元，

彰显左翼组织内平等原则，发行人张金策则不支薪。在发行部分，初期订户以内部成员在社运界人脉为主，并透过全岛巡回演讲会宣传等累积订户。（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黄国良访谈纪录，2016年4月6日）

对于《群众》在当时左翼团体的比较，当时东吴大学苏菲亚社干部江仁杰指出：

当时学生在台湾左派的选择，就是工委会（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劳工阵线、《群众》、环保联盟等几个地方能去，学生最喜欢就是东看西看。《群众》对我们比较友善，也比较草根，也不会只在学生圈子里，不会说「你们就是要向工农学习啊，你们这些混蛋！」这种工委会的态度。会去劳阵是因为钟维达的关系，后来劳阵太像新潮流了（江仁杰访谈纪录，2016年7月15日）。

对于主张与中国统一的《夏潮》、劳动党，曾为夏潮系统学运干部的徐文路指出：

劳动党是「统」优先于「左」，80年代工运的高潮退去后，劳动党在工运抢不到战场，都在讲「统」，「左」只能提提国际歌、共产主义运动，对台湾情况、切不进去社会现实，我因此慢慢的跟劳动党体系走远（徐文路访谈纪录，2016年5月29日）。

《群众》创刊时，钟维达、黄泰山出面邀请左翼的学界、社运人士担任社务顾问，工运包括：曾茂兴、吴永毅、毛振飞、王文祥、方来进、林明贤、黄清贤、简锡阶、郭吉仁。环运有：施信民、张国龙、曹爱兰、高成炎、蔡万吉。左翼学者有：许文龙、王振寰、赵刚、夏铸九，与主张台湾独立的杨碧川、原住民运动者夷将、客家文化运动者钟肇政等人（群众杂志社，1993），范围包括社运人士、台独运动者、左翼人士，但其中并无《夏潮》或劳动党人士，也呈现《群众》当时其他团体、左翼社群的关系，以及与左翼统派较无合作的情况。

此外，《群众》与郑村棋领导的「工作室」，当时曾有多次的团体接触对谈、互访（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对于《群众》与郑村棋「工委」的差异，黄泰山指出：

张金策的理论是认为，当时台湾的局势是要介入政治斗争，张金策以列宁「怎么办？」批判郑村棋是「局限在手工业的经济抗争，放弃用大量生产的意识形态斗争」，当时郑村棋只有针对关厂劳工，依照「怎么办？」，这都是以手工业的经济斗争，只着墨经济利益，经不起大风浪，一个大浪来就没了。张金策认为左翼应该进入意识形态斗争、应该介入选举，但在介入选举之前，必须有宣传工具，杂志社就是宣传工具（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

黄泰山的说法也呈现了当时《群众》以杂志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与右翼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企图。对于如何对台湾当时的右翼政党进行意识形态都斗争？《群众》（1993）杂志于创刊号发刊辞〈开创群众作主的时代〉指出：

台湾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国民党与大资本家阶级贪得无厌、横行霸道、无所顾虑地掠夺台湾的资源，榨取人民的血汗，不只造成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众杂志社，1993，页4）

显示《群众》杂志透过社会主义的阶级观点，在1990年代就点出的财团治国问题，至于民进党等「民主运动」政治人物，《群众》杂志也在发刊辞认为：

台湾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小市民也一再地打拼，做好「抬轿」的工作，将不少政治人物抬上政治舞台。但是，四十多年来，多数反对政治人物由于其中智阶层的出身或认同，受其既有的阶层利益和意识形态所制约，站在中智以上阶层看待台湾政治社会事务，从来不曾

碰触到台湾社会问题根本的阶级矛盾，对作为国民党统治后盾的大资本家的所作所为，总是很自然地加以忽视，听任那些财团的魔掌伸展到台湾的每一角落、每一行业，随心所欲地搜刮、榨取，而无从阻止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日趋恶化（群众杂志社，1993，页 4-5）。

上述论述呈现《群众》杂志虽未明确主张社会主义，但关注「阶级矛盾」，也批判民进党政治人物无法面对财团治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群众》第一期发行三千本，除了约近一千本为订户，两千本透过书报摊零售点的贩售不理想，仅约两、三成，退回杂志社数量达一千多本，《群众》检讨后，不再透过书报摊零售系统贩售，改于每周六、日由工作人员到台北市龙山寺前广场、三重大同公园等党外人士聚集之处街头演讲，宣传阶级意识、阶级矛盾等社会主义左翼理念、贩售杂志，形成「宣传车喊街—演讲会贩售杂志—推展左翼论述」的巡回宣传的活动模式，在台湾各地庙口、公园举办演讲会，并在演讲会旁摆摊贩售杂志、接受捐款赞助，阅听众大多为中下阶层，并以民进党支持者居多。《群众》成员也都须经街头喊街、即席演讲等集训，让人人都能独当一面上街演讲、推广理念，士林夜市被成衣商聘请喊街卖衣的康惟壤，更是《群众》「喊街」高手，也成为成员学习的对象（黄国良访谈纪录，2016年4月6日；林治平、丁稳胜访谈纪录，2016年6月20日；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年6月22日）。

此外，1993至1996年间在台北市各社运团体、政治团体发动的反核、环保、劳工、反国民党游行，《群众》几乎无役不与，更在大台北地区与社区民众、环保团体多项抗争，包括反捷运废土、反对林口弃土场、反对台北港工程侵犯渔场、反辐射伤害、反水泥东移、反兴建高球场、反大汉溪污染等抗争，同时也参与劳工团体的秋斗等游行，在公职人员未能积极参与、声援情况下，《群众》主动声援、协助抗争的作法，颇受好评，也卷动许多学运干部参与其中，《群众》各期也报导、呈现这些抗争运动的动态。显示《群众》藉由透过反党国威权、反财团资本家垄断的公共政策参与市民社区组织活动，逐渐发展出「工农小市民」运动路线。

《群众》发刊初期也邀请社运、学运人士与左翼学者撰稿，并维系与左翼社群、社运团体、学运社团之关系，《群众》杂志前两期有王振寰探讨社会运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问题（王振寰，1993）等学者的外部稿件，第四期也有赵刚探讨台湾族群冲突（赵刚，1993）及郭纪舟讨论日本统治台湾本质的文章（郭纪舟，1993），并邀请吴永毅、陈素香、毛振飞、简锡阶、刘芳萍、白正宪与张金策、钟维达等人座谈讨论工运走向、阶级政治路线问题的内容（群众杂志社，1993）。

不过，左翼学者撰写文章因字数多、艰深，阅读不易，与《群众》其他文章文字浅白的风格不同，考量工农小市民读者的接受程度，自第 6 期之后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由学运社团学生与环保联盟总会、台北分会成员撰写的关于社运、环保运动稿件。但国内政治经济生态分析、选举评论仍是每期杂志的主轴，但多半以化名、非本名方式写作，张金策、黄泰山、林正修、钟维达等人为主要写作者。

面对李登辉当时以「本土化」为号召的台湾国族主义，《群众》第 2 期以〈再会吧！李登辉—错误的爱，何必再留恋？〉（孙丽娟，1993），批判李登辉「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虚幻性，批判其「民主化」的宣传总统直选、却拥护五权宪法，是建立了总统有权无责的独裁体制，所谓经济自由化，更是使财团、资本家富上加富，贫富差距更大。所谓「本土化」则是让地方派系从外省保守集团夺权，垄断社会财富，使台湾由政客、财团、地方派系组成的政商联盟主控，呼吁民众走出「李登辉情结」。

第 11 期首篇文章〈民进党怎么办？〉（张金策，1994）严厉批判民进党公职以人头党员巩固权力问题，并以「民进党不等于台湾民主运动」为标题，指「不必再抱不动以民主运动的角色加在民进党的头上」，并表明「改变台湾体制，让受压迫的台湾下阶层群众翻身作主，大家只有另作长远打算」等字眼，也暗示了《群众》不一定要继续留在民进党内，可能朝向政治团体转型的企图。同期也刊出〈民进党也有妖魔鬼怪〉（孙丽娟，1994），批判民进党接纳国民党、黑道人士带枪投靠、买票贿选等问题，甚至拉拢炒地皮、搞特权、鱼肉乡民者，文章结尾并指出：

事实上功利思想在党内一日不消除，民进党必然愈选举愈堕落，愈多选举就愈多鬼怪缠身。如果民进党阵容里依旧是有钱有势的人说话大声，没钱没势的人说话没人听，即使让民进党选赢了，执政了，又有何意义？（孙丽娟，1994，页 8）

此段评论呈现了当时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在民进党内助选的观察，在二十多年后来看，甚至是对民进党执政问题的一段预言。呈现当时《群众》透过传布左翼思潮，转化党外运动进入左翼运动的企图。

陆、发展工农小市民运动

尽管《群众》杂志努力寻求出路，但 1990 年代初期，在报禁开放下，商业报刊、杂志强调专业形象，受市场机能控制的只剩《新新闻》等政治新闻杂志，党外杂志都已走进黄昏，只剩辜宽敏出资的《黑白新闻周刊》以「赞助人-侍从」（Patron-client）关系，不是靠市场机能经营（冯建三，1995）。而不靠商业、市场机制为主要经营《群众》杂志，每月出刊仅一、两千本，收支出现严重问题（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

由于刊物销售量有限，1993 年下半年《群众》出现财务问题，为降低压力，《群众》成员黄泰山、张素真、简淑慧、丘襄陵、康惟壤等人 1993 年 7 月起分别至淡水、新庄、永和、板桥等地，为民进党提名、无派系支持的台北县议员候选人助选，并向候选人支领薪资，以减少《群众》支出、维持编务，也拓展地方人脉关系，并吸引学运干部参与、历练。

尤其自 1970 年代以来，台湾选举活动已是党外运动者主要的政治宣传期间，《群众》成员也将选举视为政治运动的宣传管道，《群众》成员尝试将工农观点的政见放入选举宣传，例如在永和为民进党县议员候选人林雪琴助选时，《群众》成员提出反特权、反金权、反黑道暴力、抗议金牛买票、广设公立托儿所等诉求（林恕晖，1994），在永和助选的丘襄陵也邀请学运出身的林恕晖参与选务，林恕晖也介绍林淑芬等人参与助选。乡镇市代表选举时，也于三重、芦洲、五股等地寻此模式助选，林淑芬也由《群众》成员

介绍至三重为民进党助选，林淑芬也因助选而进入国代张仓显服务处任职，开启日后议员、立委之路（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

《群众》第12期以〈小市民对抗大财阀—现阶段台湾阶级矛盾的特质〉一文（黄泰山，1994），指当时下层劳动群众尚未形成对抗国民党与大财阀的「阶级意识」，使工运抗争被视为单一的社会事件，打破贫富不均也不是靠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民主、两党制衡，而是强大的工运力量，但台湾工运缺乏政治发言力量，政治的诠释权也不在工运团体手中，下层劳动群众必须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才能形成政治发言力量。

该文认为，「劳资对立」不足以解释阶级矛盾，当时台湾许多服务业受雇者甚至自认是中产阶级，而台湾下层社会有许多人以自雇方式谋生，如摊贩、小包工、小商家等，虽是弱势者，但不认为自己是工人，指劳工阶级诉求有局限性，而当时国民党与财团、地方派系挂勾下的都市计画与土地政策，及教育费用、税制等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下层大众，本质是「劫贫济富」，因此提出以「小市民」对抗大财阀、地方派系，是当时台湾阶级矛盾的主要特征，不能局限于劳工运动，提倡「小市民运动」就是「阶级运动」（黄泰山，1994）。

在不直接主张社会主义之下，提出「小市民运动」主张，也代表《群众》自1994年初开始的政治路线，除了结合民进党支持者等传统反国民党势力之外，其策略是透过基层选举、助选等密集的政治宣传活动，并介入都市计画、教育、税制各类型的公共政策抗争，特别是土地、房产利益越高，阶级冲突矛盾也越激烈，集结受害者进行「小市民运

动」，形成对抗大财团的阶级意识，全面推展阶级运动。

针对台湾与中国之间问题，《群众》于第8期以〈扫荡中华沙文主义的幽灵—中共白皮书的霸权心态〉（林玉红，1993）表达看法，《群众》认为中国一贯主张的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是「霸权主义」，对台湾人民自行决定前途、独立主权已形成压迫、障碍，必须加以反抗，也批判国府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说法，是不切实际。

《群众》也在第3期以〈国民党有几个老爸？〉（罗年英，1993）一文，描述国府背后的美国、日本、中国，其中批判美国「以台湾国际监护人自居」，

指美国以两手策略对付国府，若国府听话则给予美援、贸易优惠，若不听话，则拿出人权、民主法宝对付，又让反对人士常怀感激。该文批判日本是台湾资本主义的奶爸，台湾从二战前的被殖民，转换为政经从属关系，长期贸易逆差、不平等贸易，关键技术往往掌握在日本商社等跨国公司手中，使台商成为日资全球战略的马前卒，不平等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则是台湾亲日派的掌权，使日本成为支配台湾发展的经济强权。该文也批判中国强要台湾认同祖国，指中国将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极可能在台扶植代理人，但代理人「未必是外省人」，抵抗北京的打压，依赖的不应是美国制的飞机、机巧的政治人物，甚至不全是经济发展，而是进步的人民群众，强调「台湾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改造社会，只有一个成熟且具动原力的台湾社会，才能制止两岸任何冒进的力量」。

此文显示《群众》认为国府控制下的台湾，受制于美国、中国、日本强权，唯有台湾人民群众翻身作主，成为透过成熟而有动员力的台湾社会，才能摆脱美中日三股强权、帝国主义的纠缠。其论述结论虽嫌粗略，但已于当时分析台湾在美、中、日强权局势下的处境，特别是当时台湾处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却仍受宰割，又逢国民党统治、美国帝国主义宰制，于 1990 年代所面临的困境，该文已可具体凸显其关键问题，至今仍极具意义。

柒、转型《群众之声》电台

但议员助选结束后，杂志社仍面临严重财务问题，黄泰山等成员认为应透过参选募款维持团体运作，黄泰山等人也再于芦洲、三重、五股等为民进党提名的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助选、提供文宣，并向候选人支领费用，减轻杂志社财务负担，同时也可透过选举宣传「小市民运动」理念，并扩大组织人脉。

除了财务危机使内部摩擦激烈，对于《群众》成员是否参加 1994 年底省议员选举，钟维达与张金策、黄泰山等人持不同看法。钟维达认为，张金策有意将《群众》带往选举道路，与其想法不符，加上财务危机引发内部摩擦冲突，张金策多次与钟协调无效，钟维达于 1993 年 11 月表明不再担任社

长，此后逐渐淡出《群众》核心，其后转任立委陈婉真国会办公室主任（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金策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张金策、黄泰山成为《群众》主要领导者。

《群众》在财务压力下，决定推派张金策于 1994 年底参选台北县选区的台湾省议员，藉选举募款、拓展资源，期望建立左翼的政治滩头堡，并通过公职资源回馈社运，并累积左翼政治能量，期能在民进党内形成党中之党，进而与新潮流等派系竞争，夺取党内主导权，以大规模推动具阶级意识的左翼政治路线。张金策原希望《群众》再发展一段时间，于 1995 年再参选立委，但黄泰山、林正修等人担心张金策若 1994 年不参选，则《群众》财务难以维系营运，最后在《群众》召开成员会议、历经长时间讨论后，张金策勉强同意参选省议员，并由黄泰山担任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2 日）

1994 年 4 月《群众》在台大城乡所毕业的林正修建议下，与台大城乡所师生共同参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古迹保护运动，藉以凸显党国威权体制、占用日产为党产问题，并主导 4 月 11 日凌晨国民党中央党部古迹拆除抗争事件，当天凌晨红砖楼等旧建物遭国民党拆除时，民众轮番 Call in 地下电台《台湾之声》，号召三百多辆计程车司机到场，在《群众》成员林正修等人带领下，象征党国威权的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中央党部、台北市党部遭破坏（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2 日；林治平、丁稳胜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0 日），参与其中的《群众》以 4 月号「411 中央党部拆除事件专刊」报导（群众杂志社，1994），张金策、林正修也被依违反集会游行法起诉（民生报，1994 年 10 月 30 日），此事件后，张金策认为：

电台传播效率佳，杂志经营不易且效果有限，因此决定让《群众》停刊，转型成立《群众之声》电台（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建筑拆除抗争事件后，国府新闻局与检调单位于 4 月 21 日清晨「取缔」《台湾之声》并没收机具。检警认为许荣棋涉嫌利用《台湾之声》涉案，警方也依违反集会游行法把张金策、许荣棋、林正修等人函移地检署侦办（刘开元，1994），显示《群众》主导抗争、透过《台湾之声》动员，国府则透过新闻局、检警发动 421 抄台行动，这也是 1993 年起地下电台风起云涌后，国府第一次取缔地下电台，但当时《群众》的情况并未受到检警、媒体注意，相关媒体报导均无《群众》字眼。

林正修于访谈时表明，由于 411 抗争当晚张金策并不在现场，他是实际站在指挥车上的指挥者（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2 日），但《群众》因频频参与抗争，在国家机器透过司法镇压下，也使多位《群众》成员因集会游行法等遭起诉，透过轮番避风头等方式因应，也影响《群众》后续的抗争行动参与能量。

不过，「中央党部抗争事件」展现强大的动员力，加上《群众》成员自 1993 年也陆续参加《全民电台》、《绿色和平》等地下电台节目，亲身体验当时电台风潮，张金策、黄泰山、林正修等人因此决定将杂志转型为电台，当时因张俊宏有意参加首次台湾省长选举民进党提名初选作业（彭威晶，1994 年 5 月 26 日），在国府掌握主流媒体下，张金策积极游说张俊宏筹设电台，扩增宣传管道，张俊宏也同意募款成立电台作为竞选之用，由张金策担任台长，并协助自国外进口广播电台机具（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以 FM92.7 频道成立《群众之声》电台，由于张金策、黄泰山、张素真、康惟壤、林正修等人均已熟悉街头演讲主持，也有众多参与地下电台节目经验、台语流利，钟维达也回电台主持助阵，《群众之声》迅速窜红，call in 经常满线。张俊宏于民进党内省长初选落败后，未要求张金策返还机具（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素真访谈，2016 年 4 月 15 日；康惟壤访谈，2016 年 2 月 17 日）。

分析《群众之声》电台成立的原因，必须回顾 1990 年代的媒体环境，当时虽已开放报禁，但广电媒体仍由国府主导掌握，1980 年代虽有绿色小组等录影带贩售、地下有线播映系统（第四台）等异议媒体，但 1989 年至 1993 年国府积极查缉、镇压下，营运被压制（冯建三，1995），除了报刊、杂志

平面媒体外，在电子媒体部分仍遭压制，《全民电台》、《台湾之声》地下电台 1993 年发展出 Call in 节目讨论议题，使得人民只要透过低成本的电话联系，无需透过书写、被编辑台筛选，即可匿名表达意见，在国府长期垄断媒体资源下，地下电台 Call in 节目迅速成为汇集人民不满的出口。

其次，广电媒体的营运门槛较高，除国家掌控电波管理外，电台需一定资金成立营运，而中小功率电台成本相对较低，仅数十万至数百万元。《群众》因张金策的资源、人脉而募得电台设备后，初期靠选举募款维持，杂志每期印刷、发行都需要经费，但电台营运所需资金远比杂志社少，只有房租、人员维持费用，原本巡回演讲会的阅听众，也能透过电台收听《群众》演讲者的言论，使电台营运比杂志社顺利（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金策的党外运动经历、累积的人脉资源，是《群众之声》跨越电台初期营运门槛的主因。

再者，《群众》杂志营运时，透过以台语街头「喊街」、演讲会训练内部成员，使多数成员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福佬话即席演说能力，《群众之声》成立后，相关成员立即转型为电台节目主持人而窜红，黄泰山、钟维达等主持人于地下电台风行时，他们搭计程车，「上车一开口，司机就认出我是谁」（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钟维达访谈，2015 年 9 月 20 日），丰富的台语演说、论述能力，在党外运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路径下，《群众之声》以台语为主要语言，针对闽南语族群、中下阶层者为主要听众的策略，加入批判国民党、财团的论述，成为当时主要民间异议媒体之一。

尤其，《台湾之声》在 1994 年 4 月、7 月两次遭取缔而难以播音，《群众之声》的强力批判国民党、财团论述，迅速取代《台湾之声》位置，成为激进派代表，在台北地区同属民进党阵营的《绿色和平》、《宝岛新声》则相对较为温和，都固定支持群，《台湾国》以台湾独立为主张，也有一定支持者。地下电台听众也都会透过在各电台之间转换，寻觅适合想听的电台节目（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

学者冯建三于 1994 年主持地下电台调查也显示，《群众之声》主持人、听众是当时地下电台中使用福佬话比例最高者（冯建三，1995），显示《群众之声》主持人也经常使用福佬话为播音语言，主要是由于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三家无线电视台限制福佬话、客语等节目播出比例，使大众传播媒体使用福佬话比例偏低，地下电台的政论、Call in 节目却开放民众使用福佬话等语言讨论议题，特别是《群众之声》主持群的演讲会、街头演讲历练丰富，黄泰山、康惟壤等主持人更能使用福佬话的俗语讨论议题，也影响听众使用福佬话进行讨论。

《群众之声》节目多半使用福佬话，影响所及，部分学生社团干部以生涩的福佬话讨论议题时，听众还会 Call in 表明，听不懂该学生的话语（江仁杰访谈纪录，2016 年 7 月 15 日）。《群众之声》也因此特别开辟特定时段给使用国语、客语的主持人。不过，当时的民进党支持者、台独运动人士也多半使用福佬话作为沟通语言，加上主持人对时政批判力强，使用福佬话比例高的《群众之声》外观呈现较激进色彩，吸引部分民进党、台独支持者的听众，黄泰山、张金策等受欢迎主持人节目由于 Call in 满线，也筹办听友会，邀请听众到电台聚会（应静海访谈记录，2016 年 10 月 6 日）。但《群众之声》并不主张台独，仍延续《群众》反国民党与财团垄断的「工农小市民」阶级意识宣传的政治路线。

《群众》杂志转为《群众之声》电台，虽与当时传播环境变革有关，但成员对媒体转型有高度共识，也更能透过听友会经营属于自己的、非民进党的组织，加上张金策竞选活动，密集举办演讲会、街头演讲宣传，搭配参与多项社区、社运抗争，使组织财务规模、人员迅速扩充数倍，参与的学运干部达上百人，加上张金策的宜兰礁溪同乡、听友会成员、友好的基层党工，合计经常性参与成员约两百人（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钟维达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也显示《群众》从传统党外杂志转型为地下电台，是依循政党「机关报」方式转换，《群众》与《群众之声》是朝向准政党发展的政治团体。

捌、张金策参选省议员与 801 抗争事件

1994 年 4 月 11 日数百辆计程车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抗争后，4 月 21 日国府首度发动新闻局与警力取缔《台湾之声》、并没收机具，但 4 月 22 日数

百辆全民计程车则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开放牌照、声援《台湾之声》，此时《群众之声》、《绿色和平》、《宝岛新声》等反国民党的电台陆续开播，地下电台纷纷设立，国府为压制反对声浪，先于 7 月 22 日拘捕许荣棋，7 月 30 日凌晨由新闻局与警方发动全台取缔地下电台行动，包括《群众之声》在内的全国共 14 家地下电台遭「抄台」（林维娟，1994 年 7 月 31 日）。

1994 年 7 月 30 日，《群众之声》电台当时设在三重区重新路四段 97 号的国际星钻大楼内，负责《群众之声》电台机电维护的黄国良指出：

警察离开后，我到电台查看受损情况时，发现警察只搬走一些音响、控制盘设备，损失不大，电台内重要的 1200 瓦发射器，仍旧完整锁在电台十楼的小房间内，这台机器发射的电波，宜兰、桃园、新竹都听得到，我清点后，发现抄台损失不多，我立刻去找替代品，当天下午就恢复播音，经过这次经验，后来发射器都放在隐密的地方，后来几次的抄台，这台最重要的发射器都没被搬走，电台因此都能很快恢复发声（黄国良访谈，2016 年 4 月 6 日）。

《群众之声》1994 年 7 月 30 日周六清晨被警方包围抄台时，徐文路、吴静如等电台人员在电台一度关门抵抗，但大门遭警方突破后，在担心机具被破坏、避免人员被入罪考量下，并未激烈阻挡员警进入。《群众之声》负责人张金策与工作人员简淑慧、张素真在电台外被警方打伤，《群众之声》等多家地下电台召开记者会，联合声明谴责警方使用暴力，张金策当时头部被打伤、包着绷带，衣服血迹斑斑（陈佩琦、谢素娟，1994 年 7 月 30 日）。

由于只被没收麦克风等零星设备，《群众之声》7 月 30 日下午就恢复播音（黄国良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6 日），并开放听众 Call in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群众之声》也决定 8 月 1 日周一上午到行政院抗议，并透过电台宣传。许多听众、主持人也都呼吁民众参与，其中一名主持人还喊出「大家把家私带好，一起去行政院抗议」等言词，讲的很冲、很强硬，使部分成员担心会发生冲突、压力很大（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

8 月 1 日一早抗议队伍自立法院出发后，随即在行政院前方的忠孝东路聚集抗议，警方则在行政院大门内列阵，由于张金策因被打伤、无法持麦克风指挥，张素真、林重谟担心现场混乱，只讲几句话就下场，林恕晖成为持麦克风发言指挥者（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抗议队伍绕行行政院时，由于忠孝东路正在进行捷运板南线工程，板模、石块等杂物堆放道路中，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叫骂冲突，行政院、新闻局、警政署部分窗户被砸破，军方主导的华视新闻采访车与人员被抗议者批为「抓耙仔」、「告密者」，记者、驾驶遭赶出车后，车辆被翻倒，随即起火燃烧（民视新闻，1994；林治平、丁稳胜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0 日）。

当抗议队伍前导车绕行行政院外围回到忠孝东路时，警方队伍冲出行政院大门展开驱离、逮捕行动，导致指挥车玻璃被砸毁、麦克风线被拉断，引发警民冲突，数十人受伤送医，并有十多人路过者被捕（民视新闻，1994），但当时被捕者都不是《群众之声》成员，事后多不起诉或无罪等，另有十余人被依违反集会游行法、公共危险罪起诉、判刑，则是事后警方依据搜证影片移送检方，检方起诉书也呈现相关情况（台北地方法院，1994；许文龙访谈纪录，2015 年 10 月 4 日）。

警方对张金策、林恕晖等人发布 801 专刊通缉，《联合报》等媒体也大量以「八·一街头暴力事件」、「四波攻势打带跑 街头首见硫酸弹」等形容 801 反抄台抗争游行（雷显威，1994），以合理化警方的驱离、逮捕行动，并将抗争标签为「暴力」、「滋事」，联合报等媒体更引述自警方说法指「群众之声电台附近的一处工地，搜获一箱二十四瓶汽油弹」等，暗示《群众之声》计画暴力攻击政府，并以「警方决严惩暴徒 追究唆使者」（陈一雄，1994 年 8 月 2 日）为标题批评 801 抗争。国民党政府也刻意扩大对《群众之声》的负面宣传，8 月 3 日新闻局科员张台安遭人杀伤，国民党文工会刻意发表声明指责「暴徒的凶残恶行已严重破坏社会的安定秩序，其罪大恶极已到了国人共愤的地步」，但事后警方发现张台安被杀伤是因私事赌债纠纷导致（雷鸣、陈嘉宁、陈东旭，1994 年 9 月 9 日），也呈现国民党政府对地下电台的压迫情况。

在此情況下，張金策、林恕暉等人在友人家躲避警方追緝，《群眾之聲》則由許文龍、王志郎、簡淑慧等處理電台事務、繼續播音，但由於發動抗爭事件，在警方通緝、媒體大量報導「總指揮張金策 緝捕首要目標」（范立達，1994）等內容下，也讓《群眾之聲》、張金策聲名大噪，吸引許多主張台獨、激進人士的支持，張金策在警方追緝期間時曾現身《群眾之聲》播音一次，但直到一個月後檢方起訴，張金策、林恕暉等人才恢復省議員競選、電台工作。（許文龍訪談紀錄，2015 年 10 月 4 日；張金策訪談紀錄，2016 年 2 月 27 日）。

從地下電台發展過程來看，1993 年興起的地下電台與 Call in 風潮，使當時在國府壟斷、控制電視、廣播等電子媒體下的不滿國府者，透過收聽地下電台及聽眾 Call in 的互動，進行集結，而《群眾之聲》以黨外運動為路徑切入，散布反對財團與國府「勾結」、反對金牛政治的看法，使傳統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也帶入了批判美帝、黨國資本主義、階級意識等左翼的政治觀點，但這項企圖卻因國府對地下電台展開壓制行動，剛誕生而標舉左翼、台獨、激進的《群眾之聲》電台，不得不透過遊行抗爭的方式，表達立場，也因為發生警民衝突，被主流媒体形塑為「暴力份子」，成為地下電台的激進派代表，也吸引激進反國民黨者收聽，也使《群眾》被視為「沖組」代表。而電台以福佬話為主要語言，使閱聽眾受限於以福佬族群為主。

在此同時，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代表福佬人的陳水扁與外省人的趙少康互鬥激烈，使台灣民族意識與中國民族意識的對抗形勢達到最高峰，強力主張反國民黨《群眾之聲》也因此吸引大量支持者，《群眾》發動的中央黨部古迹抗爭事件目的雖是對抗黨國威權體制，但在民進黨省長候選人陳定南提出的「四百年來第一戰，要將台灣變青天」等右派台灣民族意識形態宣傳下，中央黨部古迹抗爭等事件，也在選舉操作下被轉化為對抗國府的中國民族意識的產物。

《群眾之聲》發動的 801 反抄台抗爭事件，雖可凸顯《群眾之聲》的小市民運動的左翼政治路線，但在國府批判暴力的媒體操作下，民進黨也表明反暴力、企圖撇清關係，黨內同選區其他候選人、派系桩腳基於爭奪選票的利益考量，也暗中以「張金策落跑」等耳語中傷，以《群眾之聲》台長為頭

銜的张金策因 801 事件冲出的高知名度，反而形成其他民进党省议员候选人危机感，形成「多人打一人」的局面，不利于《群众之声》的选战宣传。

801 事件对于刚诞生不久《群众之声》电台的影响剧烈，张金策等人因警方通缉的缺席，听众对《群众之声》发动抗争的反应两极，有人支持抗争，也有人反对暴力，《群众之声》内部，由于当时以选举为核心事务，黄泰山虽作为竞选执行总干事，但简淑慧、王志郎等人不满其领导方式，双方歧见日深。张金策虽于一个月后返回电台，却难以化解双方歧见，也导致选后简淑慧等部分成员离开。

当时黄泰山、张金策等人都评估当选机会浓，但省议员选举前一周，民进党另一省议员候选人张清芳率全民计程车司机与国民党民代服务处发生冲突，引发媒体关注，黄泰山评估民进党激进票源可能流失，建议张金策也如法炮制到另一国民党民代服务处踢馆，但张金策认为声势已高而拒绝（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徐文路访谈纪录，2016 年 5 月 19 日；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

1994 年 11 月选举结果，张金策以 5 万余票落选，距离当选门槛 7 万余票，差距约两万余票，对于选举结果，张金策认为是大意失荆州（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黄泰山等人认为张金策不听内部建议、劝告才落选。康惟壤认为，张金策流亡美国多年，对台湾当时局势判断失准，若能在 801 事件后立即出面被捕，反而会因此当选。（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

综观张金策返台办左翼杂志、电台，到参选省议员等过程，1994 年的张金策省议员选举，由于资源较多、集中，也被《群众之声》成员认为最好的建立左翼滩头堡机会（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

由于张金策等海外人士返台时间较晚，在台湾解严 5 年后的 1992 年才回台，在其他有意从政的党外运动者、民进党人的激烈竞逐下，张金策的起跑时间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民进党人，在 1994 年的台湾省长、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以逐渐转化为福佬人为主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陈定南省长选举的竞选标语「四百年第一战，要将台湾变青天」，正代表了福佬人为

主的汉人台湾民族意识观点，张金策代表的左翼阶级意识、「工农小市民」运动路线宣传，已难以与之匹敌，张金策省议员竞选失利、离开民进党，《群众之声》也失去继续争夺民进党内论述主导权的机会。

玖、脱离民进党的《群众之声》

1994 年底省议员选举后，《群众之声》募款情况不如选前，简淑慧、王志郎等多名成员离职，电台专职人员仅存黄国良、康惟壤、黄泰山、张素真等人，每月只领 5000 元零用金度日，另电台供应伙食，相关成员轮流煮饭度日，但电台仍维持高人气，同时也培养王婕等年轻人主持节目（王婕访谈纪录，2015 年 10 月 4 日），经常有听众到电台捐款，使电台维持营运，电台节目 Call in 仍经常满档，当时新闻局开放电台申请合法时，《群众之声》成员认为无公职力挺、资金门槛高，合法可能性低，索性退出合法电台申请，801 事件也在 1995 年在法院开始进行审判程序，张金策、林恕晖被依违反集会游行法起诉、判刑，都已易科罚金方式结案，罚金则是涉案者各自设法筹措缴纳（许文龙访谈纪录，2015 年 10 月 4 日；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黄国良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6 日）。

由于《群众之声》于 1995 年仍维持热度，张金策决定继续参选立委，但因前一年参选省议员时得票未达最低当选者的七成，不符民进党内规，张金策决定退党，以无党籍身分参选，虽有听众力挺，但缺乏民进党支持者之下，仅获得 7930 票落选（张金策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27 日；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寻求连任的民进党陈婉真，在《群众》成员替张金策助选、分散实力下，也以 37715 票落败，差距当选门槛只有 5928 票。

1996 年 3 月总统与国代选举合并举行，《群众之声》成员、中华大学教授许文龙于桃园市中坜区由绿党征召参加国代选举，前成员简淑慧则于新北市新庄区以民进党提名方式参加国代选举，两人决定参选前都未与《群众之声》成员讨论，但希望透过参选宣扬理念，同时在选后能以公职资源供应左翼社群发展，《群众之声》部分成员也分别助选，结果许文龙以 1 万 2000 余

票高票落选，简淑慧则以 2 万 7552 票当选国代，简淑慧并与王志郎、徐文路、江仁杰、丁稳胜等人发展左翼读书会，并未继续参与《群众之声》。

《群众之声》电台营运则于 1996 年 3 月总统选举后走下坡，《群众之声》主持人黄泰山指出：

1997 年时电台几乎没什么人听了，电台一直撑到 1998 年才关闭。1995 年金策选立委时，电台还很多人听，1996 年 3 月李登辉当选总统后没多久，电台失的很快，没什么人在听（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

尽管营运走下坡，《群众之声》仍力图透过参选带动，1997 年底至 1998 年初，《群众之声》推派张素真于新北市三重区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县议员（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黄国良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6 日；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但落选，康惟壤、黄国良等人则认为若能以民进党提名参选，张素真的胜算仍高。

《群众之声》成员参加 1994 年省议员选举、1995 年立委选举、1996 年国代选举、1998 年县议员选举，尽管选战失利，仍接连投入各项选举，显示：一、透过选举募款维持电台营运，二、透过选举推展左翼运动等过程。但支持者、听众却在 1996 年起流失，对于《群众之声》听众流失原因，黄泰山认为：

1996 年之后电台打电话进来的人很少，我感受很深，这是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经合理化，台湾整个新体制已经产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但当时却不清楚，电台一直撑到在 1998 年冬天才收掉（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

黄泰山、张素真、林正修、康惟壤等成员都认为，《群众之声》最好的当选机会是 1994 年的省议员选举（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19 日；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 年 6 月 22 日；康惟壤访谈纪录，2016 年 2 月 17 日），但这场选举的落败后不仅内部成员分裂出走，大幅削弱《群众之声》的组织

人力，張金策無法繼續在民進黨內參加立委初選，也讓《群眾之聲》核心成員未能繼續在民進黨內參政，轉而以無黨籍或綠黨等方式參選，但都無法當選。唯一當選者，則是以民進黨身分參選國代的簡淑慧，顯示若以左翼運動的政治灘頭堡考量，當時黨外運動路徑的左翼運動者，在民進黨內參選仍有一定程度的當選機會，也證明《群眾》於 1990 年代透過選舉進行政治宣傳的運動模式，並非不可行。

簡淑慧當選國代與其他《群眾之聲》成員落選的差異，也呈現 1990 年代的左翼政治路綫，若能繼續在民進黨內發展，雖然可能十分艱難，仍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可取得政治位置，並發展左翼媒體、左翼運動。

從台灣的左翼意識形態發展來看，在 1950 年代後國府長期的形塑反共、恐左意識形態下，1990 年代以黨外運動為路徑的左翼運動，並未取得文化領導權，1994 年張金策的省議員參選失敗，民進黨已發展出選舉總路綫、以公職分配資源（郭正亮，1997），無公職的《群眾之聲》因此淡出民進黨，左翼運動者也未能在黨外運動、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取得文化領導權。

特別是在 1996 年 3 月總統選舉後，《群眾之聲》聽眾大量流失，以反國民黨、福佬人為主的《群眾之聲》聽眾流失。關鍵在於李登輝代表的國民黨本土派 1990 年代開始尋求民進黨部分派系結盟，形成福佬人為主的台灣國族主義聯盟，「本土化」、「民主化」等詞彙盛行，取得台灣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領導權。也有研究顯示 1996 年後地下電台進入衰退期（陳清河，2004），顯示國民黨李登輝為首的本土派勢力與民進黨合作，主導了台灣國族意識形態的形塑與發展。

1996 年李登輝當選首任台灣民選總統，更象徵「台灣人出頭天」，代表資產階級主導的「台灣民主化」已經完成，李登輝的「台灣人」身分，也消解了以「省籍路徑」的台獨運動支持者反抗國民黨政府的力量，使從黨外運動路徑，標舉左翼、提倡階級意識的《群眾之聲》，不敵國府長期的「恐共」、「恐左」宣傳，在張金策於省議員落選後，《群眾之聲》淡出民進黨，也使《群眾之聲》未能繼續在黨外運動內，與民進黨主流右翼觀點爭奪文化領導權，在缺乏聽眾、贊助者捐款支持下，走向衰微、關閉。

林正修等成员认为,《群众之声》若当时不急着推张金策参选省议员,或就算张金策省议员落败、不参选立委,保留实力、透过电台低成本的长期经营,也可在几年后推派其他干部在民进党参选县市议员,也都有很好机会当选(林正修访谈纪录,2016年6月22日;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年9月19日),显示《群众之声》若以 Gramsci 提出「阵地战」方式,而非以「运动战」方式急于争取文化领导权,亟欲争取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一阶段革命成功的优势,若能长期经营电台、发展草根组织、持续参与社会运动,发展「工农小市民」政治运动,累积一定支持者、群众实力后,在民进党内从小型、地方公职选举出发、逐步扩大,或可有更好机会发展。

综观《群众》发展历程,在199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登辉领导的国府新威权逐步形成之际,《群众》初期延续党外运动杂志的发展模式,结合台湾岛内社运、学运干部推进台湾左翼反国府威权、反中国霸权、反美帝等论述,延续了《海外政论》、《台湾天地》的左翼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与观点,并串联除夏潮、劳动党以外的台湾左翼人士发展刊物,对当时左翼运动的推进产生一定程度的推展作用,也推展阶级意识等左翼观点于部分学运、社运、民进党支持者社群之中。

《群众》于1994年转型为《群众之声》,跟随着当时反抗威权而兴起的新兴媒体「地下电台」风潮,也发展出具有人民自主性的电子媒体,同时也因此让群众路线的阶级益是宣传往摊贩、工人、家庭代工、小商店等中下阶层拓展,开展了左翼阶级意识散布的广度,不过受限于电台功率与传播的区域性,《群众之声》的传播范围仅于台湾桃园及宜兰以北区域,未能广泛拓展于台湾全岛。

同时,《群众》为延续培养、扩大日益增加的组织人力,推出张金策以民进党名义参选省议员,并以争取当选为目标,把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投入选战,国府抄台与801反抄台抗争使《群众之声》开播不久就声名大噪,却面临国家机器发动媒体、司法打压,与党内竞争者暗中围剿的严苛挑战,竞选中的张金策选择以避风头方式处理,但不稳定的内部组织在高度压力下的摩擦更为激烈,也造成内部组织难以因应选前快速变化的乱局,导致落选,透过选举养活组织的赌注至此落空,《群众之声》因此大幅缩减人力规模,

并且在民进党派系斗争形成的内规下，张金策被派系排挤出局，无法继续以民进党名义参选 1995 年立委，其他成员也未延续在民进党内的左翼运动路线，在民进党即将于 2000 年取得执政权之前三至五年，《群众》成员陆续离开民进党，均未当选公职，部分离开《群众》成员则在民进党提名下当选公职，延续其左翼运动。

从意识形态竞逐文化领导权的观点分析，《群众》与《群众之声》于 1993 年至 1998 年的左翼运动，是自 1970 年代反抗国民党政府殖民统治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左翼路线下，演变而成的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目的是解放国民党政府统治压迫、美国帝国主义宰制的束缚。但 1980 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个人自由、尊严等政治价值，并宣传政府对这些价值的威胁，在 1980 年代后期国府威权瓦解之际，透过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抗经济危机的理论与跨国资本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宣传，配合蒋氏旧威权瓦解，「自由化」与反抗旧威权、中国霸权的「争台湾人尊严」，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国族主义崛起，新威权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的意识形态（夏传位，2015），并李登辉主导的国府也搭配国会改选、总统直选等政治策略形塑「台湾民主化」宣传，民进党内右派、台湾民族主义者于 1993 年起也陆续与李合作、联盟，使新自由主义、台湾国族主义取得文化领导权，《群众》、《群众之声》的左翼运动虽极力宣传阶级意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李登辉路线与民进党右派，但在文化领导权的竞逐中，却难以与之匹敌，在捐款减少、难以维系财务下，因此走入历史。

拾、未竟之志

王志郎、简淑慧等人于 1994 年底离开《群众之声》（张素真访谈纪录，2016 年 4 月 15 日），其后与徐文路、丁稳胜等学运成员发展左翼读书会，除参与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外，也成立「《资本论》研究会」，并曾邀请《台湾思潮》成员的许登源带领读书会讨论，持续传布左翼思潮，徐文路、丁稳胜等人因故离开《资本论》研究会后，徐文路目前为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理事，持续参与大学兼任教师、兼任助理权益抗争。曾参与《群众之声》的吴静如

长期投身工运，现担任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研究员，积极协助移工争取权益，并参与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国道收费员自救会、工人斗总统等工运抗争。丁稳胜则成为社运律师，经常义务协助社运人士、工会、工人诉讼。

黄泰山、张素真、许文龙、王婕等人于 1998 年《群众之声》结束后经营板桥、永和、三重社区大学，发展成人教育，投入动物保护运动，目前成立台湾猫狗人协会，除宣导尊重生命理念，也传布左翼思想（黄泰山访谈纪录，2015 年 9 月 20 日；许文龙访谈纪录，2015 年 10 月 4 日），康惟壤也成立劳动者协会、生活党等组织，持续传布劳动阶级意识。林恕晖则转任自立早晚报记者，并担任自立晚报工会代表，参与自立早报关厂抗争，在工运人士赖香伶担任台北市劳动局长后，2015 年担任局长机要秘书，推动工人参与劳检的陪同鉴定制度，并促使部分媒体工会成立。张金策一度尝试回乡再竞选礁溪乡长但失利，2015 年中风、行动不便，在美国洛杉矶由妻子照顾晚年生活。

《群众之声》1998 年结束时，民进党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并与李登辉的国府决裂，转投入总统选战，在国民党分裂两组人马参选下，台湾国族主义意识形态仍占高位之下，民进党于 2000 年以少数党之姿取得执政权。但国民党仍握有国会多数党，国府统治虽一度暂时终止，但民进党以少数党执政，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使下，企图透过全面自由化策略摧毁旧结构、建立统治基础，除了国有银行等官营企业不断私有化，扶持了财团金融资本扩张，也使台湾资讯产业在中国 2000 年前后的经济崛起时纷纷出走，前往中国东南沿海设厂，也导致国内薪资停滞、经济不振（夏传位，2015），陈水扁政府执政爆发贪污疑云风波，民进党于 2008 年执政终止，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以「新台湾人」之姿，迎合台湾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延续过去殖民统治基础重新执政。

马英九领导的国府透过积极与中国政府交流，试图取得经济利益延续执政，但经济利益仅为少数资本家、财团掌握，贫富差距扩大，使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加上国府迎合中国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反中的台湾国族主义者强烈不满，双重矛盾激化下，2014 年爆发反服贸运动、占领立法院抗争多日，国府仰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也面临强烈挑战，该抗

爭密集宣傳，也瓦解國府統治仰賴的媒體輿論、学校教育等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导致 2015 年、2016 年选举相继失败，国府统治再次瓦解。

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在国府统治失败下二度执政，也取得台湾国族主义诠释的文化领导权，但仍面临贫富差距的阶级矛盾，民进党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仍有强烈的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色彩，民进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其执政后，在年金改革、劳基法工时修法等阶级矛盾激烈的议题中陷入困境。在国府统治结束后，台湾社会也必须面对日本、国府的二重解殖问题，特别 70 年前日本殖民统治瓦解后的解殖问题仍未完成，加上国府统治结束的遗留许多政治、社会、文化、阶级问题，台湾社会都必须严肃看待。

台湾左翼运动于 1990 年代至今，受制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高位，至今仍不断以各种「阵地战」形式延续，左翼运动者在工会、社团、学校等位置苦撑，也出现部分政治集结，实力仍微弱。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出现松动，台湾社会内的阶级意识开始上扬，包括空服员罢工、高铁员工抗争成功，显示左翼运动形势好转，其中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等人透过劳工参与劳动检查、争取劳动政策主导权等方式进行「阵地战」，不仅促成自由时报工会等多个工会成立，北市劳动局透过公务体系，提出劳基法工时修法建议「以价制量、加重罚则」原则，也成为 2016 年立法院劳基法修法基调，显示赖香伶等人透过参政的经验累积，已争取了劳工的修法论述与运动空间。

到底左翼运动应如何进行阵地战争取文化领导权呢？左翼学者 Mouffe 认为，Gramsci 经历义大利共产党的失败经验后，才提出文化领导权、阵地战，Mouffe（1979）指出：

不将自己隔离在无产阶级洁癖的小圈圈内，对劳动阶级来说，就成了性命攸关的一件事。反其道而行地，它必须试着变成「全国家一民族的阶级」，代言多数社会团体的利益。要这样做，就必须拆解资产阶级霸权（领导权）的历史基础，要拆解它，就必须解合那个展现资产阶级智识导向的意识形态集团。事实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才能重新接合出新的意识形态系统，而这个新系统，将作为劳动阶级所领导的那个霸权

(领导权)集团的接合剂。这个解合一再接合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著名的阵地战。(Mouffe, L., 1979 / 张荣哲译: 83)

从这段话来看,台湾左翼运动不仅需透过各种形式社运抗争,连结环境运动、性别运动...等受压迫者,推展具阶级意识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更应透过辩论、讨论、串连,发展出共同论述,期能重新接合出符合当代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系统,为左翼争取文化领导权,也须串连邻近区域、国家的工农等无产阶级,形成区域联合的阶级力量,发展类似中南美洲的区域左翼联合阵线,透过左翼阶级运动互相支援,反制帝国主义、霸权威胁。

本文写作目的部分也在于促使左翼运动者汲取过往经验,反省、检讨台湾过往的左翼运动历史,从中记取教训,以串连受压迫者、进行政治集结、发展出共同论述,推进左翼政治的意识形态传布,进而争取左翼运动在台湾的文化领导权,这也将是台湾左翼运动者必须面对的严苛挑战。

参考书目

- 王振寰(1993)。〈从旧政权到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社会运动将面临新的历史情境〉,《群众》, 1: 54-58; 2: 66-67。
- 史明(2016)。《史明回忆录》。台北: 前卫。
- 民视新闻(1994)。《抗议取缔地下电台—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实况报导》。台北: 民视新闻。
- 李清峯(1985)。〈台湾时代何处去?〉,《台湾天地》, 2:19-20。
- 吴永毅(2014)。《左工二流志: 组织生活的出柜书写》。台北: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 林玉红(1993)。〈扫荡中华沙文主义的幽灵—中共白皮书的霸权心态〉,《群众》, 8: 29-32。
- 林恕晖(1994)。〈突破铁票区的林雪琴〉,《群众》, 12: 28-31。
- 林维娟(1994年7月31日)。〈新闻局会同警方陆空包抄——业者声称短时间内复播〉,《经济日报》, 3版。
- 范立达(1994)。〈总指挥张金策——缉捕首要目标〉,《联合晚报》, 1版。
- 夏传位(2015)。《台湾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发展型国家的变异与挑战》。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孙丽娟(1993)。〈再会吧! 李登辉——错误的爱, 何必再留恋?〉,《群众》, 2: 15-18。
- 孙丽娟(1994)。〈民进党也有妖魔鬼怪〉,《群众》, 11: 7-8。

- 張金策（1994）。〈民进党怎么办？〉，《群众》，11：4-6。
- 黃泰山（1994）。〈小市民对抗大财阀—现阶段台湾阶级矛盾的特质〉，《群众》，12：43-47。
- 陳一雄（1994年8月2日）。〈警方决严惩暴徒 追究唆使者〉，《联合报》，3版。
- 陳清河（2004）。《台湾地下电台角色的变迁（1991-2004）》。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 陳佩琦、謝素娟（1994年7月30日）。〈地下电台谴责警方暴力〉，《联合晚报》，3版。
- 郭纪舟（1993）。〈日帝统治台湾的本质〉，《群众》，4：68-70。
- 郭正亮（1997）。《选举总路线下的民进党—民主巩固或崩溃》。台北：月旦出版社。
- 雷显威（1994年8月2日）。〈四波攻势打带跑 街头首见硫酸弹〉，《联合报》，2版。
- 野百合通讯（1993年2月）。〈学生运动与选举运动—二届立委选举后座谈会〉，《野百合讯》，2。取自《影之传说》<http://mypaper.m.pchome.com.tw/chaing/post/1358950861>
- 冯建三（1995）。〈异议媒体的停滞与流变之初探：从政论杂志到地下媒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7-217。
- 程川康、钟沛东（1992年9月27日）。〈台独联盟前宣传部长 张金策飞返桃园被捕归案 担任礁溪乡长涉嫌贪污遭通缉 高院讯问后下令十万元交保〉，《联合报》，3版。
- 彭威晶（1994年5月26日），〈参选省长张俊宏今正式起跑〉，《联合报》，4版。
- 群众杂志社（1993）。〈开创群众作主的时代〉，《群众》，1：4-5。
- 群众杂志社（1994）。〈夜战台北城：411 中央党部拆除事件专刊〉，《群众》，13：1-56。
- 张荣哲译（1991）。〈葛兰西的霸权和意识形态论〉，《岛屿边缘》，1(1):59-86。
（原书 Mouffe, C. [1979].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pp.168-204). London, UK: Routledge.）
- 雷鸣、陈嘉宁、陈东旭（1994年9月9日）。〈杀伤张台安 嫌犯供称砍错人 讨不到赌债出手教训？周建宏涉嫌主导 警方疑另有人幕后唆使〉，《联合报》，7版。
- 赵刚（1993）。〈台湾族群冲突的基础及其未来走向的探索〉，《群众》，4：62-67。
- 罗年英（1993）。〈国民党有几个老爸？〉，《群众》，3：20-24。
- 罗晓荷、雷显威（1994年8月4日）〈国民党促严惩暴徒 民进党盼审慎调查 「群众之声」声明 国民党运用公权力侵犯司法〉，《联合报》，2版。
- 刘开元（1994年4月11日）。〈国民党拆旧址 爆发街头巷战 上百计程车声援抗议 群众大肆破坏 两警挂彩 凌晨五时冲突告歇 四人依违反集游法送法办〉，《联合晚报》1版。

附录

附表：访谈人员名单

| 编号 | 受访者 | 参与《群众》杂志 | 参与《群众之声》电台 |
|----|---------|----------|------------|
| 1 | 张金策 | 是 | 是 |
| 2 | 钟维达 | 是 | 是 |
| 3 | 黄泰山 | 是 | 是 |
| 4 | 张素真 | 是 | 是 |
| 5 | B (匿名者) | 是 | 是 |
| 6 | C (匿名者) | 是 | 是 |
| 7 | 康惟壤 | 是 | 是 |
| 8 | 黄国良 | 是 | 是 |
| 9 | 林正修 | 是 | 是 |
| 10 | 林志侯 | 是 | 是 |
| 11 | 许文龙 | 是 | 是 |
| 12 | 王婕 | 否 | 是 |
| 13 | 赖伟杰 | 是 | 是 |
| 14 | 徐文路 | 是 | 是 |
| 15 | 丁稳胜 | 否 | 是 |
| 16 | 林治平 | 否 | 否 |

| 编号 | 受访者 | 参与《群众》杂志 | 参与《群众之声》电台 |
|----|---------|----------|------------|
| 17 | 江仁杰 | 是 | 是 |
| 18 | 李保苍 | 否 | 是 |
| 19 | 包玉文 | 否 | 否 |
| 20 | 陈金钗 | 否 | 是 |
| 21 | 伏嘉捷 | 是 | 否 |
| 22 | A (匿名者) | 否 | 否 |
| 23 | 应静海 | 否 | 否 |
| 24 | 陈婉真 | 否 | 否 |

**Chang Ching-Tse & Taiwan's Left-Wing Media in 1990s –
“The Masses” magazine and the radio station of “Voices of the Masses”.**

Shu-Hui Lin*

ABSTRACT

The Masses magazine (March 1993–April 1994) and the radio station “Voice of the Masses” (June 1994–December 1998) were the last wave of dissident left-wing media in Taiw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founding members, including Chang Ching-Tse, to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political non-nationalist political movement in the 1970s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Chang experienced judicial persecution when he served as the mayor of Jiaoxi Township, Yilan County. After flee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7, Chang was exposed to the left-wing ideology of oversea students and compatriots, leading to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with a strong class consciousness. Through protests held by antinuclear, environmental, and labour movements, the left-wing group established a path for the peasants and working class in Taiwan. Consequently, The Masses and Voice of the Masses served as a media platform for the quasi-political party against the Kuomintang. A fierce political divid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unification and pro-independence people identified with China and those with Taiwan occurred during the Taiwanese municip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 of 1994, and the strong class consciousness exhibited by Voice of the Masses peaked the assembly of protesters. However, Taiwan’s first-ever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6 symbolised and highligh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ography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similar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with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Consequently,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aiwan was remarkably faded as the democratic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bourgeoisie emerged as the new cultural hegemony.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left-wing movement led by Chang and his comrades began to decline and resulted in the demise of The Masses and Voice of the Masses. Nonetheless, the even had brought a significant impact be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ft-wing movement in Taiwan ever since.

Keywords: Non-nationalist political magazine, underground radio, left wing, class consciousness , cultural hegemony.

* Lin Shu-Hui is The secretary of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mail: ahui0928@gmail.com

「大谎言」： 川普如何活用经典的威权主义宣传技巧？*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

篇 名："The Big Lie": How Trump Uses Classic Authoritarian
Propaganda Techniques
译 者：謝侑恩
校 訂：井迎瑞

本文引用格式

谢侑恩译(2016)。〈「大谎言」：川普如何活用经典的威权主义宣传技巧？〉。
《传播、文化与政治》，4:125-131。

投稿日期：2016 年 9 月 15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原文发表于发表于《真相》电子报，2016 年 9 月 3 日，网址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7455-the-big-lie-how-trump-uses-classic-authoritarian-propaganda-techniques>

**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育哲学讲座教授。

本文由作者商请井迎瑞教授协助委由博士候选人谢侑恩移译，并由井迎瑞校对。

谢侑恩的 email: hsieh-yuen@gmail.com

尽管川普并未拥有像纳粹般的政党及意识型态，然而我却认为去年夏天 2015 年 8 月 21 日，川普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 Alabama）举办的超大型集会，可以和纳粹集会相比拟的。那天，我看了一整个下午的新闻频道，全都是关于川普。新闻报导的重点是，那场集会将有 3 至 4 万人在举办的体育馆聚集，这是那年夏天里最盛大的集会。尽管后来只有 2 万多人前往，但这次集会却是共和党党内初选前最大型的集会。新闻画面多次聚焦在川普搭乘他的私人飞机前往阿拉巴马州，川普的崇拜者欢天喜地迎接他的到来。媒体称之为「川普的夏天」（the summer of Trump）。

在观看的过程中，我关注新闻媒体如何展示川普，如何在几分钟内不断地重复剪辑川普搭乘飞机滑过群众聚集的场所、飞机降落画面，以及川普私人飞机的特写镜头。这种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让我想起世界上最具争议性的电影：1934 年德国纳粹政权的政治宣传影片——兰妮·瑞芬斯坦的《意志的胜利》（Leni Riefenstahl's *Triumph of the Will*）。这部影片一开始描述了希特勒搭乘飞机穿越云霄，望向窗外注视底下的群众，接着飞机降落，并乘车进入纽伦堡（Nuremberg）参加大会，群众们欢声雷动地迎接他的到来。导演瑞芬斯坦呈现的影像画面是，沿途群众与会场里的民众如何欢天喜地迎接希特勒，她的影片纪录了这场纽伦堡的纳粹大型集会是个经过高度设计与策划的奇观。

我并不知道川普是否有计划性地操控这些相似性，或许只是巧合。但是很明显地，川普和希特勒一样，在保守政党运作的机制之外，组织了这次狂热的群众集会。如同 30 年代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川普的支持者们长期忍受经济贫困、政治疏离的难堪，及各种各样的困境，他们正在寻找政治上的救星来解决他们的困境，传达他们的委屈。

当然，川普不是希特勒，他的支持者也不是法西斯分子，但我认为用威权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这些词汇来解释川普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是准确的。我会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著述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理论进行分析，解释威权民粹主义，透过这个过程帮助我们了解川普性格及川普对其支持者们的诉求。早期的威权主义运动包括德国与义大利的法西斯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拉丁美洲与世界上其他的专制地区，这时

期强调的是威权民粹主义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的领导与顺从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我会进一步检视并提出川普与这些威权主义的领导者的相似性，因为他也是透过动员他的支持者们，进而达到威权民粹运动的人。

川普曾提出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在墨西哥边境建筑一座长城，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降低美国的犯罪率同时也成功阻断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他说这些话的背后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墨西哥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川普也承诺他当选总统之后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然而他却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同时，他自己有着不良的生意经营纪录，包括许多的破产、雇用外国廉价劳工及未能付钱给厂商等种种问题戳破了他的谎言。

尽管如此，川普仍以超级英雄的形象出现，这位超级英雄将会神奇地带领美国重拾它的辉煌地位，提供工作创造财富，让美国这个伟大国家重返世界第一。在这个神话里，亿万富翁会为人民战斗，摧毁国内外敌人。当然，最后结局一定是这位超级英雄获得了胜利，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幸福。

川普所扮演的角色是纳粹所创造的超人（*Übermensch*），是纳粹所赋予的领导原则（*Führerprinzip*），然而，川普是美国模式的超级英雄，缺乏纳粹用来夺取与保持权力的政党机制、纪律严明的军队与干部。如同其他右翼的美国民粹支持者，川普痛斥美国联邦的银行储蓄系统、金融体系、华尔街大亨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策略，他的方法就像希特勒攻击德国垄断资本主义一样。当希特勒对着垄断资本主义家们咆哮时，他也接受德国工业资本家的捐助。约翰·哈特菲尔（*John Heartfield*）所作的宣传画：「希特勒式敬礼的意义」传神地描绘希特勒举手敬礼其实是伸手向德国资本家接受钞票。就像希特勒谴责威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涉嫌贪污腐败羸弱的政客们，川普也谴责所有的政客就像白痴傻瓜般地虚弱不济，他尽其可能地使用过去铁腕强人曾经使用过的词汇来形容。此外，川普还攻击政策游说者，他强力宣称他并不会被金钱所诱惑而贪污腐败，因为他是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参加竞选活动（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而是为了要说服他的支持者）

川普的崇拜者就像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追随者般，觉得没有被政府关心觉得愤怒。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及科技不断变迁，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转移到国外或是被技术创新所取代，贫富差距随着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

展而加劇。2007-2008 全球經濟危機，雖然從 2008 年主政的歐巴馬政府緩緩地讓經濟復蘇，但是在這期間，許多美國人失去工作、住所與存款。而且，歐巴馬是美國第一個非裔總統的事實，也深化了許多美國白人的不滿。右翼媒體及共和黨八年來不斷地攻擊歐巴馬政府更加深了這群人的種族歧視及偏見。

的確，很多人以出生論來質疑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的合法性，只因為他不是出生在美國本土的美國公民。川普就是最積極的其中之一，他曾說過歐巴馬在非洲出生，沒有資格擔任美國總統。2008 年的總統大選，川普曾經在電視中大肆宣傳，堅持要歐巴馬拿出他的出生證明。儘管當時歐巴馬的競選團隊拿出了在夏威夷出生的證明，也提供了當時檀香山報紙的新聞報導，川普仍然持續堅持說這些證據是偽造的。直到今天，川普的支持者仍相信歐巴馬不是出生在美國的說法。

不像傳統的獨裁者有著高度的紀律性、專一的意識型態及政黨的運作機制，川普的選舉策略是混亂的、行為是沒有紀律的。在川普的推特 (Twitter) 貼文或是演講中，他會蠻橫地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外來移民，或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內批評他的人，而美國的新聞媒體也總喜歡報導他攻擊別人的言論。川普有效地利用傳播媒體或社群網絡扮演一位強大的政治煽動者，加劇他的支持者們的憤怒、非理性及恐懼。的確，在 2015 年三月媒體公司認為川普所佔據的媒體版面遠超過共和黨內的其他競爭對手；六月，根據金融資料網站《市場觀察》(MarketWatch)，川普免費地拿到 30 億媒體的宣傳報導。不過偶爾的心血來潮，川普會在集會演講時批評這些新聞媒體，如《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只因為他不喜欢這些媒體刊登批評他的言論。

川普的支持者也像歐洲法西斯主義跟隨者一樣被憤怒所驅使。他們對由少數菁英所把持的政治體制、媒體與經濟感到非常憤怒。他們希望支持一個外來者，這位外來者既不属于少數菁英集團，也反對體制。(對川普來說，有某些部份是真的。川普跟他父親一樣是房地產大亨，資本家、企業家，儘管他有很多生意失敗的例子)。他用威權主義宣傳手法編造謊言，技巧性地挑動支持群眾們的憤怒，他不停地重複說著大量移民會跨過邊界在美國境內

犯罪，不停地指责他的对手、媒体及希拉蕊是「大骗子」，不停地塑造「会说真话的人只有川普」的形象，很显然地，这才是最大的谎言。

川普的反移民政策及种族歧视性言论让墨西哥及拉丁裔移民、穆斯林及使美国国力衰弱的阴谋势力成了替罪羔羊。他的伊斯兰恐惧症、排外的民族主义再现了传统美国种族主义的黑暗面，不仅激化族群间的恐惧也加深了他们对特权的怒火。如欧洲法西斯主义一般，川普运用人们对过去的信念，承诺要让美国「重返荣耀」。因此，为了动员他的支持者，川普巧妙地运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玩弄美国人心理的黑暗面，也玩弄了美国人心中世界第一主义及排外主义，企图置少数族群及有色人种于美国之外，企图让这些人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法西斯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民粹支持者总喜欢将自己塑造成超级英雄，川普也采取一样的策略。他塑造自己以素人角色进入政坛，未来将解决国会与政客所制造的问题，这种形象一如弗洛姆论述的威权主义偶像崇拜。川普的支持者相信川普可以独自拯救美国的衰退并且使之再度伟大。一而再，你会听到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是唯一一个谈论移民政策的人，唯一一个谈论国会与政客造成的问题，也是唯一一个谈论政治献金的人。在 2016 年 8 月底，川普不停地使用「沈默的多数」这个词汇来描述他的支持者。这个词汇曾经是尼克森用来描述他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是白人，持保守态度，在 60 年代激烈的种族、政治、文化抗争上，自觉被边缘化。其实，这个词汇是用来号召心中觉得委屈的白人选民。

川普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硬汉，而这位硬汉能抵挡住俄国、中国及其他「美国敌人」。在共和党初选阶段，川普展现自己是「最重视军事」的参选人，他承诺在胜选之后将派遣美国军队摧毁 ISIS 及其他美国敌人，带领美国重返超级强国的地位（据称在欧巴马主政期间，美国丧失了这个地位）。带着自傲、捶胸阳刚的姿态，川普承诺他能带领美国回到白人男性统治的荣耀，重建美国伟大的地位。

阳刚超人川普会让美国重返世界第一并摧毁它的敌人。「世界第一」的口号是在 1940 年代孤立主义运动时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不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让美国与查尔斯·林德柏格（Charles Lindbergh）、法西斯、

反犹太势力扯上关系。尽管川普并没有强调这个关联，但它却如同口号般地影响着支持川普极端右翼的群众们。

共和党在全国大会中不断地强化「美国第一」，川普也说过这是他未来执政团队的核心任务。对于川普而言，这意味着要割断与其他国家的连结，制造更多的贸易壁垒，与北约组织更强硬的谈判与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川普「美国第一」的论述是他「让美国重返荣耀」论述的一部份，连结他所主张的「反北约，亲普丁」的孤立主义。川普不断抱怨美国支援北约组织的经费过多，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他将会摧毁这两个恐怖的世界大战后，缔造美国与欧洲长达 60 年繁荣的组织。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川普不停地说另一位强人政治领袖的好话——普丁。他更说过：「海珊非常善于消灭恐怖份子」。很显然，川普很着迷于这些独裁领袖，他正准备成为美国的救世主。

在共和党全国性集会的闭幕演说中，川普至少重复四遍他是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参选人，其实这也是 1968 年尼克森竞选时的主旋律。当川普喊出美国第一的口号时，他的冲锋部队就会大声喊出「美国！美国！美国！」在美国积弱不振及破碎制度之下，川普用元首般的口吻喊出：「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川普支持者们相信他，相信川普这个自我宣称是亿万富翁但却面临企业破产，拖欠银行贷款也无法偿还合约的人。在川普身上呈现的是资本家贪婪的缩影，但他却是那唯一的救世主，唯一能让「美国重返荣耀」——这个词印在他竞选棒球帽上，他总是随手就把这些帽子递给或卖给他的支持者们。

棒球帽不仅巧妙地说明川普只是个普通人，也让川普与他的群众站在一起，这是个很聪明的方式，自我再现了美国威权民粹主义。在竞选期间发送帽子是很讽刺的，因为这个点子似乎是从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挪移过来的，迈克·摩尔这位多次夺得影展奖项的前卫纪录片制作人或许也是反川普的一员。在共和党全国性的集会里，这个红着脸、大声说话，有着橘色头发的煽动者——川普，认为他自己代表了「被遗忘一群的声音」——正如罗斯福时代的经济大恐慌，白人选民认为他们是被遗忘的，因为政府只照顾有钱人、少数族群及绅仕名流。在共和党全国集会演讲和竞选活动上，川普总是用危机论来描述美国现况，他认为现今美国需要一位救世主来解决

所有问题。危机论也曾在早期法西斯主义及威权政权出现过。相较于纳粹，川普却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是作为亿万富翁的我用来进行交易的技巧」。他认为这种说法可以保证他当上美国总统，诱导群众们相信他会把交易做好，使「美国重返荣耀」。

显然川普是信服威权民粹主义的人，在某些方面，他的竞选策略也模仿早期独裁政权的领袖。作为名人搞政治的代表，川普也将政治与娱乐高度结合，这种结合已逐渐成为美国的政治潮流。而且川普是公关高手，善于提升他的形象，他甚至会主动打电话给新闻记者让他们报导他自身的八卦。不堪的是，他还时常模仿《纽约时报》一位残疾记者。这些种种足以解释川普的阴暗面与小丑滑稽性格。

最后，我想解释川普性格的问题。在 1973 年弗洛姆出版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一书中，他详细分析独裁者的特质：有虐待倾向、过度自恋、恶意攻击他人、具有破坏性的与恋尸癖。这些特质也可以在川普身上找到。我们既然知道川普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威胁，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位具侵略性毁灭性独裁性格的人作为美国总统。在川普的统治下，美国国内国外的局势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他蛊惑人心地演说下创造了一群追随者，在他宣称的威权民粹主义其实会给美国民主带来危机。我们如何处理这些威胁将会决定美国的未来及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在传媒的末日创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从「泛科知识」谈起

郑国威*

本文引用格式

郑国威（2016）。〈在传媒的末日创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从「泛科知识」谈起〉。《传播、文化与政治》，4:133-141。

投稿日期：2016 年 9 月 15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郑国威为中正大学电讯传播所硕士，曾经营知名部落格「龟趣来嘻」并发起《全球之声》中文版，现为「泛科知识」总编辑。，e-mail: rworkingman@gmail.com。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更何况这是末日的黄昏。在超人的漫画宇宙中，氪星爆炸了，克拉克肯特来到地球，当起每日星球报的记者，一方面接近露薏丝，另一方面则利用记者身份处理超人无法直接用超能力解决的事情。然而上述已是怀旧的设定，随着时代演变，近期的超人漫画跟电影中，特别是【蝙蝠侠大战超人】里，超人与《每日星球报》最大的危机已经不是外星侵略生物来访，而是没人在看报。电视虽然还在，看似角色吃重，但也已经沦为琐碎讯息的生产线。

末日前的黄昏长什么样？超人离开氪星时还小，不记得氪星的末日景观，但克拉克肯特现在则面对传媒产业的末日，一个他的超能力无法解决的麻烦。在台湾的我们也进入了这个最终阶段，我因为则在这最终阶段投入了传媒创业，才得以在最刺激的距离欣赏末日前夕的风光，并描述给大家听。

在描述之前，得先回顾一下我是怎么移动到此刻这个座标上。我是在 2005 年开始写「部落格」，当时部落格这三个字其实也还没有被早期的「部落客」完全接纳，因此有时我们称之为「线上日记」，有时跟着中国喊「博客」，但更常用的则是「网志」，这个大家都觉得中性且华文世界都可以接受的词。至于要叫自己「版主」、「格主」，还是「作者」，就随意了。

我也是在同一年进入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透过系统化的学习，渐渐了解台湾的传播产业状况、问题、与背后的结构，不久后，我认识了全球之声 *Global Voices* 这个网站，并且主动加入成为志工，将全球的部落格圈动态，以当时主流媒体规格外的样貌一片段、完全来自一般人、直接连结至原文一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台湾跟中国的读者。

按下快转，来到 2010 年底，我刚离开上一份在蒙藏基金会的专案工作，开始在台湾数位文化协会任职——这个我 2007 年与多位部落格圈好友共同创立的非营利单位。我们想要「用知识改变社会」、「缩减数位落差」、「让青年发声」，并且天真地希望，可以的话，不要赔钱。

台湾数位文化协会从成立到现在 10 年，一开始先是透过活动把国际上的数位新动态带进台湾，像是 2007 年在台北举办的维基百科人全球年会。

在傳媒的末日前創業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尔后持续不辍的重要计画是「胖卡 Puncar Action」。目标是把城市与偏乡透过胖卡连起来，把宅青跟 NPO 连起来。

到了 2010 初，协会的创办人与前执行长骆呈义决定成立潮网科技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数位广告的新创公司，初期的策略是将多年在来协会从事的数位运营知识变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企业。尽管创业路途上总是颠簸，潮网科技在企业脚步上比「泛科知识」来得快许多，也是泛科知识倚重的姐妹公司。

而从 2011 到 2016 上半年，我们陆续成立了 PanSci 泛科学、PunApp（目前已整并至 PanX 泛科技）、PunNode（目前已整并至 PanX 泛科技）、NPOst 公益交流站、SciMu 科学募资网（暂停营运）、Punchline 娱乐重击、MakerDIWO 创客窝（目前已整并至 PanX 泛科技）、PanX 泛科技、不可考的庙宇网站、不可考的潮流网站、不可考的旅游网站、不可考的游戏网站等等.....许多未能正式推出就结束的计画，中间的波折起伏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从 2006 到 2016 年，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也是传媒末日前的四大风口。

壹、风起，风停

首先是 2006 至 2010 年，这是部落格写作从兴趣创作到完全商业化的阶段，随着 Web 2.0 的浪潮洗去上一波网路泡沫的斑斑血迹，部落格从草根媒体的解放跟另类角色，迅速被资本体制吸纳为主流商业模式的一种，部落格平台（BSP）如无名小站跟痞客邦也在这个时期再现了硅谷的创业奇迹，每日聚集数百万眼球，靠着广告版位贩售，成为一门好生意。部落客一词也从百花齐放的独立线上自由创作者，变成专针对热门消费领域如旅游、美妆、3C 等做「类素人推广」的跑单帮行销个体户。由于 Google 的搜寻结果偏好部落格格式的逆时序发表、更新快、连结多的内容，因此随着 Google 以更强的技术力逐渐取代 Yahoo 型入口网站在台湾的网路广告宝座，部落格在这一阶段快速成长。邀请各路部落客试用代言这件事，成为越来越多行销公司

的首选高投资报酬方案。这时候的风口来自于 Google 的加速成长，以及 Web 2.0 平台的商业化。

接着是 2010 至 2013 年，社群媒体时代来临，从始终在台湾不得志的 Twitter 推特到曾经红极一时的 Plurk 噗浪，再到后来众所皆知的霸主 Facebook 脸书（以下简称 FB），台湾使用者跟随着小游戏、人脉网络跟意见领袖的带动，再也离不开社群。个人帐号及粉丝页取代了部落格，也就在这个时期，除了认真自我经营的个人部落客，以共笔型态经营的部落格渐渐以「新媒体」的姿态出现，而当格式底定，「新媒体」也成为新常态。这时候的风口当然就是脸书为聚集地的社群媒体大爆发。

2013 年到 2015 年，随着行动网路加速、智慧型手机热销，App 产业如烟火出现又沉寂，以 LINE 为主、更高速、更直接的对话式媒介窜红，政府、企业、与名人迅速转移。FB 也在这阶段果断地将策略改为「移动优先」，并串起 Instagram, Whatsapp, FB Messenger 等产品矩阵，延续了上个阶段的成长，稳固了地位。这时候的风口就是移动化带来的个人化，创造更长的连网时间与无数内容消费场景。

不过到了 2016 年上半年，转折迅速来到，讲直接一点，就是前面三个风口都停了，而且是全球规模的停滞。智慧型手机销量停滞，未饱和市场如印度、中国四线城市、东南亚跟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成长有限，加上已开发国家投资熄火，就算有些红利，也不是台湾做内容的人能够轻易沾染的。饱和市场中，新的风口，不管是穿戴式装置、物联网、VR、还是直播，都撑不起过高的期望，疾速快跑好一阵子的中国互联网创业热潮也同步降温，百度 / 微博 / 微信公众号 / 阿里 / 今日头条等流量源头盈利速度剧增，市值飙高，也代表曾经靠着三波风口红利期的低成本流量而火爆的中国创业公司跟风险投资已经无法继续烧钱。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台湾，跟以 Facebook、Google、Amazon 等网路巨头控制的世界，当我们看见这三家公司同样以惊人的速度赚钱，股价往上冲，这就意味媒体跟传统广告业啃了几十年的那块饼，已经都挂在了 Facebook、Google、与 Amazon 的脖子上，随着这些巨人越长越高，我们只会越来越构不着饼，顶多只能捡拾有如恩赐般落下的饼屑。

在傳媒的末日前創業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对于面向大众、生产成本偏高的主流媒体来说，除非获得补贴（例如老板从事房地产业、食品业钱多多，不怕赔），或能够找出其他商业模式（如电子商务跟会展活动）填补缺口，否则在广告营收与订阅收入都呈现断崖式下滑的时刻，无法支撑只是时间的问题，例如台湾《苹果日报》跟《壹周刊》。而还撑着的也不可能有余裕烧钱把内容做好，「再制再制再再制」成了众多媒体的救命绳，但这绳子一端虽然套着岸上的木桩，另一端却勒着自己脖子。令人窒息的低能内容只是用「比较贵的方式」产生内容农场等级的文字或影片，大家爱不爱看呢？从这些网站与内容农场型网站在台湾网站排名占据多个前名次来说，是很爱看，但在电视时代这么做可以用「收视点成本」(Cost Per Rating Point, CPRP) 换到钱，进入网路时代钱却都被 Facebook 跟 Google 没收。科技巨头们如今掌握阅听人种种详细数据，拥有无数内容，但不用负担内容生产的成本，也不负担媒体的责任。

而风口停了以后，本就缥缈的粉丝数、触及率等数字就更虚无了。平台的演算法时时介入，进行「宏观调控」，让这些数字瞬间贬值。不管是台湾、全球、或是中国的数据，都显示从社群媒体导流的流量下滑。不管是努力提升数位表现的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卫报》，或是 *Huffington Post*、*Buzzfeed*、*Vox*、*Vice*、*Business Insider* 等备受瞩目的网路原生媒体，都避不开海啸，轻则估值下调，调整战略，如 *Mashable* 跟 *Buzzfeed* 企图加强影音来继续满足平台的胃口。重则如 *GigaOm* 或更多名字都已经被人遗忘的网站一样，很快地消失。

贰、为何还是要创业

前面说了很多此刻传媒商业模式遇到的问题，但传媒当然不是只有商业的做法。媒体公共化也是许多倡议者长年追求的目标，例如透过政府或民间捐赠独立基金来运营，若这种作法能确保财源持续，商业模式造成的困扰或许就省下了，但若将其视为最佳或唯一解法，亦将无法跟上高速迭代的产业环境。

说得直白一点，从共笔部落格到「新媒体」的差异很小，绝大多数的作法只是用比个人部落客更组织化、但比传统媒体更扁平、更开放一点的架构去建立一个又一个内容网站。目的是乘着搜寻引擎导流、社群媒体、与行动载具的风口，飞越怠惰跟慢吞吞的老媒体。当我们在飞，大家也都在飞，传统媒体随便做个网站也可以飞（尽管营收不明确），成长不足为奇。当风口休止了，现在起才是真正的淘汰赛。

之所以成立泛科知识，而不是去卖鸡排，是因为我们这群人共享一个未被严格检验，但听起来很合理的想象，那就是社会要进步，需要：

- (一) 优质知识
- (二) 活跃且有能力分享的知识份子
- (三) 适合知识分享的空间

而在上述前提下，我们相信社会中更多人会做出基于优质知识的好决策。一个一个的好决策，累积起来就是进步的社会。

接着，我们自问：

Q1：社会缺乏优质知识吗？

A1：其实不缺，但是各种资讯太琐碎太嘈杂，好的知识不一定为人所知，也不一定以社会接受的方式呈现。所以会有「科普」，但不只是科学，而是对各种学术、产业、专业知识的普及传播工作。

Q2：社会缺乏活跃且有能力分享的知识份子吗？

A2：就台湾而言应该不缺，但是状况越来越险峻。学术、教育、出版、媒体等传统知识份子栖身的场域一一崩坏，人力贬值，人才出逃，这些都是我们正目击的情形。知识产业空洞化将对社会造成持久的伤害，必须赶紧想出替代方案，亦即新的知识产业。

Q3：社会缺乏适合知识分享的空间吗？

在傳媒的末日前創業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A3：无远弗届的新传播科技（从卫星电视到 FB）照理来说该成为更好的知识分享与公共论述空间，实现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想象，但商业模式反而让每一种媒介到后来都变成八卦乐园；小猫小狗、正妹天菜、鸡汤淫语总是胜出，公共讨论的层次大多停留在自以为是公共知识份子的一群人，互相消遣，酸来酸去。事前乱说，不审查，事后证实真的乱说，也无后果。

因此，我们的价值就在于能否提出更好的方案，让获得好知识的成本降低，让愿意提供好知识的人获得奖励，创造好决策得以出现的环境。并且让我们这份价值转成价格，获得消费市场跟资本市场认可。

从 2006 到 2016 年，或许因为我们起步得早，有机会登高，望得也比较远。我们学到的事情是：

- （一）我们的目标「带给所有人知识，用知识带来改变」并没有问题，但做法需要一直变。
- （二）Google、Facebook、智慧型手机等快速成长的风口停了，但既然巨头已经垄断渠道，便开始加速对内容贡献者杀鸡取卵，我们做垂直内容虽然受创较轻微，但若不在尚可努力时积极从事，独善其身也没办法太久。
- （三）经过十年教育，不想死的老媒体人也学会了怎么做所谓的「新媒体」，凭借过往人脉，带着钱来砸。但因为实在太慢，已没有重塑环境的能耐。
- （四）因为科技变革加上知识份子欠缺变现手段，一般内容的价格超贱，传播的专业也被轻贱。然而这已经不是倡议劳动权就能改变的了，此刻更像是电话接线生这份曾经吸引无数男女的职业彻底消失的前夕，不是接线生技术不好、专业不够，而是职业本身不再有存在价值了。
- （五）未来十年会如何变化，我没有能力预测，但我判断五年内，「社群」会继续是新内容时代的关键。然而，社群如果是建立在仿佛流沙般的

社群媒体网站上，将无法真正积累，也无法避免来自科技公司如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人一样，从更高维度透过演算法「宏观调控」。

所以进入 2016 年下半年之后，我认为才真正进入百分之百的新媒体时代，先前的状态都只是渐进酝酿，此刻起，所有媒体从内容到模式都要跟过往有断裂般的差异，才有机会在传媒末日后重生。

参、传媒末日前的求生包

与其抵抗 Facebook 与 Google 等渠道巨头赐死「内容专业」的作法，不如往前想，如何更扎实地将社群基础建在能够深度掌握的平台。而要达成这样的战略，组织也必须调整因应，作为一个野蛮成长起来的中小型团队，我们的做法分成三块，第一块是将编辑部按照功能分组，让负责不同主题内容，但同样职责的同仁互相学习，互相补位，去除本位思考。

第二块是让资深编辑转为数据总监，与工程研发部门密切对接，专注负责找出「数据、反馈、及行动」之间的关联，让我们更明白原先做得不错的部分为何做得不错，做得不好的部分为何做得不好，并提出量化的调整方案，应用在我们目前几个可高度控管的渠道，如电子报、App、会员系统等。

第三块则是挪出资源做新产品的研发。危机四伏，但危机也是转机，我们清楚认知自己是一家还在半路上的创业公司，当知识份子跟年轻用户有逃离 FB 的冲动时，我们能否把握机会，提出具特色吸引力的选项？我们认为既然想要驱动社群，当然也要能让社群驱动，传媒因为过去日子太安逸而不重视研发，我们当然要记取教训，持续投入固定比例研发新产品。

从内容公司走到内容渠道公司，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因为我们看见问题在于既有渠道阻塞，既然如此，若只是在阻塞的渠道里头跟其他内容做困兽之斗，最终只会像是炼蛊一般，炼出最恶最毒的传媒。我们现在不就已经见证？

最后，回顾过去十年，因为幸运跟一点努力，我得以承接许多先进对年轻人的鼓励跟支持，才走到现在，尽管末日景观让人忧虑，但也逼着我继续

在傳媒的末日前創業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往目标前进。如今的我已撕下年轻人的标签，虽然还没有太多能耐为新一代的传媒创业者做出贡献，但仍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相信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未来。包括我在内的传媒创业者，绝大多数会失败，被环境吞噬，但此时此刻我们一定要继续，创造传媒生态的丰沛多样性，越多越好。

我国公视节目规划策略之探讨

徐福德、胡元辉*

本文引用格式

徐福德、胡元辉（2016）。〈我国公视节目规划策略之探讨〉。《传播、文化与政治》，4:143-197。

投稿日期：2016 年 1 月 17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5 月 10 日。

* 作者徐福德为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生，e-mail：shift0309@hotmail.com
胡元辉为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e-mail：telyhhu@ccu.edu.tw。

《摘要》

全球公共广电自 1980 年代起遭逢来自商业广电愈来愈强大的挑战，为因应新型态的竞争环境，公共广电多在节目规画上采取汇流策略，惟此举亦招来违背成立宗旨之批评。本研究发现，我国公共电视虽然成立脉络与其他国家有异，但亦难逃与商业电视节目汇流趋势，成立十七年来虽仍制播相当数量的文化艺术、纪录片与教育学习类节目以彰显公共服务特色，并致力于节目品质的独特性，不过，综艺与戏剧节目排播比例有逐年增加趋势，并在整体节目播出上占有相当比例。此外，历年公视年报的内容分析显示，电视台治理高层对收视率在节目策略上的地位虽无明确表态，但重视度似有逐年提升态势。面对与外国公视异中有同的节目汇流现象，本研究认为，应提供我国公视充分营运经费以实现其营运宗旨，并因应公共服务媒体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公共服务媒体、公共服务广电、台湾公视、节目规划策略、节目汇流

壹、前言

1980 年代之後，以公共广电体制为主轴的欧洲国家逐步开放商业电视营运，不仅存在已久的单元化广电生态为之丕变，形成公共与商业并行的二元广电系统，而且使公共广电面临强大的收视压力，进而出现存在价值的严重挑战。

据统计，欧洲国家商业广电蓬勃发展所形成的商业洪流，不仅使公共广电的市场占有率失去独占或宰制地位，且多降至 40% 以下，若干国家的公共广电市场占有率甚至下滑到 20% 以下。以营运绩效相对受到肯定的英国 BBC 为例，1985 年时，BBC One 与 BBC Two 两个主要频道的市场占有率总和为 47%，到了 30 年后的 2014 年时则仅占 27.8%，加上 BBC 其他所属频道亦只占 33.2%（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2005; Iosifidis, 2007; Ofcom, 2015）。¹为了因应此一生态剧变，欧洲国家的公共广电多在节目策略上进行或大或小的调整，以期争取阅听众的持续支持。

欧洲国家如此，商业广电挂帅的美国亦复如是。1980 年代之后，不仅电视频道的剧增让阅听众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节目内容，包括 Discovery、History、Learning、National Geographic 等纪录片类型频道，以及 Disney、Nickelodeon 等儿童节目服务的兴起，亦让阅听众感觉到即使是商业频道，亦有能力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与儿童节目，致使原本就资源有限，主要以利基节目服务阅听人的美国公共电视面临更大压力（Stavitsky & Avery, 2003; Mater, 2006; Seneviratne, 2006）。

我国公视直至 1998 年 7 月 1 日方才开播自有频道，其成立时的社会脉络既不同于欧洲独大的公共广电体制，亦无法与美国公视成立时的广电生态相比拟，但其所面临的竞争挑战则与欧洲及美国今日公视所面临的发展情境

¹ 若將英國其他商營公共服務廣電機構的市占率加入計算，尚無純商業電視加入競爭時的 1985 年，ITV 的市占率為 46%、Channel 4 為 7%。到了 2014 年，ITV 所有頻道只占 22%，Channel 4 所有頻道則為 10.9%，將它們與 BBC、新增的 Channel 5 的所有頻道加總，則市占率達 71.9%。此項數據顯示，英國商業公共服務廣電迄今雖然占有一定的市場佔有率，但整體而言仍屬下滑。

仍有相通之处，彼此都面对商业电视的竞争压力，也都需要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以维持政府或人民在经费上的持续支持。

究竟欧美国家的公共广电在节目策略上做了哪些改变以因应商业广电的强烈竞争？我国公视虽然成立较晚，但节目规划策略是否出现与欧美国家相同的发展与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公共服务广电乃至公共服务媒体的存在宗旨是否有所悖离？委实值得了解与关注。本文爰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厘清公共媒体的发展轨迹及未来路向。

贰、公共广电的节目策略与挑战

自 BBC 于 1927 年以公共媒体形式运作迄今，公共广电制度的发展历程已近 90 年，虽然全球公共广电的运作型态并不一致，不过，在所谓雷斯传统（Reithian tradition）的影响下，民主国家的公共广电多被视为公共财。不同于商业电视以牟利为主要目标，公共广电有其社会性角色，以告知、教育及娱乐为主要使命，融大众娱乐与公共资讯的节目服务于一炉（Tsourvakas, 2004）。但最早推动公共广电制度并蔚为主流的欧洲国家，已在 1980 年代从公共广电的独占阶段走入与商业广电开放竞争的阶段，形成公共与商业并存的二元广电体制（Seneviratne, 2006）。此一转变不仅大大冲击公共广电的营运策略，甚至高度影响其存在价值，节目策略可以说是此一情境的最佳注脚。

一、公共广电之节目规划策略与特质

基于公共服务的营运宗旨，公共广电的节目内容致力追求品质、多元与创新等原则。所谓品质是指节目能够提供阅听者吸睛之外的更多价值；多元则是指节目能够满足多元社会不同阅听众的需求；至于创新则是指节目具有实验与探索特质，能够使阅听者产生惊奇与新鲜感（Blumler, 1993）。换言之，公共广电的节目不仅要满足大众口味，也要服务小众需求；不只要提供阅听人习惯的节目型态，也要制播具原创性、挑战性的新颖内容。若以节目类型

来说，至少包括高品质的娱乐节目、可信赖的新闻节目乃至各种文化艺术、儿童少年与弱势服务的节目（Iosifidis, 2007）。

1980年代之前的欧洲公共广电独占时期，毫无疑问，由于公共广电在促进公民身分、形塑文化认同的使命上受到高度重视，加上市场寡占的特质，资讯、文化艺术与儿少教育类型的节目与服务特别受到重视。1980年代，公共广电面临商业广电的竞争之后，它的任务在普及服务、文化价值、问责、公共财源等原则之外，尚被赋予竞争能力、效率等要求，表现在内容服务上的期待即是独特性的达成（Iosifidis, 2007）。世界广播电视协会（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 WRTVC）因此强调，在公共广电与商业广电并存的时代，前者的基本运作原则必须在普及、多样与独立之外，特别强调独特性（CMRTV, 2001）。

根据 WRTVC 的定义，公共广电在节目服务方面所需达到的独特性，不只意谓能够产制商业或政府电视所不感兴趣的节目，更包括服务被它们所忽视的观众，以及关注被它们所漠视的题材。因此，公共广电不会排除任何类型的节目，而是致力让自己制播的节目与众不同，不论是节目型態或时段安排都必须展现创新精神，成为其他广电业者的标竿，引领影视制作的风潮（CMRTV, 2001）。

显而易见者，娱乐型节目自公共广电制度建立之初即在内容服务之列。姑不论公共广电成立的三大任务早已确立为「告知、教育与娱乐」，即使是非娱乐型节目，亦被要求不能变成所谓「夜间课程」，如何以阅听众更易吸收、更能融入的方式来展现，也一向是公共广电实务工作者经之营之的所在（CMRTV, 2001）。就一个理想的公视节目定位而言，它所制播的节目虽然不会落入纯粹的收视率争夺战，但也绝不意谓着枯燥乏味或菁英取向，即使是戏剧或综艺节目，同样可以将文化与社会意涵蕴藏其中，让对公共事务原无兴趣的「粗放型阅听众」（inadvertent audiences），或是仅仅愿意对资讯进行扫描而无兴趣阅读的「警戒型公民」（monitorial citizen），能够更为融入民主的运作，执行其公民角色（Blumler, 1993; Esser et. al., 2012）。

因此，就公共广电节目编排的实务运作而言，多数公共电视除了全频道的节目排播有别于商业电视以外，更会在收视高峰的黄金时段采取不同的节

目策略，以达成其培育公民社会、服务多元观众的宗旨。具体而言，商业电视会在收视高峰时段安排电影、运动、竞赛、戏剧或轻喜剧类型节目，相对的，公共服务频道则倾向给予纪录片、时事、新闻与文化艺术等类型节目更高的优先性。即使排播同类型节目，亦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公视的新闻节目服膺新闻专业主义，而商业电视的新闻则包装以娱乐手法，形成所谓资讯娱乐化的节目取向（Holtz-Bachal & Norris, 2001）。

当然，公共与商业电视的节目差异并非绝对，即使公共电视频道之间亦非全然一致，不过，欧洲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之前的公共电视独占时期，不以收视率为考量的节目策略仍相当清楚，与美国等商业电视垄断国家的节目生态形成明显差异。此外，商业电视既以牟利为主要目标，则其绩效很容易从利润多寡加以评定，相对的，公共广电所强调的节目品质不似商业媒体般容易界定，其判准乃透过政治与社会程序所决定，甚至往往不够明确，形成治理上的挑战（Tsourvakas, 2004）。

二、公共广电之节目汇流策略与挑战

据统计，1980年，欧洲有36个公共频道，但只有5个私营频道。到了1997年之前，广电生态已经逆转，欧洲只有奥地利、爱尔兰与瑞士三个国家的全国性频道为纯粹公共频道，而且全欧公共电视台总数为45，低于总数已达55的商业电视台（Holtz-Bachal & Norris, 2001）。

面对商业广电媒体的竞争、阅听众视听型态的改变，以及政府传播政策的递移等营运生态的冲击，诸多实证研究皆显示，1980年代之后，许多公共电视的节目策略确实多频道时代变得更为主流化、大众化，采取竞争性排播政策，以致出现与商业电视节目汇流的现象。不仅全频道或黄金时段节目型态的差异性缩小，甚至表现手法亦有同质化的现象。不过，相对而言，多数公共电视仍然比商业电视提供较多的新闻、资讯与文化性内容（Steemers, 2003; Iosifidis, 2007）。

以1980与90年代的变化而言，Euromedia Research Group曾针对欧洲53个公共与商业电视频道在1991年1月其中两周全频道与黄金时段的节目

进行分析，并将之与 1980 年代中期一项类似研究的结果做对比，发现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节目播出情形与商业电视仍存在差异，但邻近 1991 年时差异已经愈见缩小（Blumler, 1993）。

以德国为例，Meier（2003）从组织科学的角度，检视 1970 至 1993 年公共电视 ZDF 的 13 个节目排播决策，并透过深访等方式对 1993 年后的情形进行了解。研究发现 ZDF 在德国开放商业电视经营之后，虽然资讯型节目仍占重要比例，以维持频道的独特性，但加大了娱乐性节目的经费投入，包括戏剧与运动类型节目，并将之置于黄金时段。相对的，文化性、实验性与少数族群的节目被减少。此外，ZDF 与德国另一家公视 ARD 原本在节目上的协调合作也变成高度竞争关系。

再以希腊为例，Tsourvakas（2004）的研究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该国 1990 年开放商业电视自由竞争前后的变化。²他的研究比较开放前（1987-1989）与开放后（1990-1992）的电视节目发现，希腊的公共电视并未如自由化前的预测，以提升节目品质及多样化来满足阅听众的不同偏好，相对的，反而发展出与商业电视类似的节目策略，在追求市场占有率的目标下，既妥协了品质，亦增加了节目的同质性。「留在赛局之内」（stay in the game）的思维不但使希腊公视远离组织的原始宗旨，亦让它无法发展出另类的、动态的公共使命。

根据 Tsourvakas（2004）的研究，希腊商业电视开放经营前的 1987-1989 年间，2 个公视频道的节目呈现高度多样性，外国电影（18.51%）、运动（14.54%）与新闻（12.09%）类型节目比例最高，都在 10% 以上，但儿童（9.19%）、文化（6.23%）与纪录片（6.11%）类型节目比例亦不在少数。整体而言，呈现出资讯取向的节目规划策略。但开放竞争后的 1990-1992 年间，2 个公共与 2 个主要商业电视频道所播出的节目中，希腊国产电影（10.49%）、

² 希臘於 1990 年首先開放 Mega 與 Antenna 兩個商業電視頻道之前，只有兩個公共電視頻道 E.T.1 與 E.T.2，後來更形成 5 個主要的全國性商業頻道與 3 個公共電視頻道競爭的局面。由於希臘公視經費來源仰靠國家預算與廣告，其與商業電視在廣告上的競爭因此變得激烈。開放競爭一年之後，希臘公視的廣告收入即降低一半以上；開放競爭三年之後，2 個商業電視頻道的廣告收入已占整體廣告市場的 85.6%，而 2 個公視頻道的廣告營收只占 10.3%（Tsourvakas, 2004）。

竞赛节目(5.59%),以及购自国外的系列刑案影集(7.45%)、戏剧影集(3.89%)及情境喜剧(3.26%)大幅增加,公共电视的节目策略明显商业化,增加了许多娱乐型节目,而且随着竞争时间加长,两者的相似性愈高。

许多人认为,儿童节目的制播乃公共广电的宗旨所在,亦为市场失灵的重要例证。事实上,儿童节目虽为公共电视的特色,但其真正与商业电视不同之处不纯在于节目数量,尚且包括本国自制与非动画型儿童节目的类型差异(D'Arma & Steemers, 2010)。Blumler (1993)针对1981年及1991年英国儿童节目的研究即发现,电视台儿童节目的播出总时间虽有增加,但节目类型则出现若干收缩现象,包括儿童纪实、学龄前与说故事等类型的节目形态已减少相当比例。1991年,英国两大主流无线电视台BBC1与ITV的儿童节目已有超过半数以上时间播出动画或其他显著娱乐形式的节目,然而此类节目在1981年时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公共与商业电视之间所出现的节目排播汇流趋势,到了二十一世纪亦然。一项针对2003、2004年欧盟除卢森堡以外14个会员国所进行的大型研究显示,商业电视黄金时段的节目有相当强的娱乐化取向,而公共电视则倾向在资讯与娱乐性节目之间维持比较平衡的比例。即使如此,就节目类型的多样化而言,公共电视只比商业电视稍高,而且差别有限。此份研究的结论是当时的欧洲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之间尚保有若干差异,足以成为其存在合法性的坚实基础。但内容多样化方面则出现差异性缩小的事实,可视为公共与商业电视趋向汇流的讯号(León, 2007)。

最近一项针对欧洲13个国家广电系统近三十年(1977-2007年)新闻节目所进行的大型研究亦发现,美国电视联播网基于经济因素考量,采取正面对垒(pure blunting)的节目编排策略,各联播频道晚间黄金时段只有一节全国性新闻报导节目,而且排在同一时段,致使「警戒型公民」无法在不经意之间巧遇新闻。欧洲国家则基于培育公民身分的公共政策,对新闻报导节目采取多时段的排播策略。在13个国家5种排播型态的综合性频道中(如表一),传统型态的新闻报导节目(不含新闻快报、新闻杂志及时事论谈型节目)多数占了2个以上的时段,其中公共电视除了义大利与西班牙只安排一

个时段以外，几乎都是2至3个时段，德国的ARD与ZDF更安排了四个时段（多在晚间7:00、8:00、9:45与10:30；Esser et. al., 2012）。³

此一研究显示，就新闻报导性节目而言，公共与商业电视在若干国家如德国虽有较大差异，但在比利时、英国、以色列、荷兰、挪威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则在播出时段数上并无太大区别，都在晚间排播了2至3个时段，只不过播出时间有所区隔而已。至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则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模式，包括公共与商业在内的主要电视频道晚间几乎都只安排一个新闻报导时段，而且都在相同的时段，意大利是8-9点，西班牙是9-10点，公共电视虽曾尝试开辟另一新闻时段，但最后都放弃了。

整体而言，比利时等国电视的新闻节目排播模式让阅听众拥有吸收政治资讯的最多元的机会结构，而西班牙等国则反之，至于公共与商业电视之间在新闻报导型节目的策略上则显然既有汇流，也有分殊之处，而此份研究特别点出，欧洲的商业电视由于受到「资讯角色」的压力，它们的新闻性节目策略事实上乃是向公共电视靠拢（Esser et. al., 2012）。

表一：欧洲国家新闻报导型节目比较表

| 国家 比较项目 | 比利时、英国、 以色列、荷兰、 挪威、丹麦 | 德国 | 希腊、 葡萄牙 | 奥地利、 瑞士 | 意大利、 西班牙 |
|----------------|-----------------------------|-------|------------|------------|-------------|
| 公共电视新闻 时段数 | 2-3 | 4 | 2 | 2 | 1 |
| 商业电视新闻 时段数 | 2-3 | 1 | 1 | 1 | 1-2 |
| 商业电视时段 排播策略 | 高度多样化 | 轻度多样化 | 轻度多样化 | 模仿 | 模仿 |

资料来源：” Political Information Opportunities in Europe: A Longitudi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een Television Systems,” by F. Esser, et al., 201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7(3), p. 264.

³ 美國電視聯播網的全國新聞播出時間在東區時間為 6:30 p.m.，中區時間為 5:30 p.m.，一天僅此時段播出全國新聞，藉以讓黃金時段得以播出娛樂性節目。

从上述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公共广电仍维持一定的节目特色以符应成立宗旨，但面对商业广电激烈竞争下的新传播环境，公共广电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向商业靠拢的现象，节目排播汇流的趋势相当明显。此种汇流现象既出现在不同节目类型的制播数量与时段安排，亦出现在相同类型节目的呈现型态或制作手法之上。

三、节目汇流策略理论依据与争议

公共电视为何会在节目策略上向商业电视靠拢，主要原因在于希望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以免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公共广电的经营者普遍担心当阅听众愈来愈不观看公共电视时，不仅意味着阅听众对公共广电的需求降低，更可能代表公共广电的公众支持将日益弱化，此将严重危及公共广电的存在与发展（Meijer, 2005）。

上述看法的基础显然立基于从经济观点出发的汇流理论，假定阅听众乃同质而且在节目偏好上属于常态性分配的结构，因此公共广电一旦与商业广电形成二元广电体制，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公共广电走向更为大众化的节目策略，公共与商业电视都会重视能够吸引最大多数人可能观赏的节目类型，藉以透过节目排播上的最大公约数争取稳定数量的观众，并在收视率或占有率上占有一席之地（Meier, 2003; Tsourvakas, 2004）。上述推论呼应媒介经济理论中常见的理论命题：公共与商业电视的高度节目竞争会造成产品相似性，学者因此强调，为避免公共与商业电视之间形成破坏性竞争，公共电视应有其独立的、积极的节目策略（Tsourvakas, 2004）。

但也有研究强调，此种以市场选择为基础的公共与商业电视汇流理论，并未考虑到公共广电的组织与制度因素。何况，阅听众事实上并不是同质的一群，公共电视的特质与核心能力亦有助于争取非商业电视青睐的阅听众群体。以相当倚赖广告收入（40%）为其经费来源的德国公共电视 ZDF 的节目策略为例，Meier（2003）的研究发现，在公共电视独占时期原本以娱乐型节目著称的 ZDF，虽然在商业电视进入市场后出现向商业靠拢的现象，但仍

能发展出资讯型取向的节目策略 (information-oriented programming strategy) 以维持其独特性,此乃市场与广电组织、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互动下的结果。

Meier (2003) 指出,面对多频道竞争的时代,ZDF 虽然因为立法架构的模糊定位使它拥有高度经营自由,但德国社会有关公共服务广电的规范性论述都强调电视的民主功能,加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视的资讯型节目存在共识性期待,致使 ZDF 在资讯型节目上展现出与商业电视有别的独特性。此外,ZDF 分权化的组织运作以及多边协商的节目规划流程,亦让该电视台新闻部门负责人得以争取维持 40% 以上的资讯型节目,有效打消 ZDF 订出任何激进的节目策略。

尽管公共电视何以向商业电视靠拢存在不同的解释观点,但汇流现象普遍存在乃不争的事实,亦使双元广电体制下的欧洲公共电视面临存在正当性的挑战,特别是阅听众已逐渐发展出一种定型化的观念,认为商业电视是娱乐性节目的主要供应者,而公共电视则是资讯性节目的首选来源。问题是阅听众的行为已经发生改变,年轻世代愈来愈少收视新闻时事类的节目,甚至商业电视亦能发展出有品质的知识型节目,如 Discovery、History、Bravo 等频道,致使公视的节目融合策略有可能陷公视于经营窘境 (Bardoel & d'Haenens, 2008a)

此种经营窘境同时反映在正反两面的评价,一方面会有公共广电的研究者高呼:「公共服务广电除非能够吸引大众 (popular), 便不可能成功」,「公共服务广电若要有效运作,就必须是能吸引大众」(Collins, Finn, McFadyen, & Hoskins, 2001)。另一方面也有人强调:「(公共服务广电) 若不能在众多的产出 (output) 中证明自己的独特性,公共资助的共识最终就可能消散。」(Steemers, 2002)

「收视率 vs. 品质」(ratings versus quality)、「完整 or 补充」(comprehensive or complementary)、「修道院模式 or 全组合模式」(monastery model or full portfolio model), 不仅是公视营运者长期面对的两难,亦为公共广电相关各方争论不休的课题。为了解决公共电视向商业靠拢的困扰,有的学者以迁就 (adaptation) 与纯化 (purification) 之间的中庸之道来看待此种变化,并名

之为公共广电组织的「修正策略」(compensation strategy; Bardoel & d'Haenens, 2008a, 2008b)

有的学者甚至对公共电视何以必须制播戏剧、娱乐等商业电视广为处理的节目类型提出新的思考方向，例如 Meijer (2005) 即倡议以「愉悦者」(enjoyer) 概念来打破传统「公民 vs. 消费者」的二元架构，她强调从阅听者观看节目的冲击面 (impact) 来分析，所谓的优质节目不仅是要让阅听者足以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还包括能让阅听者变成享有真正欢愉的「愉悦者」，而这就不是单靠商业电视所能达成的目标。

四、小结

进入多频道时代之后的各国公共广电业者，特别是欧洲国家，显然都面临来自商业广电业者的激烈竞争，亦颇多出现节目汇流的现象。就公共广电业者而言，向商业靠拢意味着市场竞争的迁就，更代表着公共价值的调适。即使如此，公共广电业者在节目商业化、主流化的若干走势下，依然以节目的品质、多元或创新，维持住内容服务的独特性，也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度过来自外界对其存在合法性的批评。

虽然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公共广电机构的节目策略，惟既然是「节目汇流」，此处仍须强调商业广电业者「向公共靠拢」的另一侧面。事实上，诸多研究确实显示，公共广电扮演节制商业广电，提升阅听环境的重要角色。Graham 与 Davies 即强调，法律规管对广电产业实现公共利益的效果有穷，必须透过公共广电服务来对商业广电提供正面压力。公共广电服务对商业领域来说并非替代物，而是一种弥补，可以承担「品质设定」(quality setting) 的角色 (Graham & Davies, 1997 / 刘忠博、丘忠融译, 2007)。曾任 BBC 信托主席的 Michael Grade (2004, June 29) 同样公开表示：「当我在第四频道服务时喜欢说：『是 BBC 让我们走在正路』，如今我仍然确信。」诚然，商业广电面对公共广电的「标竿效应」，以及来自阅听大众、公民社会与监管机构的问责压力，它们或以提供类似公共服务的节目，或以接近公共广电的节目排档策略，与公共广电业者进行竞争并承担问责。

如今，公共服务广电（PSB）已迈入公共服务媒体（PSM）的时代，面对网络化沟通的新时代，有关节目服务的争论不只停留在频道节目的规划策略，更延伸至多平台、多媒体的服务策略。商业媒体业者抨击公共服务媒体应局限于传统的广电服务，若将取自人民的执照费或国家补助运用于新媒体服务，乃是不公平竞争，不仅扭曲市场机制，亦影响消费者权益。即使颇多欧洲国家的公共服务媒体经过多年争取并取得政府与社会支持，得以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新媒体服务，并取得跨媒体服务的合法性，惟究竟应该对趋于零碎化的多元公众提供何种内容服务，亦面临资源配置的困扰或内容合法性的争议（Donders, 2012, pp.19-24）。

无论如何，对公共服务广电或公共服务媒体而言，它的艰难挑战无疑存在于面对市场压力时如何确保核心公共服务使命的达成，并证成自己的存在价值。

参、研究方法

为了解我国公视的节目规划策略是否出现与欧美国家相同的发展与变化？本研究将透过节目表的内容分析进行公共电视节目规划策略的纵向比较，以及公视与商业无线电视节目规划策略的横向比较，接着再针对公视年刊中所刊载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话进行内容分析，以期爬梳公视节目策略的规划原则与变迁缘由。

有关节目表的节目分类，本研究参考国外公共广电节目策略既有研究与我国公视节目分类区分为综艺、戏剧、新闻时事、教育学习、生活资讯、文化艺术、纪录片与体育等类，⁴以期反映公共广电节目服务宗旨，并符合我国公视自我定位之社会脉络。在节目分类的编码作业上，则由研究者两人共同讨论并确认各电视节目所宜归属的类别之后，再由一人进行勾稽与统计。⁵由

⁴ 我國公視(2015)近年來於對外報告中將其製播的節目依型態區分為教育學習、新聞時事、體育、紀錄片、戲劇與「綜合、表演、藝術」(合為一類)、「生活、資訊、服務」(合為一類)等。本研究將綜藝節目類型獨立計算，以利與商業電視進行比較。

⁵ 節目編碼作業會遇到若干不易歸類的困擾，例如一個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生活資訊的

于公视一些早期节目已不再制播，为降低节目类别认定上的误差，研究者对资料不详的节目系透过公视企划部人员的访谈与资料搜集进行最后判定。

本研究在节目月份的选择上，以立意抽样方式选定五月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公视历年节目之比较均以五月的节目为对象，公视与其他商业无线电视台的比较系以2015年5月的节目为标的。此一月份的选择除为避开特殊月份可能出现的节目异常安排之外（如1、2月的春节，7、8月的暑假，10月的国庆），亦着眼于商业电视横向比较资料取得的便利性与完整性。至于纳入比较之商业无线电视则包括台视、中视与民视，以商业电视台的群体表征视之，华视则因2006年公共化，其节目排播或与一般商业电视有所不同，且以单一月份论断，并不足以显示公共化商业电视台的完整实况，故不纳入比较之列。

肆、研究发现

以下区分为三小节进行探讨，第一小节为我国公共电视节目排播策略之演变，分析公共电视开播以来（1999年～2015年），17年间5月份之节目类型比例的变化；第二小节针对2015年5月份台视、中视、民视与公视节目的类型比例进行比较，以了解商业与公共电视节目规划策略的差异是否存在？此一比较并细分为全时段、黄金时段（晚间7至11时）、周间与周末的比较；最后一小节则以公共电视年报中董事长与总经理撰文的内容分析结果，探讨影响公共电视节目排播策略的可能因素。

一、我国公视节目类型比例之演变

此小节将统计公共电视自开台以来，所有5月份（1999年～2015年）的节目类型比例，探究不同节目类型排播比例的演变。节目类型计分为综艺、

節目應歸類為教育學習或生活資訊類節目？或是具綜藝色彩的生活資訊節目須歸類為綜藝或生活資訊節目？本研究認為分類標準或有主觀之失，惟若能以一致標準進行節目分類，仍有助於歷時性與比較性研究的有效進行。

戏剧、新闻时事、教育学习、生活资讯、文化艺术、纪录片与体育等类，分析时段则分为历年全时段（6:00~24:00）各节目类型比例之演变、历年黄金时段（19:00~23:00）各节目类型比例之演变，并以软体 windows office excel 2010 年版本分析其演变斜率。

（一）公视历年全时段各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

统计分析后发现，全时段里各节目类型的排播比例呈现上扬趋势的节目，依其增加程度的强弱依序为，综艺节目（斜率=1.2936）、戏剧节目（斜率=0.9382）、新闻时事节目（斜率=0.5814）；至于比例分配呈现降低趋势的节目，依其减少程度的强弱依序为，教育学习(含儿少)节目（斜率= -1.6696）、生活资讯节目（斜率= -0.5973）、文化艺术节目（斜率= -0.4593）、纪录片（斜率= -0.0581）、体育节目（斜率= -0.0324）。不过，5月份全时段所播出的节目中，公共电视仅于2005年（5.4%）与2001年（0.4%）播出体育节目，⁶其余皆没有播出纪录（请见表二、图一至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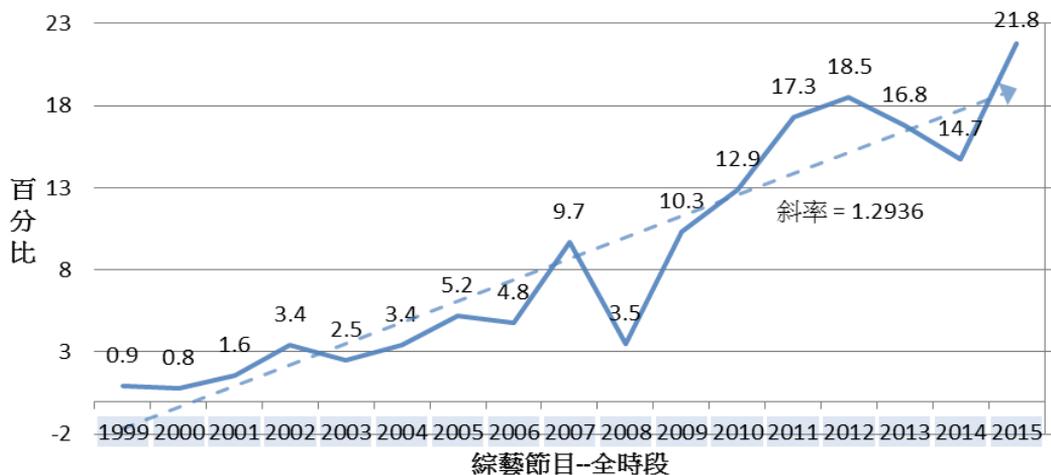
表二：全时段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走向

| | 程度强 | >>>>>>>> | >>>>>>>> | >>>>>>>> | 程度弱 |
|----|--------|----------|----------|----------|--------|
| 正 | 综艺节目 | 戏剧节目 | 新闻时事节目 | / | |
| 斜率 | 1.2936 | 0.9382 | 0.5814 | | |
| 负 | 教育学习节目 | 生活资讯节目 | 文化艺术节目 | 纪录片 | 体育节目 |
| 斜率 | 1.6696 | 0.5973 | 0.4593 | 0.0581 | 0.03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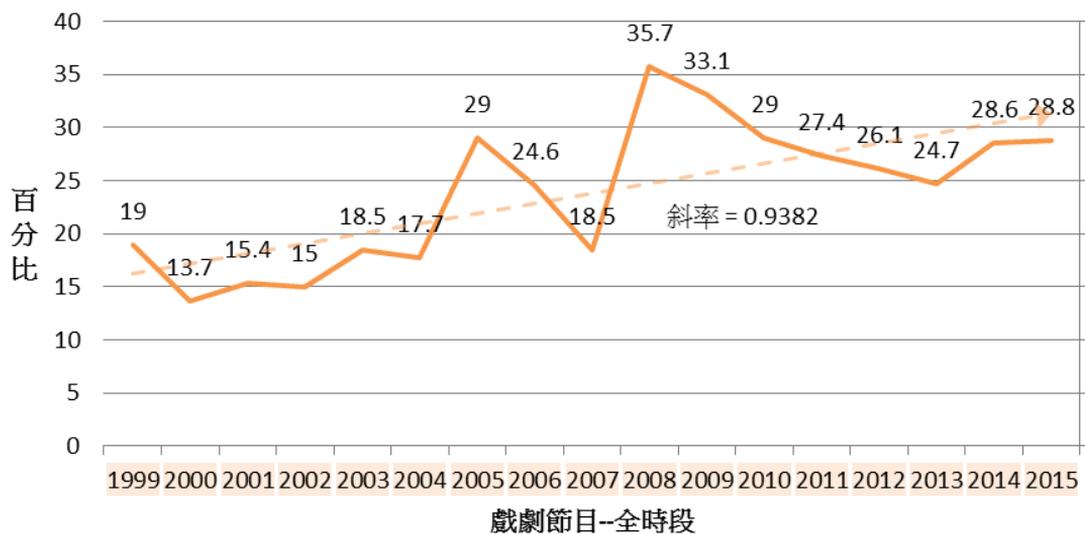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⁶ 依據公視歷年年報資料顯示，公視成立以來播出的體育節目確實稀少，除早期年報因體育節目播出時數甚少而無該類型節目統計數字外，自2006年起的節目統計顯示，全頻道播出的體育類節目都在2%以下，甚至趨近於0。歷年公視主頻道播出體育類節目的高峰僅在2005與2006兩年，主要為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熱賽」，而本研究之所以出現2006年5月份體育類節目比例為零，原因在於公視節目表並未顯示職棒比賽轉播時段。至於公視節目表何以無轉播時段？原因係公視無法於事前掌握欲轉播之台灣旅美選手王建民出賽賽程，遂以機動調整節目表方式因應。

图一：历年公视综艺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二：历年公视戏剧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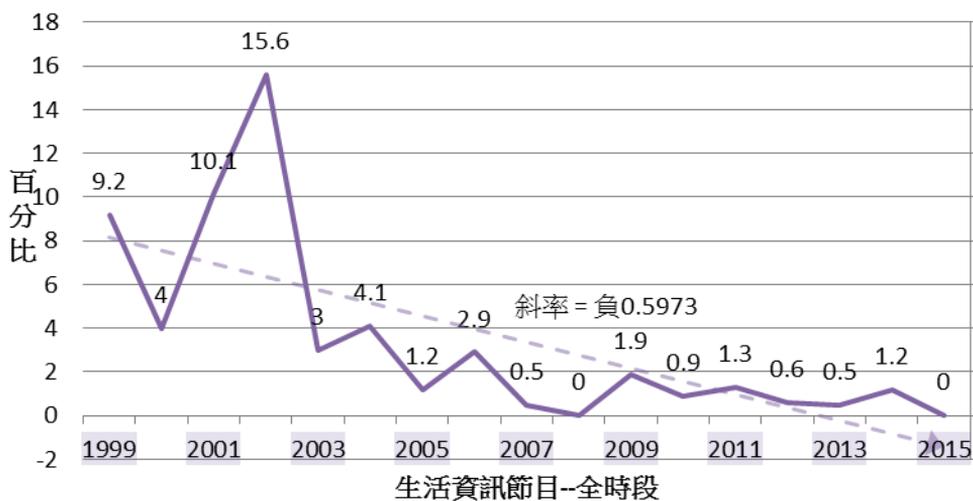
图三：历年公视新闻时事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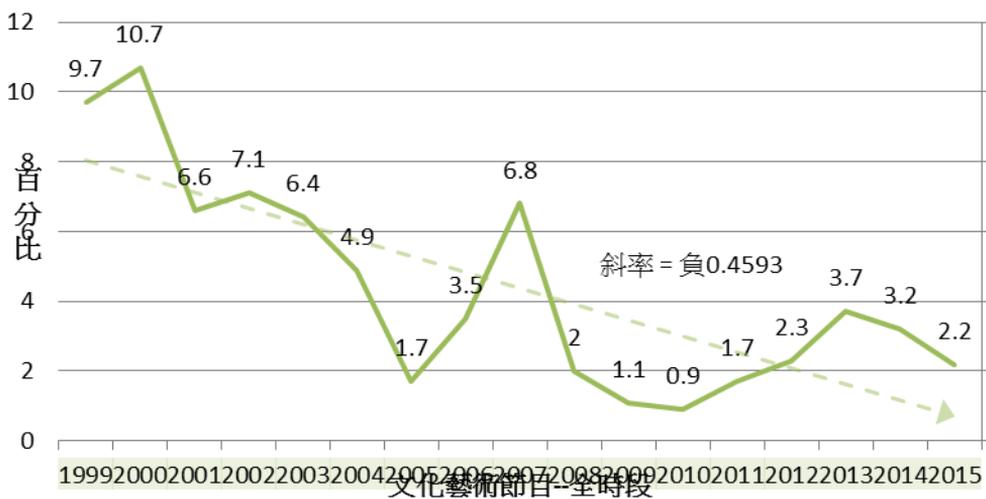
图四：历年公视教育学习节目（含儿少）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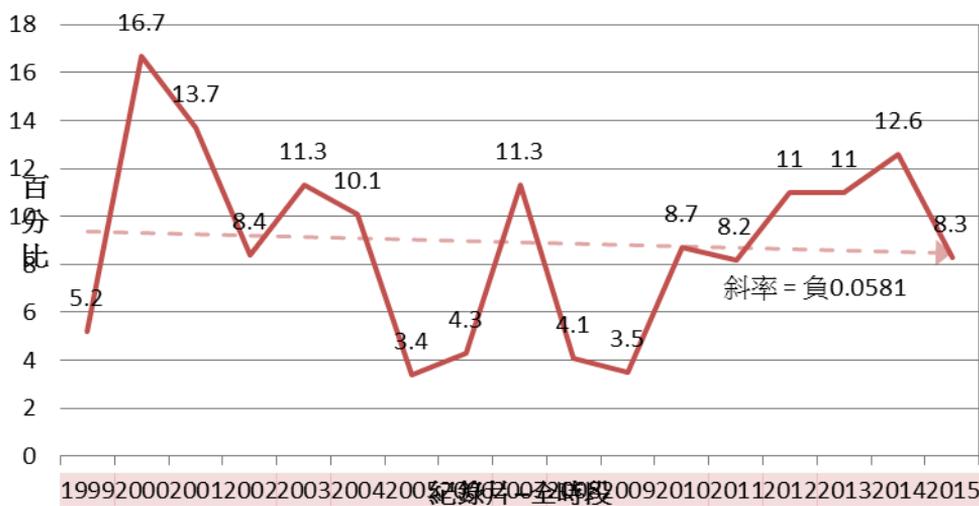
图五：历年公视生活资讯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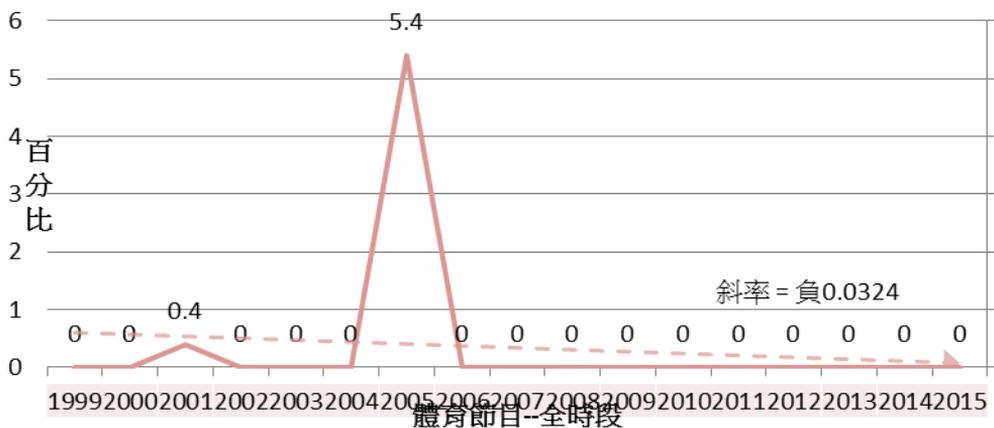
图六：历年公视文化艺术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七：历年公视纪录片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八：历年公视体育节目占全时段比例之演变



(二) 公视历年黄金时段各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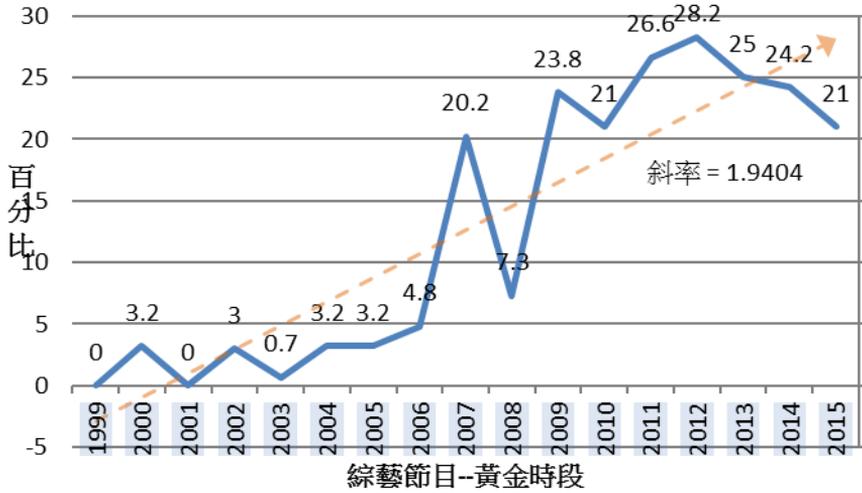
统计分析后发现，黄金时段里各节目类型的排播比例中，比例分配呈现上扬趋势的节目，依增加程度的强弱依序为，综艺节目（斜率=1.9404）、新闻时事节目（斜率=0.5414）。至于比例分配呈现降低趋势的节目，依减少程度的强弱依序为，戏剧节目（斜率= -0.8669）、教育学习（含儿少）节目（斜率= -0.6848）、生活资讯节目（斜率= -0.4544）、文化艺术节目（斜率= -0.301）、纪录片（斜率= -0.1581）、体育节目（斜率= -0.0118）。不过，5月份黄金时段中公共电视的体育节目仅于2005年（2.4%）时播出，其余皆没有播出纪录（请见表三与图九至十六）。

表三：黄金时段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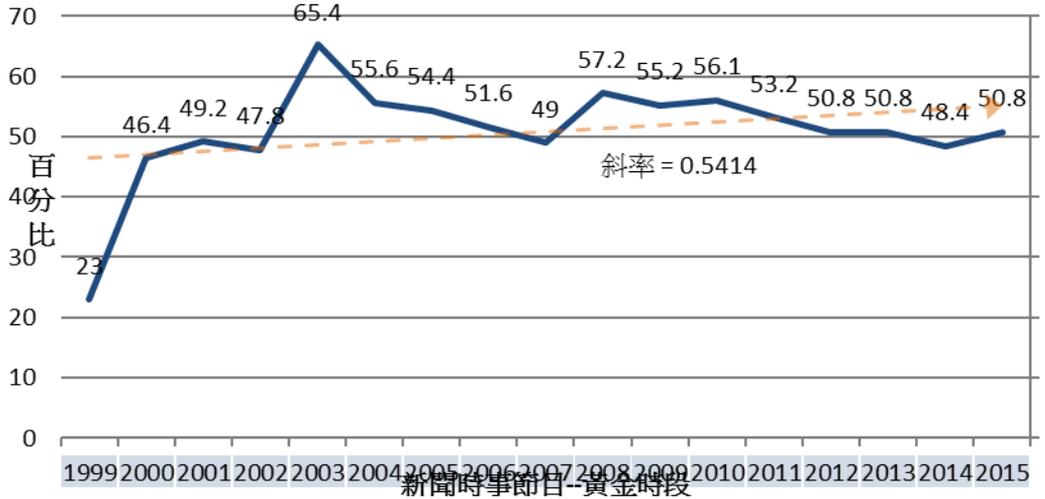
| | 程度强 | >>>>>>> | >>>>>>>> | >>>>>>>> | >>>>>>>> | 程度弱 |
|----|--------|---------|----------|----------|----------|--------|
| 正 | 综艺 | 新闻时事 | / | | | |
| 斜率 | 1.9404 | 0.5414 | | | | |
| 负 | 戏剧 | 教育学习 | 生活资讯 | 文化艺术 | 纪录片 | 体育 |
| 斜率 | 0.8669 | 0.6848 | 0.4544 | 0.301 | 0.1581 | 0.0118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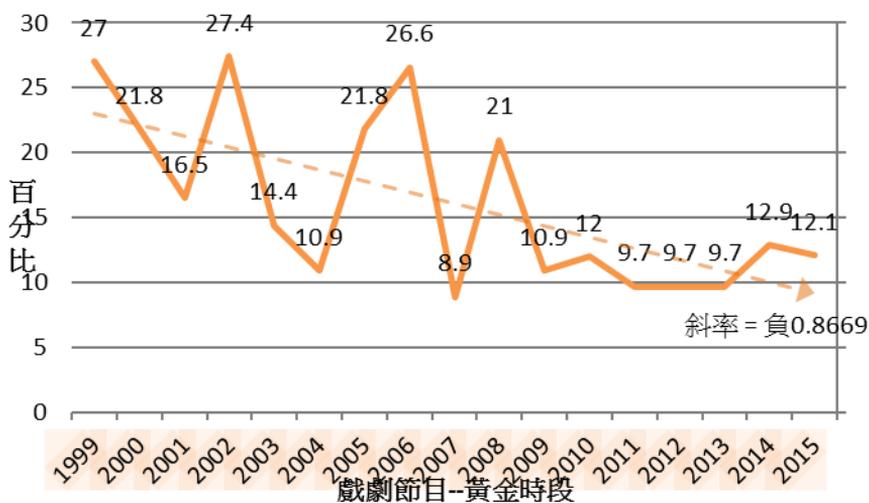
图九：历年公视综艺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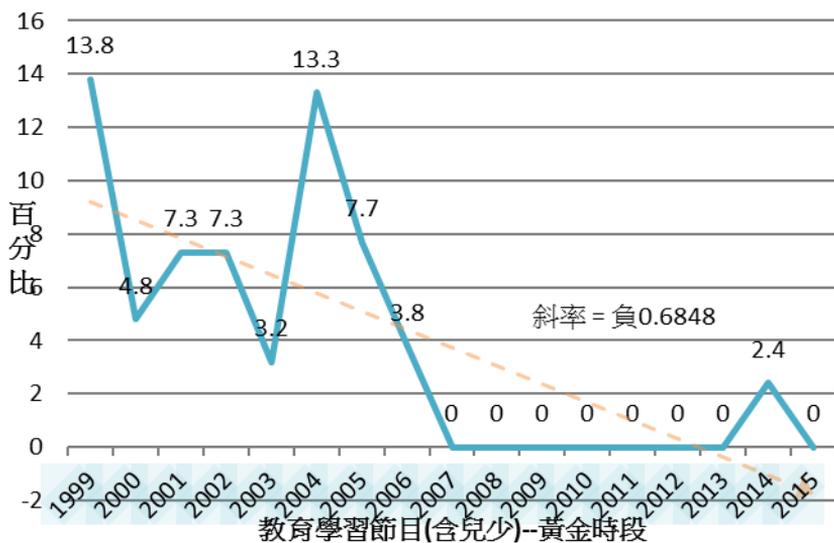
图十：历年公视新闻时事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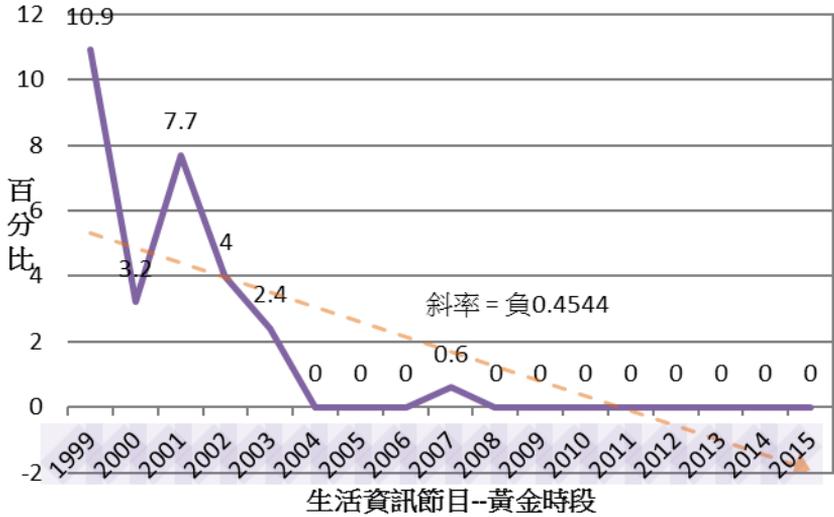
图十一：历年公视戏剧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十二：历年公视教育学习节目（含儿少）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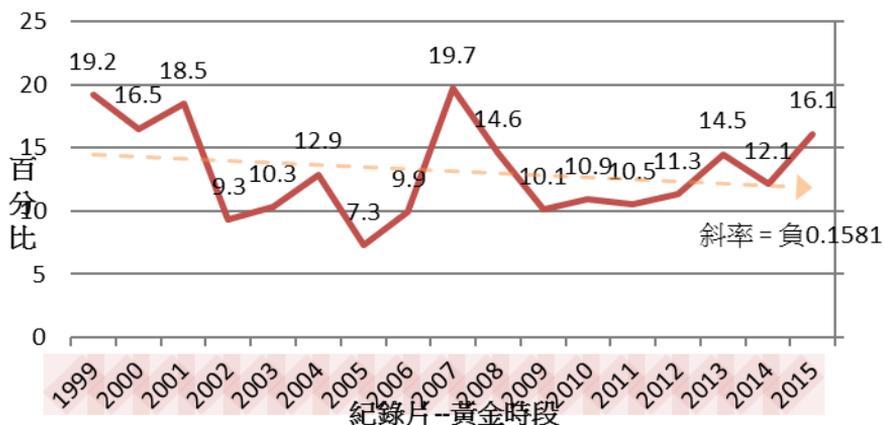
图十三：历年公视生活资讯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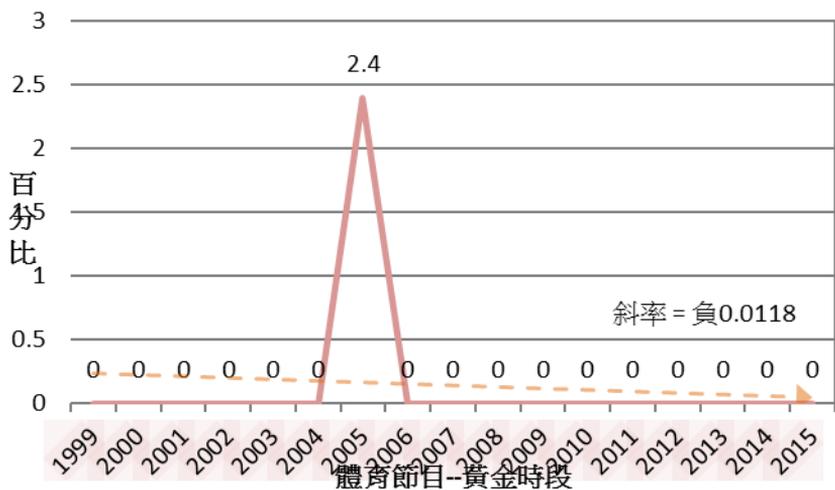
图十四：历年公视文化艺术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十五：历年公视纪录片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图十六：历年公视体育节目占黄金时段比例之演变



综观以上，就公共电视历年全时段节目排播比例走向来看，综艺类型与戏剧类型等较具收视吸引力性质的节目比例越来越高，节目策略有向商业电视倾斜的趋势。至于历年黄金时段节目比例分配的走向，虽然戏剧类型节目比例走低，不如全时段趋向商业电视台的节目策略明显，但综艺类型节目走高，教育学习、生活资讯与文化艺术等类型的节目比例在 2008 年之后更几乎不见踪影，显示公共电视在黄金时段的节目排播虽仍保有新闻时事节目的一定坚持，但向商业电视靠拢的趋势仍然存在，特别是 2008 年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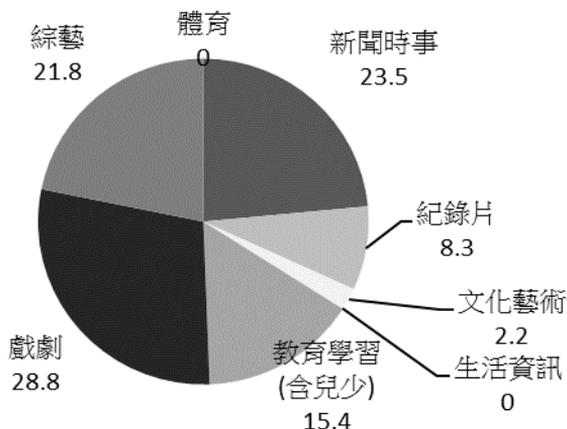
二、我国公共电视与商业无线电视节目类型之比较

以下就台视、中视、民视，与公共电视于 2015 年 5 月份播出节目类型进行分析，并区分为全时段（6:00~24:00）、黄金时段（19:00~23:00）、周间（星期一~星期五）与周末（星期六、星期日）等时段的比较。

（一）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与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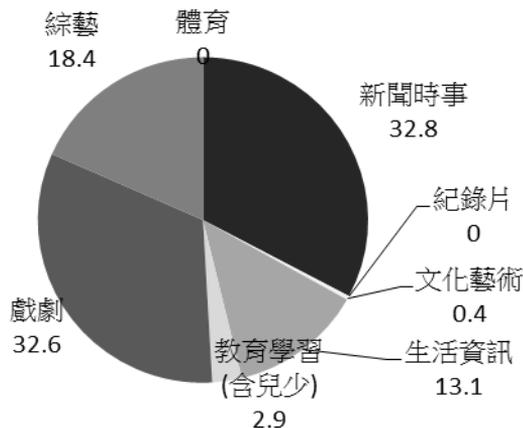
公共电视于 2015 年 5 月份全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戏剧节目 28.8%（159.1 时）、新闻时事节目 23.5%（130.0 时）、综艺节目 21.8%（120.3 时）、教育学习（含儿少） 15.4%（85.3 时）、纪录片 8.3%（45.9 时）、文化艺术节目 2.2%（12 时）。可以发现其戏剧节目、新闻时事节目与综艺节目占了当月近四分之三（74.1%）的节目播出时间，惟若扣除新闻时事节目，则戏剧与综艺节目约占半数（50.6%）播出时间（请见图十七）。

图十七：公视 2015 年 5 月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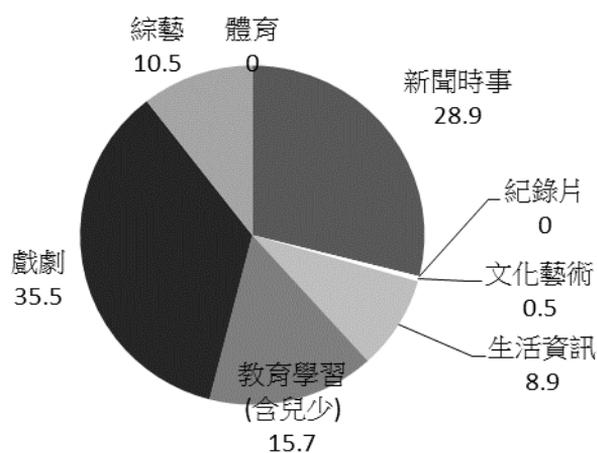
中国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全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新闻时事节目 32.8%（182.7 时）、戏剧节目 32.6%（181.8 时）、综艺节目 18.4%（102.5 时）、生活资讯节目 13.1%（72.8 时）、教育学习（含儿少） 2.9%（16 时）、文化艺术 0.4%（2 时）。可以发现其新闻时事节目与戏剧节目已占了当月近三分之二（65.4%）的节目播出时间（请见图十八）。

图十八：中视 2015 年 5 月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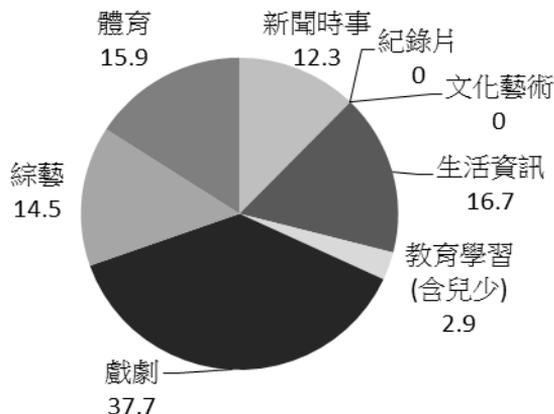
台湾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全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戏剧节目 35.5%（198.1 时）、新闻时事节目 28.9%（161.0 时）、教育学习节目 15.7%（87.4 时）、综艺节目 10.5%（58.8 时）、生活资讯节目 8.7%（49.4 时）、文化艺术 0.5%（3.0 时）。可以发现其戏剧节目与新闻时事节目同样占了当月近三分之二（64.4%）的节目播出时间（请见图十九）

图十九：台视 2015 年 5 月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民间全民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全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戏剧节目 37.7%（211.5 时）、生活资讯节目 16.7%（93.0 时）、体育节目 15.9%（88.7 时）、综艺节目 14.5%（80.6 时）、新闻时事节目 12.3%（68.5 时）、教育学习（含儿少） 0.5%（16.4 时）。可以发现其戏剧节目与生活资讯节目已占了当月一半（54.4%）以上的节目播出时间（请见图二十）。

图二十：民视 2015 年 5 月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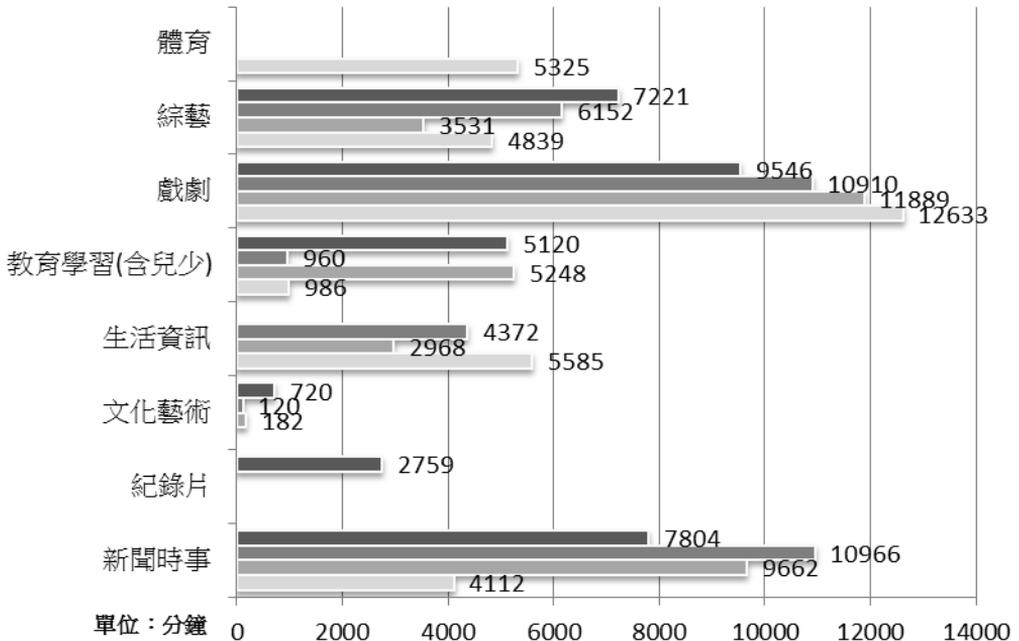
综观 2015 年 5 月各电视台所播出之新闻时事节目，中视播出最多时数（182.7 小时，10966 分钟）；戏剧节目以民视播出最多时数（211.5 小时，12633 分钟）；综艺节目系公视播出最多时数（120.3 小时，7221 分钟）；生活资讯节目是民视播出最多时数（93.0 小时，5585 分钟），而公视该月没有此类型的节目；教育学习（含儿少）节目则以台视播出最多时数（87.4 小时，5248 分钟），公视次之（85.3 小时，5120 分钟）；但纪录片仅有公视播出 45.9 小时（2759 分钟）；体育节目仅有民视播出 88.7 小时（5325 分钟）；至于文化艺术节目，仍系公视播出最多时数（12 小时，720 分钟）。以全时段来看，公共电视与其他商业电视台比较起来，其节目类型分配较为平均（请见表四与图 21）。

表四：各电视台 2015 年 5 月排播节目类型统计表

| | 新闻 时事 | 戏剧 | 综艺 | 生活 资讯 | 教育 学习 | 纪录 片 | 体 育 | 文化 艺术 |
|----|----------|---------|---------|----------|----------|---------|--------|----------|
| 公视 | 130.0 时 | 159.1 时 | 120.3 时 | 0 时 | 85.3 时 | 45.9 时 | 0 时 | 12 时 |
| 中视 | 182.7 时 | 181.8 时 | 102.5 时 | 72.8 时 | 16 时 | 0 时 | 0 时 | 2 时 |
| 台视 | 161.0 时 | 198.1 时 | 58.8 时 | 49.4 时 | 87.4 时 | 0 时 | 0 时 | 3.0 时 |
| 民视 | 68.5 时 | 211.5 时 | 80.6 时 | 93.0 时 | 16.4 时 | 0 时 | 88.7 时 | 0 时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注：灰色网底表示制播时数在该节目类别中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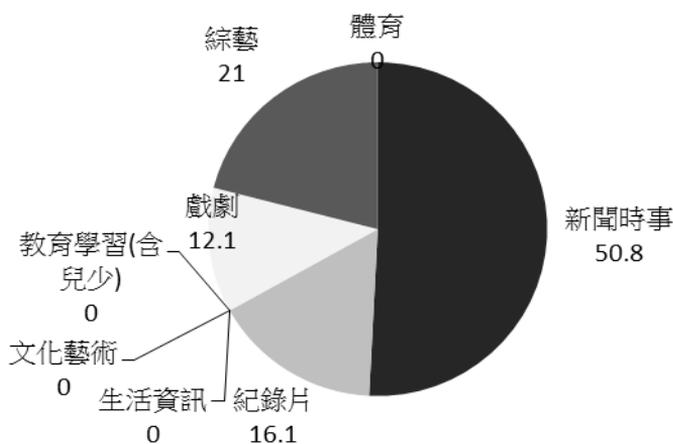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一：各电视台 2015 年 5 月全时段排播节目时数分配统计图



(二) 黄金时段节目比例分配与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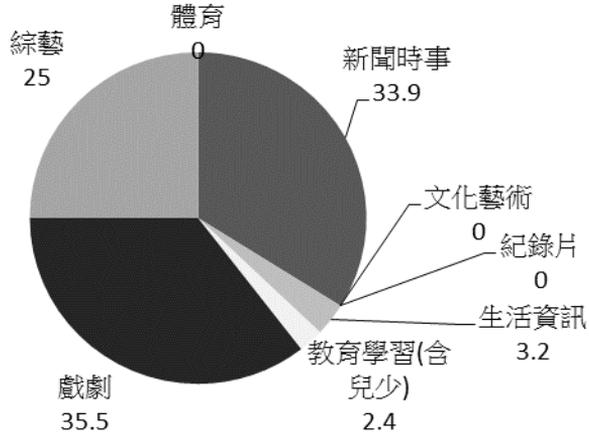
公共电视于 2015 年 5 月份黄金时段所播出的节目类型比例，依序为新闻时事节目 50.8% (63 时)、综艺节目 21% (26 时)、纪录片 16.1% (20 时)、戏剧节目 12.1% (15 时)。可以发现新闻时事节目占了当月黄金时段一半 (50.8%) 以上的播出时间，综艺与戏剧节目合计则约占三分之一 (33.1%) 时间 (请见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公视 2015 年 5 月黄金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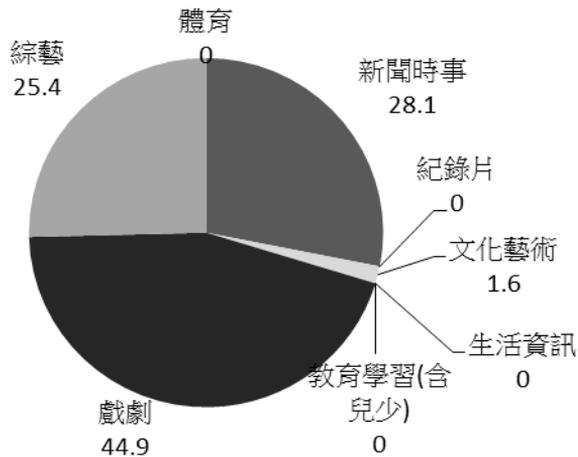
中国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份黄金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戏剧节目 35.5% (44 时)、新闻时视节目 33.9% (42 时)、综艺节目 25% (31 时)、生活资讯节目 3.2% (4 时)、教育学习 (含儿少) 2.4% (3 时)。可以发现其戏剧节目与新闻时事节目占了当月黄金时段三分之二 (69.4%) 以上的节目播出时间 (请见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中视 2015 年 5 月黄金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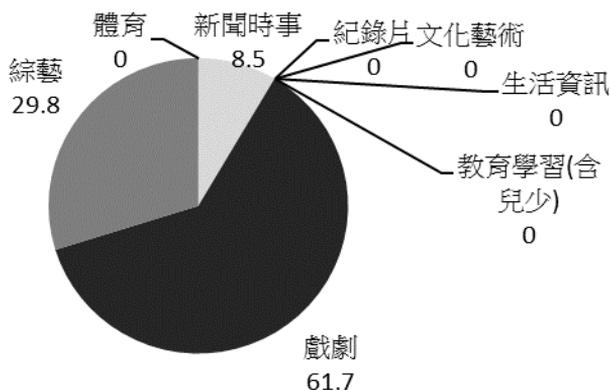
台湾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份黄金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戏剧节目 44.9% (55.6 时)、新闻时视节目 28.1% (34.8 时)、综艺节目 25.4% (31.5 时)、文化艺术节目 1.6% (2 时)。可以发现其戏剧节目与新闻时事节目占了当月黄金时段近四分之三 (73%) 的节目播出时间 (请见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台视 2015 年 5 月黄金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於 2015 年 5 月份黃金時段中，節目類型比例分配依序為戲劇節目 61.7%(76.5 時)、綜藝節目 29.8%(37 時)、新聞時視節目 8.5%(10.5 時)。可以發現其戲劇節目占了当月黃金時段六成(61.7%)以上的節目播出時間(請見圖二十五)。

圖二十五：民視 2015 年 5 月黃金時段節目比例分配圓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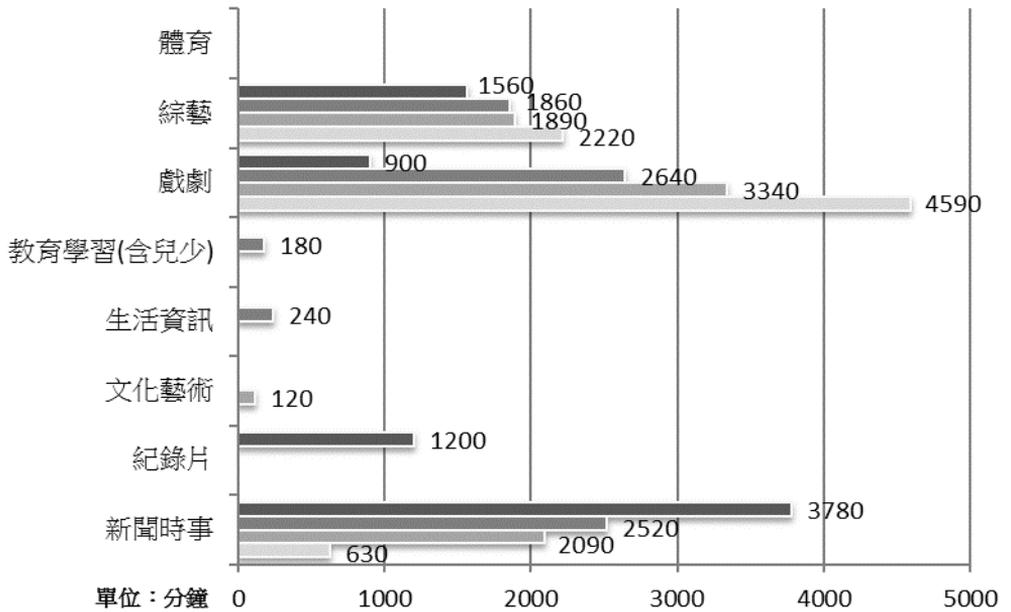
綜觀 2015 年 5 月份当月黃金時段，新聞時事節目上公視播出最多時數(63 小時，3780 分鐘)；戲劇節目上民視播出最多時數(76.5 小時，4590 分鐘)；綜藝節目上民視播出最多時數(37 小時，2220 分鐘)；生活資訊節目上僅有中視播出 4 小時(240 分鐘)；教育學習(含兒少)上亦僅有中視播出 3 小時(5248 分鐘)；紀錄片上僅有公視播出 20 小時的時數(1200 分鐘)；體育節目上各台播出時數皆為 0 小時；而文化藝術節目僅有台視播 2 小時(120 分鐘)。以黃金時段來看，其他商業電視台為了追求廣告收視率，皆分配較多比例於新聞時事節目、戲劇節目與綜藝節目，而公共電視則相對側重於新聞時事，並給予紀錄片較戲劇節目還要高的比例，顯示其節目規劃希望採取更為平衡與差異化的策略(請見表五與圖二十六)。

表五：各电视台 2015 年 5 月黄金时段排播节目类型统计表

| | 新闻 时事 | 戏剧 | 综艺 | 生活 资讯 | 教育 学习 | 纪录片 | 体育 | 文化 艺术 |
|----|----------|--------|--------|----------|----------|------|-----|----------|
| 公视 | 63 时 | 15 时 | 26 时 | 0 时 | 0 时 | 20 时 | 0 时 | 0 时 |
| 中视 | 42 时 | 44 时 | 31 时 | 4 时 | 3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 台视 | 34.8 时 | 55.6 时 | 31.5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2 时 |
| 民视 | 10.5 时 | 76.5 时 | 37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0 时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注：灰色网底表示制播时数在该节目类别中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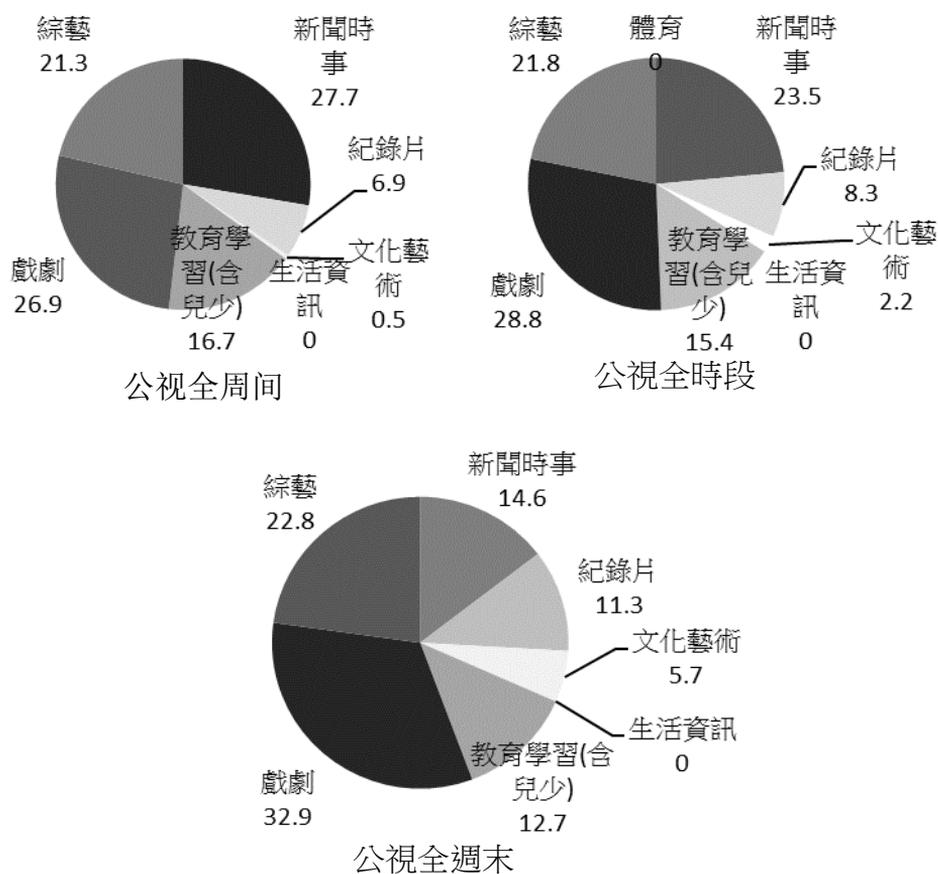
图二十六：各电视台 2015 年 5 月黄金时段排播节目时数分配统计图



(三) 周间与周末节目比例分配与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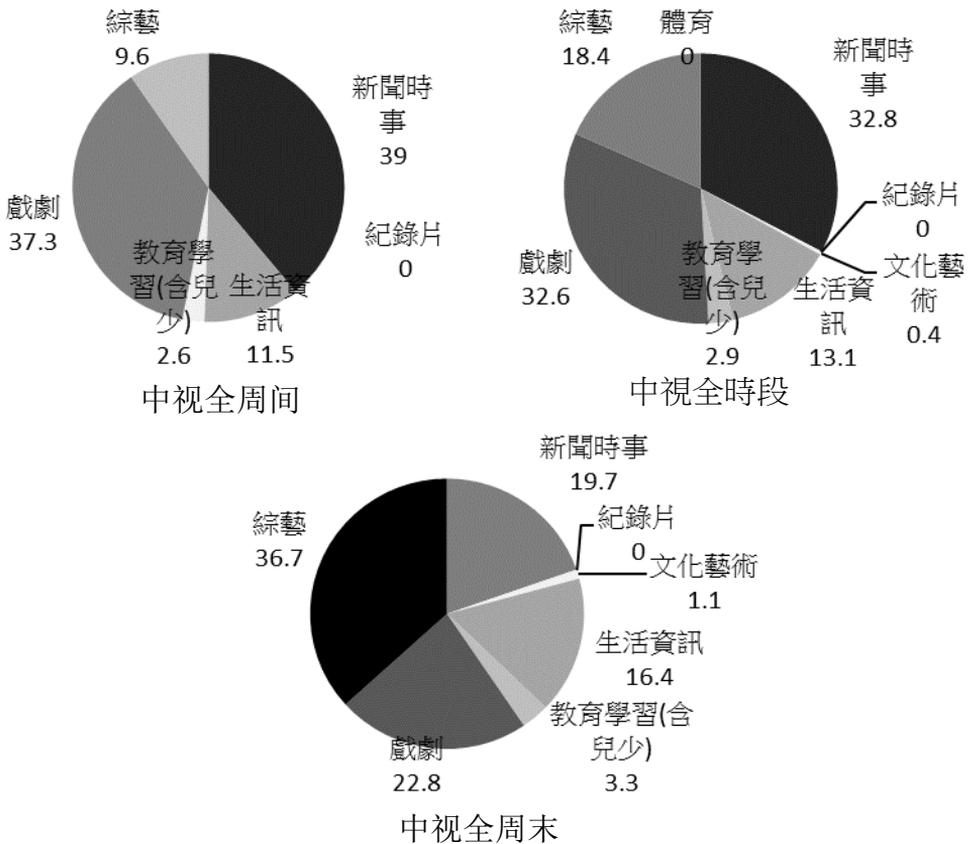
公共电视于 2015 年 5 月份全周间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新闻时事节目 27.7%、戏剧节目 26.9%、综艺节目 21.3%、教育学习（含儿少）16.7%、纪录片 6.9%、文化艺术 0.5%。可以发现与公视自己全时段比例差不多。而全周末时段中，戏剧节目 32.9%、综艺节目 22.8%、新闻时事节目 14.6%、教育学习（含儿少）12.7%、纪录片 11.3%、文化艺术 5.7%。可以发现公共电视于全周末时段中，戏剧与综艺节目为其主要播出节目类型（请见图二十七）。

图二十七：公视 2015 年 5 月周间、周末与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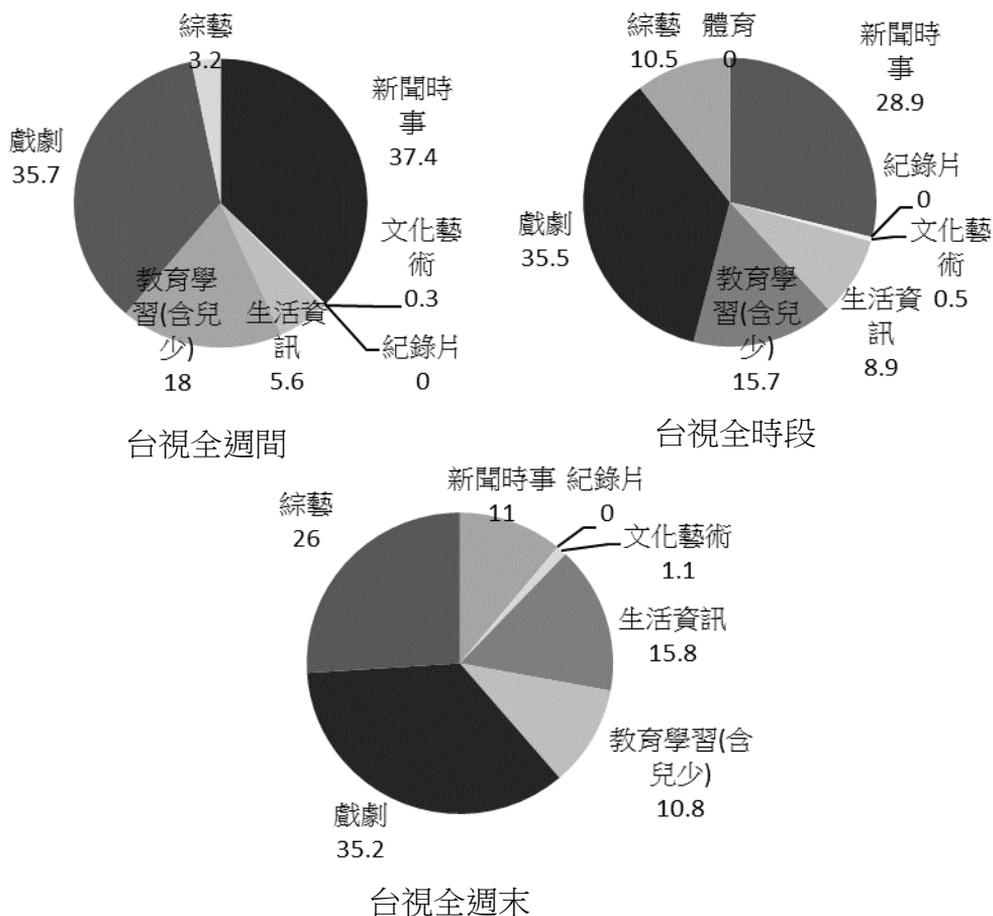
中国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份全周间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新闻时事节目 39%、戏剧节目 37.3%、生活资讯节目 11.5%、综艺节目 9.6%、教育学习（含儿少） 2.6%。可以发现与中视自己全时段比例差不多，但是综艺节目缩减许多（相差 8.8%）。而全周末时段中，综艺节目 36.7%、戏剧节目 22.8%、新闻时事节目 19.7%、生活资讯节目 16.4%、教育学习（含儿少） 3.3%、文化艺术 1.1%。可以发现中视于全周末时段中，综艺与戏剧节目为其主要播出节目类型（请见图二十八）。

图二十八：中视 2015 年 5 月周间、周末与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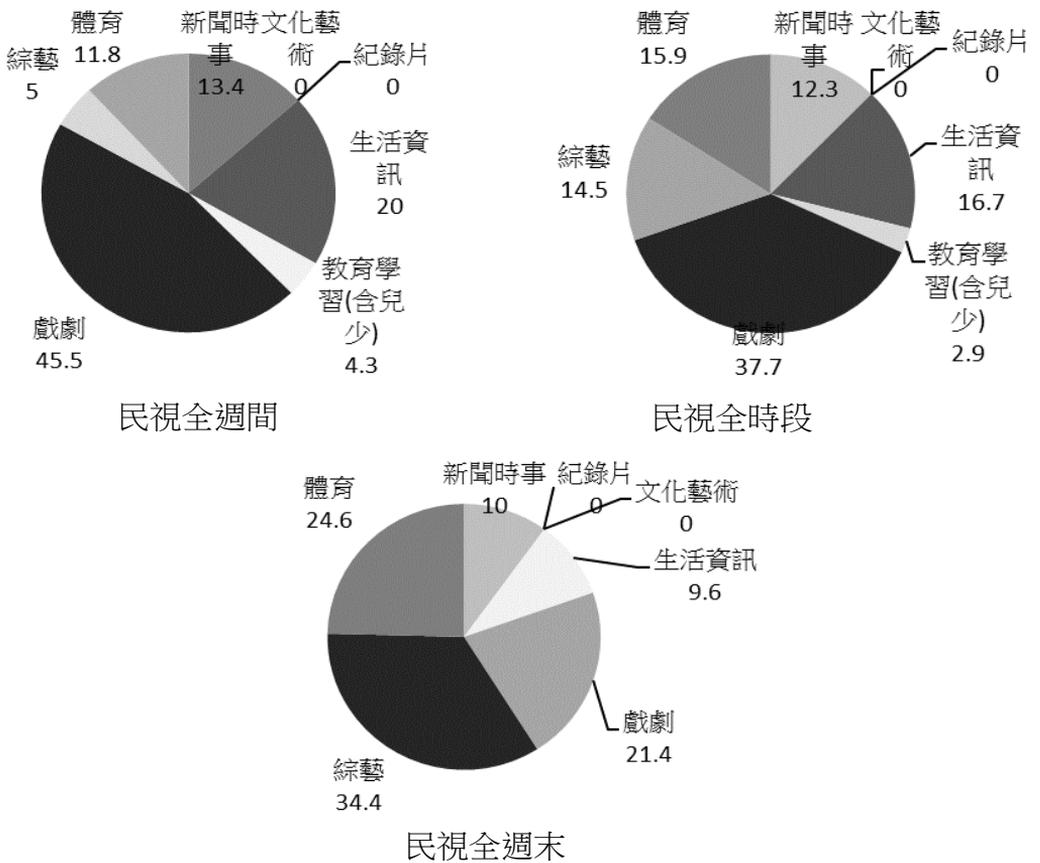
台湾电视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份全周间时段中，节目类型比例分配依序为新闻时事节目 37.4%、戏剧节目 35.7%、教育学习（含儿少） 18%、生活资讯节目 5.6%、综艺节目 3.2%、文化艺术节目 0.3%。可以发现与台视自己全时段比例差不多，但是综艺节目中缩减许多（相差 7.3%）。而全周末时段中，戏剧节目 35.2%、综艺节目 26%、生活资讯节目 15.8%、新闻时事节目 11%、教育学习（含儿少） 10.8%、文化艺术 1.1%。可以发现台视于全周末时段中，戏剧与综艺节目为其主要播出节目类型（请见图二十九）。

图二十九：台视 2015 年 5 月周间、周末与全时段节目比例分配圆饼图



民間全民電視公司于 2015 年 5 月份全周間時段中，節目類型比例分配依序為戲劇節目 45.5%、生活資訊節目 20%、新聞時事節目 13.4%、體育節目 11.8%、綜藝節目 5%、教育學習（含兒少）節目 4.3%。可以發現與民視自己全時段比較，戲劇節目的比例增加許多（7.8%），而綜藝節目則縮減不少（相差 9.5%），從民視全周間節目時段來看，戲劇是主要播出的節目類型。而全周末時段中，綜藝節目 34.4%、體育節目 24.6%、戲劇節目 21.4%、新聞時事節目 10%、生活資訊節目 9.6%。可以發現民視於全周末時段中，綜藝與體育節目為其主要播出節目類型（請見圖三十）。

圖三十：民視 2015 年 5 月周間、周末與全時段節目比例分配圓餅圖



综观周末节目，可以发现各电视台的播出节目比例时段中，除了民视播出约四分之一的体育节目外，综艺与戏剧皆是主要播出的节目，连公共电视也不例外。公视的节目制作方式虽然有别于其他商业电视台，如：寓教于乐的综艺节目、创新型态的戏剧节目、以社会少数民族群作为题材等等，但是为了争取更多民众收视，其戏剧与综艺节目的播出时数比例亦在半数以上，几乎与商业无线电视不分轩轻，与商业电视节目策略存在明显汇流现象。但是，公视在教育学习（含儿少）、纪录片、文化艺术节目的比例分配上，还是较其它商业电视台高，尤其是纪录片类型的节目，与商业台的零播出相较，差异更是明显。不过，公共电视在本研究所分析月份的周末节目亦未播出任何生活资讯类型节目，反倒是中视、台视、民视提供了娱乐化的生活资讯型节目。

三、历年公视年报之内容分析

历年（1998 年~2014 年）公共电视年报皆由董事长与总经理撰写专文（「董事长的话」与「总经理的话」），向社会大众说明该台的年度工作成果。本研究针对历年 33 篇专文进行内容分析，试图藉此掌握公视最高层治理者在节目策略上所秉持的原则与演变。相关分析并区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分析 33 篇专文中涉及收视率概念的语词，如「收视率」、「触达率」与「市场占有率」等，以探寻其与公视节目规划策略之间的关系；其二为分析专文中提及节目类型的情形，以观察其与节目排播比例之间的关系。

（一）提及收视率相关词语之内容分析

在历年 33 篇的公视年报中，「董事长的话」与「总经理的话」提及「收视率」、「触达率」或「市场占有率」等语词共 15 次，但其中的 13 次皆仅陈述当年公共电视之「收视率」、「触达率」或「市场占有率」等「高」或「低」的事实，属客观描述性的使用。仅在 2002 年年报中，吴丰山董事长于专文中以带有价值性的观点 2 次提及「收视率」一词，该文指出：「**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都不以收视率作为检验成果的单一指标，可是大家仍然很重视收视**

率，我国公共电视亦然。」具体显示出公共电视在收视率上必须重视，却又不能过度重视的两难情境。惟此一对收视率仅有的评价式观点并未出现在其他年报的专文，因此无法藉此窥探历届公共电视治理阶层对收视率的态度及其变化（请见图三十一）。

图三十一：历年公视年报中收视率相关词语之提及次数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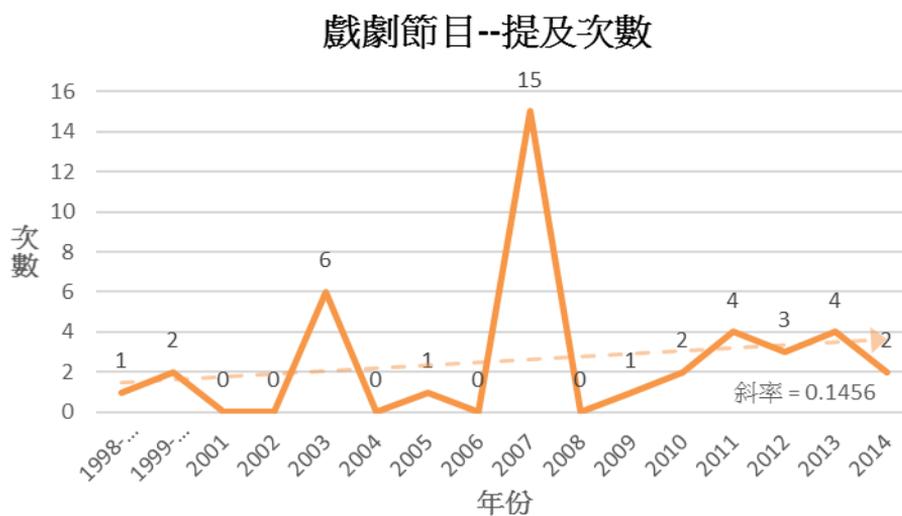
（二）提及节目类型次数之内容分析

董事长与总经理在公视年报专文中所提及的节目类型，依次数多寡依序为戏剧节目 41 次、教育学习（含儿少）31 次、新闻时事节目 28 次、纪录片 27 次、生活资讯节目 26 次、文化艺术节目 13 次、综艺节目 9 次、体育节目 6 次。其中大多数节目被提及次数皆呈现上扬趋势，程度强弱依序为纪录片（斜率=0.2426）、戏剧节目（斜率=0.1456）、新闻时事节目（斜率=0.0882）、综艺节目（斜率=0.075）、生活资讯节目（斜率=0.0735）、体育节目（斜率=0.0471）、文化艺术节目（斜率=0.0309）；惟教育学习（含儿少）节目（斜率= -0.1221），被提及次数则有越来越少的倾向（请见图三十二至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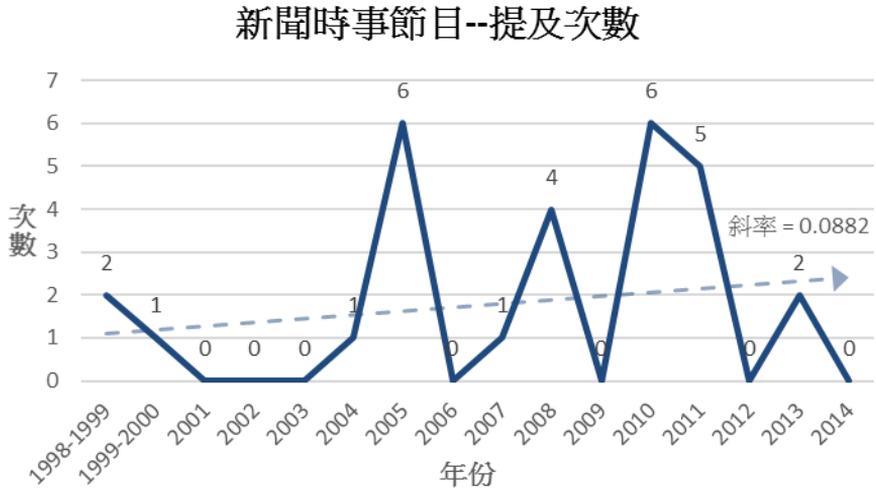
图三十二：历年公视年报中纪录片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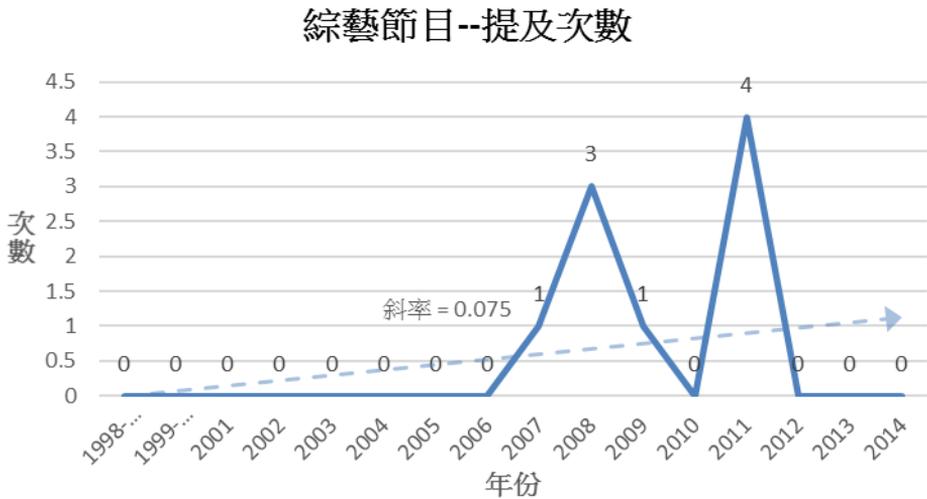
图三十三：历年公视年报中戏剧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图三十四：历年公视年报中新闻时事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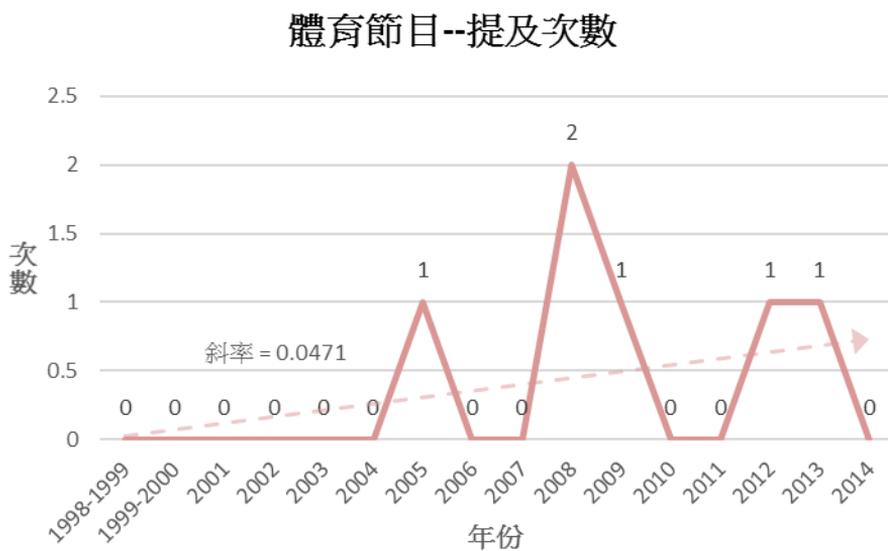
图三十五：历年公视年报中综艺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图三十六：历年公视年报中生活资讯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图三十七：历年公视年报中体育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图三十八：历年公视年报中文化艺术节目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图三十九：历年公视年报中教育学习节目（含儿少）受提及次数之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综艺与戏剧节目被提及次数皆越来越多，其斜率亦较高，而教育学习节目逐年提及次数越来越少，其斜率为负。此结果与前述公视历年全时段与黄金时段之节目排播比例所呈现的结果相似，亦即综艺节目、戏剧节目排播比例越来越高，其斜率亦较高，而教育学习节目则排播比例越来越低，其斜率亦为较强烈的负值（请见表六至八）。

表六：历年公视年报中节目类型被提及次数之演变走向

| | 程度强 | >>>> | >>>>>>> | >>>>> | >>>>>>> | >>>>> | 程度弱 |
|----|--------|--------|---------|-------|---------|--------|--------|
| 正 | 纪录片 | 戏剧 | 新闻时事 | 综艺 | 生活资讯 | 体育 | 文化艺术 |
| 斜率 | 0.2426 | 0.1456 | 0.0882 | 0.075 | 0.0735 | 0.0471 | 0.0309 |
| 负 | 教育学习 | | | | | | |
| 斜率 | 0.1221 | | | | | |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表七：全时段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走向

| | 程度强 | >>>>>>> | >>>>>>> | >>>>>>> | 程度弱 |
|----|--------|---------|---------|---------|--------|
| 正 | 综艺 | 戏剧 | 新闻时事 | | |
| 斜率 | 1.2936 | 0.9382 | 0.5814 | | |
| 负 | 教育学习 | 生活资讯 | 文化艺术 | 纪录片 | 体育节目 |
| 斜率 | 1.6696 | 0.5973 | 0.4593 | 0.0581 | 0.0324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表八：黄金时段节目类型排播比例之演变走向

| | 程度强 | >>>>>>> | >>>>>>> | >>>>>>> | >>>>>>> | 程度弱 |
|----|--------|---------|---------|---------|---------|--------|
| 正 | 综艺 | 新闻时事 | | | | |
| 斜率 | 1.9404 | 0.5414 | | | | |
| 负 | 戏剧 | 教育学习 | 生活资讯 | 文化艺术 | 纪录片 | 体育 |
| 斜率 | 0.8669 | 0.6848 | 0.4544 | 0.301 | 0.1581 | 0.0118 |

资料来源：本研究制表整理

四、小结

综合以上发现，首先，公共电视之综艺与戏剧节目排播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次，综艺与戏剧节目皆为商业电视台获取收视率、增加广告收入的重点经营节目类别，公共电视虽然在节目排播比例上相对平均，但在综艺节目与戏剧节目上也有相当大的占比；最后，历年公视年报显示，该台治理高层提及综艺与戏剧节目的次数呈增加趋势，与公共电视在综艺节目与戏剧节目的排播比例逐年上升，相互吻合。虽然从年报中关于收视率的内容分析中，管理阶层对收视率的态度并没有明确表态，但相关分析仍然显露，公共电视在节目排播上对收视率的态度似乎愈来愈见重视。

伍、结论

本研究清楚显示，台湾的公共电视尽管出现在商业电视已然成为市场主导者之后，而与欧洲国家并不相似，但同样避免不了向商业靠拢的节目策略。相对于同属商业挂帅环境中的美国公视，我国公视虽然不必因为募款压力而过度重视节目的收视情况，但寻求公众认同的压力不遑多让。当然，即使相同类型的节目，其节目制作方式与内涵亦可有所差异，前文探讨其他国家公共广电业者在新闻与儿童节目制作上与商业广电业者的差异即为例证。我国公视节目制播强调创新、品质与公共服务题材等，其形式与内涵自与商业电视有别，惟因缺乏质性研究的佐证，此种节目制作上的差异性是否因时间演变而有所变化，尚无法论断。

不过，我国公视的节目规画仍以一定比例的文化艺术、纪录片与教育学习类节目彰显公共服务特色，并致力以节目品质的领先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合法性。包括金钟奖与卓越新闻奖等得奖数在内的历年国内外得奖纪录不仅是公视的宣传重点，亦是该台品质优先策略的最佳注脚。我国公视经费受到相当局限，为维持节目品质不得不牺牲新制节目的数量，以 2014 年为例，

公视频道全年播映时数共计 8,471 小时，新制首播的节目为 3,290 小时（公视，2015），仅占 38.8%，形成「以重播率换取品质」的独特策略。

由于所处脉络的差异，我国公视节目策略尚有其它独特于他国公视之处，例如同样都维持或提升资讯型节目的比例，但其他国家的商业电视并不重视资讯型节目（如德国），相对的，我国公视则身处于商业新闻频道密度高居全球之首的环境，其全频道资讯型节目的增加（主要系制播台语新闻），除了公共服务使命的实践之外，恐怕也是对观众需求的回应。

一、避免节目策略过度主流化

1980 年代之后，全球公共广电多遭逢来自商业广电愈来愈强大的竞争压力，节目策略因而成为公共广电组织的两难。公共广电组织若过于在意收视占有率，将节目变得更为「主流化」，则可能丧失公共电视的独特性，远离公共电视的存在宗旨。但如果公共电视无法证明自己的节目与服务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吸引一定数量的观众收视，公视存在的正当性亦将很难辩护（Syvertsen, 2003; Tsourvakas, 2004; Meijer, 2005; Iosifidis, 2007）。

实证研究显示，为了因应新传播环境的挑战，全球公共广电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节目策略主流化、商业化的现象，此一现象虽被公共广电营运者视为现实环境下的「不得已」举措，但诚如 Open Society Institute 针对 20 个欧洲国家电视产业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电视在支持民主运作上的关键角色正面临威胁，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广电为与商业频道竞争而在品质上做出妥协」（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2005）。

许多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看法，他们发现媒体环境确实会影响阅听者的内容偏好以及作为公民的责任感（Esser et. al., 2012）。常态性或花费比较多时间收视公共广电的阅听众，其政治资讯与知识相对通达，对政治事务的兴趣甚至政治能力也较高（Holtz-Bachal & Norris, 2001）。足见公共电视的节目内容与排播策略不仅关乎公众视听权利，更影响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品质。学者因而呼吁公共广电业者必须采行「品格维护政策」

(Integrity-safeguarding policy), 以各種方式宣示與檢視自我的作為(Blumler, 1993)。

我國公視節目制作是否過度重視收視率？節目排播是否過度傾向商業化的議題，雖曾引發若干討論或爭議，但整體而言，並未受到社會普遍關注。此或與公視收視占有率偏低有關，亦可能與公視其他問題的受注目程度高過此項爭議有關。但公視節目服務走向不只有其社會意義，亦有其實質的社會影響，不能等閒視之。相對其他國家，我國公視的收視市場占有率偏低，採取主流化、商業化的節目策略固然能夠提升若干占有率，但較之商業電視，其相對比例仍屬懸殊。就此而言，我國公視在現階段節目策略的訂定上是否應比其他國家更著重於獨特性的保持與發揮，恐怕是公視與商業電視「匯流」時必須特別留意的課題。

二、經費來源影響節目策略

那些因素會影響公共電視的節目策略向商業電視靠攏？若干研究顯示，公共電視組織的經費來源是影響此一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León (2007, 2010) 的研究指出，擁有高廣告收入的公共電視頻道，其節目會變得更為娛樂取向。他以西班牙為個案的研究亦發現，儘管 2006 至 2007 年間該國的公共電視正式整合為 RTVE，並以邁向真正的公共服務廣電為目標，但在仰賴廣告收入為主要營收來源的壓力下，收視率仍然是節目規劃的重要考量，以致比較改革前後（2004 與 2008 年）的節目服務後發現，其與商業電視的競爭對手相當近似，黃金時段節目的多樣性甚至还減少了。⁷

⁷ 西班牙國會於 2009 年 8 月修法，取消公共廣播組織 RTVE 的廣告收入，規定其營運經費來自國家預算撥給與傳播產業（電信公司、開放式商業電視與付費頻道）特別稅，此舉嚴重削弱 RTVE 的總體經費。資料顯示，2011 年，RTVE 前兩項收入為 12 億歐元，2012 年，來自國家預算的費用較前一年少 38%，從私部門徵收來的稅亦較前一年少了 26.8%，兩項收入合計不到 10 億（Santín & Rubira, 2014）。儘管 2016 年，RTVE 的總經費提升為 10 億歐元，但截至 2014 年，累積負債已達 9 億（Gonzalez, 2015, August 6）。經費問題自然影響節目品質，RTVE 在電視頻道的節目排播上，不僅新聞時段變化不大（官網節目表顯示，綜合頻道 La 1 晚間新聞時段仍為 9 點，綜合頻道 La 2 夜間新聞時段在 12 點之後），新聞公正性亦受內外訾議。2015 年 4

加拿大的情形亦复如是。一项针对该国公视 CBC 所进行的研究亦显示，由于约半数的节目预算来自广告，CBC 于 2006 年开始采取大众取向的「加拿大制娱乐策略」(Canadian entertainment strategy)，于黄金时段（晚间 7 至 11 时）增加排播加拿大制连续剧与纪实娱乐性节目，其比例从策略启动前（2005-6 年）的 7.5% 成长至 2008-9 年的 9.2%。不过，此一策略同样遭到批评，指其牺牲了资讯性与地区性节目的制作经费（Savage, 2010）。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Esser 等人（2012）的跨国性研究亦发现，高度仰赖广告经费营运的公共电视提供较少的资讯型节目。McKinsey & Company（1999）早几年所做的研究亦指出，以执照费为其主要经费来源的公共广电组织，较依赖广告等商业收入的公共广电，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与文化性节目。换言之，后者的节目独特性将在营收多寡的考虑下受到影响。

公共电视经费增加及其来源稳定足以提升营运效能的最佳范例之一就是爱尔兰公视 RTÉ。以执照费及广告收入为营运经费主要来源的 RTÉ，受到来自商业媒体竞争等因素的影响，2001 年时犹短绌 7,100 万欧元，但 2003 年即转亏为盈，2004 年更净盈余达 680 万欧元，主要原因就在于 2003 年起得到执照费大幅提升的挹注，以及据此所成功展开的节目变革。RTÉ 于 2002 年 11 月向政府提案，要求增加偏低的执照费以制作符合公共利益的优质节目，政府同意自 2003 年 1 月起一举将执照费提高 40%（每年每户增加 43 欧元，使每户执照费总数达 150 欧元）。RTÉ 因此有能力推动以创新、品质及培育人才为目标，特别是提升自制内容的节目变革，其结果不仅节目表现深受肯定，连带的广告收入亦大幅提升，例如 2004 年的广告收入即增加 1,530 万欧元（Iosifidis, 2007, pp.141-145）。

经费与节目品质的密切关系不只存在于公共广电时代，对于业已逐渐展开具体实践的公共媒体而言，同样是唇齿相依。因为公共媒体除了要提供传统的广电服务，尚需投资不断变迁中的新科技，以更细致的多媒体能力满足益趋零碎、主动与多元的阅听众需求，而这在在需要经费。但，本世纪以来，以执照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欧洲公共广电组织一方面遭遇执照费运用于新

月，該台記者甚至派代表團直接到歐洲議會申訴其新聞自主遭到嚴重政治干預 (Buck, 2015, April 27)。

媒体发展的合理性挑战，另一方面亦面临执照费因电视收视人口下降所形成的收入压力，以致亟需重建执照费收入的新架构。公共广电组织传统的收视费来源主要系以拥有电视的家庭为其征收标准，如今不同装置都可接收公共媒体的内容服务，包括奥地利、德国、爱尔兰、瑞典与瑞士等国都在研究以「装置独立」(device-independent)为原则的新架构来征收执照费，亦即让执照费与特定的电视装置脱钩，延伸至所有家户以及一些企业。⁸其中，德国与芬兰的转制经验显示，当公共广电组织得以向非电视家户收取执照费之后，公共媒体的收入为之增加，其在新媒体服务的推动上也得到相对有利的基础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 Burnley, 2016; 冯建三, 2015)。

若然，思考我国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时，就必须对我国公视现行的经费来源模式进行考量，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高品质且具有独特性的公共广电或公共媒体，现行的政府预算捐赠模式虽有不必受商业营收影响的好处，但终究有独立性易受影响与长期规划难以进行之虞，⁹特别是政府捐赠经费过少，不仅深深影响公视节目内容的走向，亦严重压抑公视制作多元、创新与高品质节目的能力。此外，我国政府官员曾建议开放公视播放广告，但考量公视频道现有的收视率及国外公视的发展经验，此举不仅收入有限，更有迫使公视节目趋于商业化、主流化的高度风险。欲期公视达成营运宗旨，提升服务效能，充足而稳定的经费来源仍是最为关键的基本条件。

三、迈入公共媒体时代的节目策略

公共广电面临多频道竞争之后，毫无疑问，如何让公共频道更贴近阅听众并保持节目内容的独特性，已经是许多公共广电组织戮力以赴与公共广电支持者积极倡议的方向。对欧洲国家公共广电机构如何面对数位化挑战进行广泛研究的 Iosifidis (2007, p.180) 即结论指出：「公共频道必须更让民众有

⁸ 德國與芬蘭已於 2013 年採行執照費新制，瑞士於 2015 年 6 月通過修法，預估將於 2018 末或 2019 年初執行新制。

⁹ EBU(2016)提出公共服務媒體公共經費來源的四個原則，包括：穩定與充足，免於政治干預的獨立性，公正與合理，透明與問責。

感，更植基于民众的生活，并且藉由节目创新、多元而独立的新闻，多元内容的主题频道，以及可触达及可负担的方式，成为所有广电业者的范例。」

相对于南欧希腊与西班牙等国公共广电曾经采取鲜明的商业化节目策略，以致被阅听众边缘化的处境，一些西欧与北欧国家公共广电机构在节目汇流问题上的因应策略显然得到较佳的结果。Meier (2003) 与 Meijer (2005) 针对德国公共广电所进行的研究即发现，相当倚赖广告收入为其经费来源的德国公视 ZDF，虽然在许多方面模仿了商业电视的节目策略，包括其节目排档的决策愈来愈依赖精细的阅听众研究。不过，强调「以品质获取收视率」(ratings through quality) 的 ZDF，并没有完全陷入丧失独特性的眼球战争。整体而言，德国公视反而是在「组织自利」的思考下，采取与商业电视不同取向的节目差异化策略，并因而保有其独特性。

如今，公共广电已迈入公共服务媒体的数位化时代，处于多平台、多载具的传播环境下，阅听众的阅听行为已然大幅改变，传统电视频道的节目排播策略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已逐渐降低，特别是对年轻世代的阅听众。但即使是在各种新兴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从何种平台、何种装置接收视听服务，电视组织所制播的内容仍然为多数人的重要讯息与娱乐来源，也仍然是建构现代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的重要基础，而由传统公共广电业者发展成的公共服务媒体，则在诸般电视组织中继续发挥提供有价值公共服务内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许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果论证新传播时代同样存在市场失灵现象，¹⁰因为新媒体或新平台与所有传统媒体领域殊无二致，同样存在向寡占倾斜的经济动态，亦更容易造成本国自制内容的短缺 (Berg, Lowe & Lund, 2013; Donders, 2012, pp.25-48)。

¹⁰ 長久以來，公共廣電的擁護者以廣電服務若依附於商業競爭將出現市場失靈，作為有力的支持論述。數位新媒體時代到來之後，許多公共廣電的反對者振振有詞的說，市場失靈論已經「失靈」了，因為如今不僅包括博物館、圖書館、大學等機構可以提供公共媒體的若干服務，商業媒體同樣產製許多具公共價值的內容。但公共服務媒體的支持者則提出諸多論證，強調市場失靈現象持續存在，並非已然消失的歷史課題。如果說新科技讓公共媒體擁有高度發展潛能的主張乃是一種科技樂觀主義，反公共服務媒體的論調則是不折不扣的科技決定論 (Donders, 2012; Donders & Bulck, 2013)。

D'Arma, Enli & Steemers (2009) 针对英国、挪威与义大利等三个国家公共服务媒体儿童节目的研究即指出，即使是在数位时代的今天，本国自制内容仍然是公共媒体组织能够与商业媒体做出区隔的要素之一，而财务来源也同样是决定公共服务媒体能否维持自制内容原创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此而言，独特性在公共服务媒体时代的重要性显然不会消退，甚至是不减反增。

除此之外，Jakubowicz (2006) 的研究强调，公共服务媒体的节目策略除了将节目服务延伸至各个平台与载具，尚须有更进一步的思维。公共服务媒体必须将阅听众视为一个包含多种需求与兴趣的「完整的人」(complete human beings)，重新思考其节目策略。换言之，所谓内容普及性的概念不应该停留在以一体适用 (one-size-fits-all) 的节目规划提供于所有频道、平台或载具，而必须为不同的频道、平台或载具量身制作专属的内容，以服务不同或特定的阅听众，而且这些服务必须能够出现在各种重要的频道、平台或载具之上，包括个人化的公共服务 (personalized public service)，以实现触达的普及性。显然，普及性原则在公共服务媒体时代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化。

尽管公共服务媒体仍处于实验阶段，甚至其他公共机构或商业媒体亦在新的媒体生态中提供公共服务，但颇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媒体已走出自己的路，并展现亮眼成绩。一份由英国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所进行的全球性广泛调查即显示，对许多公民而言，公共服务媒体仍具重要性，即使阅听众益趋零碎化，其所产制的内容依然受到重视与信赖 (Horowitz & Clark, 2013; Tambini, 2014)。探讨如何以永续政策支持公共广电发展为公共服务媒体的 Donders (2012, pp.41-42) 因此强调，公共广电业者仍将是公共服务媒体的核心，因为它拥有在新媒体市场实现公共利益的可观技能，是实现媒体政策的最佳工具，协助民众克服内容爆炸问题的最好帮手，也是资讯零碎化时代促进社会凝聚的有力凭借。

面对公共服务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电视已经在多平台、多载具的服务上展开新的尝试与实验，不过，限于经费等因素，跨出去的步伐相当有限。未来如何从自我社会脉络出发，对源自公共广电时代的治理原则进行转化，并展开崭新的内容服务，已经是无可回避的课题。就此而言，全球公共广电业者在频道节目策略上所经历的「汇流经验」，或许将不只是历史的陈

迹而已，更是对自身如何迈向未来的珍贵启示。本研究分析显示，公共广电成立以来所标举的普及性、多样性、独立性与独特性等四项要素，不仅没有随着媒体环境的变迁而降低其重要性，反而需要透过创造性的转化以实现公共服务媒体的新时代角色，对此，本研究的探讨显然只是起步而已。

此外，本研究未直接访谈公视经营者的节目策略思维，以与实际节目变迁相互印证；侧重节目类型的数量变化，而未及于节目内容之质的分析，均为本研究之限制所在，亦为未来可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处。

参考书目

- 公视 (2015)。《2014 公视基金会年度报告》。台北：作者。
- 冯建三 (2015)。〈公共政策与(新)媒介财政〉，《传播、文化与政治》，1: 101-141。
- 刘忠博、丘忠融译 (2007)。《多媒体时代下的广电事业、社会与政策》。取自：
<http://www3.nccu.edu.tw/~jsfeng/grahamdavies19972007.doc> (原书 Graham, A. & Davies, G. [1997]. *Broadcasting, society and policy in the multimedia age*. Luton, UK: Lu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doel, J., & d'Haenens, L. (2008a).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converging media modalities: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Convergence, 14*(3), 351-360.
- Bardoel, J., & d'Haenens, L. (2008b).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Europe: Prospects, promises and proble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3), 337-355.
- Berg, C. E., Lowe, G. F., & Lund, A. B. (2013). A market failure perspective on value creation in PSM. In G. F. Lowe & F. Martin (Eds.), *The valu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pp. 105-126). Göteborg, SE: NORDICOM.
- Blumler, J. (1993). Meshing money with mission: Purity versus pragmatism in public broadcas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403-424.
- Buck, T. (2015, April 27). Spanish state broadcaster TVE accused of political bias. *Financial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next.ft.com/content/4625b188-e818-11e4-9960-00144feab7de>
- Burnley, R. (2016). *Public funding principles for public service media*. Le Grand-Saconnex, CH: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Retrieved from [file:///C:/Users/asus/Downloads/EBU-Legal-Focus-Pub-Fund_EN%20\(2\).pdf](file:///C:/Users/asus/Downloads/EBU-Legal-Focus-Pub-Fund_EN%20(2).pdf)
- CMRTV. (2001). *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 Paris, FR: UNESCO. Retrieved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0/124058eo.pdf>
- Collins, R., Finn, A., McFadyen, S., & Hoskins, C. (2001).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beyond 2000: Is there a future fo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1), 3-15.
- D'Arma, A., Enli, G. S., & Steemers, J. (2009). Serving children in public service media.

- In G. F. Lowe (Ed.), *The public in public service media* (pp. 227-242). Göteborg, SE: NORDICOM.
- D'Arma, A., & Steemers, J. (2010). Public service media and children: Serving the digital citizens of the future. In P. Iosifidis (Ed.),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 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 (pp. 114-127).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Donders, K. (2012). *Public service media and policy in Europe*. New York, NY : Palgrave Macmillan.
- Donders, K., & van den Bulck, H. (2013). The 'digital argument' in public service media debates: An analysis of conflicting values in Flemish management contract negotiations for VRT. In G. F. Lowe & F. Martin (Eds.), *The valu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pp. 145-163). Göteborg, SE: NORDICOM.
- Esser, F., de Vreese, C. H., Strömbäck, J., van Aelst, P., Aalberg, T., Stanyer, J., ...Reinemann, C. (2012). Political information opportunities in Europe: A longitudi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een television system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7(3), 247-274.
- 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2005). *Television across Europe: Regulation, policy and independence*. Budapest, HU: Open Society Institute.
-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 *PSM Funding*. Le Grand-Saconnex, CH: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3.ebu.ch/files/live/sites/ebu/files/Publications/EBU-Viewpoint-PSM-Funding_EN.pdf
- Gonzalez, J. F. (2015, August 6). *RTVE's budget increases by €100 million*. *Rapid TV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apidtvnews.com/20090104188/about-us.html#axzz44BzIS6zF>
- Grade, M. (2004, June 29). Building public value. *BBC*.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speeches/stories/bpv_grade.shtml
- Holtz-Bacha1, C.& Norris,P. (2001).To entertain, inform, and educate: Still the role of public televis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23-140.
- Horowitz, M. A., & Clark, J. (2013). Multi-stakeholderism: Value for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G. F. Lowe & F. Martin (Eds.), *The valu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pp. 165-181). Göteborg, SE: NORDICOM.
- Iosifidis, P. (2007). *Public television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NY : Palgrave Macmillan.
- Jakubowicz, K. (2006). Keep the essence, change (almost) everything else: Redefining PSB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I. Banerjee & K. Seneviratne (Eds.),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 94-116). Jurong Point, SG: AMIC.
- León, B. (2007). Commercialisation and programming strategies of European public televis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urpose, genres and diversity. *Observatorio (OBS*) Journal*, 2, 81-102.
- León, B. (2010). Spanish public service media on the verge of a new era. In P. Iosifidis (Ed.),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 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

- (pp. 197-208).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ater, M. A. (2006). USA: The state of public broadcasting—promoting democratic access. In I. Banerjee & K. Seneviratne (Eds.),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 312-326). Jurong Point, SG: AMIC.
- McKinsey & Company. (199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round the world: A McKinsey report for the BBC*. London, UK: BBC.
- Meier, H. E. (2003). Beyond convergence: Understanding programming strategies of public broadcasters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3), 337-365.
- Meijer, I. C. (2005). Impact or content? Ratings vs quality in public broadcas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 27-53.
- Ofcom. (2015). *PSB annual report 2015*. London, UK: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binaries/broadcast/reviews-investigations/psb-review/psb2015/PSB_Annual_Report_summary.pdf
- Santín, M., & Rubira, R. (2014). Promotional practices in news programs: The case of Spanish public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810-829.
- Savage, P. (2010). Identity housekeeping in Canadian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P. Iosifidis (Ed.),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 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 (pp. 273-286).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eneviratne, K. (2006). Definition and history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I. Banerjee & K. Seneviratne (Eds.),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 9-58). Jurong Point, SG: AMIC.
- Stavitsky, A. G., & Avery, R. A. (2003). U.S. public broadcasting and the business of public service. In G. F. Lowe & T. Hujanen (Eds.), *Broadcasting & convergence: New articulations of the Public Service Remit* (pp. 137-146). Göteborg, SE: NORDICOM.
- Stemers, J. (2003).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s not dead yet: Strateg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G. F. Lowe & T. Hujanen (Eds.), *Broadcasting & convergence: New articulations of the Public Service Remit* (pp. 123-136). Göteborg, SE: NORDICOM.
- Syvrtsen, T. (2003). Challenges to public televis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and commercializat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 4*(2), 155-175.
- Tambini, D. (2014). Public media and digitization: Seven theses. In F. Bermejo et al. (Eds.), *Mapping digital media: Global findings* (pp. 75-105). London, UK: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 Tsourvakas, G. (2004). Public television programming strategy before and after competition: The Greek cas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7*(3), 193-205.

Examining the programming strategies of Taiwan's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u-De Hsu & Yuan-Hui Hu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globally have been experiencing ever stronger challenges from the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secto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fast-changing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mostly adopt convergence strategies in their programing, even though this ac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as moving away from their founding mission statements,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servic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although Taiwan's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 was established in a different context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it cannot avoid following the trending strategy of programming convergence with that of its commercial counterpart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cheduling ratio of variety and drama programs is increasing yearly and those programs constitute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its overall broadcast. In addition, content analysis of PTS's annual reports over the years indicates that though the senior management may not openly voice the role of the rating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its programing strategies, its importance seems to be a rising tren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aced with the similar programing convergence phenomenon a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PT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sufficient operational funding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mission statement and be ready for the advent of the new public service media era.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media,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rogramming strategy, programming convergenc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Taiwan)

* Fu-De Hsu is graduat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e-mail: shift0309@hotmail.com
Yuan-Hui Hu i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e-mail: telyhhu@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四期
2016 年 12 月 頁 143-197

关于「看见」的持续思考与对话—
试评介丘贵芬《「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

郭力昕*

書 名：「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
作 者：丘貴芬
出版日期：2016 年 1 月
出 版 社：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本文引用格式

郭力昕（2016）。〈关于「看见」的持续思考与对话—试评介丘贵芬《「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4:199-207。

投稿日期：2016 年 7 月 31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8 月 25 日。

* 作者郭力昕为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e-mail: lixinwho@gmail.com。

台湾纪录片的论述文字相当不足，相关之学术研究写作的出版更是缺乏。在丘贵芬教授的《「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问世之前，国内关于纪录片的中文出版，大约集中在西方纪录片历史与制作的译介¹，台湾纪录片研究史料的整理与汇编²，以及对纪录片创作者的访谈³这几方面。过去两三年出现了五份涉及台湾纪录片评介或研究的专书出版。长期耕耘纪录片创作与研究的李道明教授，将他对西方纪录片历史、制作、与概念所累积多年的知识分类耙梳，汇集为《纪录片：历史、美学、制作、伦理》（李道明，2013），并加入了一些台湾纪录片的例证，与对台湾纪录片产制分析的详细资料，是很有价值的教学与研究参考书。笔者的《真实的叩问：记录片的政治与去政治》（郭力昕，2014）则是针对过去十余年台湾纪录片现象的一些观察，与某些具有代表性之纪录片作品的评论文字集结。游惠贞策划编撰的《记录亚洲》（游惠贞，2014）介绍了包括台湾的十几个亚洲国家的纪录片发展历史与现况，扩展了读者的视野，同时也对比了台湾与其他亚洲国家在纪录片发展上的差异历史经验。

然而，第一本针对台湾纪录片的学术专书研究，则是中国年轻学者李晨改写其博士论文，并在北京出版的《光影时代：当代台湾纪录片史论》（李晨，2014），这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台湾纪录片研究者应该感到有些尴尬⁴。李晨的著作在资料搜集的研究工夫上尚称认真，但由于其博士论文完成于2007年，而其主要的纪录影片资料则止于2005年，而此专书并无太多资料更新上的改写；少了台湾过去十余年纪录片文化最丰盛多元的景观，多少减低了一些这份史论的参考价值。此外，由于对岸在研究与出版时无法避免的政治

¹ 如王亞維翻譯（1996, 1998）的兩本早期國外著作，分別在2012與2010年再版。另外，游惠貞譯（2000）是至今唯一一本關於西方記錄影像研究的學術性譯作。

² 如張昌彥、李道明（2000），李道明、王慰慈主編（2000），以及王慰慈主編（2006）。後者初步開展了對台灣記錄片的研究和論述的可能方向。另外，「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移至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時，國美館曾策劃兩套叢書《2008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一）》（2008）、《2009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二）》（2010），對台灣紀錄片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³ 例如，王慰慈（2001），蔡崇隆主編（2009），以及林木材（2012）。

⁴ 國內過去以來有不少研究台灣紀錄片的碩士論文，但針對台灣紀錄片歷史的整理研究尚不多見。前年自英國學成返台任教的陳斌全老師的博士論文（Chen, 2014），若有機會改寫為中文出版專書，將會相當令人期待。

考量，使这本史论在影片文本的议题选择，或者其史观与解释方式，都有一定的考量或盲点，或不得不表态的既定立场。未必书中所有观点都有问题，但一种必须被限制的观点，总是让一份学术研究写作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不免可惜。

直到丘贵芬的这本专著面世，我们才真正看到了第一份由国内学者研究撰写，具有高度学术参考价值与阅读乐趣的纪录片研究著作。如果第一本关于台湾记录片的研究性专书由中国学者在大陆出版，而令人有些尴尬的话，那么国内第一本具有重量的纪录片学术研究专书，是由一位长期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学者另辟空间的耕耘成果，则一样得要让如我这样的影像文化研究者感到汗颜。台湾电影在剧情片方面的学术研究，相对地有着一些精彩的成绩，而纪录片则几乎还没起步。丘贵芬的这本着作，为台湾影像文化研究贡献出一份杰出的成果之余，同时也成为台湾影像研究者需要更加努力的标竿与鞭策。

本书的内容扎实丰富，概分五章。第一章是导论，从亚洲几个国家纪录片发展的宏观视角，回顾台湾「新纪录片」的发展进程，并定义 1980 年代中期以降的纪录片，从视角（或发声位置）、展现形式，以及生产、放映、流通模式等不同面向，何以为「新」。此章梳理台湾新旧纪录片的发展轨迹与阶段性变化，并针对纪录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记录片的定义、特质与主要议题，进行了基础但相当全面的铺陈。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讨论历史纪录片与环境纪录片；通过与主题相关的诸多作品的提点，与几部具代表性作品的细读，历史与环境这两个丘贵芬认为关照着时间与空间的创作主题，成为本书在纪录片主题类型上特别关注的研究方向。第四章与第五章的内容规划，则由纪录片创作题材或类型的讨论，转为纪录片研究的其他议题：第四章以几部具体作品讨论台湾记录片的伦理问题，第五章则从国际影展的表现，分析台湾纪录片在国际发声的因素与困难。

每一章的内容都精辟、扎实，理论的耙梳和参照充分，书写流畅，呈现了一位治学严谨的研究者，如何能在大量的资料和理论中进行提问与论辩，让一本学术写作保有高度的可读性与思辩性，并不断引发着读者与之对话的欲望。这样的例子全书比比皆是。例如，在第一章论及纪录片特质的一节里，

作者引述李道明与王斑教授的洞见，提醒我们「纪录片与真实世界无法切断的连结……轻易取消纪录片与剧情片的界线，并无助于我们探讨纪录片这种特殊电影形式所带来的深刻课题。」（页46）在纪录片创作方法与美学日趋多元的今日，我认为这样的提醒并非回归传统的「反祖意识」，而是对影像与真实的深刻反思和提醒。又如，在第二章论及「影像化的历史书写」这个话题，也在本书第三章讨论影像如何论述环境题材时被提及，这是一个关键议题，值得深入对话。我将在稍后回到这个讨论点上。

以历史和环境为主题的纪录片，确实是台湾当代纪录片的两大类内容。固然，近三十年来的台湾纪录片生产，还有其他主题类型，例如各类社会议题、劳工议题、国族认同、性别议题，以及个人化的题目，与励志性的故事等等；作为一本研究台湾新纪录片的书写计画，在这些主题类型上的讨论，似乎未见研究者给予与如历史和环境两类主题同样的篇幅。然而，一本专书不见得要包办所有重要的纪录片研究主题，这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未来的持续书写。本书的章节结构安排，一方面是结合了丘贵芬过去以来在纪录片研究方面的论文，经过大幅度改写或重写之后的研究架构。另一方面，如丘贵芬所言，「历史叙述」一直是她在文学研究上的关切课题；至于环境议题，则如作者在序文所提，是她跟着环境纪录片导演或研究环境相关问题的同事朋友，亲自到污染现场之后引发的研究驱力。这样的研究动机所展示的主题选择倾向与成果，经常可能会比面面俱到的学术书写更具动人的能量。

作者以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待历史纪录片与环境纪录片这两个本书主要课题。这样的概念固然不错，不过若以近年在当代视觉艺术领域讨论热烈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概念来看的话，则人类文明和工业发展对环境破坏的历史与当下，使环境议题更可以是「时间」的课题：人类在无尽的经济开发和资源掠夺的贪婪下，造成对环境的加速度毁坏，使今日的文明，要多快成为历史与灰烬？历史并没有如福山的得意宣告，终结在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的1990年，却有可能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快的将终结在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无尽挥霍与破坏里。环境议题，在这个意义下，就不仅是空间或时间的课题，而恐怕是最大、最急迫的政治议题了。

基于这样的论点，使我针对本书就环境纪录片的一些看法，希望与丘贵

芬进行一些持续的对话与商榷；一方面也是由于本书许多地方的论点，是我某些曾发表过的意见为一个主要的对话或论争对象，使我意识到持续对话的责任与乐趣，是我阅读本书在汲取知识之外的一大收获。本书仔细梳理关于环境纪录片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论点，并以几部国内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当本书回应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评论意见时，丘贵芬秉持研究者面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在回应、对话时的同意或不认可的意见上层次分明，客观持平。对于本书同意或谬赏笔者某些其实也未尽严谨的论点，限于篇幅我就暂且略过，于此我只针对部分看法不同的地方进行对话。

作者以引为书名的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为例，分析这部缔造了超过两亿台币票房的环境纪录片对环境议题的价值，以提出对包括我的一些对此片批评的不同意见。本书多次在不同的地方，对于过去十余年来台湾许多进入院线的、受政府或商业机构支助的、能大肆宣传的、或曾为政治人物背书的票房影片，被动辄冠以「被主流势力收编」这个说法不能苟同，【看见台湾】则是其中一个争论的案例，而我则是这个作者认为有问题的、或过于简化的说法的主张者之一。也许我在过去曾发表过的几篇相关评论文字里，对于何谓「被主流势力收编」这个概念，说的不够清楚，而本书所引述的相关评论也不全是我的意见。但因为多年来讨论纪录片的政治性，若因此需要某种程度的概括承受这个论点的话，我愿意以曾经数次在他处提过的看法，于此再强调一次。

其一，有票房效果的纪录片上商业院线，并不自动是「被主流势力收编」，甚至应被期待它们可以发挥的话语效果；是在台湾特殊的戏院机制和观影语境下，使上院线的「主流纪录片」，常必须遵循投此语境之所好的某种选材与制作上的方向⁵，才是我担心的问题。其二，所谓纪录片「被主流势力收编」，并不一定表示政治或商业势力主动介入了「收编」计画，以服务其政治宣传或商业利益；甚至，并非记录片的制作团队必然处心积虑的以其影片讯息，投怀送抱于主流势力的政治或商业效益。他们可能只是想在票房上成功、亮

⁵ 不過，有些非以票房為目的的紀錄作品，也能有排上戲院放映的機會，如在國內最早得以上戲院放映的影像人類學者胡台麗教授的影片，或近年一些創作型的記錄作品，則不包括在這樣的討論裡。

眼，以确保有制作下一部影片的机会；甚至，创作者可能在营利之余，也真的说服了自己，他们迎合或不自觉鼓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对社会进步是有帮助的。这其实更是在自我催眠之下，自己收编自己，自我合理化的加入主流势力，以促进社会进步的姿态或宣称，继续巩固、扩大主流意识形态，使其沛然莫之能御。

回到【看见台湾】之政治效应的争论。本书对比了黄信尧的【带水云】和齐柏林的【看见台湾】。作者以提问的方式，明确指出前者美感化云林县口湖乡因地层下陷以致海水倒灌所形成的淹水「美景」⁶，但肯定后者见证了台湾的环境创伤，召唤了观众的环境意识，也产生了不少立即可见的正面政治效应。丘贵芬认为，这样具有通俗话语效果的纪录片，其教育和政治意义，并不比社运性质的环境纪录片「低下」或无用（页 150）。我很同意这个概念本身，也想强调，讨论环境记录片的政治性时，通俗形式的影片或运动型影片何者具有更多政治上的「道德纯粹性」，并不应该在讨论的意念中。我也不认为社运影片自动就有较多的道德动机。

作者强调，本书的第三章「着眼于纪录片政治（documentary politics），重点将放在影片的呈现方式如何回应、探索环境课题」（页 112）。本书对环境记录片的关切，既然是它们的政治性，而非扩大解释的 ecocinema，则也许争论的核心问题，还是得回到「看见」这件事。见证人为的环境破坏，当然是具政治性之环境纪录片必要的基本讯息。然而，许多对纪实影像的国内外研究与论述都早已指出，纪实影像若只停留在见证这个层面的讯息，则它大抵只能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式的社会关怀，它的政治作用也只会是一种改良主义（liberal reformist）式的效应，对现状（status quo）不但没有威胁，反而帮忙巩固了既有的政治生态或结构。⁷

作者问：「所谓『好』的、『值得赞许』的纪录片到底是什么样的纪录片？」

⁶ 但作者於討論【帶水雲】的最後，仍以學術的謹慎態度，提醒此作仍未必是呼應主流勢力，其可能原因，引張子見教授的說法，乃是淹水的生活方式，可以營造出一種地方產業特色，也許「以後口湖會變成台灣的威尼斯，大家過著一種水上的生活。」（頁 137）

⁷ 關於紀實影像之見證作用的相關論述，尤其是紀實攝影方面的批評，文獻太多，也已成爲紀實影像研究方面的某種共識，遂不於此作特定的援引。

纪录片的『政治性』显然是个复杂的课题。」(页 142) 作者也认为, 一部不到 100 分钟的影片, 不可能将关于各种国土破坏的结构性问题都交代清楚。我同意一部篇幅有限的纪录片无法触及过多问题, 结构性问题的详细分析, 也未必一定是所有纪录片创作者的责任或应有的能力。但是, 一部希望带给观众认识环境议题的纪录片, 应该要让观众同时看见的是问题, 不能只是现象。问题可以在记录现象时提问, 起码提问一两个何以台湾环境会全面崩毁的核心问题, 比完全不碰要对观众有帮助的多。【看见台湾】不断俯瞰这个岛屿地表的环境创伤, 但更多的创伤影像, 并不会累积成具有政治认识意义的提问; 没有准确的问题意识, 观影之后的一时热血行动, 恐怕很难阻止这些环境问题的继续存在与恶化。

事实上, 观看「环境创伤影像」这件事, 可以是很吊诡的。影像创作的人都知道, 框取之后的照片, 或者通过特别镜位(尤其空拍、俯视这种充满神圣感的角度)、光线、色彩与镜头运动下的动态影像, 可以「化丑恶为美丽」, 将任何原本应该是脏乱、恶质、创伤的视觉材料, 转化为美感经验。这是摄影机所具有的「创造性」与魔术效果, 有时未必是摄影者刻意为之。果若如此, 则更多的环境创伤见证, 对观众的环境意识, 有何根本上的助益? 环境污染与破坏, 根本的问题在国家 / 跨国资本主义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高度勾结, 我认为它因此是大于国族矛盾、文化冲突或恐怖主义的更为迫切的全球政治问题(只是强国领袖一直刻意淡化它的急迫性)。也因此, 本书第四章论及的各种纪录片伦理, 尽管都非常重要而具有前提意义, 我仍认为涉入现实的纪录片, 最后、最大的「伦理」, 是纪录片究竟让观众「看见」了什么, 有没有政治性的提问或问题意识。

这样的讨论, 不断触碰到一个关键讨论: 纪录片这样的叙事形式, 对复杂的议题或政治性提问, 究竟能够做多少? 作者在论及历史纪录片和书写历史的差异时, 引述一位国外学者的论点, 认为影像面对的是一般观众而非历史专家, 「其目的在于激发对于一个议题的兴趣和后续探讨, 便可能舍弃在短短一两个钟头的影片里进行复杂深入的辩证, 避免让观众难以消化而失去兴趣的风险」(页 70)。这样的看法, 大约也适用于环境或政治等议题复杂的纪录片。文字与影像确实是两种不相同的语言, 但它们是否一定如此南辕北

辙，以及，因剪接而能组织意义和结构性话语的动态影片，在面对复杂议题时，是否只能激发观者的眼球、情绪或初步的兴趣，这些仍可商榷。我在英国看他们的电视纪录片时，发现他们对影视作品的叙事与提问企图，和问题化议题的能力上，并不自我设限，或假设观众一定看不懂、不耐烦；相反的，他们的策略是「高估观众」的议题接受能力。长此以往，终究培养出能够阅读影片复杂议题的观众，与能制作复杂深入之影像叙事的人才。这个经验，或许值得我们以文字书写的人，反思对影像叙事潜力的既定想象。

本书最后一章，分析台湾纪录片在国际发声时，能入选国际影展或者竞赛得奖影片，原因在哪里；台湾纪录片虽然质量丰富，却又普遍难以受到国际注目的因素有哪些。作者对国际文化政治的通透分析，非常值得纪录片创作者思考与参照。而书末作者留给读者的两个问题：台湾纪录片在国际上「不被看见又如何」，以及，「如果被看见了，但是台湾观点的论述却缺席、消音，我们认为如何」，俱是有价值的提问。若以读者的位置回应这两个问题，我会认为：纪录片若在乎其政治意义，首要或优先的目的，是在地的意义；是否能让国际看见、认可，于我并不重要。如果为了挤上国际舞台，被要求删减在地的政治意义或脉络，或为了投「国际（其实就是西方）市场」之所好，而在题材与表现上配合这个市场的消费需要而做取舍，则是本末倒置。

纪录片的「看见」或「被看见」，是一个需要不断讨论、争辩的题目。因为丘贵芬《「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的出版，我们藉由其质量充沛的研究成果，在吸收了知识和观点之余，也因此有机会进行持续的对话。所有创作或研究纪录片的人，与希望深入了解台湾纪录片文化的读者，都应该为本书多方面的价值而感谢它的出版，并享受本书贡献的丰硕内容、思考与提问。

参考书目

王亚维译（1996）。《记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台北：远流。（原书

- Barsam, R. M.[1992] . *Non-fiction film: A critic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王亚维译(1998)。《制作纪录片》。台北：远流。(原书 Rabiger, M.[1992]. *Directing the documentary*. Boston, MA: Focal Press)。
- 王慰慈(2001)。《记录与探索：1990-2000 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
- 王慰慈(主编)(2006)。《台湾当代影像：从纪实到实验 1930-2003》。台北：同喜文化。
- 李晨(2014)。《光影时代：当代台湾纪录片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道明(2013)。《纪录片：历史、美学、制作、伦理》。台北：三民。
- 张昌彦、李道明(主编)(2000)。《台湾纪录片研究书目与文献选集》(上、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 李道明、王慰慈(主编)(2000)。《台湾纪录片与新闻片影人口述》(上、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 林木材(2012)。《景框之外：台湾纪录片群像》。台北：远流。
- 陈树升(主编)(2008)。《2008 台湾纪录片美学系列(一)》。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
- 陈树升(主编)(2010)。《2009 台湾纪录片美学系列(二)》。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
- 郭力昕(2014)。《真实的叩问：记录片的政治与去政治》。台北：麦田。
- 游惠贞(2014)。《记录亚洲》。台北：远流。
- 游惠贞译(2000)。《谁在诠释谁：记录片的政治学》。台北：远流。(原书 Rabinowitz. P.[1994].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 : The politics of documentary*. New York, NY: Verso.)
- 蔡崇隆(主编)(2009)。《爱恨情愁纪录片：台湾中生代纪录片导演访谈录》。台北：同喜文化。
- Chen, P.C.(2014). *A critical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傳播文化與政治 · 第四期
2016年12月 頁199-207

评《文化资本-创意英国的兴起与衰退》

蔡蕙如

書 名：Cultural Capital: The Rise And Fall Of Creative Britain
作 者：Robert Hewison
出版日期：2014 年
出 版 社：Verso Books

本文引用格式

蔡蕙如（2016）。〈评《文化资本-创意英国的兴起与衰退》〉。《传播、文化与政治》，4:209-215。

投稿日期：2016 年 9 月 15 日；通过日期：2016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蔡蕙如为英国罗浮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e-mail: H.Tsai@lboro.ac.uk。

1997 年，布莱尔（Blair, Tony）领军，英国工党在野 18 年后，重回唐宁街十号。这个世人称为「新工党」的政府，执政后次年，推出「创意经济」的说法，并迅速在数年之间，吸引全球许多国家的目光。台湾在本世纪初也逐次援引，更在华语世界率先使用「文化创意产业」一词。

就英国来说，创意产业政策推出，在当时似乎是想成为药方，解救英国的制造业衰败与外移。但许多研究却已指出，新工党于 90 年代末所提出的创意产业政策，遵循的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作法，未能振衰起弊；新工党宣称，这些「外包计画，是公部门和民间企业的有效合作」，究其时，却是柴契尔主义私有化策略的间接继承者。在「酷大不列颠」(Cool Britannia)与「创意英国」(Creative Britain)的大旗下，佐以「知识经济」、「资讯社会」、「创意经济」等新的修辞（包括「新」工党）下所推动的各种创意产业政策。虽然前文化媒体与体育部部长克里斯·史密斯（Smith, Chris）在《创意英国》（1998）一书曾宣称接下来新工党政府不仅会努力扮演滋养创意的角色，更会将民主精神带入文化领域。而透过创意产业政策的推动，艺术与文化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享受，而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然而在 2005 年的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与体育活动参与度普查报告结果指出，只有不到 20% 的民众表示他们经常性地参与各类文创活动，57% 的民众反映他们几乎非常少投入此类活动（Hewison, 2011, p.241），似乎间接证明了「创意英国」的计画并未真正创造所谓的民主的文化参与。

《文化资本-创意英国的兴起与衰退》作者休伊森（Hewison, Robert）作者本身即是亲工党智库（Demos）的研究人员¹、文化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兴趣是战后英国文化与艺术政策的发展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²，并长期为周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撰写艺术与文化评论。

¹ DEMOS 智库於 1993 年成立，在其網站介紹上說明該組織為跨黨派的智库，主旨為「讓政策貼近人民的需求」。並不定期出版政策研究與社會觀察報告。然而，根據《衛報》報導的介紹指出 DEMOS 其實是形成新工黨政治意識形態與政策的重要智库。其創始人包括前英國首相辦公室政策主管 Geoff Mulgan 和 1980 年代《今日馬克思主義》雜誌的前編輯、《衛報》專欄作家 Martin Jacques。

²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藝術家、藝評家、政治評論家，提出藝術社會主義，並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主導英國美術工藝運動。

本书通过深度报导，追踪新工党创意政策的发展。作者淡化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直捣黄龙。作者进入报章杂志、演讲文稿与政府文件，从中揭露决策过程，并对细微的改变有所交待，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看到，这些政客如何再三抛出新的词汇，又如何通过节庆活动，消磨文化与艺术部门的核心价值与基础。章节编排也以编年史的方式，描绘新工党创意产业政策的起源与执行面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并从千禧穹顶计画到 2012 年奥运开幕式（1997-2012）的过程，回顾新工党失败的创意产业政策与后来联合政府（保守党与自民党）的樽节政策，各种公共工程外包、失败的都市更新计画，在在指出文化政策如何挂羊头卖狗肉变成经济政策。从「酷大不列颠」的宣言、千禧穹顶建设计画、伦敦奥运更明确展现文化变成商品的问题。遑论目标至上、效率优先的政策管理，到头来还是扼杀创意与文化的不归路。

壹、创意产业政策扼杀创意

休伊森认为，新工党上任以来先营造一种享乐、虚无、个人主义式的流行文化，接着以文化工业、资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等口号与政策即将带来的财富与就业机会做为号召。但研究显示，创意产业政策的推行并不如预期效果，包括参与艺术活动的人口并无显著上升、扩大创意产业人口就业机会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工作仍是低薪、不稳定、临时性的工作，并且大部分的工作并非所谓的「创意的」工作，而是被纳入创意产业链里的一般工作。

作者开宗明义表示「别再相信政治与艺术两者八竿子打不着这种流行的偏见」，暗示着创意产业政策与文化政策发展历史中，政治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政治与艺术同样扮演撩拨情绪、形塑社会文化的角色。休伊森因此说：文化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组织生活的方式，这里，休伊森在雷蒙威廉斯的名言上，更进一步强调政治活动的作用。对休伊森而言，文化资本应该是公共财的一部分，具有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并且它的价值来自于它的丰饶而非其稀缺性，每个人都可以共享。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下，文化公共财却被私有化为一件件商品贩售，被作为工具性的使用。除了文化政策被工具化，变成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修辞，打造

了创意英国、创意经济与创意阶级，这些「很酷」的新词汇，鼓励了生活风格的个人主义与新的企业家精神，「创意阶级」变成时尚，但其实刻意忽略创意产业劳动的自我剥削程度，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最大赢家。

同时，新工党政府上任以来推崇讲究效率的现代化公共管理制度，对文化部门而言，布莱尔沿袭保守党的政策：文化部门不该过度依赖公共补助，因此文化部门的观光化的问题也因此浮现：公共补助转而用来支持具有商业利益价值的休闲产业的活动与节庆。休伊森认为，例如由国家文化遗产部改名整并为新的文化媒体与体育部（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符合威廉斯对文化民主化的想象，实际上该部门的成立，特别是文化与媒体这两个字并不是针对威廉斯的理想的公共广播电视 BBC 而是指数位科技的汇流下，文化与媒体可以驱动整体文化工业，带来更多利益。同时，虽然新工党将文化与艺术设定为该部门的核心精神，但实际上只是将艺术和文化遗产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文化与创意产业（本书，p. 28）。

特别是各地的都市更新计画也被包装在创意产业与观光旅游业的计画中，各地城市以文化作为包装，对于废弃不再生产的工厂进行改造，从 1980 年代英国经历一连串去工业化的过程，英国制造业在全球化与政府政策放任的浪潮下，也出走到中国印度等地设厂以降低成本（廉价劳动力）。这个制造业衰败的空缺则由新工党提出的「文化创造财富」（本书，p.34）变身为一个新政治手段，奠基于知识经济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分离原有传统制造业工人阶级的根基。

貳、千禧年体验与奥运之后的副作用

即便新工党高举「效率至上」，标榜「新的公共管理学」，欲摆脱保守党长年来迂腐守旧的形象，变得更「酷」。然而，创意产业政策的成效事与愿违，连原本宣称的经济「效果」，也未能达成，个中最著名，或说恶名昭彰的案例是千禧穹顶（McGuigan & Gilmore 2000, 2002; McGuigan 2003, 2004）。

根据统计，新工党至少浪费约莫 6 亿镑的乐透补助经费在千禧穹顶的计画（Hewison, 2011, p.240）。

新工党在 1997 年执政，大力推广「创意英国」的政策口号，吹嘘多少经济与文化利益将在创意政策推动后大幅提升，但未有显著成效。而千禧穹顶建造计画，原是保守党政府过去曾提出的计画。新工党让它死灰复燃，试图赋予新的意象：一个展示大英帝国的伟大即将迈向千禧年、象征全英国人民的新的精神地标。不仅如此，政府宣称此计画，将会带来巨大的观光效益。最后这个由民间企业建造与出租、买断公共空间，预算严重超支的千禧穹顶计画，并未带来预期的观光财，号称参观人数。英国政府多少黔驴技穷，落得鼓励中小学校前来千禧穹顶，办理校外教学活动，目的无非是让参观人数得以增加。

建造千禧穹顶看似是为了庆祝千禧年的一系列计画之一，但实为格林威治半岛的都市更新计画的一部分（Nicolson, 1999; Hewison, 2014, p.49）。作者发现，千禧穹顶其实曾被考虑坐落在德比或伯明翰，相较于伦敦格林威治半岛原本是一处前工厂废弃与污染遗迹。虽然就技术上来说，千禧穹顶的唯一股东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千禧穹顶于千禧年（2000 年）之后的运作模式，在各种势力妥协后，居然达成由私人企业负责营运的协议。由此可知，公共主导都市更新计画固然不全是罪恶，但新工党以文化为名的都市更新计画，不仅由外包公共建设建案，经营权也被私有化，延续的是保守党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思维与精神（本书，pp.50-52; McGuigan 2004）。

事过十年之后，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典礼，同样不脱名实不符的案例，再次暴露了创意经济的问题。休伊森说，千禧穹顶的失败在前，伊拉克战争致使英国声望低落在此后，这就使得标奥运会成为重要契机，新工党试图藉由壮盛国际庆典，重振英国雄风（本书，p.174）。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其实就是一家被各国政府惯坏了的国际性的私人公司组成，资金来源由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国际企业赞助。这些企业在承办奥运相关业务同时，还故意夸示运动会可望创造 7000 个职缺，欲藉此来控制赞助的合约细节与奥运票务销售权（本书，p. 177）。休伊森同时也分析了伦敦奥运开幕如何再现大英帝国的伟大、「创意英国」的成功，

但实际上也仅此于那一夜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而已，但这些「再现酷大不列颠」的表演是由超支的公帑、政治角力、近万名的志工所共同燃烧的结果（本书，p.196）。

然而，奥运会毕竟也只是一种包装，这次瞄准的就是东伦敦最为雕敞破败的区域：下利亚河谷区（Low Lea Valley）。在奥运主馆场等相关设施建造过程中，预算不断增加，从原本两亿英镑的建造费用，到 2003 年奥林匹克公园与其他设施的费用为「都市更新」的项目，又增加一亿英镑；额外的七百万英镑来自私部门。到了 2007 年，增加到 9.3 亿英镑（追加的经费来自英国政府、伦敦发展局、乐透彩，以及部分私部门支出）。奥运过后，就连伊丽莎白皇后奥运公园（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也并非由皇室经营，而由民间企业管理。然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街区的房地产、各种公共建设的兴建才是主要目的。连当时的伦敦市长 Ken Livingstone 对体育赛事毫无兴趣之人，都嗅到该区域在都更后的庞大商机，支持促使伦敦发展局支持此计画，并提拨伦敦市政府额外的超过 6 亿英镑的税金支持此区域都更计画。这都难让人相信，官方保证奥运会之后，该区域的整个社群的每一个居民都会因此受益。然而实际上受益的并非原本住在东伦敦的弱势族群，在奥运之后，部分居民因为无法负担上涨的房租而搬迁。所谓都市更新计画，实未落实。

参、迈向公共的文化政策

对于新工党所推动的创意产业论述与文化政策，休伊森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化批判主要反对的是官样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价值与目的。而今（二十一世纪），官方文化与商业文化已经相互依存，这是因为英国新工党所发明的创意产业政策所改变的关系。然而政府有职责推动「公共的文化政策」，发展公共补助的问责机制，为专家学者、艺术家、大众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互信关系，对文化政策的推动而言，好的文化参与机制，并非「买票入场」而已，而更需要一种长期互动与在地文化组织的合作与培养计画。然而目前在英国却有很多地方的独立文化组织，仰赖慈善基金运作，而非国家的公共补助。文化资本不是为了创造更多文化商品、文化消费，而是一种文化的公共

利益，它不是商品，而奠基在历史累积的各种文化艺术遗产上并发展出永恒可持续性的知识体系，而所谓的「创造力」是因此而孕育，绝非「创意产业」(McGuigan 2016)。

参考书目

- Hewison, R. (2011). "Creative Britain": Myth or monument? *Cultural Trends*, 20(3-4), 235-242.
- McGuigan, J., & Gilmore, A. (2000). Figuring out the dome. *Cultural Trends*, 10(39), 39-83.
- McGuigan, J., & Gilmore, A. (2002). The millennium dome: Sponsoring, meaning and visi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8(1), 1-20.
- McGuigan, J. (200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disaster: New Labour's millennium experience. *Cultural Studies*, 17(5), 669-690.
- McGuigan, J. (2004).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Issues i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Berkshire: McGraw-Hill Education.
- McGuigan, J. (2016). *Neoliberal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Nicolson, A. (1999). *Regeneration: The story of the Dome*. London, UK: HarperCollins.
- Smith, C. (1998). *Creative Britain*. London, UK: Faber.

《众志》以两岸民众为主体 推动文艺跨境交流

李哲宇*

《众志》计划¹的思想资源起于 1990 年代，来自亚洲民众戏剧的交汇。我们希望透过韩国、台湾、香港与菲律宾等亚洲民众戏剧工作者的跨境交流与学习参照，共同揭示草根政治的民众连带与戏剧形式，支撑无需闭锁在民族国家之内的民众视野，清除后冷战时代下仍然存在的帝国殖民遗绪，同时超越顺其衍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框架。

90 年代民众戏剧在亚洲的发展理路，联系于第三世界民众的解放思维，试图摸索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它与共产政权相继瓦解有关，反映彼时左翼政治想象计划的失效。因此，具有革命意义的组织与解放构想，必须另作转进，民众戏剧的实践应运出现，就是要通过民众的参与和培力，以戏剧作为操演，提出新的乌托邦实验，挑战既有秩序。

台湾的小剧场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个部分，兴起于 1980 年代。到了 1990 年代，进步能量大多聚集在地理认同，致使社会运动与小剧场运动处于颓势。此时，幸有民众戏剧适时引入甘泉，缓缓开通以社区作为行动场域的戏剧，承袭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实验。无须讳言的是，民众戏剧行动得以依托于社区而开展，仍与起源于地理认同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有关。台湾的民众戏剧或社区剧场，至今无法自外于政府的治理机制，根源在此。身处这个格局，戏剧越来越像是出气筒，发泄了受压迫者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对于治安秩序

*作者李哲宇为「众志劳作群」成员，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博士候选人，e-mail: lijeyu@gmail.com

¹由「众志劳作群」筹画，本文作者之外，成员包括關晨引、段惠民、許孟祥、黃顯淨、郭佳與宋慧昱。計劃訊息可參見：<https://zhongzhi2016.wordpress.com/>

的维稳，竟有功能；民众备受压迫，但却无力明确指认作俑者，岛内国族政治争斗与打造公民社会的烟雾，已然致使压迫者的身影日益模糊。

相当明显，民众戏剧工作者的思索与行动难题是：国家政策会消解真实乌托邦的能量。戏剧参与者认同公民社会的公民身份，可能多于认同第三世界的民众身份。身陷其间，民众戏剧工作者自身如何自处？我们会是工匠，安然于修补治安秩序，抑或，我们必须不断重拟民众戏剧的问题意识？

因应前述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局，遂有「众志成城」在 2016 年策划《众志》。延续亚洲民众戏剧的经验，对于民族国家场域的行动局限，我们有所警觉，其间，东南亚新移民女性在 2009 年成立于台湾的「南洋姊妹剧团」对于身份的认知与追求，更是冲击我们对于公民的想象与界定。

壹、「姊妹淘戏剧交流」的跨境行动

通过肢体语言，「南洋姊妹剧团」表达新移民姊妹来台之后，必须面对的教育、价值观与传宗接代…等等议题。她们在 2016 年 10 月前往北京演出《看见我们》，陈述新移民在台申请各项证件的不易，以及取得国籍的困境。

「木兰花开文化发展中心」则在 2010 年成立于北京，是关注和服务来到北京工作的女性的非营利组织，近年成立「木兰文艺队」演出民众戏剧。除了服务打工女性的文化需求，使其融入城市生活，该队也通过戏剧，试图让打工女性的社会处境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她们四处漂泊工作、摆荡于城乡，心系「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等等课题。

有感于「南洋」与「木兰」团队的共同处境与从事，「众志成城」因此发起「姊妹淘戏剧交流」的行动，以戏剧为介面，促成双方的交流，同时展现与传播人们在跨国与城乡流动之中，所遭遇的各种认同课题。

历经半年多的戏剧工作坊，木兰文艺推出《我是女人》一剧，南洋姊妹剧团则是以《看见我们》，在 2016 年 10 月 28、29 日于北京的木兰社区所在地东沙各庄及蓬蒿剧场，进行两场演出。

图一：「木兰文艺队」与「南洋姊妹剧团」在北京蓬蒿剧场演出后合照



资料来源：黄显净摄（2016年10月29日）。

贰、「众低音演唱」计划——新工人艺术团首度来台演出

同样是 1990 年代，全世界的生产线汇聚于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资本主义史上，这是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数以亿计的打工仔与打工妹离乡背井，筑构世界工厂与市场。

身处这个情境，「新工人艺术团」在 2002 年于北京成军，其后勤走于中国各地，用音乐一点一滴拼装农民工的生活样貌，就像是在资本高分贝喧嚣中，俯身采集这些不见容于时局的众低音——成群成众发出于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现场的时代噪音。

「新工人艺术团」的主要创办人是陕西的中学音乐教师孙恒，从内蒙古到北京边打零工边学相声的王德志，以及从浙江到北京四处卖唱的许多等人。相较于京城绚烂的流行乐，他们的音乐总带了点土味，弥漫建筑工地与

工厂流水线的劳动尘埃。2004 年，在热爱音乐与关注农民工处境等趋力下，发行第一张颇受好评与热卖的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他们进而借着版税收入来到北京外围的皮村，开始了以文艺倡议农民工文化的社群发展。这十年多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中，他们相继以最为土炮的方式，成立了「同心实验学校」解决流动儿童的受教难题，搞了中国第一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呈现农民工自改革开放后的相关档案文件，并陆续号召各地农民工弄了数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²，以及专属于农民工的「打工春晚」。

图二：新工人艺术团在中正大学演出后与观众合照

资料来源：黄显净摄（2016 年 11 月 15 日）。



参、众志成城

²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委會按，「新工人文化藝術節」第一屆在 2009 年 1 月 1 至 3 日，假北京舉行，其記錄與分析請見卜衛（2010）：〈民族誌教學：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新聞學研究》，102: 229-251。

资本高分贝喧哗的时局中，面向农民工的音乐创作本就不易见于主流，加上两岸政治格局的长年喧扰，使得「新工人艺术团」在成军 14 年以来，迟迟未能来到台湾演出。为了促成他们能够来台分享以音乐开展的社会实践经验，「众志成城」与「新工人艺术团」在 2016 年终有能力协作，由后者集资自费来台，前者在台以募款与贩售胸章等方式，众筹他们在台食宿、交通、演唱设备等全数支出。在师长友人支持与相关商品的义卖下，2016 年 11 月 13 日「新工人艺术团」等一行人总算顺利来到台湾。15 日，在中正大学艺文中心的规划下，首度在台进行演讲与演唱；17 日受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刘梅君老师的邀请，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黄德北所长的安排，「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分别进行了两场弹唱新工人处境的演说。18 日至 20 日则是一连三场的《众低音》，其中 20 日的演唱还特别邀请「南洋台湾姊妹会」，与「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和「九野乐团」的段玉一同为登台演唱进行音乐工作坊。

图三：南洋姊妹会、新工人艺术团与九野进行音乐工作坊



资料来源：许孟祥摄（2016 年 11 月 20 日）。

民众的样貌自有其社会与历史性差异，我们期待《众志》以两岸民众为主体，而透过文艺为介面进行的跨境连带，在「姊妹淘戏剧交流」与「众低音」的操演下，能让我们在艺术之社会性的思辨、民众之界定与其能动性等课题与实践上，有着积极的相互参照之用。³

³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委會按，隨同「新工人藝術團」來台的呂途著有《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2013，法律出版社）一書。她的研究經驗顯示，即便身處極大不平等、儘管打工（新工人）階層受到極大的資本剝削，但「大家對“階級性”的詞語也感覺很難接受...“剝削”這個詞讓很多人覺得刺耳」。呂途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與 20 位工友談社會公平，只有 5 人認為社會不公平，同時認為這個不公平很不合理（10 位認為不公平，但認這很正常；5 位說沒有不公平，又說若存在不公平，亦屬合理）。這個結果使得呂途從「主持人變成了主辯方，和在場大多數工友進行辯論」。（頁 264, 280）這段體驗，也是汪暉在為這本書撰寫序言時，再次呼籲要在中國等轉型社會的研究，「重返階級」的緊迫與必要，但得對階級概念再作分析的意思。（頁 4-5）黃德北與林深靖通過電郵邀約，一日內有四十多位響應，參加 2016/11/20 日在台北市汀州路與呂途的會晤。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帐号 50313103